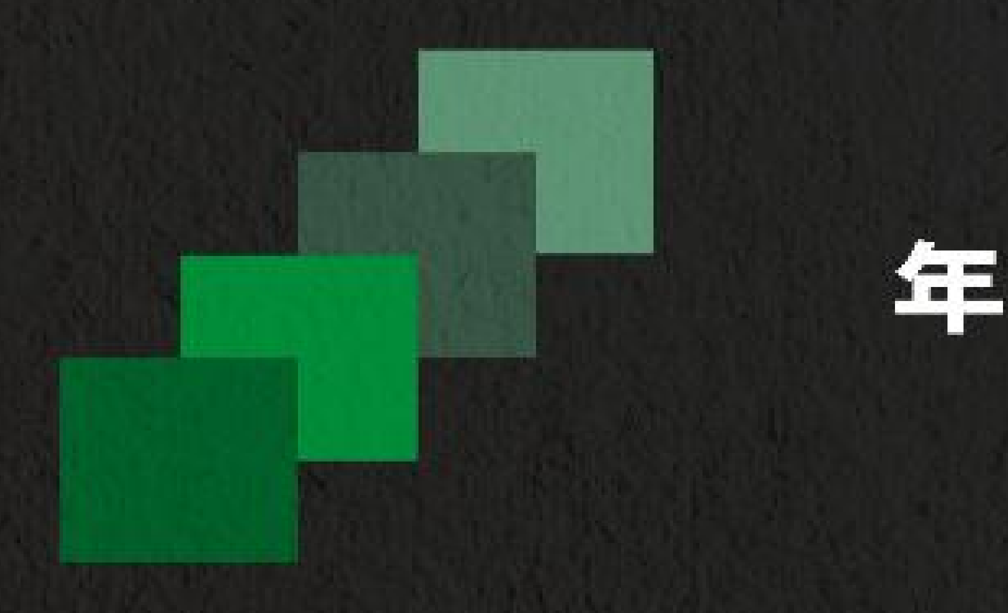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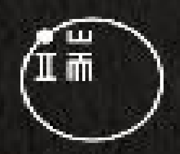
# 六四 30 年





走進記憶的隧道
抵達三十年後的六四現場

端傳媒工作室

# 目錄

# 關於端傳媒

自由的道路漫長，我們一起開端

◎端傳媒，立足香港，面向全球華語讀者，以原創深度報導和數據新聞為特色，深入剖析在地及國際事務。在時代潮湧中，提供新的討論視野和表達方式。2015年上線以來，獲得超過45個新聞或攝影大獎。設立付費制兩年多，累積付費會員超過40,000名，成為華文圈最具影響力的網路媒體之一。

▽瞭解更多



http://bit.ly/2KHTETa

▽索取《端傳媒2018-2019主編精選》



http://bit.ly/2xMxr3C

▽領取讀者專屬禮券，

# 【第一章：打撈記憶，他們站得堅定】

# 「媽媽你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天安門母親尋覓三十年

記者 鄭佩珊丨2019-06-04

監控人員上門，跟張先玲打個招呼，語氣謙恭。「唉喲阿姨，我們又來上崗了。你有什麼事，給我們打個電話。」

「又來違法了？」張先玲一句回過去。對方客氣笑笑，「啊對對，我們違法違法。」

張先玲滿頭白髮，身材瘦小，今年82歲，「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起人之一。過往多年，她出門有人開車護送，買菜有人跟著提東西，鄰居都知道張先玲的經歷，不過從來不說什麼，只是戲稱，這是「首長待遇」。受高度監控的季節由1月17日趙紫陽死忌開始，3月的兩會、4月清明節、4月15日胡耀邦忌日...... 臨近六四時，監控人員數目增至幾十人，有的守住兩條主要通道，有的緊盯她家門，有的在院子裏攔截紛至沓來的記者。

可故事還是透過網絡、透過海外記者，傳到世界各地。用張先玲的話說，30年了，她「說了千萬遍，全世界的人都聽膩了」。她要說的也

不複雜——兒子王楠死於1989年6月4日，頭部中槍，她要明白死因，知道還有多少人和自己的兒子有相同遭遇。不過儘管在北京的屋子裏說了千萬遍，聲音卻傳不到屋外去。

有整天「護送」她的年輕小伙子不知事情底蘊，以為自己真的來保護「首長」，防止生人接近。張先玲也不氣餒，就在家裡為這些小伙子印傳單。

「給他們看過真相後，絕大多數人、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人都站在我這邊，」她語氣堅定，「這些都是我的宣傳機會。」

### 他也許以為不會開槍了

北京初春的一個早上，剛剛敲門幾下，張先玲就立馬開門。她盯著我們，沒有問一句話，急道「進來，快進來」。「香港來的？」大門關上之後，她才問。明白了來意，她先邀請記者在客廳準備拍攝工具，再徑自步往房間，換下睡衣，穿上上鏡的衣服。

年輕時，張先玲是原航天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丈夫王範地是中國音樂學院教授、著名琵琶藝術家。1989年6月3日，面對緊張的局勢，王家先後兩次討論局勢。兒子王楠當時讀高中，很喜歡攝影，不時跑去

天安門廣場記錄學運。一個來串門子的朋友提醒大家要注意，擔憂部隊或許會開槍，張先玲不太同意。

朋友走了，王楠再問一次：「媽媽你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

「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都不可能開槍吧。」張先玲不太擔心，但她還是提醒兒子千萬不要出去。

「媽，你放心，我不出去。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臺上去！」

這成了母子二人最後的對話。當晚，槍聲、救護聲響徹小城，王楠住在父母家對面的樓，張先玲遠遠看到兒子房間的燈還亮著，以為他還在家裡。

第二天清晨6點，張先玲起來發現，燈還是亮的。她跑過去，發現兒子房間裡留了一張紙條：「我去找同學，6月3日晚上。」

此後幾天，家裏一直沒有王楠的任何消息。十天後，有電話打來說，找到像王楠的屍體。張先玲跑去醫院，同行的學生不忍心她去看屍體，幫張先玲認領。

「就是王楠了。因為他的脖子開過一個刀，有一個疤痕。他穿的衣服鞋子，就是他。」王楠頭戴頭盔，有繃帶包紮過的痕跡，一顆子彈射入他的左前額，從頭盔後側射出。醫生對張先玲說，屍體是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第28中學挖回來。

「我很後悔我那句話，可能是我說不會開槍。他也許認為真的不會開槍了。」

**過去的事情別再找我了**

張先玲自此烏絲全白。最初，她難以入睡也無法食飯，甚至無力下床。「我一直很希望他還是活的。」

可一段時間之後，她想要知道答案：誰救過王楠？包了繃帶，但為什麼不送到醫院呢？為什麼屍體給埋了？她說，自己成了「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逢人就說慘況，坐公車，搭計程車，朋友聚會，任何場合她也不放過。

一個出租者司機告訴張先玲，他看見王楠在南長街南口想要拍照，戒嚴部隊來了，他中彈倒下；群眾想要搶救，有老太太跪地求情，但戒嚴部隊不允許，「你們出來，我們就給你打死，他是暴徒」，其時王

楠尚有體溫。還有見證人也陸續確認這個情況，但沒有人敢出來作證。

張先玲又找到一名醫科生。1989年，他是北京醫科院應屆畢業生，6月3日當晚與同學自願組織醫療隊，為群眾急救，發現王楠救不了之後，決定收起王楠身上的證件，並寫下一份死亡證明書，包括身份、年齡、中彈部位和死亡時間，留在屍體上，後來他們被戒嚴部隊趕走了。

可王楠怎麼被埋在第28中學？張先玲繼續查找，綜合多方消息，拼湊出這樣的經過：警察大清晨接到電話，要協助戒嚴部隊打掃現場，把屍體都給埋了；隔了一陣子，屍體發臭，又被挖出來，估計因王楠當時在軍訓，身穿軍服，被誤認為軍人，才被送到醫院去了。最初，她猜測政府慌亂之下才去埋屍，後來又聽說，因當年一顆外國衛星將要打開，避免長安街實況給拍下，就得埋掉死去的人。

「這是我連出來的真相。真相到底如何，就是靠當時的人說出來。」

1990年1月，那批曾在廣場一帶救人的醫科生找到張先玲，登門拜訪，並歸還王楠的遺物，包括他的學生證和鑰匙。照相機呢？醫科生表示，他們發現王楠的時候就已經不見了。

張先玲記得，其中一名醫科生後來還給她發賀年片，現在人還在北大醫院工作，不過對於往事，已經不再提起。

「他就說：過去的事情別再找我了。」張先玲說，「他現在態度完全不同了，這也可以理解吧。」

**骨灰盒上的小字條**

王楠的骨灰存放在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骨灰堂。小小的骨灰盒上，擺放一張遺照，相片上，王楠戴著一副厚鏡片眼鏡，咧嘴笑得燦爛。

1990年，張先玲去掃墓，發現骨灰小盒子上留了一張紙條：「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紙條上附有姓名、住址和所在單位的電話。

寫字的人是尤維潔。6月4日凌晨，她的丈夫楊明湖聽到外面有槍聲，說要出去看看。在南池子東長安街的路口，楊明湖中彈了，膀胱被炸成幾片，骨盤是粉碎式骨折，撐了兩天後離世，遺下5歲的兒子。

王楠的骨灰盒就在楊明湖的後兩排，尤維潔發現了這一位死於6月4日的年輕人，就萌生了認識對方家屬的想法。

張先玲看著紙條的電話，撥給了尤維潔，邀請對方見面，後來又把字條給了更早就認識的另一位母親丁子霖看。

丁子霖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兒子蔣捷連生於1972年6月2日。1989年6月3日晚上約11點，蔣捷連在木樨地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遇難時剛滿17歲，仍是一名高中生。

看到紙條，丁子霖寫了一封信，把整個家裡的情況都告訴了尤維潔。一紙一信一個電話，依託著共同經歷的悲劇和信任，三個家庭開始聚在一起。

**尋訪死難者的原則：說謊**

六四之後，國內氣氛一片肅穆高壓。張先玲記得，時任國家總理李鵬回應事件，形容家屬覺得事情不好看，故不讓政府公佈死難者名單。

張先玲聽了心裡不忿，第二天就去找住在附近的丁子霖，商量要找被槍殺的中學生。

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同樣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任教，他建議查找範圍不應該侷限在中學生。

「要找就都找。找的目的是什麼？證據吧。你不是說就死了一個人嘛，我們給你找出來，死了幾個人？」

大家決意行動。丁子霖和蔣培坤成了主將，兩人在大學任教，認識很多學生，找人方便，同時也會接觸媒體，聯繫國際組織，述說慘案。

1994年首次正式出版名單，整理了52名死難者的信息，由香港雜誌《九十年代》代為印刷，名為《「六四」死難者名冊》，當中詳列丁子霖的住址和電話，還標明與外界有聯繫。

不過，公開露面之後，丁子霖夫婦二人很快便遭到懲罰，丁子霖的教職被「暫停」，中央宣傳部發出內部通知，禁止二人出版學術著作或在報章發文章，其名字也不准出現。

已經離開航天工業部的張先玲沒有工作，開始承擔了更多的尋訪工作。直到今天，天安門母親蒐集了一份有逾202人的死難者名單，過程不容易。

「一個原則，就是說謊，你不說謊，你找不成啊。」張先玲這樣總結她的調查心法。

掌握死難者姓名、居住地點等情報之後，張先玲挑一個不太惹人注目的晚上前往探訪。有一回目的地是公安部宿舍，還有老奶奶在門外值

班，張先玲就說：「我剛去了一個旅行團，團友認識住在裡頭的一個朋友，據知他生病了，就託我帶了東西去他家慰問一下。」

一頭銀髮的老人家很少惹人懷疑，十之八九能夠蒙混過關。不過，如果手頭上的資料不一定齊全準確，例如地址只是一個院子，未有點明單位，只知道死難者的姓氏，不得其名；張先玲曾到達現場後，才發現胡同不存在，院子給拆了，變成空地。

張先玲這時會使出同樣的招數，但會在對話添加情節，以取得更多訊息。「團友交給我點心，讓我帶給這個胡同、姓楊的，他還寫了一封信，可是我搞丟了……只記得胡同，號碼、人名都記不住了。點心擺著，時間長會壞，你會知道嗎？」

人家看她這麼大歲數，也就相信了，張先玲再下一城，「聽說他家的兒子去世了」。對方一聽就回應：「怎麼死的？」她就裝傻，「那我不知道，不就病死，還能怎麼死？」被問的不虞有詐，和盤託出。「那邊有一個姓楊的，還未拆掉，他六四時被打死了。」

直到最後面對難屬時，她才會拿出兒子王楠的照片。

曾經有一次，尋訪小隊得知難屬姓名，但對方電話改了，地址也不對。張先玲主動出擊，打去對方的工作單位。「我是某某的同學，他

搬家了，能否給我地址？」結果只能取得當事人電話，她之後又打過去，訛稱自己是某個機構的工作人員，說這家人的登記不清楚，要求拿個準確的地址。

「我是詐騙電話的鼻祖。」張先玲笑說。

不過，不是每一位難屬都積極回應張先玲。許多難屬道出了經歷，成了天安門母親的成員，也有的堅定回絕任何會面。

有難屬曾經問張先玲，這樣尋訪，有什麼意義?

「我在尋求證據，我在核對真相，總有一天有用。」這位母親回答。

**一伙人在一起**

這幾位母親一邊尋訪，一邊邀請難屬加入群體。定下的機制是簽名了就是成員，多年來，未曾有一人退出。成員當中，除了母親，還有父親，有遇難者的兄弟姐妹和孩子，還有因六四而致殘者。

他們曾撰寫起訴書控告李鵬，多年未獲回應。2000年時，這一群人為自己取名為「天安門母親」，最高峰時，成員人數達190人。

記者問道，當初沒想過變成這樣的組織吧？張先玲小心翼翼地強調說，「在國內是禁止搞組織的，組織會要取締，所以我們也不是組

織。只是群體，一伙人在一起。」

措辭謹慎，皆因這些年來，家屬一直受壓，至今也沒法公開悼念親人的離去，六四當天還得坐當局專車，才能去墓園拜祭；也曾經有難屬說，把孩子的骨灰撒了在北海公園的湖裡，以後家人每次去公園，便是去看孩子。

30年過去了，難屬老的老，死的死。

現時，「天安門母親」中，56人已先後離世，只剩下126名成員。早在2013年，丁子霖收到一個其他難屬發來的短訊說：「我們都老了，應該想一想後面，六四的問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後面是不是有人應該要繼續做。」丁子霖找來了從第一批已經加入的尤維潔和幾個難屬接棒，組了個服務團隊。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維潔由過往在幕後「普通的難屬」，正式變成媒體常常聯絡的「發言人」，起初，她並不習慣，當時家門樓下總有人，走到哪，跟到哪，面對媒體，她也手足無措。

不過，時間逼著她不斷往前走。2015年9月，蔣培坤因心臟病發離世，女兒在3個月後因癌症而跟著走，丁子霖在三個月內失去兩名摯親。現在，82歲的丁子霖近年卧病在床，已經難以接受傳媒訪問。

尤維潔的工作近年越來越重。「把我迫上去，要處理各樣各樣的事情。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退，就迫著我走。」

六四二十五週年時，她曾去探訪四散在中國各地的難屬。六四三十週年前夕，她在Facebook上開通了帳號 “Weijie You”，先加一批媒體記者為朋友，隨後上載多段由其自行製作的訪問影片，邀請大家「共同分享来自於當年失去親人的難属們講述的痛苦」，相關片段同在天安門母親的官方網站公佈。

這些自述影片中，每名親屬只有短短幾分鐘，訴說家人離開的心情。其中大學生劉洪濤的媽媽齊國香是退休大學講師，她一開始說話，便泣不成聲。30年來，她和丈夫只能在屋內悼念兒子。

「我們也沒有公開為你悼念過，請你原諒，因為你的骨灰沒有地方放，把你放到床下了。爸爸媽媽死後也要和你會合，好好陪伴你。」那雙握著蠟燭的手，一直在抖。

片段的末尾，齊國香說：「我們的國家會一天比一天好，孩子你放心吧。」

**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怎麼不來利用我們？**

2019年6月2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在亞洲安全峰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罕有就六四事件表態，形容這是「一場政治風波、一場政治動亂」，當時中央及軍隊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平息動亂，才令國家保持穩定，是「正確策略」。

「說了30年，都是這一套。」張先玲冷笑，回應說：「一個國家只能用槍彈來打死老百姓，用國防軍來殺死手無寸鐵的平民，才能維持國家正常的運轉，那這還是個國家嗎？這不是個土匪群？」

儘管行程被緊盯，通訊遭監控，但張先玲相信，「天安門母親」日復一日的工作亦然有效，至少她發現，身邊至少監控者的態度也有改變。

她形容對方以前的態度特別狠：「為什麼要出去？出去要跟我報告！」張先玲會罵回去：「我是罪犯嗎？我被管制了嗎？你們才是犯法的呢！」

吵了不知多少回，張先玲繼續自己的生活，他們繼續在家門外守著。

「你們腦袋進水了，半夜三更還在看。」對方回道，「不是我們腦袋進水，是我們上頭的人腦袋進水。」張先玲也明白，「他們監控我

們，也不是底下人願意。說實在話，天氣那麼冷，在那兒坐著，誰願意啊？」

近年，張先玲身邊的人換上保安公司的年輕人，完全不知道他們奉命保護的人是誰。「領導說要我們保護你，不要讓生人接近你……你可能是首長吧。」

六四25周年之時，院子來了幾十人，張先玲就在家裡印了幾十份材料，發給他們看。「有些人不敢表示出來，但內心也站在我這邊」；也有人要求張先玲答應不見記者，那就撤掉監控，她一口拒絕。

保安人員說：「他們利用你。」張先玲直白回應：「我喜歡被他們利用，他們利用我們，我們的話就傳出去了。」她反問：「你們怎麼不來利用我們？你可以用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來利用我們呢！」

**淒淒慘慘，那我們怎麼鬥爭？**

30年來，張先玲的生活大多圍繞著六四和不幸遇難的兒子，她早期主力尋訪，近年才慢慢把擔子交給稍為年輕的難屬。

朋友勸她說，不要搞了，還是好好保重身體。張先玲認真地說，「你以為我每天都很悲慘？不是的。想到這事，當然不高興，但我不是悲苦那種人。該高興還是會高興，該玩還是玩，該出去還是出去。」

這些年來，她去過歐美亞洲各地，也踏足過南非，名單只欠澳大利亞，最近還去了一趟潮州走過湘子橋，吃到肚子撐撐的回來。「不可能很苦，很苦我們怎能活下去啊？淒淒慘慘的，那我們怎麼鬥爭啊？」

惟前年年底，老伴王範地離世，她的精神開始大不如前。家裡客廳、睡房都有二人合照，桌子上的記事小本子由丈夫過去的藥單改造而成，還有兩台他用過的手機。王範地工作忙碌，但總是支持張先玲的工作。

面對丈夫的琵琶，張先玲只會聽，不會彈。老伴生前留下了20多萬字關於琵琶的書稿，這段日子她就待他的學生前來，一同看看稿子，打發日子。

其餘的時間，張先玲過著自律的日子。她睡前看看書，早上七點多起床，先給家中王楠的遺像上一柱香，白天一個人做飯，搞衛生，洗衣服，有時會去附近飯堂點一個菜，吃一尾魚，提醒自己保持飲食均衡；閒時還會用社交帳號找朋友聊天，那個帳號名字裡頭，藏著兒子王楠出生的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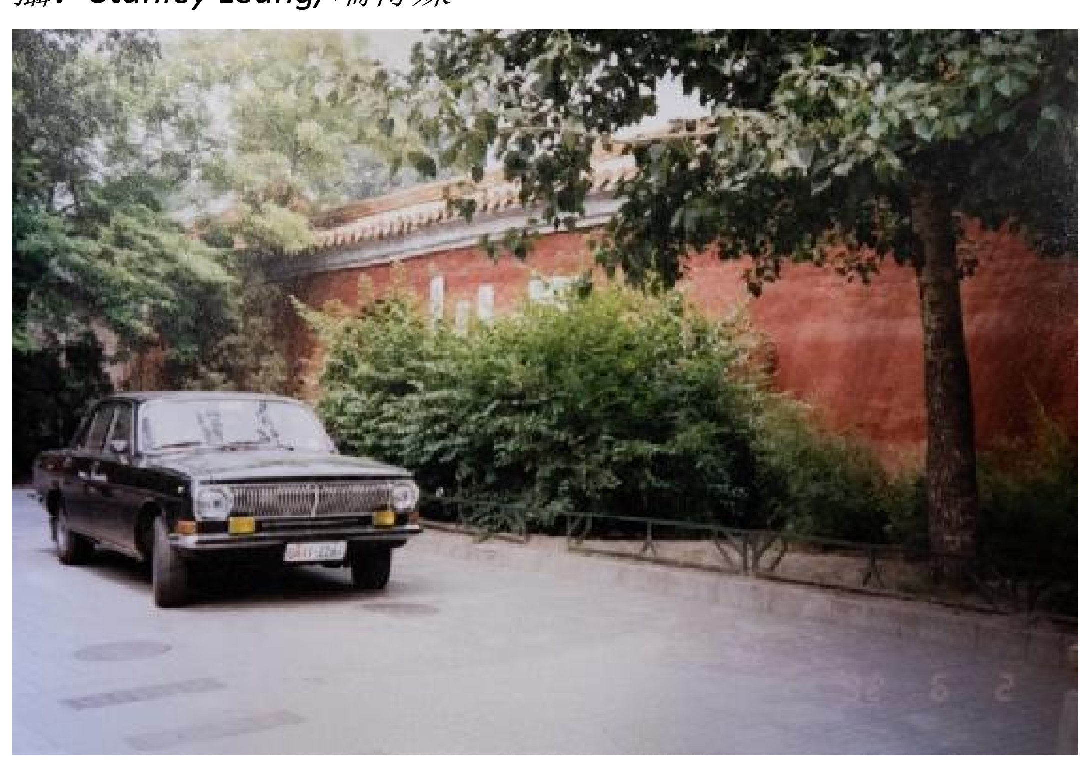
早陣子，北京天氣好，她就搭地鐵，去逛逛頤和園。家裏的大門上貼著一張紙條，上寫「水、煤、窗」，提醒年過八十的自己出遠門要注意。

張先玲強調說，難屬們生活上還可以。她握着我們的手說，「這個事情不會忘記，精神上的痛苦，永遠跑不了，是不是？相比如果沒有（六四）這種事情，我們活得更好。」

尤維潔記得，20多年前，她和張先玲、丁子霖剛相識不久，三人就曾許下一個至今不知是否能實現的願望：「如果六四的問題能夠解決的話，我們相聚在天安門廣場，為這些死去的人獻花。」



*「你監視我，監視吧。我也不理他，我又不犯法。」張先玲一臉鬆容不迫，「在惡勢下，你只能在環境中找到你生存的方式。對吧？」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天安門廣場西側的第28中學，曾經埋下王楠屍體的地方，現在已經種下一棵棵灌木。圖：受訪者提供*




*包括張先玲在內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到萬安公墓拜祭六四死難者。圖：天安門母親網頁*



*天安門母親多年來蒐集一份逾200人的死難者名單，過程不容易，丁子霖早年已接受外媒採訪，常被監控，寸步難行。攝：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王楠的學生證。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維潔由過往在幕後「普通的難屬」，正式變成媒體常常聯絡的「發言人」。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張先玲早上七、八點起床左右，會先在家中擺放王楠的照片上一柱香。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 專訪王超華：我不是秋瑾，我是你們的一份子

記者 何欣潔丨2019-06-04

為了逃亡，王超華做了一件她最不喜歡的事情：向別人證明她是「王超華」。

在1990年被香港黃雀行動營救之前，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中國公安故意放的誘餌，她必須證明自己「於1989年4月代表研究生院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會，並擔任常委、副主席」，證明自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於二十一名通緝學生名單中第十四名」的那個王超華。

逃亡30年後，2019年的台北，王超華向記者回憶起這段經歷：「1990年的春節過後，北京已經解除戒嚴了。對方不能確定我是不是王超華，那就讓我寫一封信，給在美國留學一個朋友。寫得好家常，但非常具體的小事。我給她寫了，上次我孩子出生的時候，因為妳的孩子已經長大了，妳就把那張小木床送給我了。這小木床相對來說體積大一點，她不會忘記，又是我倆才知道的事情。信輾轉送到她手中，確

認了我是王超華，就不讓美國那邊跟我聯繫了，要切斷關係，因為線索越少越好。接下來，香港那邊（黃雀行動）開始跟我聯絡了。」

「去坐火車的時候，我問，我能不能再去天安門廣場看一眼？接我的人說，不行，太危險了。我路上往廣場的地方遠遠看了一下，好像還能看到一點點。天安門有燈光，就能看到一點，就是最後一眼。」

這也是當時37歲的她，拋下孩子與家庭、望見故鄉的最後一眼。她原本沒有打算流亡，甚至多次想要自首入獄。牽絆住她的，是在六四之後這段日子裡，曾收留她、藏匿她的許多普通北京市民。若真入獄，這些普通人可能遭到比她自己更嚴重的打壓。回望天安門最後一眼，流亡，就此開始了。

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30週年祭》中，她寫到這一次人生轉折的關鍵意涵：「我確實不是一個小人物了。我開始體會到作為一個政治符號而生存的痛苦。在那半年多裏，對每個可能接觸我的人來說，附著於我的政治標籤的意義都遠遠大於我做為一個個體的其他意義。」

**把小孩哄睡再上街，卻成了學運領袖**

書名「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來自《國際歌》歌詞，也是89年天安門廣場上廣受學生傳唱的抗爭主題曲。歷史是慷慨激昂的主旋律，王超華是當中躊躇而充滿意外的中低音。八九六四是王超華人生參與的第一場學運，當年她已經37歲，還是一個孩子的媽，與她同場的同學們仍是20幾歲的大學生。

1980年代的中國，每一年都有學運，在北京做學生，抗議是家常便飯，但王超華沒有參與過。和年輕一代不同，出生在50年代的她完整經歷過文革，曾熱烈參與過革命，甚至積極與被打成「黑五類」的父親王瑤劃清界限，直到見證革命與理想最終的幻滅。「我覺得我整個被政治欺騙了。」
文革結束後，王超華一度失去人生方向，「算了，想說過我自己的小生活吧！」她開始戀愛、結婚、生子，人生目標就是先把自己調回北京，再千方百計將做工人的先生從外地調進北京。王超華原本的專業是土木工程，但為了陪先生考大學，她又開始自學，以助理工程師的身分參與考試，走上文學之路。改革開放之初，外頭風起雲湧的政治討論，幾乎與她絕緣。

直到她1987年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系碩士班，又在《光明日報》轄下《博覽群書》雜誌擔任編輯，一步步，走進了文化輿論場的中心。

「社科院的學生們有特別強烈的文化菁英意識，認為明天的文化菁英就是我們，同學們都是野心勃勃。」1989年，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帶著強烈文化使命感的同學們相約寫一本《文化與社會》，文學部分分為兩塊，王超華負責近代文學，另一位男同學寫古代文學，「當時做書啊、搞文化都是特別熱的事情，大家都覺得自己可以參與、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這樣的氛圍下，八九學運揭開了序幕。氣氛很熱烈，儘管北京進入交通管制，但沒人覺得有什麼危險。王超華覺得，自己整個八十年代都沒有上過街，這一次，可以見證了。在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的第一天，她把小孩哄睡之後，「開始套毛褲、毛衣，準備出門」，當天晚上去了廣場，清晨還是跑回家，「因為要把小孩弄起來去學校」，然後再回廣場。

她說：「記得我碰到一個同學，他還說七六年（天安門學運）自己來不及拍照，這次一定要拍到照！大家的感覺是與有榮焉，沒人想過，會有這麼慘烈的結局。」

**「柴玲是民主女神，我是幼稚園老師」**

從沒參與過運動的王超華，如何第一次上街就成了「學運領袖」？

她回憶，廣場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生不多，大約只有四十人，坐兩排就沒人了，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人數不能相比。「到了要各校開會的時候，吾爾開希拿大喇叭說請各校派代表，我就說咱們要不要也派個？他們就都看看我不說話，我就說那我去聽聽，回來給大家傳達訊息？大家就說行啊你去吧。然後就再沒有出來了。」

在廣場上，王超華認識了柴玲。她回憶，柴玲當時「馬上就帶著我去會議室敲門，跟大家介紹說『這是社科院的！』」

因為比其他學生年長不少，讓王超華在學生組織之間出入時常遇困擾。比如被糾察隊的男生反覆詢問身份，「一次他們用英語問了一句非常簡單的英文，類似who are you這樣的句子，我用英語回答，他就放我進去了。」那個年代的北京，會說英語，已經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標誌。

通過了這些看似兒戲的考驗之後，王超華逐漸靠近學運決策核心。「我開會講，你們都提北大、清大，那我們這些小院校怎麼辦？」會議一結束，馬上有好幾個「小院校」學生過來圍在王超華身邊說話，她立刻有成「小院校代表」之勢。決策群眼見如此，便來徵詢王超華擔任幹部的意願，「他們說剛好有一個常委退出，不然推薦妳當常委，妳願意嗎？我就很興奮，說我真的可以當嗎？」學運開始沒幾天，無畏的「小院校代表」新兵，就這樣成了北高聯的常委。

她回憶，自己和柴玲作為組織中唯二的女學生，「我們滿足了那些男生兩種不同的想像，柴玲是一個單純的民主女神，有信念、有理想的少女，身材瘦小，絕食起來又很堅定。我呢，因為比他們年紀大很多，就好像幼稚園老師這樣的。開會幾個小伙子吵架，我說話他們會聽，會表現出一點理性，我覺得是很有用的。」

王超華曾在1990年一篇文章中，記錄當時對王丹的印象：「我還記得王丹像運動員臨入場時一樣躍躍欲試的神態。那是在去國務院信訪局遞交請願書的路上，王丹和鄭旭光安慰我這個比他們年長十餘歲卻毫無臨場經驗的領隊，胸有成竹地表示，應對的事他們會幫我……每逢這種時候，我常常會生出一絲自慚形穢，覺得自己也許確實是歲數太大了些，跟不上這些年輕人了。我能感覺到，他正是這一代大學生的代表，成長在開放的年代，有機會接受吸收各種不同的新思想……」

事隔三十年，姐弟情誼仍然未減。2019年，在王超華的台北新書發表會上，王丹擔綱主持人，介紹王超華時，便說，「我跟王超華當年老吵架，指著鼻子吵的那種，吵得可兇了。奇怪，我說她年紀大我這麼多，怎麼也不讓我著點！」王超華在一旁依舊無語微笑，既不辯駁，也不屈服。

和曾在廣場上的許多人一樣，他們的情誼，建立於運動，更建立於此後30年，共同的背井離鄉。6月4日凌晨，天安門槍響，王超華與其他許多現場的運動領袖、幹部，一夜之間成了通緝犯。

**「要怎麼解釋整個運動你都在，最後卻沒有死在那兒？」**

1989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發佈21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王超華名列第14位。一聽到通緝令，王超華便開始躲藏，一開始，她躲在與家裡有關係的朋友家中。由於擔心戒嚴部隊挨家挨戶進行搜捕，朋友們緊張討論對策，甚至說到要給冰箱做個罩子，讓王超華躲進去。王超華也想參與討論，卻被朋友制止了：「這都什麼時候了，妳別擺那個北高聯召委的樣子了，妳還以為妳讀書人真的什麼都知道？」

乍聞此言，王超華非常錯愕，「我想，所以現在我就不是北京市民的一份子了嗎？從此以後就是『學運領袖』、『知識份子』，我以後就要這樣被異質化了嗎？」

天黑之後，王超華從這戶人家離開，移動到下一個避難所。接待她的正是一對讀書人夫婦，作風卻太老派，既不願意把她藏到儲藏室裡，還說吃飯也必須坐到桌上來，不可偷偷摸摸。「他們說不可以把你當逃犯，警察真要來了，就把我們一塊抓走吧！」「我就想，阿呀，這

怎麼一點不實際呢！後來躲藏的時候就想，千萬不要再找知識分子，太老派了！」

就這樣，她在城裏從一家住到另一家，住遍了各式各樣的房子，整整躲藏了6個月。有時每天要練習躲到小櫃子裡一兩個小時，掩人耳目。直到12月，她在收音機電台裡聽到，父親去世了。

聽到父親的死訊，王超華哭得幾乎要暈過去。她與父親的關係始終緊張，文革時期，她站在父親的對立面；文革之後，父親順利回校，她卻不是很能分享父親的「得意」，「我後來想通了，過去二三十年來，我跟父親有競爭關係，就是要我要證明我足夠了解中國、我的意見是有價值的，你不能輕易來評判我。」直到八九學運，王超華成為與李鵬對話的學生代表之一，回到家中，父親握著她的手，老淚縱橫地說：「你要是被捕了，我就去自首，跟他們說我是你背後的黑手！」

王超華回憶，那一刻，她與父親之間終於取得了一種共鳴與理解。「好像我們兩個都有關心政治、關心學生運動的基因，在那一刻，我知道他相信我。但他一下子就不在了，而且是因為我。」王超華略帶些激動：「是我參與學生運動，葬送了他的生命。……以後我要證明自己，就只能自己跟自己證明了。」

「到這個時候，我覺得我還要躲、還要保我的命，意義何在？我後來都沒有辦法看那些血淋淋的照片，我覺得我應該在那天死去的。要怎麼解釋整個運動你都在，最後卻沒有死在那兒？」

「父親去世了，我猛然醒悟到，我不再是過去的我，原先的那個王超華已經不在了。」

**「北京市民，我不是你們的一份子了嗎？」**

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王超華再也不想躲藏了。她灌醉自己，情緒失控，想要自首。但那時的局勢時，到處都在抓人，到處都在殺人—她回憶：「凡是學生抓到就送監，只要不是學生，許多工人抓到以後馬上就殺了……上海殺了燒火車的工人，濟南一天殺掉24個人，沒有解釋什麼原因，北京殺了7個人，說他們燒軍車。通緝令加上死刑，快速執行，直接威脅市民。」「妳如果自首，就變成把幫助你的人都置於危險之地了。」

這樣一路想下來，王超華心想，好吧，去接觸香港那邊吧。彼時香港的黃雀行動，正將無數像她這樣的學運參與者送出北京，抵達安全的國度。王超華也經由廣州、香港，最終輾轉抵達美國。

她說自己非常佩服韓東方，六四時被通緝的一位工人領袖。「他聽到通緝令，就直接走進公安局說，我聽說你們來找我呀，我來看看你們找我什麼事。」王超華說：「如果你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對，應該是這樣子的，直接去承擔你要承擔的責任。可是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跑。」

這也是六四之後三十年，她從沒有放過自己的反思。「文革裡面，這麼長時間，知識分子一直就是這樣，第一個反應就是先屈身。不是去想原則的事情，而是先想說，又亂了，咱們先躲一躲吧？看看過一段時間是不是好一點？這種政治已經把投機灌輸到你身體裡，變成本能反應了。」

「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很抱歉，就是比較軟骨一點。」這是她回望當年，留給自己的評語。

在美國，王超華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東亞系，讀完博士學位，現在以獨立學者的身分寫作。2005年，她編了《歧路中國》梳理80、90年代的中國思想辯論，收錄汪暉、朱學勤、陳平原等人對中國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思想、農村、教育等領域的思辨。做為編者，王超華在書中序寫道，「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將使讀者意識到中國仍然存在著批判的精神之魂，這裡思考的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處境，也是影響到人類整體存在狀態的問題。」

她也沒有因為千辛萬苦脫險，而與運動絕緣。到了美國沒多久，中國政府對王丹、王軍濤等人的審判即將開始，聲援者在舊金山發起靜坐，王超華想去參與，卻遭到幫助她逃亡的朋友質疑，「他們意思是說，妳怎麼可以這樣？妳應該要爭取趕快完成學業，怎麼又去弄這些事？」

對王超華來說，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政府通過對個別人的審判，讓人忘記為什麼這麼多人會站出來堵軍車。那麼多人、那麼慘烈的傷亡，這是我們共同的回憶，我要站出來。而且覺得自己有這麼道義責任，如果我保持沉默，不光是對這三個人的遭遇保持沉默，而且是對北京市當時傷亡的這麼多無名的人，也保持了沉默。」

去國多年，王超華再無踏上過北京土地，但這一切在異鄉的行動，仍在持續地向北京市民、向所有中國人民反覆說一聲：「我仍是你們的一份子。」

「我覺得，你們當時也都上街了，我並不比你們突出什麼。我並不要做秋瑾呀，為什麼我今天變得特別了呢？北京市民，我不是你們的一份子了嗎？當初我們上街的時候，我們不是同樣的嗎？你們承認這是政府對我的迫害，這不夠呀，你要承認我是你們其中的一員啊！當初是我們所有人一同認可的價值，才把我們帶在一起。難道因為政府把我放到了通緝令的名單上，你就不接受我了嗎？」



*王超華。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六四30週年祭**

出版日期：2019/6/4

作者：王超華

出版社：渠成文化



*1989年6月1日，柴玲、封從德、張伯笠、王超華、王丹、李彔召開記者會。圖：王超華提供*



*1989年6月1日，示威者在天安門廣場彈吉他。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王超華。攝：陳焯煇/端傳媒*

# 半生被稱劊子手，戒嚴部隊軍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記者 陳虹瑾丨2019-06-01

編者按：據六四親歷者、學者吳仁華研究，1989年參與鎮壓的戒嚴部隊大軍約20到25萬人，僅個位數的戒嚴部隊軍人或軍官站出來反對武裝鎮壓，其中2人仍在大陸境內、曾受中共政治騷擾，分別是曾表達懺悔的54集團軍的官兵張世軍、以油畫重現六四場景的前65軍士兵陳光，目前難以聯繫。30年過去，當時被分配到共軍第39軍116師的高射炮兵團、任副連級的雷達站長李曉明，是那「25萬分之個位數」、少數能自由說出證言的人。

李曉明受訪時悶著頭，原來是在刷手機。在忙嗎？「今天早上（5月23日）去你們的總統府，」他把手機遞過來，是總統蔡英文接見華人民主書院安排的六四親歷者的合照，「接見我們就是種表態嘛，這是第一次吧，她（蔡英文）也支持中國民主事業吧。」這些當年在天安門毛澤東頭像和自由女神塑像前欲灑熱血的少年，如今成了流亡各地的大叔，這一天，他們換上筆挺的西裝和皮鞋來到孫文遺像前，只有李曉明，踩著舊球鞋就來了。

5月18日，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在台北登場，海外中國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1989年任職的戒嚴部隊成員之一、時任解放軍軍官的李曉明受邀赴台出席這場研討會，這是他此生第二次公開為六四事件作

證，第一次是2002年，應「中國人權」邀請，在紐約公開作證，作證後申請澳洲難民簽證，2005年才以澳洲籍人士身份回到中國。

李曉明一家人目前定居澳洲。5月中旬，他和妻子提了要去台灣出席研討會，妻子毫無反應。他又和26歲的大兒子談了這件事——此前，他幾乎不和家人談他的六四親歷——說了之後，兒子竟擔心起李曉明的人身安全，要他別談了、別去台灣了。「兒子以為我回中國了，他以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我解釋說沒問題，我是去台灣啊，台灣和中國不一樣，台灣是民主國家，我可以像在澳洲一樣，說任何事情。」

**原以為去「維護社會治安」**

李曉明是瀋陽人，出生於1964年，高中上的是瀋陽二中，他在受訪時數度強調：「我上的是最好的高中，很多同學都考上了北大、清華那些重點大學。」1983年，李曉明大學沒考好，家中又有經濟負擔，父母索性讓他和妹妹都去唸軍校，如此兩人學費、生活費都由軍校補助。他考入河北石家莊解放軍軍械工程學院雷達系，1987年七月獲得學士學位。
他又給我們看剛上軍校和從軍校畢業的照片，軍帽中央有顆大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鑲金邊紅色五角星軍徽。他有些老花，想仔細端詳年少的自己，得移開眼鏡。人滄桑了，照片中的李曉明更顯風發。回到1987，這位少年軍官對未來有什麼期待？「沒有什麼期待。」他答：

「年紀小吧，只知道學費生活費都是國家負擔，將來工作就是上部隊服役。別的也沒什麼想法。」

六四事件爆發那一年，李曉明25歲，任解放軍第39軍116師高炮團102連中尉副連職雷達站長。 第39集團軍隸屬於瀋陽軍區，軍部駐地為遼寧省遼陽市，李曉明在公開作證和受訪時，數度強調：「第39軍116師是最好的部隊。」「我們部隊以前打過朝鮮戰爭，打仗打得好。給我們的各種人員配備、裝備，都是最好的。」

歷史學者、六四事件親歷者吳仁華在《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書中亦指出，步兵第116師是第39軍的主力師，在解放軍的所謂「四大王牌師」中名列第二。該師曾是首批進入朝鮮參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曾先後於1950年12月4日和1951年1月5日分別攻佔平壤、漢城（現今首爾），戰績顯赫。

吳仁華在書中指出，1989年5月20日，第39軍接到中央軍委緊急命令，部隊立即趕赴北京執行戒嚴任務。一開始，為了保密，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只傳達到師一級指揮官，師級以下的官兵並不知道即將戒嚴，只聽說要前往瀋陽執行「維護社會治安」的活動。6月3日，第39集團軍指揮部接到了上級命令：「部隊立即向北京城內強行開進，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畫。」在中央軍委的調兵計畫中，第39集團軍是屬於首批進城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但實際上，該集團軍進

京的時間，比北京軍區的第24集團軍、第27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第65集團軍等部隊要晚。

吳仁華的研究和李曉明的證言相吻合，39軍之所以比計畫中晚進北京，李曉明說，是出於116師師長許峰的消極抵抗。話說從頭，5月20日，上頭交辦瀋陽有上街遊行，要求部隊去「維護社會秩序」，他原以為要回瀋陽老家附近，還有些期待回家。「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關，最後的命令是去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我們部隊的具體任務是去使館區，保護領事館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隊都是駐紮在北京郊區。」在郊區駐紮期間，李曉明一度以為學生只是上街遊行，「都是很和平思維，沒有暴力，而且我們部隊在外圍，部隊沒進北京市，沒感覺到那種緊張。」

## 「日本人到北京都沒開槍......」

「你們是人民解放軍，不能對人民開槍，不能向學生開槍。」「日本人到北京的時候都沒有開槍啊！」他回憶，6月3日晚上之前，民眾圍著軍人，「老年人、中年人、年輕人、好多人......，」他坐在軍用卡車裏，周遭的士兵和民眾沒有互動。不過，他看見當時的團政委拿著擴音器和群眾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 我們不會對學生開槍。」

只是，當天傍晚，士兵就接到指示往裝彈藥的車輛移動，李曉明回憶：「你能拿多少（子彈）就拿多少吧，沒有什麼限制，就站在路邊發子彈，老百姓都看到了，帶著驚恐的眼神看著我們，不再跟我們交談了……。」

「上頭要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他說，當時有些軍人攜帶小型收音機，另外的消息來源就是解放軍日報。「我們自己也很害怕，」他回憶，軍用卡車上少有交談，收音機廣播向他們播送暴徒要殺解放軍，大家沒什麼交流。事後回想，他認為絕大部份士兵受教育程度低，當時只是聽上級命令，就照上級傳達的做。

李曉明舉例，除了從廣播重複播送，軍中也傳出「天安門6月3號晚上有暴徒要殺害解放軍」的耳語，戒嚴部隊裏的許多人信了，事實上，軍隊駐紮在朝陽區一所小學時，他親眼看見有個部隊的戰士，因槍枝走火，遭到誤傷，當場死亡。他眼睜睜看著這人的屍體被拖出去，結果，聽見部隊領導人向上級報告：「有暴徒開槍打死我們戰士！」李曉明說：「這是我親自經歷的，那人（死者）就在我對面，至少從這部分，我看到很多真相。」

**麵包車上的傷者，「用眼神示威」**

「6月3日晚上，大概7點鐘，我看到一台從天安門廣場出來的麵包車（廂型車），麵包車走得很慢，門口站著一個受傷的群眾，他拄著雙拐，腿上包紮繃帶紗布，應該是看著我們，應該是仇恨、憤怒的眼神吧。」當時李曉明的部隊停在天安門東郊，軍用卡車準備從天安門東側往天安門方向開，他精確地想起這個眼神，不會錯，卡車距離他頂多十米遠，「雖然他沒說話，但他意思就是『你們解放軍殺人了』。我覺得他就是有意向部隊示威。所以對方用行動告訴我們，部隊已經開槍了。」

「任何人都猜出來開槍了。」麵包車默默從眼前駛過的那一刻，他回憶：「大家看了面面相覷，也就默默無語吧。」

李曉明觀察到116師師長許峰的消極抗命。由於高炮團總是和師部一起行動；當時李曉明離師裏的通訊車最近，他見到許峰化裝為平民，身著便衣，帶著幾個參謀去前方探探情況。「當時還有學生、百姓圍堵軍人，若身著軍裝，絕對不許你往前走的。」「我自己猜的，也許他（許峰）看到傷亡，他回來以後開始消極抵抗，所以我們部隊就沒有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
6月3日當晚，李曉明遠遠聽見中央軍委的無線電呼叫，「116師，你們在哪裏請回答。」不論無線電怎麼叫，許峰就是不回應。他就聽到許峰說一句話：「我收不到上級命令、我們收不到上級命令」，隨後鑽

進師部通訊車。「他（許峰）這樣說，底下參謀就明白他什麼意思了。」李曉明回憶。

部隊一直消極抵抗命令。中央軍委要他們6月3日晚上或隔天清晨抵達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但我們是6月5號清晨才進到天安門廣場。」他說，部隊一直坐在軍車上，繞行北京市郊區周圍，徘徊遊蕩著，就是沒有按照命令往天安門廣場集結，直到6月5日清晨。

**褲子、棉襖、血**

李曉明作證時稱，6月5日一早，第39軍被第38軍（編者按：近年陸續出爐的研究顯示，第38軍是六四屠殺中最兇殘的軍隊之一）「押」進天安門廣場，針對這段證詞，他在不同地方受到質疑：一個部隊有資格「押著」另外一個部隊嗎？他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如此解釋：「38軍處長領著士兵，架著機關槍，他在前面，把我們『領』進天安門廣場。」

彼時六四清場已經結束，在被「領」進廣場的路上，李曉明清晰聽到兩邊建築物、樓群裏、立交橋（高架橋）下，群眾對軍人們喊著「法西斯」與「劊子手」。謾罵一直從樓裏飛出來，眾人張望四處，始終不見人影。李曉明身旁的士兵朝樓裏開槍，「我給他說了回去，他是我連裏的戰士，我就說：『你不准開槍』，他就不開槍了。」但子彈

不長眼，早往樓裏飛去，「具體傷沒傷人？我不知道……。」撤出廣場後，他的部隊駐紮在朝陽區一所小學內，任務是「抓暴徒」。有一位街頭擺攤賣冷飲的老太太，罵軍人是法西斯，而被冤作「暴徒」，抓進了派出所。

李曉明這一輩子都不會得到答案：老太太後來被怎麼了？當時身邊的士兵開槍，是否造成民眾死傷？但他在6月5日就可以確定，戒嚴部隊造成了慘重的傷亡。他看見廣場地板、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有裝甲車履帶輾壓的痕跡，一地的狼藉。他和一名排長一起翻找垃圾，撈出了一件上面有彈孔的褲子和沾血的棉襖。

「打掃衛生的戰士親口告訴我，看見垃圾下面好幾灘血。」褲子、棉襖、血，成了腦中揮之不去的屠殺鐵證——李曉明2002年首度在紐約公開作證，到2019年到台北公開作證，一定提及這段證據。在台北，他在百人面前談及那件褲子，兩度哽咽。

但這段證詞同樣遭到反覆質疑。對於證物的真實性，網路到現實生活中，曾有人拋出：「難道當時有人中彈之後，還把衣服褲子脫掉、然後自己跑走？」李曉明如是回應質疑：「那我就不知道了。有各種可能性。至少，我相信我看到的。」

此外，在台北的研討會上，李曉明說的另外一段證言，當場受到挑戰。他說，到了6月3日下午開始發放子彈，但沒有具體下命令開槍。後來，部隊有了明確命令，「距市民100公尺以外可對天鳴槍警告、30公尺以外可對地開槍警告、30公尺以內遭遇奪槍等危險時，可以開槍自衛。」

這段證言也激怒了一部分人士。一名老人在台北的研討會上，情緒激動地挑戰李曉明：「開槍、坦克壓人都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用少數士兵槍口抬高一吋（的說法，）或把正義和非正義之間的界線模糊掉，這是對得起方政（編者按：1989年6月4日凌晨，方政沿西長安街撤出天安門廣場，自述為救某學妹，遭坦克碾斷雙腿，至今流亡海外）那兩條腿嗎？對得起那麼多死了兒女的母親、父親嗎？」「有人說這個政權的領導人犯錯，那是犯錯嗎？還是反人類罪行？」

**如何證明自己「30年前沒有殺人」？**

鎮壓的痕跡很快被政府抹平，李曉明在1989年7月回到瀋陽駐地，隔年調到另一個部隊，1993年轉業，在瀋陽市電業局調度所擔任工程師。為何選擇轉業？「我一直想出國留學，好多高中同學都考上好的大學，大學畢業都出國留學，出國留學也是一個趨勢吧，當時中國還是比較落後，很多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他盤算著自己未來，「在部隊的話，是不能出國的。所以我必須轉業到地方工作。」2000年，

他自費留學到澳洲墨爾本，就讀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MIT），攻讀兩年制電子工程碩士學位。

2001年，他的妻兒到了墨爾本陪讀，2002年，他首度前往紐約作證，第一次說出自己目睹的六四真相，「太太申請到陪讀簽證，我就放心。如果我不先把他們接出來，政府會有懲罰措施吧，例如不讓我孩子和太太來到澳洲……。」

同一年，他向澳洲政府申請難民簽證，歷經數次面試，移民官審查民簽證時，依法定程序問了很多問題，包含個人簡歷、在澳洲就學的學業成績、在中國的服役軍區、六四目睹的情況，還有最關鍵的：「他（移民官）問我：『六四時，你殺不殺人？開不開槍？』」

一個人要如何證明自己「在30年前沒有殺過人」？軍職成了李曉明半生的原罪。即使他反覆重述自己的證言、對外強調自己未開一槍、未殺一人，仍不時會在公開場合被問到這個問題，以及更多他始料未及的問題。比如在台北，接受了將近30場的中文、英文媒體訪問，公共場合也常有人問他尖銳問題。也比如在2002年，初次作證時曾有媒體寫錯他任戒嚴部隊時的軍銜，導致他被質疑經歷造假，他看過那些評論，「很多人把我的生日、軍階都寫錯了，我就看了幾篇，混淆是非吧，都是胡攪蠻纏。我懶得和他們爭辯、我沒有太大感覺、我覺得浪費時間。」

李曉明公開談論自己的六四證言時，常帶著幾項關鍵文件和照片：當年所有參與執行戒嚴的解放軍都收到的「首都衛士」紀念冊、紀念章以及紀念手錶。他在今年把這些文件和物品捐給墨爾本博物館。只是，此舉遭網友說他別有居心、檢視他「亮出證物」的舉動與真偽；甚至在網路論壇上質疑李曉明離開中國時刻意攜帶紀念章冊，是「很早就計畫把六四這事情去國外說出來」。

「對啊，他說得很對。2000年留學時我就帶著（紀念章冊與手錶）了。不然我為什麼要帶出來？我就是為了說出這個事情。」他坦率回應，離開中國時就打算有天要向國際說出這個事實，「但你得有證據說你參加過（六四戒嚴部隊），否則你有什麼證據說明你參加過？」他拿出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拍的照片，那是116師高炮團一營所有軍官的合照，「大家都穿著戰士服裝，這張照片我2000出國就帶出來了。」他又說，其實早在1989年的6月5日，他就有「將來出國說出這件事」的想法，才申請留學。

但留學計畫一開始不是因為一直想出國唸書、追求更好的生活嗎？他想了一會兒，答：「從我個人來說，一個動機是像其他高中同學追求更好生活。但從另外一個特殊情況，六四成為我想出國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吧，就是為了從軍人角度，講出一個六四的真相吧。」

**歷史的選擇：是加害者，是證人，亦是受害者**

拿到難民簽證後，李曉明第一次回中國是2005年，「拿到澳大利亞護照我才敢回去看父母。如果我在2002到2005年持中國護照回中國，一定會被關進監獄的。」

移民澳洲之後，2005年起，他陸續以澳洲公民身份為國探親。第一次回國，他老感覺有人跟蹤監視。他的雙親完全不知道他已在紐約發表證言；即使在親人之間，六四仍然是禁忌，李曉明從來不提。近年，他陸續把雙親接到澳洲居住，才在輕輕和父母帶過這件事。

李曉明在2003年拿到電子工程學位，在澳洲卻找不到電子工程工作。20年來，他打了許多份工，「長期、短期、外貿公司、保安器材公司都做過，我什麼都幹。」他在倉庫處理中國進口澳洲的的帽子、手套、圍巾、襪子，他也待過保安器材行，負責販賣和在倉庫整理監控儀器、攝像頭、電子門鎖、各式開關。

算算，人生做過最久的兩分工作，分別是在保安器材行，與少時任職解放軍的「資歷」。前者，在倉庫裏日復一日的重複勞動，後者，帶給他恥辱一生。

他多次表示：「雖我沒開槍、沒殺人，但作為當時戒嚴部隊的20萬戒嚴部隊的一員，當時我在部隊服役，我覺得也是一種恥辱，有一種內疚情感。軍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恥的角色吧。」

在台北的幾場座談會上，曾經是戒嚴部隊的身份，數度讓他尷尬。首度和當年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民運人士方政會面時，兩人就坐在講對方身邊。方政第一次坐在戒嚴部隊軍官身邊，「我（方政）今天跟他（李曉明）坐在一起，其實也是第一次，也感覺怪怪的，怎麼突然……這個……我其實沒有太多心理準備，但好在他的部隊執行的命令跟我沒有太大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知道我會什麼反應，我很難說。」

方政又替李曉明緩頰：「他的部隊執行的命令好像真的跟我沒有關係，他說他5號才進來（天安門廣場），我想我已經倒在醫院了。張健（另一名六四民運人士）前不久也去世了，我們真的不能等太久。」語畢，李曉明主動伸出手，兩人一握。

此行來台，六四親歷者們有許多同進同出的時刻，李曉明和方政被媒體定義為「槍口的兩端」，常共同出席會議、採訪。李曉明說：「我有時候幫忙他（方政）推推輪椅、幫他上廁所。」一場研討會的樓梯很窄，他眼睜睜看著方政自己徒手爬上台階，「上樓梯，樓梯窄，我扶著他，怕他掉下來。我們都會在後面看著。」

但對於「槍口兩端」這樣的定性、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加害者的一員，李曉明仍然有話想說。「我覺得這好像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吧。我們沒有辦法選擇。就像方政說的，一開始覺得怪怪的，但是通過我們交流吧，如果我有開槍過殺人，他絕對不會再和我握手、接觸的。我沒有開槍，他覺得很欣慰，覺得我能站出來說真相。」

「雖然他是受害者，但不能說我是加害者吧，應該是...應該是...不能叫做加害者，應該要叫我證人。」他思考了一下：「說我是加害者，我不同意，這是用詞上的不恰當。除了證人，更恰當的是，作為一個受害者，一個參加戒嚴部隊的軍人吧。如果叫我加害者，那方政的腿可能和我有關，暗示我可能開槍。這是用詞不太洽當。」

「從某種意義上我是學生。我既是學生，又是軍人。」為什麼有這樣的身份重疊？李曉明稱，當時雖然已經從軍，1989的前兩年，他不過是個學生，如果那時還在念大學，也可能走上街頭、遭到鎮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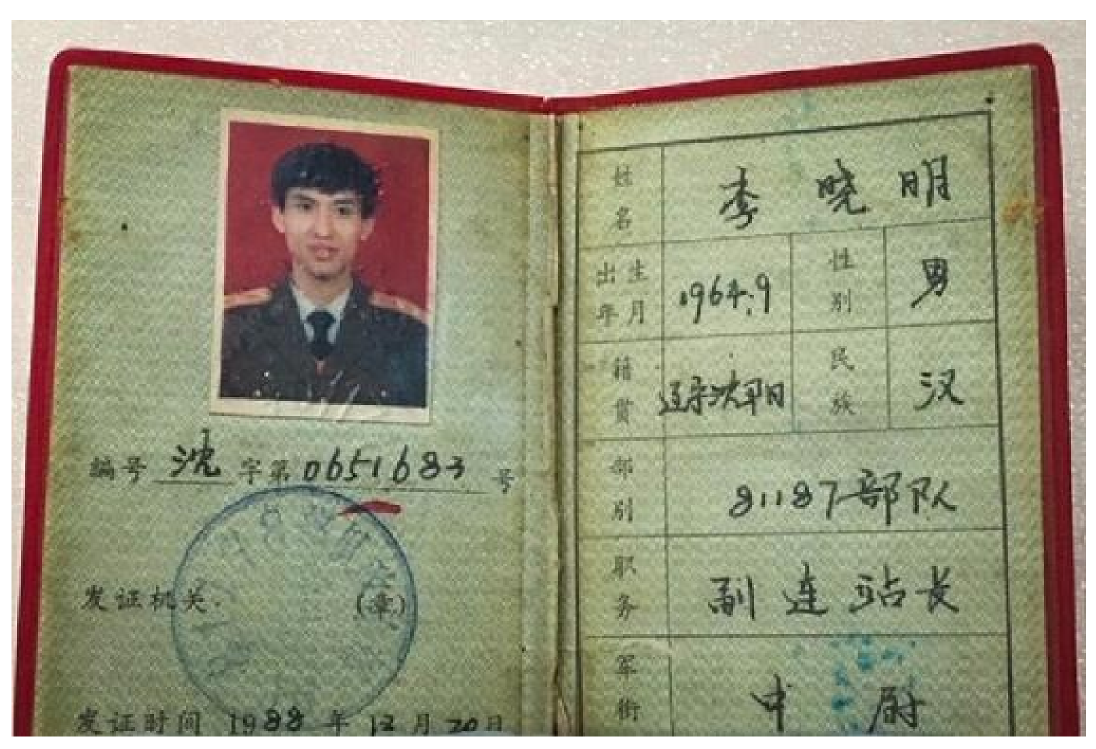
李曉明年過半百，他談起自己不時易怒、長期受失眠所苦，「受害者不只是在身體上，還有一種是心理的傷害。在澳洲，很多人跟我說要看心理醫生啊！」他說，兩三年前，在家人鼓勵之下，整整看了兩週心理醫生，說出自己年少時的見聞。

然後呢？他又輕描淡寫起來：「醫生說你自己把事情說一說，發洩出來，完了給我提供一些建議。聽聽音樂，其他方式治療吧。」

對六四的記憶和情緒，發洩得出來嗎？要花多久時間才能發洩完？面對追問，李曉明不願多說。訪談尾聲，他不言不語，盯著總統府網站的六四親歷者合照。小小屏幕照亮老花眼鏡，他仍埋頭刷著手機。



*李曉明。攝：陳焯煇/端傳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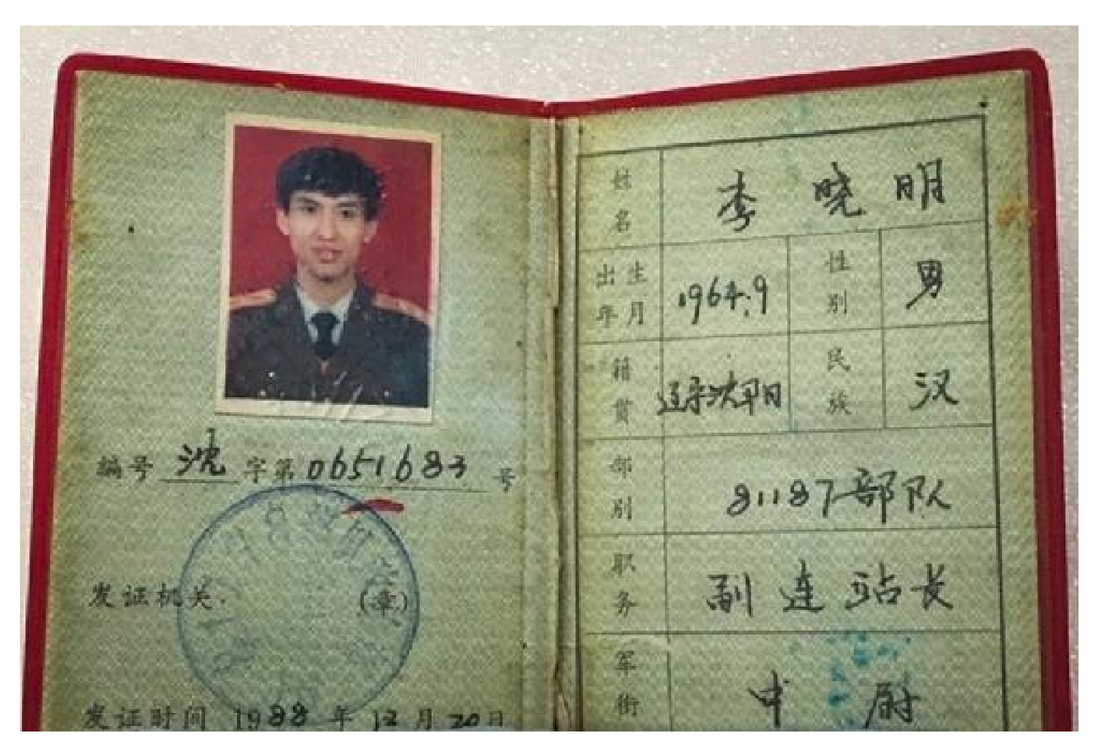
编号 沈 字第 0651683 号

发证机关 （章）

发证时间 1988 年 12 月 20 日

| | | | |
|---|---|---|---|
| 姓名 | 李晓明 | | |
| 出生年月 | 1964.9 | 性别 | 男 |
| 籍贯 | 辽宁沈阳 | 民族 | 汉 |
| 部别 | 81187部队 | | |
| 职务 | 副连站长 | | |
| 军衔 | 中尉 | | |

*李曉明的解放軍軍官證。圖：李曉明提供*




*李曉明的解放軍軍官證。圖：李曉明提供*



*李曉明（後排左二）拿出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拍的照片，那是116師高炮團一營所有軍官的合照，「大家都穿著戰士服裝，這張照*

*片我2000年出國就帶出來了。」圖：李曉明提供*




*六四事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首都戒嚴部隊官兵頒發的一組「首都衛士勳章」紀念章。圖：李曉明提供*



*2019年5月19日，李曉明出席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5月22日，方政(左)與李曉明(右)於台北一起出席有關六四事件的講座。攝：陳焯煇/端傳媒*



*李曉明。攝：陳焯煇/端傳媒*

# 從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他牽着兩歲女兒，目睹世界翻轉

特约撰稿人 姚佳識丨2019-06-03

「我覺得對不起孩子...... 真對不起......我不想想這些事了......」

眼前近1.9米高、留着板寸頭的山東大漢，話說到一半，突然臉皺成一團，哽咽得無法繼續，發出輕聲的嗚咽。他低頭，伸手去擦通紅而濕潤的雙眼。

孫立勇，在北京當過八年警察，作為六四抗暴者親歷了八九學運。

當年無法加入示威學生行列的民眾，轉而以各種方式支持學運：號召罷工反抗、設置路障、攔截與燒毀軍車等等，這個群體被稱為六四抗暴者。六四之後，孫立勇因創辦「反革命刊物」而入獄七年，被迫與年幼的女兒分離。他後來逃亡到澳洲，成了一名建築工人。

如今，58歲的他頭髮已經半白，不過腰板兒總是挺得直直的，只有談到女兒時，他潸然淚下，蜷縮在沙發的一角，似一隻受傷的巨獸。

氣氛有點尷尬，他提出要去抽根煙。孫立勇是個老煙槍，開口說話時嘴裏會冒出陣陣煙臭味。他說起往事時繪聲繪色、手舞足蹈，又像個嘴上帶着幾分俠氣的說書人。

可只要提到女兒，他的語氣就會柔和起來。女兒是鐵骨錚錚的孫立勇心中最柔軟的部分。

## 第一聲槍響

那個改變他一生的夜晚，孫立勇與女兒在一起。

1989年6月3日晚，他正在家吃晚飯。本來在播新聞的電視畫面忽然變成藍色，播送着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告，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家中。

孫立勇放下飯碗，打算出門去，丈母娘問他幹嘛去。

「今天晚上共產黨要開槍了，」孫立勇答。

「開槍那你幹什麼去？」

「保護學生啊！」

丈母娘大概沒把孫的話當回事，說了句激他的：「你要真想去，你就帶着你孩子去。」

孫立勇還真把兩歲多的女兒帶出了家門，往天安門的方向去。

「那會兒年輕氣盛啊，現在想來真是後怕。」

大概晚上十點多，他倆走到復興門外大街的燕京飯店（編注：後被海航集團收購，現為北京唐拉雅秀酒店）附近時，好幾輛平板車迎面而來，車上躺着流血呻吟的傷員。遠處有公交車在熊熊燃燒，那是民眾用來堵軍車的路障。女兒瞧見了，說：「爸爸，你看那邊那麼亮！」響徹天際的坦克轟鳴聲從亮光的方向傳來。

他們身邊這時突然響起陣陣急促的子彈聲，孩子不懂危險，反而興奮起來：「爸爸，發炮了，過年了！」

旁邊的人們高喊「快跑！」本來揹着孩子的孫立勇，趕緊把孩子抱在懷中，往邊上的胡同裏飛奔逃命。他瞥見子彈在他頭上嗖嗖飛過，還有的打到地面上反彈起來，擦出點點閃亮的火光。

「我回頭一看，坦克一撞那輛着火的公交車，一秒鐘，公交車就成了兩半。什麼路障，什麼都不是。」

孫立勇護着女兒安全返回家中。而他的世界，從此翻轉了。「從第一聲槍響起，我對中國共產黨、這個政府徹底絕望。我開始走向它的反面。」

那晚之前，孫立勇說，他從沒想過推翻共產黨。他只是很現實地希望，能過上更好的日子。

「你買電冰箱，花900，我買電冰箱，花1700。因為你有關係，我沒關係。你能買到洗衣機，因為你有票，我沒票。當官的孩子在倒這些東西，他們用權力來獲取利益。我們不滿這些社會不公，於是才支持學生。」

六四之後，孫立勇沒也再踏進天安門廣場一步，他說那廣場上都是冤魂。最靠近的時候，他也只是坐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望向正對面的天安門。

## 反骨警察

孫立勇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共產黨員，家庭教育忠黨愛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出身「根正苗紅」。

不過從小，他就不服從權威。

「我屬於那種在學校不聽老師的話，在家裏不聽父母的話，當警察不聽領導的話，那種不聽話的人。用北京人的話來講，就是頭腦後有長反骨的人。」

陰差陽錯的是，他高考以寥寥幾分落榜，進了公安學校，在北京當上了警察。他說，警隊機關裏盛行拍領導馬屁，一片腐敗風氣，孫立勇不習慣，處處碰壁。「他們希望我是一隻綿羊，但我是一個愛頂牛的人。」

1986年，北京爆發學潮，一些學生被扭送到孫立勇所在的公安局。孫支持學生的訴求，拒絕審訊他們，故意頻頻告假，被扣了一個月工資。

「領導跟我說，小孫，這個是政治性的事情。你是刀把子。共產黨要你剁，你不能不剁。你不能講學潮是對的。你這是跟黨和政府的立場不一致。」

孫立勇在1987年辭職，離開格格不入的警隊系統，但他毫不諱言這段過去。「我以前當過警察嘛」如今仍常被他掛在嘴邊。

他轉而到北京橡膠供銷公司當保安員。保安是份閒差，孫立勇說，他沒事就到處瞎溜達。八九學運期間，他每天都往天安門廣場跑，單位

離廣場走路只要15分鐘。

「我說下去檢查工作了，其實是到廣場了，跟學生聊聊天，捐款、送水。」

他當年28歲，被平均比他小十歲的學生們擋在了糾察隊圍欄之外。學生自發組成了糾察隊，擋在請願學生與支持他們的民眾之間，以保護學運的純潔性。

一向反叛的孫立勇，卻對學生定的規矩照單全收，並無不滿。

「我就想我們的任務就是保護學生，支持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聽他們的。他們不讓進我們就不進。大家要團結一致。」

孫立勇說，直至今日他不怨學生一分。

他唯一遺憾的是，30年來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們大多沒有進行自我反思檢討。
「那場運動之所以最後失敗，哪裏做得不好，他們沒有作出一個歷史性的、對自己的剖析。」

**六四抗暴者**

1989年5月20日，當局頒布戒嚴令。深夜，孫立勇跟一群北京市民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附近的胡同裏，打算圍住約30輛軍車。「我們大概一兩百人，都是無組織的散兵遊勇，彼此不認識。」

四周黑壓壓的，他們不敢亮手電筒的光，藉着月光，貓着腰往裏走。人人手裏提着大板磚，準備隨時出擊。孫立勇心裏有點慌，戒嚴令剛下，戒嚴部隊會對民眾採取什麼行動，大家心裏都沒有底。

到了軍車跟前，群眾發現軍人都沒有配戴武器。人們把手裏板磚都拋下，開始滔滔不絕地給軍人介紹學生的訴求，請求他們不要傷害請願學生。

「我們說，今天你們不應該給共產黨當狗腿子，你們應該站在人民一邊，人民士兵愛人民，人民也愛人民士兵。」還有人回頭從家裏給部隊送來涼白開、酸梅湯和饅頭。

軍人們端正地坐在車上，無動於衷，也不回話。

群眾轉而敲開了指揮車的窗戶，有人把一隻擴音喇叭遞給了車中的中校，要求他表態，不然就毀壞車的通訊天線。

中校見勢，下車發言：「各位北京市民好。我是中校，我是副團長，但是你們放心，我們，絕不會鎮壓北京市民，更不會鎮壓我們的大學

生。」

「人民解放軍萬歲！」大夥兒齊呼。清晨時分，人群漸漸散去。

孫立勇至今不知道，這位中校和他手下的部隊最終有沒有參與六四鎮壓。

**打開監獄的大門，我是志願者**

六四之後，孫立勇明白，自己不再是之前那個安於清閒的保安了。

「我就思考，我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我現在應該幹什麼？我是像所有人一樣沉默嗎？我想我不是，我應該反抗。怎麼反抗呢？我沒有武器，我們只有筆和紙，就做刊物。」

他與友人創辦了雜誌《民主中國》，後改名《鐘聲》，共發行五期，每期印刷約200冊，孫立勇擔任主編。他特意選在一座居民樓裏印刷刊物，印刷時間嚴格控制在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

「我當過警察嘛，反偵查能力可好了。我們專選在晚餐時間鄰居炒菜、電視新聞播放時打印，那樣鄰居就不會聞到油墨味、不會留意到印刷的噪音。」

他與友人通過郵寄、投遞居民區的方式散播雜誌。雜誌不大，傳單大小，大家一份份塞入信封，貼上郵票，投入郵筒。1991年，友人在郵寄刊物時，不慎被警察逮住了。

孫立勇放棄了逃亡的機會，決定向當局投案，希望替同案的友人承擔罪名。「雜誌是我帶着大家辦的。如果我要跑了，我覺得對不起我的同案。」孫立勇說，他當時想起不知誰說過的一句話：打開監獄的大門，我是志願者。

孫立勇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刑事判決書中寫到，他的刊物誹謗國家獨裁，煽動推翻國家政權，為反革命暴亂份子鳴冤叫屈。

孫立勇把獄中的日子數算得一清二楚：2557天。

他在回憶錄《走過冰山》中詳盡記錄了期間受到的虐待：他戴着近二十斤重的手銬腳鐐，被關押在如蒸籠般熱得透不過氣的禁閉室內；因為行動受限，他無法用手解開褲子大小便，只能撕開褲襠解手，即便如此還是夠不着用手紙揩淨，導致肛周感染；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他還患上了中耳炎、美尼爾綜合徵、高血壓等疾病。

然而如今，孫立勇在Twitter上打趣說，那七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挺好的」。

他在獄中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友。「共產黨把我們這些反革命都關在一塊，全認識了！」

其中有原北京大學法學講師王天成。兩人一度都被囚禁在北京第二監獄，放風時能碰到面。為了不讓獄警察覺，他們繞着圈走路，擦身而過時故意不看向對方，這樣每次匆匆說上幾句話，就此結下了難兄難弟的情誼。

六四30週年之際，孫立勇飛越重洋到美國參加紀念活動，也特地到王天成在費城附近的家中作客，並接受端傳媒的專訪。

王天成在《走過冰山》的序中曾寫道：「儘管立勇並沒有像有些朋友那樣幸運地備受關注，但他一直在履行一個公民、一個愛國者的責任。為了這份責任，他付出過很大的犧牲。」

七年牢獄讓孫立勇最煎熬的，是鐵窗分隔了他與年幼的女兒。

入獄一年半後，他第一次在獄中見到當時五歲多的女兒。家裏親戚透過警界關係，把孩子抱到他跟前。「她完全不認識我了。我穿着囚服，剃着小寸頭。我硬給她抱過來，她哇哇地哭。」

小女孩沒認出父親，孫立勇的家人就跟孩子說，爸爸到了美國留學。她天天搬來小板凳在家門前等爸爸回家，但遲遲沒等到他，後來暗暗猜測，爸爸是不是死了。

直到1996年，她十歲，偶然聽見祖父母探監時要給爸爸帶去紅燒肉，才得知真相。小女孩央求祖父母帶上她去探監，他們約定，無論如何，她不能哭。

事先不知情的孫立勇，等來了一個莫大的驚喜。

「我太激動了。我們隔着玻璃說話。我一看，孩子長高了，都長1米5了，四年級了。我問她，還認識爸爸嗎？女兒回答說，認識，老看你照片。她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就是不下來。我對她說，你好好讀書，你不要再來了，爸爸還要一年多就回家了。」

**民運推灰工**

1997年出獄後，孫立勇先後開過兩家書店維生，裏面全是普羅大眾喜聞樂見的暢銷書，日本漫畫、言情小說、養生書籍等等，供人租賃或購買。

2003年，他的第二家書店開在北京大紅門，租金很貴，他跟朋友借了好幾萬塊。開店不到三個月，兩輛警車開到了店門口。

「我說，你們什麼意思？他們那帶頭的說：『孫大哥，沒事兒，想您了，看看您來了，想找您下盤棋。』結果他下完圍棋殺象棋，殺完象棋下跳棋，從早上八點下到晚上八點，我一天一單生意都沒做成。」

當過警察的孫立勇立即意識到，這是由於前一天他參與組織了一場民運人士討論中國民主未來的聚會，消息外泄了。

這樣對峙了幾天，警察挑明瞭來意，上級要切斷孫立勇的經濟來源，書店不關門的話，他們就會「天天來下棋」。

「一旦共產黨認定你是敵人，那麼你終生都是他的敵人。它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曾經反對過它的人，」孫立勇說。他下定決心逃離中國。

2004年11月4日是另一個讓孫立勇刻骨銘心的4日，那天他逃亡到澳洲，女兒緊隨其後。他出獄後，兩人像朋友一樣相處，幾乎無話不說。「她喜歡哪個男生都告訴我。」

一提到女兒，孫立勇按耐不住滿滿的驕傲。他說，女兒的學業優秀，大學畢業後謀得高薪厚職，還交了澳洲男友。

「我不懂英文，但在澳大利亞也算是紮下了根。」

孫立勇現在是一名推灰工，他的英文雖不算靈光，但能用英文專業術語解釋推灰的工序：上膠、推平、打磨……

「這樣你就看不出來，這面牆原本是有縫的。」

他自認主要是個理想主義者，不過也承認生活很現實，吃喝拉撒睡，柴米油鹽醋，一個都不能少。

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兩道推力下，孫立勇大半生換過種種身份，像一面被抹過層層新灰的舊牆，而六四是上面一道不可修復的裂痕。

在澳洲，孫立勇創建了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資助流落各地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六四30週年來臨之際，他編纂了《六四抗暴者法庭檔案》，囊括了108名抗暴者的信息。他說，抗暴者是在六四之後結局最悲慘的群體。與學生領袖不同的是，他們往往不受國際社會關注，判刑重，出獄後際遇悽慘。

從警察到六四抗暴者，從「反革命分子」到海外民運人士，孫立勇對民運同志們有個忠告。

「我希望海外民運人士不要打橫炮，不要打自己；我們要打豎炮，要打共產黨的專制制度，打橫炮的都是吃飽了撐着的。我希望你們都找一份工作，有個職業，像我一樣，養活自己。」

「我是一名建築工人。」如今，孫立勇這樣向陌生人介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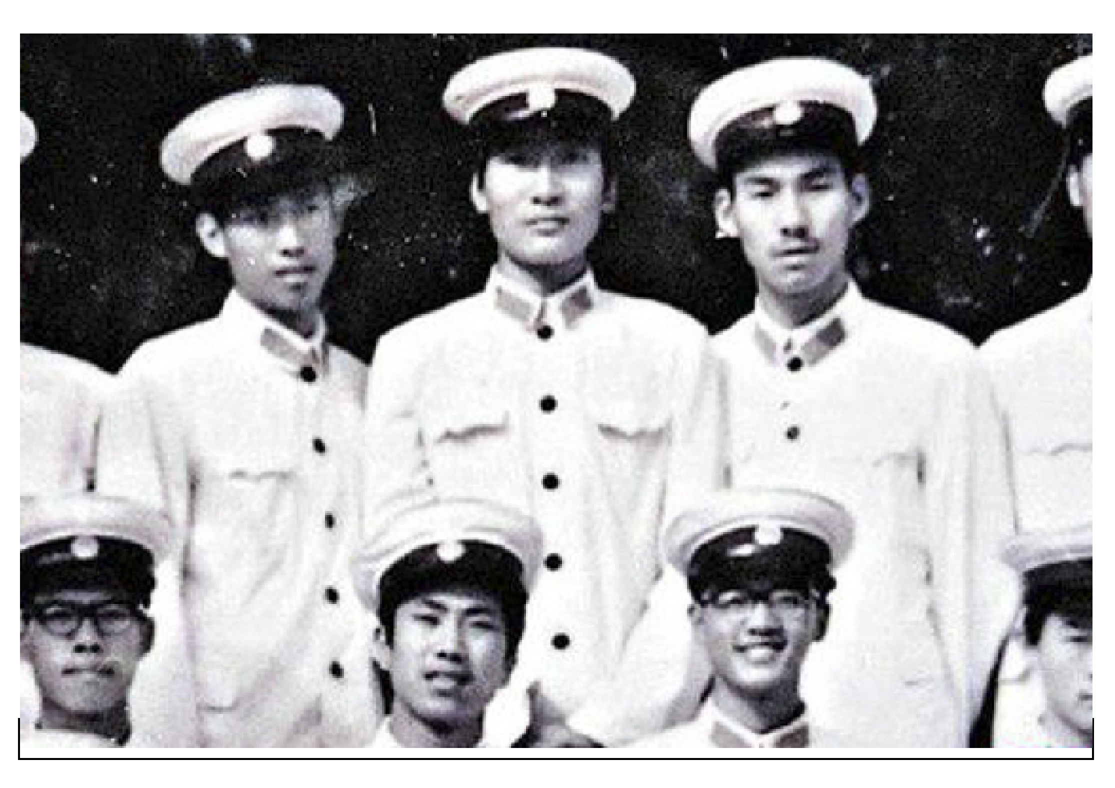
（實習記者徐涵對本文亦有貢獻。）



*近1.9米高、留着板寸頭的山東大漢孫立勇，曾在北京當警察，作為六四抗暴者親歷了八九學運。攝：Yuhong Pang /端傳媒*



*六四之後，孫立勇明與友人創辦了雜誌《民主中國》，後改名為《鐘聲》，通過郵寄、投遞居民區的方式散播雜誌。並因此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攝：Yuhong Pang /端傳媒*



*孫立勇曾在北京當過八年警察，於1987年辭職，其後轉當保安員。圖中後排中間為孫立勇。圖：受訪者提供*




*孫立勇編纂的《六四抗暴者法庭檔案》，其中包含108名抗暴者的信息。攝：Yuhong Pang /端傳媒*



*從警察到六四抗暴者，從「反革命分子」到海外民運人士。「我是一名建築工人。」如今，58歲的孫立勇會這樣向陌生人介紹自己。 攝：Yuhong Pang /端傳媒*

# 六四去國三十載，若在故土上不能說話，與流亡何異？——張倫專訪

記者 雷隆丨2019-05-31

眼前的張倫，看上去頗為疲憊。他對記者連聲道歉，說如果早知道要拍照，本來應該「穿得更像樣一點」。受失眠困擾，當天他五點便起床，上午參加亡友追思會。今年4月15日，旅法民運人士張健在從泰國曼谷返回巴黎的航班上突發急病，雖然飛機迫降慕尼黑，張健被緊急送醫，但最終撒手人寰，時年不足49歲。

三十年前，張倫與張健一同活躍於天安門廣場，早有結識。開槍清場之後，張倫踏上流亡之旅，經「黃雀行動」營救，同年年底經香港抵達法國。而張健則在廣場上被戒嚴部隊開槍射中腿部，直到2001年才流亡法國。2008年，法國醫生終於從張健腿中取出彈片和腐肉，這一幕被拍成紀錄片，成為六四二十週年時的悲情縮影。

轉眼十年，時光又逝。比自己年輕八歲的戰友，此刻已經不在人世，張倫感慨萬千。雖然此前幾年間，關於二人誰才是廣場上正牌的「糾

察總長」，外界曾一度有過喧囂，但張倫迴避參與，多年以來，他一直迴避海外民運的種種爭論。追思會上，他神情黯然地回憶起與張健交往的點點滴滴。

體格強壯、活力充沛的張健，抵法之後意氣風發地投入到海外民運的工作中，組織活動、演說撰文、擔任「民主中國陣線」（民陣）副主席，皈依基督教、用槍傷來現身說法、利用聊天室QQ群等一切他能想像到的途徑去傳播「民主萌芽」，但同時也難以避免地捲入到「兄弟鬩牆」的種種紛爭當中，個人生活也並不如意。客死異鄉之際，除了弟弟從北京萬里奔喪，便只有原來「民陣」同仁從各地趕來料理後事。

而作為廣場上曾經的糾察總長，張倫對海外民運來說更像一個「局外人」。他曾擔任原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著名異議人士嚴家其的助手，但早早抽身而退，走入學術研究。在法國社會學大師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ne）門下攻讀博士之後，張倫輾轉數地，終於在新興的Cergy-Pontoise大學謀得教職，再經努力獲得教授資格，主講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及東亞地緣政治。旅法30年，現在他與太太在巴黎郊外安家，撫養三個孩子。對於海外民運，除了一些重要時刻的重大活動，他很少再露面。

用張倫的話說，這三十年來他大半時間過着一種「半隱居」的生活。不過，他的研究旨趣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即便遊歷東歐拉美，考察民主或現代性，他念茲在茲的，仍然是那個他從東北荒原到帝國首都求學、又從西北重鎮潛行到東南海疆倉皇出境的國家。從維權運動到《零八憲章》、再到不時見諸報端的時評寫作，他始終與中國的老朋友們互通聲氣，密切關注這個國家的走勢。

流亡的生活是苦澀而尷尬的。直到多年之後，張倫才能用學術的語言，重新解釋這種安身立命的劇烈變化。對他來說，流亡意味着身份認同上的封閉性被迫打開，自己處於「門窗洞開」的境地，同時獲得多重的身份。他是當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廣場糾察總長；是曾經語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師門下高足；是曾經被法國學界排斥的局外人、也是鍼砭時弊的評論人；是被三個孩子弄得手忙腳亂的父親，也是無法床前盡孝的孩子。面對「我要回家」的悲慼呼聲，當局多年來不為所動，即便至親之人離世，流亡者也只能遙寄哀思。

當年26歲的張倫，如今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回首三十年，他感覺自己終於「爭得了真自由」、生活算是有了「基本保障」，他給後來人的經驗往往是，「生活一定要現實」、「先想辦法活下去再說」。「流亡」已經不再是一個心結，他似乎也習慣了這種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生活，並儘可能從這種特殊生存狀態中，獲取思想與生活的智慧。

然而，對整個中國海外民運群體來說，「知天命」似乎仍然是個遙不可及的境界，舉目可見，一代人凋零老去、有人像張健一樣出師未捷身先死，有人在異鄉漂泊到精神失常地步，還有人用一紙保證書換取護照上一個入境簽章。

在六四30週年之際，張倫應法國出版社之邀，和記者、畫家共同創作了一本法文連環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用域外讀者（尤其是年輕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承這段記憶。在他看來，如何激活人們對八九的記憶，是對死者最好的紀念，也是對將來的鋪陳。在畫冊第一頁的第一幅圖，他說道——

「我離開中國已經三十年，但每天，我都會回到這個廣場上。」

**端=端傳媒**

**張=張倫**

**我們曾想幫助學生進退收發**

端：外界往往把你視為學運領袖之一，但事實上，你當時已經是中國地質大學的青年教師，離「知識分子」群體比「學生」更近。你當年是如何參與到這場運動中的？

張：我生長在一個知識分子幹部家庭，文革時跟着父母插隊，在靠近渤海的東北荒原上長大，對農村有一種特殊的關懷。先學了幾年經濟，然後1985年我考入北大社會學系，用新學到的社會學調研方法，和官方機構合作參與各種各樣的改革；此外還參與了文學、藝術圈子很多事；後來因緣際會，認識了王軍濤、陳子明這批朋友，成為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的一員，致力於建設公民社會。

1980年代是中國少見的激盪時代，中國人剛從文革中解放出來，普遍有劫後重生的心態。那時候滿腦子都是如何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把個人命運和時代結合起來。我當時連黨員都不是，卻照樣參與了很多中共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的課題調研。如果當時沒有八九，可能再過一兩年，我會有不少研究成果出來，但八九改變了一切。

端：最近這部連環畫作品，除了勾勒出六四的宏觀線索外，也暗示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內部張力。回首1989，如今你有什麼反思？

張：1988年我經歷一次胃部大出血，在南方養病很長時間。四月間學潮興起之後，我回歸到王軍濤、陳子明這個團隊中，參與一些溝通協調工作。絕食活動開始後，我主要的工作是維持廣場的秩序，同時幫助學生更好地進退收發，不讓運動出現問題，這是我們當時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

我們現在都知道，大眾運動有個很大的麻煩，就是缺乏組織性，尤其在中國這樣的體制下更是如此。即使在民主國家，比如今天法國的黃馬甲，大眾行為的無序性也可能帶來很多問題。即便訴求合理，也不見得能形成良好路徑，甚至弄不好走向負面。在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中，民眾從小有各種各樣的訓練、同時有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存在，尚且如此；在中國這樣一個極權國家裏，難度就可想而知。

威權國家轉型之所以相對容易，是因為它還允許存在一點組織空間，比如台灣的民主轉型中，除選舉之外，諸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等民間社團在特定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中國則不允許任何獨立組織存在，稍有苗頭就要不惜一切代價滅掉，這種體制有一個悖論，就是平時它不認為這個社會有多元利益的表達，而一旦危機出現、運動興起，它又不知道找誰對話協商，如何讓事情和平解決。

八九運動中有一個著名鏡頭，是政府和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對話時，李鵬氣急敗壞地和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說：我在這裏和你們講，你們誰說了算？——這話其實很深刻。

運動中出現的「領袖人物」，並沒有經過合法性程序，最終會造成一種局面：誰更激進，誰的聲音就更大——比如法國的「黃馬甲」就是這樣，運動中哪個頭面人物溫和，立刻就被更激進的人所「超越」。

任何大眾運動當中，都會發現類似情況。而要真正理性運作，恰恰需要組織形態。如果沒有組織形態，那麼最好有一些因為以往經歷積累而有公信力的領袖人物，他們自己付出過代價，但同時又能保持理性，這對轉型而言非常關鍵。

非常悲劇的是，其實一個社會自組織的力量，有利於這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甚至對執政者有極大的幫助，但執政者往往又視之為敵對勢力，想除之而後快。

中共是不汲取這個教訓的，它始終想把「不穩定」扼殺於搖籃當中，將來還是要面臨這種難題，一旦有抗議，鎮壓就容易會成為選項，從它的角度來說，這是自然的選擇。而從民眾角度來說，和平抗議如果遭到鎮壓，教訓就是：沒有什麼「和平」「理性」可言，局勢一旦惡化，中國傳統的造反邏輯就可能再次浮現。

回到八九來說，我們當時想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幫助學生統合起來，有進有退地和政府博弈。給政府施加壓力，絕不是靠街上的人潮就能決勝的，一定要有進有退，目標要有限度、有共識；而如果沒有組織形態，協調運作，這種有限目標又是很難達成的。

所以我們後來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就是想把各界力量整合起來，同時也更好地和學生進行合作。在「聯席會議」之下，是「保衛

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是學生，但下面辦事的各部一級的負責人，基本都是青年知識分子或者大學老師——我是糾察總長，聯絡部是劉蘇里（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參謀部是劉剛（時任中國科大研究生院軟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宣傳部是老木（劉衛國，時任中國作協《文藝報》編輯）。

端：「糾察總長」具體負責什麼工作？

張：有兩方面：一是維持天安門廣場的秩序，二是堵截軍車。這兩項任務是白紙黑字寫的，沒什麼可否認。

後來王軍濤、陳子明作為「黑手」被捕後，他們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中都有一段關於我的話，也許在官方眼裏，我做的這些大概是最有價值可拿來證明所謂運動的「反革命」或者「暴亂」色彩的，包括指控我當時配備了對講機、望遠鏡、擬定聯絡暗號，在地圖上標註駐軍位置、負責部署堵截軍車等等。如果六四之後我被捕，會怎樣處置我不曉得，很可能會被重判，因為當局會把後來燒軍車等等都算到我的頭上。

端：6月3日晚間到4日凌晨，北京進行暴力清場時，你當時是什麼處境？

張：六四那天我並不在廣場上，說起來，這是讓我很內疚的一件事。

1988年胃出血之後，我的身體一直不好，在廣場上忙得昏天黑地，後來又暈倒了被送去醫院。而且到五月底時，廣場上的人已經越來越少。當時大家普遍認為，中共的策略就是「拖」，一直到把運動拖黃為止，然後「秋後算賬」抓主要負責人。所以我們當時也開始考慮做「長期鬥爭」的準備。

當時我和劉剛是處境最危險的兩個人。劉剛在學運之前，就成為公安局高度關注的對象，他對當時北京學運組織的成立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所以當時大概6月初，我們先撤下來，去昌平那邊一個朋友家裏休整兩天。

同時在廣場那邊，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個人上去絕食。之前我們開會討論過絕食，我也表示贊同。為什麼？因為從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之後，就一直有聲音說知識分子也應該參與。因為當一些學生的激情上來之後，你去勸學生，是不容易有效果的，你只有和學生「共患難」，贏得他們更多的尊重和信任，然後才能用更理性的方式，把他們帶出廣場。這是其中一個重要考量。

而且後來事實證明，在六四凌晨他們的確起到了關鍵作用——和戒嚴部隊談判，帶領學生和平撤離。如果當時他們不在現場，會不會死更

多人，很難說。當然這是後話了。

當時我看到劉曉波他們參與絕食，感覺比較放心，所以就撤下來休整，我和劉剛被送去昌平。但是到6月3日中午，感覺氣氛有點不對，到了傍晚就完全不對了，電視裏一遍遍在播戒嚴公告……

端：有想過回到廣場上嗎？

張：想過啊，但一個問題是用什麼方式回去，昌平離天安門廣場幾十公里，當時交通已經不暢通了；另一個問題是當時也沒有通訊工具，和廣場上的朋友接不上線。

夜裏劉剛出去打探情況，有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從市區回來，精神受到刺激，一直說「北京開槍了、殺人了」，回來後劉剛過於激憤，心臟不適，我在水泥地上鋪了涼蓆照顧他躺下休息，一直號着他的脈，等他稍穩定昏睡過去後，凌晨三四點我自己又跑出去打聽，但還是沒什麼消息，直到早上，有各種傳聞說天安門清場開槍了。

端：後來的逃亡旅程是如何開始的？

張：6月4日天亮之後，畢誼民把王丹、楊濤和老木都送到了昌平這邊。前一天夜裏王丹在北大學生宿舍，也不在廣場上。大家草草吃了頓飯，隨後準備分頭疏散到各地。飯後劉剛、王丹先走，我和老木、

楊濤等到6日，每人得到一個落腳聯絡地點，被送到密雲的古北口車站，踏上逃亡旅程。

我本來先去內蒙古，但在那邊沒有待下，輾轉去了蘭州，在朋友家住了三個月，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出國，但後來發現不行，一是局勢不會很快好轉，二是朋友冒着風險把你藏起來，如果一旦被捕，勢必連累朋友，帶來滅頂之災，再加上陸續聽說劉剛楊濤被捕，所以決定還是要想辦法出去。

後來香港的「黃雀行動」派人輾轉和我們聯繫上，我和兩個朋友偷渡到香港，待了好幾個月，當時「民主中國陣線」在巴黎成立，中法關係非常緊張，所以很多人在香港滯留，等局勢稍微穩定下來，1989年底我們到了法國。

**我們不能永遠用「難免」來給八九的一些欠缺做藉口**

端：當時很多流亡者以法國為跳板，再去美國，你為什麼會考慮一直留在法國？

張：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首先覺得做人要有一點loyauté（忠誠），當年法國承受了相當大的政治和外交風險，付出了一定代價，把我們這些人接收過來，但是我們都跑掉，我覺得太對不起法國。

為什麼這麼說？這和我三十年前在香港的感受也有關係。當時老布什政府對接收我們這些人的態度，其實有很大的保留，後來我們也知道，老布什把特使秘密派到北京見鄧小平等等。當時我在香港就能非常明顯地感覺到這種態度。

其次，當時歐洲處於發生鉅變的前夜，東歐的蘇維埃陣營還沒有倒掉，但我預感到可能快要壽終正寢了。如果這麼大的一個帝國崩解，不留在歐洲觀察，跑到美國去幹什麼呢？尤其那個時候我自己的學術關懷集中在後共產主義轉型，正當其時。此外當時歐洲正在醞釀後來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用一種和平方式、而非征服方式建設這樣一個大共同體，這是人類歷史上此前從未有過的。

我個人也一直比較喜歡歐洲尤其是法國的文化氛圍，西方文明的根畢竟還在歐洲，這裏的問題有豐富的複雜性，不像美國有獨特的200年發展道路。美國有很多值得中國學習的東西，比如在大國實行民主體制，但中國的歷史積澱，可以在歐洲產生更多回響，後者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對中國會更有啟發。這幾重因素結合起來，促使我留在了法國。

我當時也參與過海外民運的工作，作為嚴家其的助理，幫助他籌備「民陣」二大，但1990年開完二大，我就南下到法國中部城市維希（Vichy）開始學法語，強化半年之後註冊博士，從此踏上求學之路。

端：這種學術經歷，對於八九親歷者而言，有什麼特殊意義？
張：學術積累可以讓人對宏觀問題有更深一層的看法，比如，八九和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運動是如何銜接的，不像原來想得那麼簡單。八九本身是很宏大的事件，它完成了思想解放，但它也有它自身的問題，比如知識界的思考有很多不足，當然這也沒有辦法，是文革封閉環境的結果，對許多問題的理解不夠完整深刻，有簡單化傾向，這都是難免的，但反過來說，我們不能永遠用「難免」來給八九的一些欠缺做藉口，三十年之後我們總得深入下去，對現代性問題等有更深的認識。

這些問題也不是僅就中國談中國。我曾經半開玩笑地說，中國人有「自戀」的毛病——說到好處，是中國特殊地好；說到壞處，也是中國特殊地壞。其實如果我們把視野拓展開，從現代性角度看中國近百年的變遷，放到世界背景下比如和奧斯曼帝國、阿拉伯世界對比，可以發現許多相似之處。

端：回到八九，參與者不僅僅有知識分子，還有學生、市民和政府。在那個歷史關頭，即便知識分子的思考到位了，恐怕也很難改變整個事件的走勢？

張：知識分子的事業，其實應該是在運動之前，等走上街頭的時候就晚了。

原《北京之春》主編胡平曾經提出一個很有名的理論，叫「見好就收，見壞就上」，我不太同意，為什麼？因為在八九的那個具體情景中，他所說的很難實現。但從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來看，胡平的說法又絕對是有道理的。

我們不妨把八九和當下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對比來看，有一段時間法國社會民意對黃馬甲的支持度也相當高，但這個社會有確定的制度框架，鐘擺只能在這個框架裏擺盪，這是一個多元社會長期形成的共識，最壞情況下不過就是馬克龍辭職，重新大選，這是可以預想的，但要說真搞革命，把目前現行體制徹底推翻另起爐灶，大概沒有什麼人支持。

但中國並沒有這樣的框架，之所以如果前期準備工作不做到家，歷史中的這些「行動者」思考、積累和準備不夠，運動一來，出問題的概率相對就比較高。

端：你覺得法國黃馬甲佔領街頭的形式，和當年學生佔領廣場，二者之間有可比性嗎？

張：我覺得沒有太多可比性。如果一定要說有可比性，從最抽象意義上說只有一點，就是社會問題的積累、以及新的社會力量的發展，和原有的社會架構一定會產生衝突，最好的方式就是原有架構進行調試，吸納這些新興力量，尋找解決問題的新方式，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達成平衡。民主制度的好處，就是可以通過理性方式完成；而威權國家裏，可能就演變成顏色革命或者暴力革命。

只有在這一點上，今天法國的情況可能和當年中國有相似之處；除此之外，在政治權力來源、組織方式、政治文化等等，二者都非常不同。

**我依然感謝流亡**

端：2003年時你曾經寫過一篇《感謝流亡》，現在又是十幾年過去了，您還抱有同樣心態嗎？

張：到現在為止，我仍然感謝流亡。不管是個人還是民族，生命歷程與歷史發展中都會遇到很多劫難與挑戰，關鍵是作為主體的抉擇和應對。許多事不是好事，但如果處理得好，就可以轉化成財富；如果處理不好，自己垮掉了，那就是災難。

這三十年間，我多數時間處於半隱居狀態，沒有太多社交，海外民運在1990年代初參與過一段時間，後來除了一些重大活動，其他事情也很少參與。海外流亡運動的聲音在這個時代不能沒有，但我同時也不對它抱超出可能的期望，而且我也不覺得什麼人都來參與，會是件好事。

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是一個堡壘，一旦形成，人就有封閉性。而流亡意味着這種封閉性將被迫打開，自己處於「門窗洞開」的境地，同時獲得多重的身份認同，你看待世界、對生命的體驗認識會和沒有出國完全不同，和以普通遊客或學生身份出國也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命的體驗得以豐富，我還是感謝流亡。

端：有沒有想過退一步做妥協，比如籤一個「保證書」，來換取回國的機會？

張：從來沒有。我這些年來的想法是，尊重任何人的選擇，不要用過於道德化的標準去要求別人，每個人都有權做自己的選擇，可以和中國官方做他們願意做的妥協，只要不損害第三方的利益，我覺得這種選擇也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我自己不這樣做，這種決定是早就想好了的。我對誰都不下跪，希望自己人生歷史上這一頁能夠寫得像樣一點，對得起生者，也對得

起死者。曾經有朋友試圖幫我溝通，我對他說，不必費心了，他們不來請我，我自己是不會主動自尋其辱的。

端：有過官方的主動接觸嗎？

張：沒有，從來沒有。據說他們在美國和一些人接觸過，但在我這邊從來沒有。

我也希望這個民族能夠和解，能夠走出和平轉型、重建正義、重建共識的道路，但前提是有些事情得做到，不能說殺了人白殺。殺人者還沒有檢討，先要我檢討？就為了回國？

回國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只是為了回國而回國，見見朋友喝喝酒，什麼事都不能幹，什麼話都不能說，那完全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人如果在自己的故土上都不能說話，那也是一種流亡啊。

要說了解中國，坦率說我在法國，不見得比某些國內的朋友對中國了解得少。我這幾年寫的時評，能受到國內許多讀者的肯定，證明我並沒有失去對中國的了解和把握。

端：從八九之後中國的整個海外流亡群體來看，似乎並沒有做出別人對他們期待的成就？

張：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態度是No comment（不做評論）。我只對自己提出要求，別人做什麼選擇，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狀況，外界的某些期望是否恰當等等，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文化有時就是很個體的事情。一頁文化史，我們可能就記住一兩個人。從我個人角度講，也只能多寫兩篇文章，對得起這一頁歷史。

## 「雙重轉型」造就平反之難

端：對比讀中法歷史，讓人有一個困惑：法國歷史上也不乏流血內部衝突，比如巴黎公社也有慘重傷亡，但短短十餘年後，公社社員就獲得赦免。為什麼六四過去已經30年，禁錮不僅沒有鬆動，反而更加嚴密？

張：我此前提出過「中國的雙重轉型」，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這個問題。

所謂「雙重轉型」，一方面指中國正處在從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大趨勢中，另一方面也正經歷最近幾十年來從共產體制向後共產主義的轉型，二者相互疊加，但各自面對的核心問題是不同的，比如土地私有問題，如果僅有前一個大轉型的話是不存在的，只是因為有後一個轉型，才凸顯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就後共產主義轉型而言，不對現存的國家政權形態進行某種解構是不行的；但是從文明的現代性轉型的角度看，如果缺乏國家建構，又絕對是一個致命問題，清末的混亂就和此有關，因此更顯示出「雙重轉型」的複雜與艱鉅。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轉型就和法國非常不同，前者是從極權中掙脫出來，原來的社會自組織力量不復存在，需要進行分化重組。這種轉型中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今天如果不是習近平在台上，形勢會不會不同？當然有可能。但這其中又有一些結構性因素，歷史中的行動者不是隨心所欲的，他有自己面對的限定結構。六四也不是非開槍不可，但一旦開槍，此後就有路徑依賴問題，就不得不面對這種選擇造成的後果。

法國社會當時的情況不一樣在於，它存在於大革命之後的歷史脈絡中，在確定現代性框架的過程中、在這種框架裏不斷完善，在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互動作用下，就容易實現和解與平反。

但在中國，有什麼力量可以撬動這些因素？我們當然希望高層能夠有遠見與政治智慧，那會減少成本，但如果你不把希望都寄託在這種我們無法把握的事情上，就只能寄希望於社會、經濟力量成熟到一定程

度，到時候平反就會成為大概率事件。所以歷史中的確有很多偶然性事件，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結構性因素的累積。

端：一方面是六四30年逐漸進入歷史，另一方面是習近平的「新時代」，如何理解歷史與當下二者的連續性和衝突性？

張：在我看來，六四標誌着全民改革共識的終結，而「悶聲發大財」的鄧氏改革如今也已經走到頭了，過去二十年中它一方面激活了社會的很多活力，空間在增大，到胡溫時代甚至一度「公民社會」話語也很流行；另一方面政治上又始終高度敏感、缺乏自信。雖說經濟高速增長重建並積累下一些合法性，但恰恰因為六四和隨後的畸形發展模式，導致當局異常脆弱、敏感到一種病態地步。這種模式發展到一定地步，必然會面對瓶頸。

中國確實要進入一個「新時代」了，但不是習近平自己標榜和期許的「新時代」。接下來中國面臨一個「範式選擇」的問題，也就是說，下一步中國的發展要選擇什麼模式？如何繼承過去改革中的合理性成分，消除其負面遺產？這就是取決於我們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的體認有多深，對中國的未來要做什麼選擇。

而習近平上台後，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了選擇，其中核心是什麼？要讓紅色江山「萬世一系」。相比之下，鄧對這個問題其實是工具性地處

理，「要穩定、要發展」，普選之類以後再說，這種「開放性」有它自己的問題，但同時確實帶來一些空間。但習不一樣，他要重新定義，他其實也清楚，如果按照鄧氏改革模式繼續發展下去，一方面允許各種社會力量壯大起來，另一方面允許各種腐敗繼續下去，早晚有一天都會威脅到中共的統治，應當說，這種思路有他自己的邏輯。但他的落腳點是要重建黨的權威，重建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我幾年前對此就曾經總結為習式的「新毛主義的執政趨向」，核心就是「打通毛鄧」、「毛鄧互補」、「毛鄧兼用」。

但根本問題在於，毛鄧的路線在許多地方是不相容的，一個是「毫無自由」，一個是「有限自由」，二者如何結合？我曾經戲稱，文革和改革，二者是不能聯姻的，非要扯到一起，只能生出一個意識形態分裂的怪胎。而習近平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讓文革和改革聯姻。這種執政方式，最後必定會給中國帶來災難，但在眼下，他能借助的只有一招：控制。

**對於六四記憶，我並不悲觀**

端：你在海外任教多年，和年輕學生有許多交流。當下六四記憶的一個重大命題，就是如何傳承。三十年間，一代人老去，六四記憶有沒有被湮滅的可能？

張：一方面，中共這些年的宣傳，抹殺記憶的有效性很明顯，許多年輕學生就是不知道六四，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人如果不能從歷史中汲取知識和教訓，未來道路上必然有坎坷。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是那麼悲觀：一方面，一個人、一個民族的記憶本身是很深層很頑強的東西，難以簡單、徹底地抹殺掉，它總有一天會浮出水面，甚至可能過幾百年還有痕跡。另一方面，記憶為什麼難以抹殺？我們回到八九，看看當時學生們到底在要求什麼？運動前期很多活動都圍繞着「七點聲明」，其中除了公正評價胡耀邦和增加教育費用等具有時代特徵的內容外，其他大部分內容——比如要求官員公布財產、新聞自由、政治透明度、選任與監督官員等等——仍然是中國今天最重要的問題。歷史的基本課題還在那裏，沒有得到解決，除非發生世界大戰這樣的重大變化，否則是逃不掉的。只要一天不解決，這些問題的張力、能量就一直在那裏，而這和八九的歷史是聯繫在一起的。

端：但就像大腦長期缺氧會造成不可逆的損害，你不擔心一種情況：即六四記憶長期被壓制，也會造成不可逆的缺失？一代人已經翻頁，新的一代人腦中幾乎完全是空白。

張：新一代的年輕人一樣要進入社會，一樣要接觸現實。他們可能在課堂上被灌得滿腦子稀裏糊塗，但現實會教育他們去面對一些基本問

題。小粉紅們可以群起攻擊台灣、美國，但哪天因政治需要又被領導下令噤聲，他們會很失落、很火大的。

退一步說，他們再粉紅，能紅過我們那代人、我們的上一代人嗎？我們比這些小粉紅們更相信黨的說教，但這兩代人中怎麼產生批判意識的？就是因為歷史現實的教育。況且當年信息更閉塞，沒有互聯網，不是也做到了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也並不絕望。

端：1989年的大學生，曾經對民主體制抱一種非常美好的幻想，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就是最典型的反映。這三十年來，你一直生活在民主體制下，想必知道其實它事實上充滿衝突，尤其是近十年來西方民主體制本身也遭遇嚴峻的挑戰，回過頭來看三十年前的民主想像，你覺得有什麼需要反思的地方嗎？

張：我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過一個更極端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連西方人自己都放棄民主體制了，中國人自己還要不要追求民主？答案仍然應該是肯定的。說到底，民主是為了解決權力的合法性問題，為了解決利益代表機制的博弈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直到今天，我沒有看到有其他任何機制比民主更好。

無疑，今天的西方民主面臨重大挑戰，包括中國的崛起導致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內部財富配置的變動、信息技術、地緣政治、各式身份認

同政治等等，法國的黃馬甲也是一個體現，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有舊的機制需要調整，一些烏托邦的東西也會產生，其中甚至伴隨着暴力——很像19世紀末期的情況，而且民主體制的衰敗從來也都是可能的，但從現在看，我並不認為西方民主會徹底瓦解。經過一段的調整，我相信民主制依然是這個世界上最具有生命力、活力的制度。

端：近年來的六四紀念中，一直有個危機信號，就是以香港作為標本，對維園晚會等紀念活動的熱情逐年走低，加上「佔中」等活動，陸港對立也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今年是六四30週年，可能參與人數會有回升，但這個問題仍然存在。您作為流亡海外30年的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香港這方面的現狀，我完全能理解，這是由於挫折感造成的。年輕人期望值都比較高，期待一行動就能見到效果，但歷史有時候需要韌性，它不是一天兩天能改變的。

我們讀歷史也會看到類似現象，年輕人遇到挫折，會容易往兩頭走。1920年代國民革命失敗之後，激進一翼有些人跑到共產黨那邊——就像今天有些香港年輕人提出「港獨」；保守一翼有些人可能就潔身自好，什麼都不管了。這兩種情況都容易出現，但年輕人畢竟都會成熟、會重新再思考、再出發，我想香港人最後會意識到，他們和大陸

的關係是脫不開的，真正面對現實，尋找一種可行的方式，是一個人成熟的標誌，也是一場運動成熟的標誌。

總之，我完全能理解這些香港年輕人，我並不想居高臨下給他們建議。給他們時間吧，只要真正面向現實思考，我想有一天他們會找到合理的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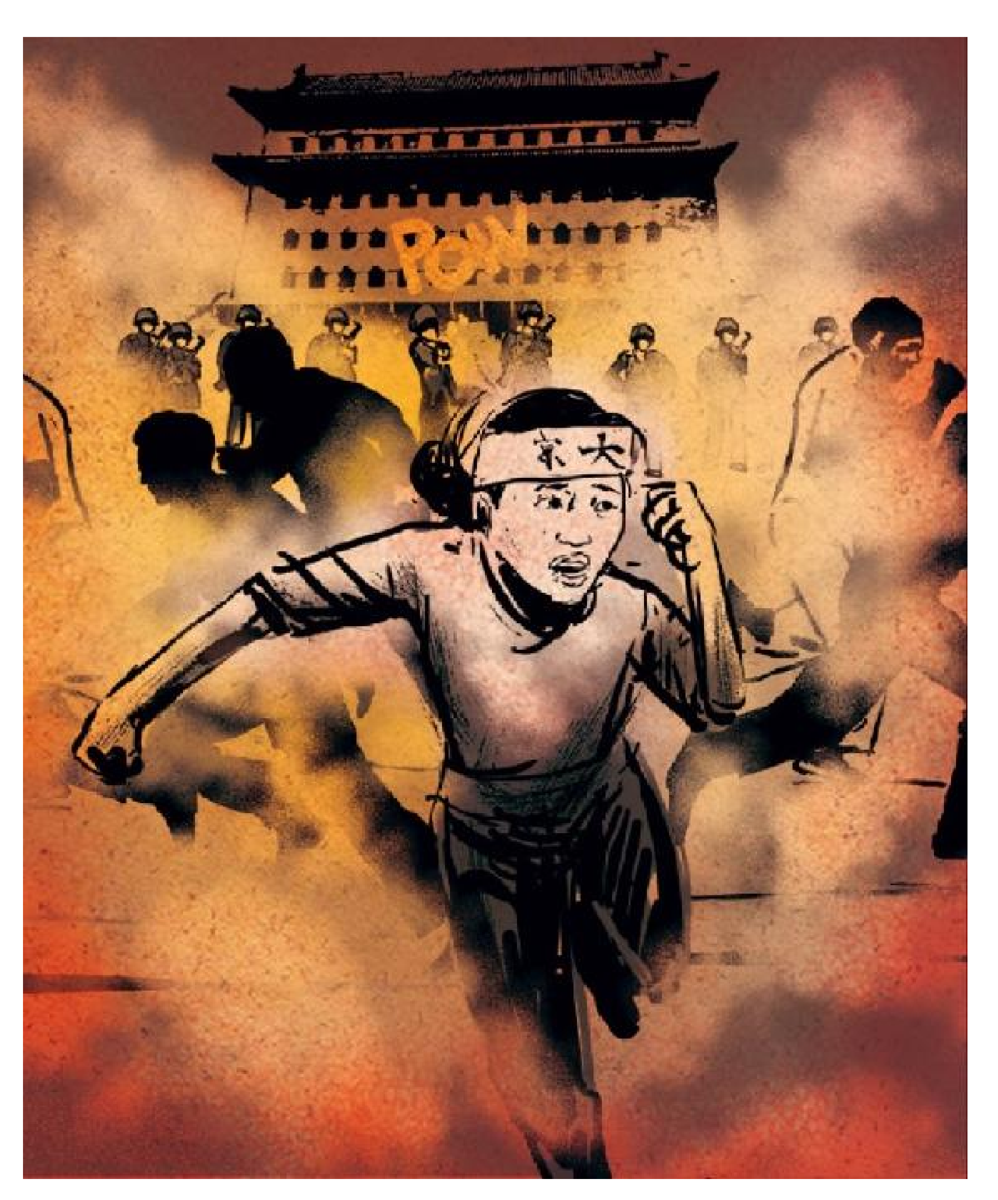
*張倫於六四開槍清場之後就踏上流亡之旅，經「黃雀行動」營救，同年年底輾轉香港來到法國，近年已很少再露面，用自己的話說，這三十年的大半時間裏過着一種「半隱居」的生活。攝：Dan/端傳媒*



*今年4月15日，旅法民運人士張急病去世，年僅49歲。張倫在法國的張健追悼會上。攝：Dan/端傳媒*




*張倫曾應法國出版社之邀，和記者、畫家共同創作了一本法文連環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圖片提供：Seuil及Delcourt出版社*




*法文連環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圖片提供：Seuil及Delcourt出版社*



*法文連環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 圖片提供：Seuil及Delcourt出版社*





*法文連環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圖片提供：Seuil及Delcourt出版社*



*張倫對海外民運來說更像一個「局外人」。流亡後早早抽身而退，走入學術研究，把對中國民主自由事業的關注，選擇聚焦在支持中國的維權事業上。攝：Dan/端傳媒*




*法文連環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圖片提供：Seuil及Delcourt出版社*

# 「尋釁滋事」式紀念，陳雲飛「快樂抗爭」的心法

記者 鄭佩珊丨2019-06-02

陳雲飛的微信號由1989-06-04這組數字組成，早前換過手機號碼，尾號仍是8964。在朋友圈內，他自稱為「陳犯雲飛」，附註解釋身分是「尋釁滋事犯」（被授予「一級最危險罪犯」囚銜），2015年清明節前夕，他與一批維權人士在四川成都為兩名死難者掃墓，回程途中，遭近百名警察圍堵，他其後被以尋釁滋事罪起訴，判處有期徒刑4年，期間屢受酷刑。

今年3月25日，陳雲飛終於出獄，沒幾天，他又為死難者掃墓去了。「我們朋友被抓了，擔心萬一沒有人去，我還是悄悄地去了。」他帶著濃濃的四川口音，在電話裡頭對著記者這樣說。「沒有什麼害怕的，因為紀念自己的同胞。該做的事還是要做。」

事實上，這陣子的四川早已一片風聲鶴唳，「六四酒案」拖拉3年，終在4月判決，四人因 在微信公開銷售寫上「銘記八酒六四」、並附以王維林身擋坦克圖的紀念酒，分別被判3年至3年半；至5月，當地獨立

電影製作人鄧傳彬將該酒瓶圖片上傳至Twitter，其後刪帖但在凌晨被國保帶走拘留，兩案罪名同樣是尋釁滋事。

致電找陳雲飛，他一口爽快答應受訪。反而是記者遲疑，先後幾次跟他確定意願，真的沒問題嗎？他每次也語氣篤定，「說真話無所謂」，「如果我們恐懼，他們的目的就達成」，「我不想坐牢，但前提我守了法，他要是這樣搞，我就當成榮耀。」

剛過去的星期一（5月27日），陳雲飛轉發「天安門母親」的受訪視頻給網友，手機及電話卡隨即被扣。30年前，他是學生，在北京活下來了。早年曾在報章刊登「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今年的6月4日，陳雲飛已知規定不准出門，計劃待在家裡給良心犯家屬發一封價值89.64元的紅包，非指定的對象則發6.4元。這就是他紀念六四的方式。

## 一、我心中的紫陽情結

1989年，陳雲飛21歲，是個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現為中國農業大學）大三學生，校內氣氛其實不怎麼關心政治。但此前，他在圖書館看過《河殤》、《走向走來》，思想受衝擊。學運爆發，他去了遊行，還參與絕食，待至第六天，身體受不了就送院。

一直流傳這樣的一個情節，在餓得昏迷之際，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撫摸著陳雲飛的頭頂說，「孩子，你要活下去啊」。陳雲飛驚訝，不知道這個說法從何而來，他說，5月18日已暈倒入院，而趙紫陽等人翌日才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當時陳雲飛已就躺在病床上，電視播放趙的講話，「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

陳雲飛一直念念不忘這番話。

他身體虛弱，待至5月24日才出院，一直未有重回廣場。至6月3日下午，空氣彌漫著危險的味道，戒嚴部隊要來了，人人也時刻關注最新消息。晚上10點，陳雲飛剛好在學校值班室，接到高自聯的電話說，頤和園有裝甲部隊開始進場，他就跟同學空手就去了擋軍車，「也沒有害怕，因為沒有想到會這樣，人民警察、軍隊怎麼可能對付學生嘛？」怎料現場一片黑，防暴警察拿著警棍劈哩啪啦的打學生，陳雲飛被打個頭破血流，頓時沒了意識，「醒來的時間不記得，去了哪個醫院也不記得。」

清場結束，他休學養傷，政府派來宣傳車，在城內到處宣揚公佈死傷人口約三百。陳雲飛人不在衝突現場，也沒想到會死多少人，聽了就信了。記者反覆追問好幾次，人在北京，總會有些真實見聞吧。他說

消息封鎖，人也單純，「我從農村來，沒經歷過文革，不知道會做得那麼洗腦」，故當年也毫不懷疑官方說法。

翌年畢業後，他還安份的抱著「國家培養我」的心情，回到四川的農牧廳工作，怎料內部爭權貪腐，管理一塌糊塗，他待了幾年才離開，轉往農村開自己的養殖場，只靠不時聽聽外地電台接收消息，與外間沒甚聯繫。

一直至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逝世，重新打開了他的世界。

隔了兩天，陳雲飛才輾轉在一名工人口中得知這個消息，他連夜趕到鎮上的網吧翻牆一下，彼時開始研究趙紫陽的身世，重溯他的歷史，突然深受觸動。「這個人可以拋開他的個人利益、黨派利益、家族利益站出來說話，而我作為老百姓為什麼不能站出來說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開始維權。」

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自此陸續有來。

## 二、死難者家屬的義子

翌日一早，陳雲飛來到成都天府廣場，高舉「蒼天，你怎記不得紫陽好？」的橫幅，警方把他強行帶走，監控其活動。至同年4月清明節，他才能趕赴北京拜祭趙紫陽，卻在悼念的留言簿驚見「天安門母親」

留言。他首次獲知這個群體，即前往拜訪，與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張先玲。

陳雲飛看到這一群母親為追求真相而搜集的六四死難者名單，「我很傷痛」，他頓感被騙了，被當時的消息封閉了。「我知道死人，但沒有想到那麼多。」他說。

天安門母親還告知他，四川有死難者吳國鋒和肖傑。陳雲飛與吳、肖二人本來不認識的，但都是同一個時間去北京讀書。自此，他開始每年去為他們掃墓，親自上門探望其家人，中秋節又買點月餅去，後來還成為了吳氏父母的義子。

「孩子走了，為了國家、為了民主走了。那我們就是他們的孩子嘛，就當他們是自己的親人在看，然後他們就也把我們當自己的親人了。」陳雲飛感歎道。

那些親屬看到陳雲飛，當面也不說有多生氣悲痛，他說，「如果生氣憤怒，生病了，死了，正好達到某些人的目的」，家人最重要還是保持身體健康，「可以跟更多的人訴說這個事情，他們就是活見證。」

事情不止於此，陳雲飛輾轉得到一名死難者的資料：陳永廷，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的學生，當晚在天安門廣場外圍被打死

了。他先將資料轉交至天安門母親，又協助聯繫消息來源以便核證。當天安門母親的尋訪成員到了四川，陳雲飛就跟她們說，「我今天能夠活著，是因為當年那些死去的學生、市民替我去死了，所以，我不能苟活著。」

陳永廷，則成為了天安門母親製作的名冊上第202名死難者。

## 三、把公權力關進籠裡的馴獸師

陳雲飛開始維權了，這些年來獲取很多不同的封號：「民主行為藝術家」、「業餘馴獸師」。問維權方式與理念，他隨即無間斷發表四分鐘演說——「陳式三板斧」。對於公權力，他先來個貼身的形容，「公權力就是猛獸，我們目的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

是故，陳雲飛就是馴獸師，他詳列具體方式有三，第一式：「我們小時候趕豬，豬跑到籠子外面之後，你想趕他進去，你打他、罵他、踢他，他都不會進去。如果踢屁股，就能歡歡喜喜地把他帶進去。」

陳雲飛總不會明刀明槍地與政府對著幹，擅長戲謔又幽默的行動。前往示威，他會揹著「為人民服務」的包包，身上會掛上紙牌，附上「溫馨提示」：「公僕，不要向你的人民動粗！」當局剝奪他的出國

權，他就為自己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舉辦葬禮。早年經營養殖場，還自稱「陳氏勞改農場」，就當作自己在「勞改」前來滋擾的警察。

看似並無章法，正是中心思想第二點。「不要去爭論，把公權力關進籠子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就像殺豬一樣，有的殺頭，有的殺屁眼。」2015年，陳雲飛因應彭州中石化PX廠導致空氣污染情況嚴重，就特意「開通一條來往成都與工廠的一日遊旅遊攻略」，以展現「黨委政府的豐功偉績」，手法引起關注，他同時也被行政拘留十幾天。

陳雲飛講求，在每一個微小的位置上，「要力所能及地去做」；「民主運動不一定要在天安門廣場，不一定要在長安街，民主運動應該是在每一個有公權力的地方。」結果他總是到處跑， 非正式統計，他已去了超過40個派出所。

維權需要穿川過省，他會搭硬座火車，日常使費能省便省。維權圈子朋友描寫他的文章裡頭，總說有點擔心陳雲飛提出主動請客，亦不想跟著他去維權。因為此人每頓伙食費不超過5塊、每晚住宿列為20元。記者向他求證，他就是笑笑，沒有正面回應，只道住宿可以找當地朋友協助，一般則睡網吧。「很多維權是需要錢，比吃穿更需要錢，那些維權的良心犯等等更需要錢。」他不時為他們送飯，又送上一封89.64元的紅包。

四、我的中國夢

這名馴獸師又補白，「公權力就是猛獸，獅子要是發怒了，它要死人的，那麼你還在跟他頂著幹？危險的時候就退一步。」

話說回來，陳雲飛這個人物開始進入公眾目光，是源於2007年，他在《成都晚報》刊登了一個分類小廣告——「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事前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已勸他不要做，因為估計到會有無辜的犧牲，惟陳雲飛選擇一往無前，「我有自己的堅持，我就堅持表達我的聲音」。報章職員問他64是什麼啊，他就訛稱是礦難，最終避過自我審查，卻躲不過秋後算帳。他被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處以監視居住半年。

至2015年，陳雲飛為六四死難者掃墓後被捕，官方以尋釁滋事罪起訴之，判刑4年，還被定為「一級嚴管」的囚犯，期間曾遭受酷刑，諸如長時間罰站、穿約束衣，甚至將手和腳銬在一起，15天才能洗一次澡，還與肝炎和肺結核患者囚禁於同一斗室。監獄不時將其轉監，家人無法探望。好不容易出獄了，陳雲飛又悄悄再去掃墓，還向四川司法部及省監獄管理局提請信息公開，要弄清楚在監獄內措施的司法根據。

上述一切舉措，彷彿與他提倡的「危險退一步」大相逕庭。陳雲飛如此回應，「沒有危險。當然我沒想到他們會那麼對待我，但我覺得，只要沒有要我的命，還是撐住的，還好。」他還帶著笑意，「我快樂啊。我坐監獄，我在裡面也是維權。」他知道，「外人來看，肯定是酷刑，24小時折磨我們，我覺得是磨練自己，的確是很苦的。」但這酷刑，卻是「暴露了他們的法盲，是不守監獄法的，是暴露殘暴的一面。」

他進一步解釋理論，「要感到快樂地去做，不快樂的時候，你不要去做，如果感到鬱悶的時候，就放一放。」

陳雲飛卻好像沒有放一放的時間，被控尋釁滋事之時，他寫了一個法庭陳述，「我的感覺就像孫悟空在煉丹爐中，舒服極了。對我的迫害、毆打、戴脚鏈，就像做數學題，越難越有趣，意義越深遠」。判刑當日，他穿了一身灰白睡衣出席審訊，就是為了方便做「中國夢」，聽到刑期4年，還打出了一個勝利的手勢，理由是判刑太輕。

## 五、公開事情的維權律師

這一條審訊路，隋牧青是其中一名為他奔相走告的律師，時有探訪陳雲飛，還拍了一張他在獄中的照片，公開其遭受酷刑的情況。陳雲飛說，是他特意挑選的人物，因為對方也有「8964的情節」。

隋牧青當年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學生，他與陳未曾在廣場上相見，但同樣由4月開始參與運動，他向我們訴說清場實況，「一路上全是血，為什麼叫血流成河？它有凹的地方，你就會感覺得到血是在流動的。」隋牧青還被通緝要坐牢，畢業後待過政府機關、企業，主力商業案件，待至2011年認識了另一名維權人士郭飛雄，受其影響才投身維權行列，因此也認識了陳雲飛。

「在法律上，你不需要有多高的水平，就非常容易判別他是無罪的。」隋牧青這樣分析國內的案件，他就說維權律師的價值，反而是「要把這些事情公開，我就要讓社會來評價一下你捉他關他，是不是對的？」他就是把東西都放到微博群上去了，隋牧青說有人或會擔心，事情公開了，在監獄裡頭的人不是更危險嗎？

「不會，其實對發東西的人才有影響，對裡面的人沒有。對裡面的人只有好處。」過程中，陳雲飛在監獄裡頭寫了一堆日記、信件，也有維權案的資料，請隋牧青幫忙帶出去。結果隋牧青被抓住了，看守所都把東西搜出來，還說他擾亂單位辦公秩序，他也一一發到網上去。

發東西的風險確實在發東西的人身上，2016年，隋牧青成了709維權律師之一，半夜被帶走，其後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監視居住

半年。至2018年2月，他的律師執照被吊銷，處罰決定書還點明了隋牧青為陳雲飛拍照和對外傳遞文件的行為。

「我很遺憾，都是他們法盲警官，亂來的。」陳雲飛知道結果後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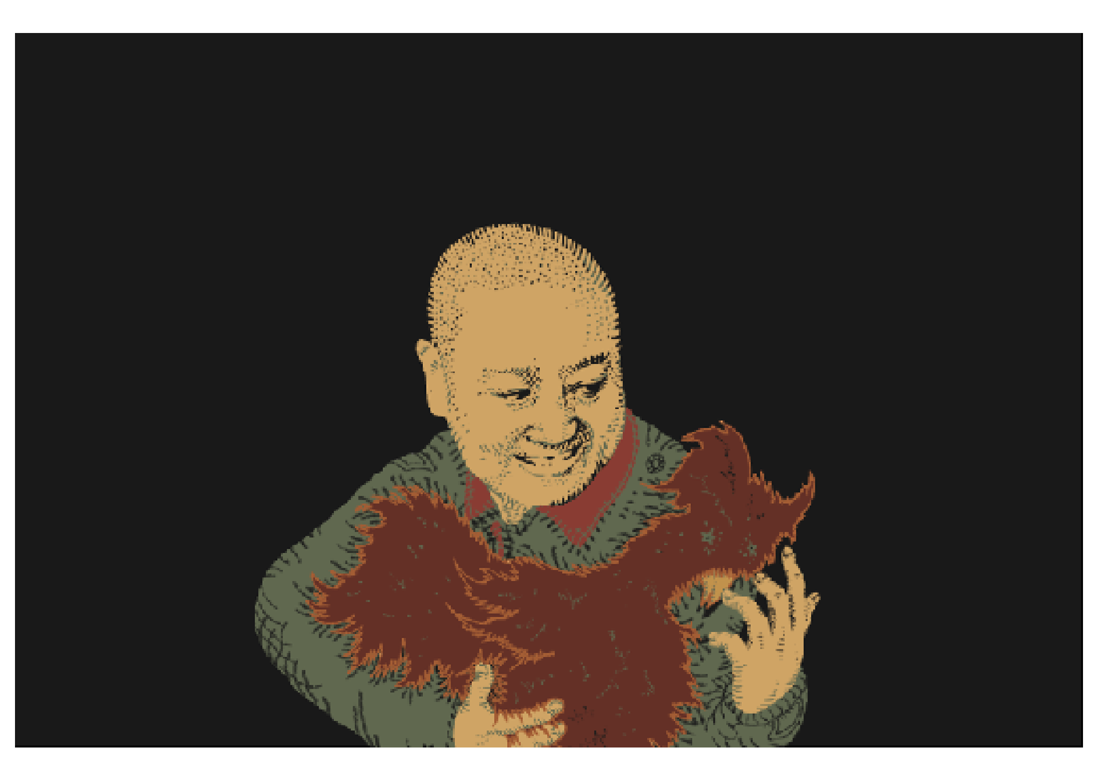
**六、中國修路工**

不管怎樣問陳雲飛，他總是圍繞這種快樂的抗爭。「有危險，還是很快樂去做了，不是感到負擔，不要感到負擔。」如此率真純粹，只會在提及家人稍有遲疑，因為陳雲飛不時被人半夜三更帶走，把媽媽嚇到不行，「老媽也得了一些病，很虧欠很虧欠。」現時惟有天天給媽媽做飯，常陪伴對方。

難得母親也理解，不時有人問她：「你們兒子幹什麼工作的？」陳媽媽總是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兒子是修路的，哪裡的路不平，他就要去鏟鏟。」

陳雲飛就是這個國家的修路工，曾一同與他協力的朋友卻逐一給抓進去了，這條道路還有未來嗎？他仍然樂觀「並不會被嚇到」，有一種韌性在裡面，「不要去強調結果，民主就是一個果實，它總有瓜熟蒂落的時候，它經歷的時間越長，它結出的果實越成熟越甘美。」

早陣子，陳雲飛打110報警，想要取回監獄沒收了的一件上衣，警員問他的電話尾號是否8964，他說是啊，你知不知道8964什麼事情？你不知道的話，那我給你解釋一下。



*陳雲飛說，「公權力就是猛獸，我們目的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裡」，他就是馴獸師。圖：端傳媒設計部*



*六月三日晚上，防暴警察拿著警棍劈哩啪啦的打學生，陳雲飛被打個頭破血流，頓時沒了意識。圖：端傳媒設計部*



*陳雲飛每年去為六四死難者掃墓，親自上門探望其家人，中秋節又買點月餅去，後來還成為了他們的義子。圖：端傳媒設計部*




*前往示威，陳雲飛會揹著「為人民服務」的包包，身上會掛上紙牌，附上「溫馨提示」：「公僕，不要向你的人民動粗！」圖：端傳媒設計部*



*審訊當日，陳雲飛穿了一身灰白睡衣出席審訊，說是為了方便做「中國夢」，聽到刑期4年，還打出了一個勝利的手勢，理由是判刑太輕。圖：端傳媒設計部*

# 請回答1989：支援與裂縫，那一年，香港學生在北京

記者 楊子琪 | 2019-06-03

今年54歲的林亦子是一名香港西醫，她在屯門開設私人診所，每週六天、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高峰期時，她試過一天看超過一百位病人。可每到6月，她會跌入另一個時空——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她和一群香港中文大學的同學好友一齊管理物資，每日圍著雞蛋、麵包、盒飯和單據打轉。

這些年，她感到遺憾、焦慮、放心不下，一直在所有六四清場前後的照片裏，留意這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痕跡。歷史照片中，物資站是被火燒掉的。

30年來，她常常不敢觸碰1989年的回憶。當她終於鼓起勇氣，翻開曾經同行的中大同學們所寫的北京紀行時，飄揚的旗幟、喧嘩的人聲，同學們之間的爭吵，統統洶湧而至。回憶裏，香港學生帶去的兩百個帳篷在廣場上支了起來，五彩繽紛，蔚為壯觀，而北方夜晚驟降的氣

溫仿佛就在身邊。那一刻，她又成了廣場上的南方女孩，每日要完成的重任是，採購約一萬人的食物。

那是1989，林亦子24歲，和她一樣趕赴北京的，還有約30個香港同學。

## 大埔村屋的自由時代

林亦子診所不大，約30平方，書架上擺滿各種醫學英文書籍，一本中文書在其中格外顯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六四25週年時，當年赴北京支援學運的一群香港中大同學，一同寫作了這本回憶錄。書中作者，全是她熟悉的老友——林洋鋐（原名林耀強）、陳哲（化名）、曾憲冠，還有她大學時代最要好的朋友林藹純。經歷六四震盪，返回香港之後，她和林藹純30年來再沒有說過一句話。

1988年，林亦子曾和這群好友搬進一間700呎村屋，在靠近中大的大埔尾村。七八個人來自不同專業，卻都關心中國事務，參加了中大的學生組織「國是學會」或者學生會。村屋有一部小小的電視機，閒時大家聚在一起，看新聞，辯論各種題目。

80年代的中國大城市，各界思想激盪，知識份子紛紛投入思想啟蒙的浪潮，社會一片自由之象。而在香港大學生中，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主流思潮過後，中國時政的話題仍然炙手可熱。每一年聖誕假期，中大國是學會就會組織交流團到大陸不同地方遊學，尤其是八六學潮興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陳哲都去過。

中國對林亦子來說並不陌生。她來自廣東汕頭，因為文革，父母帶著14歲的她逃到香港。不過在陌生的香港，來自本地人的歧視，使林亦子一直感覺不適應。經歷文革的時候她年紀小，成年後，她對中國仍然很有身份認同，加入國是學會，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朋友陳哲，也同樣是小時候從大陸移民到香港的。

「那時就類似現在大家說的『大中華膠』，愛國青年，」香港一間中學的會議室裏，陳哲笑著回憶。從北京返港之後，他選擇了教書育人的職業。

在林亦子回憶裏，那是一個中大的自由年代。當年，陳哲、林亦子與其他國是同學成天吵架辯論。「最基本、最理所當然的價值觀：為什麼要有國家，為什麼要有家庭，為何要結婚……這些全都要拿出來被質疑。」時任校長是電子系教授、後被稱為「光纖通訊之父」的高錕。在林亦子的印象中，校長是一個即使被學生喝倒彩，也仍會微笑的人。

1989年4月1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北京迅速掀起學運。國是、學生會的成員天天聚在一起討論北京情勢，來自中國的官方報紙是他們的資訊來源之一。國是學會訂的人民日報，林亦子天天捧著看，覺得它風氣開放，國際新聞尤其好看。隨著局勢越發緊張，學生絕食，各界支援，幾乎整個香港的目光都在關注北京學運，民眾日夜守在電視機前，緊盯現場報導，為記者鼓掌。中大的許多同學也無心考試，日夜商討情勢，上北京支援的想法，逐漸在國是和學生會的同學之間彌生。

5月21日，在李鵬宣布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翌日，香港激發首次百萬人大遊行。林亦子和同學開始計劃，怎樣瞞住家裏人到北京去。

整個八九學運期間，共有約30名中大學生赴京支援。他們幾乎都是國是學會、學生會和學聯的成員，大部分以個人身份前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5月到6月期間，合共向全港籌款約港幣一千萬元，其中一百萬元由林洋鋐及其他同學在5月份帶到北京，這百萬元裏的大部分，六四鎮壓後隨即被當局扣押。除中大以外，香港其他高校亦有個別學生自發上京支援。在香港大學，學生設立「電話隊」，以聯絡大陸不同省市的高校學生。

5月24日，林亦子和曾憲冠兩人買好了赴北京機票。焦灼於支援的事，林亦子甚至搞錯了一門考試的日期，就這樣在沒有考試的情況下，瞞著家人，和曾憲冠帶著從學生會獲得的十幾部對講機，飛到千里之外的北京。

## 廣場上的裂痕

林藹純、陳哲、潘毅等國是學會的同學，更早一些就到了北京。國是學會前後十幾人到北京，都擠在北京飯店同一間房裏，大家只好睡在地上，或者到其他大學的宿舍裏借宿休息。

一到天安門廣場，林亦子就發現，經過將近一個月的靜坐，衛生環境變得非常糟糕，學生們的情緒看起來很低落。「（外高聯）對廣場眾多的外地同學不問不理，呼呼喝喝，我們去到真的很震撼，尤其是不斷有同學告訴我們，他們沒有東西吃，晚上非常冷。」

在看見幾個同學分吃一個饅頭後，林亦子決心和中大的同學一齊建設物資站，負責食物供應的工作，每天花大半天時間聯絡食物工廠、算賬、接收和分派食物。

她穿短袖恤衫，背一個大背包，裏面是從香港帶來沉甸甸的捐款，來回於物資站、帳篷區、與廣場隔著一條寬廣長安街的北京飯店。每

天，她預算要為一萬人購買麵包、蔬果、肉類、雞蛋等等。一到晚上，這位南方來的瘦弱姑娘，就被北方常見的驟降氣溫凍得直發抖。

當香港學聯帶來的彩色帳篷在廣場上支起時，亮麗的顏色使林亦子精神為之一振。後來，吳仁華在《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記錄，廣場建設的藍圖，手筆之一正來自林亦子的國是同學潘毅，但林亦子當時並不了解。她只知道潘毅是「不用睡的」，成日不見蹤影，「參與得比我們深」。

不過，林亦子和其他中大學生對物資援助的投入，卻引來好朋友林藹純和同學陳耀輝的質疑。

林亦子回憶，林藹純和陳耀輝的觀點是，來自香港的學生不應去供應物資，而是應該到廣場上，和內地的學生討論運動和民主的問題。「（林藹純他們覺得）我們香港學生，對民主的探索多一點，似乎就應該跟同學聊聊。」林亦子說，「他們覺得，這是好的機會，可以進行民主實踐、討論、思考。」

從這些中大學生陸續抵達北京開始，大家就一直為自己在學運中的角色而辯論不休。當時開會的內容並無會議記錄，林亦子、曾憲冠難以回憶，只記得「幾乎天天都討論」。翻看陳耀輝在1989年6月19日所

寫的信件（收錄在中大同學回憶錄中），他擔心中大學生手握資源，如果使用不當，在缺乏監察下，會造成以物資建立權力並左右學運方向的境況。

為了討論清楚中大學生在北京學運裏的角色，5月31日，這群國是學生曾在飯店裏爭論了一個通宵，包括物資站的運作情況、過百萬資源有否被誤用、香港學生有否主導運動某方面發展的問題。多年後，林藹純在回憶錄中寫道：「沒有任何結論，一切如舊，部分同學漸萌退意。」

「他們（林藹純）覺得，我們有這樣龐大的資源，才能做到這樣的角色，我們應該拋開資源，以普通同學的身份參與運動。」曾憲冠回憶。他當時是學生會代表，感覺林藹純他們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不至於去到如此強烈的地步」：「既然帶著資源，我們始終還是要管理手上的資源。我們都很清楚：主體不在我們。不可以用資源去影響大陸學生的決策。比如人家要撤，我們不可能不同意。」

而對於林亦子而言，她只是想去幫助這些外地來的學生解決膳食。「沒人關心，又不能回家，那些同學好像要乞求他們的權力中心（外高聯、指揮部）去拿物資，我真的看不過眼。」在她看來，物資的支援工作並非掌握權力，而是像紅十字會救助般的一種支援方式。

1989年的夏天，廣場上的中大學生連日爭論後，兩個曾經住在一起、像「孖公仔」一樣的姑娘，因為彼此不同的理念而分道揚鑣。而這一分歧，在此後三十年，仍是這群學生無法達成共識的一個裂縫。幾天後的流血清場，讓這一裂痕添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 清場

6月4日凌晨12點，林亦子和友人在西單的胡同裏。當時，國是學會和學聯的同學，都按照各自想法，前往不同地點。陳哲和時任學聯主席的林洋鋐一樣，留守在廣場上的紀念碑，希望與北京學生共患難。當時紀念碑附近的學生至少數千名，他們沒有看到彼此。林藹純則留在廣場上的香港物資站，當軍隊進入廣場、路過物資站時，根據她在中大學生回憶錄裏的文章，這些軍人一邊走一邊說：「我們不會傷害學生。」

不過，更讓人緊張的徵兆其實更早出現。凌晨12點前，林亦子看見一群糾察隊模樣的學生從廣場那邊過來，他們十幾二十歲，大多數戴著白口罩，沒有任何武器，神情嚴肅。她把手上最後一個口罩遞給了隊伍後面的學生。

十二點，槍聲響起，林亦子隨著人群撤入胡同。起初，大家並不緊張，有人準備好口罩和手絹，也有人在猜測，那是何種槍支的聲音。

「那時人們很天真，說，共和國的士兵是我們迎接進城的，這些槍聲是向天開而已。」

不久之後，一輛摩托車突然載著傷者跑入胡同。「讓開！快讓開！」為摩托車開路的學生大喊。被送進胡同的傷者越來越多，三輪板車、摩托車穿梭不停，一路鮮血淋漓，林亦子奮力擠上去看傷者的模樣，他們多數傷勢嚴重，以她現在的專業判斷，很多人都處於休克狀態，生死未卜。

她極力想記住他們的面孔。直到今天，她也無法忘記這些年輕人的樣子：面色慘白、雙目緊閉、滿面滲汗、身體染血、極度痛苦。

「妳不可以到前面去，這是我們去的。妳一定要將情況說出去。」身邊的市民衝林亦子喊。「說完他們就真的衝過去了，是唱著《國際歌》去的……整條街都是人。」

她在回憶錄寫道：「口號聲越來越響，初時不知道喊些什麼，後來問旁邊的人，才知道喊『殺人犯！』『法西斯！』『獨裁！』『打倒李鵬！』響徹雲霄的憤怒的口號聲與槍聲夾雜在一起，一直沒有斷，槍聲並沒有使人群後退。」

凌晨1點鐘，廣場上的陳哲看見第一批軍隊，大約一千人，手持長棍，背著衝鋒槍，從香港物資站經過。他同樣聽到軍人說「不打學生」，懸著的心放了下來。他隨後返回紀念碑最高台階，躺下來，仰望天上的幾顆星星。遠處不斷傳來槍聲，周圍同學在唱《國際歌》，他腦袋一片空白，曾經想過寫一封遺書，最後什麼也沒有寫出來。

過了四點半，陳哲遠遠望見一列列軍隊從人民大會堂操步過來，持槍向紀念碑推進。這當中，北面有一隊二十人左右的軍隊，來到紀念碑前。而在此時，另一小隊軍人已到達紀念碑最高台階，他們向著留守學生們的頭頂上方開槍，又用衝鋒槍指著學生。陳哲被人群推著撤離。

另一邊，在從紀念碑被迫撤離之前，林洋鋐曾跑到長安街上，救起一名中槍的工人，他記得，那工人的背像開了水龍頭一樣，血汩汩地往外流。林洋鋐看著工人漸漸雙眼反白，癱軟在地，就那樣在他手上斷了氣。

當軍隊來到紀念碑下，林洋鋐被幾名北京同學以身體護著，他被半推半擠到紀念碑底層。「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們要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一名學生流著淚對林洋鋐說。返回香港後的許多年，林洋鋐向傳媒回憶起這一幕，多次提起那位學生對他說的話。

當人群撤到西單郵電大樓時，陳哲聽見後方傳來坦克車的聲音，他趕緊跑向附近的胡同，聽見後面有人大喊——「坦克碾死人了！」陳哲又忍不住跑回去看，遠遠看到「有些屍體，也有一些他的行李、背包之類的東西，也有一些瑣碎的東西。沒有過去數數有多少人。」他不敢再看。
同樣從紀念碑撤離的林洋鋐，一路走到了木樨地，他記得，那裏是「滿街的血路」。

**從廣場歸來**

6月5日，當港府派來的專機起飛的一刻，林亦子感覺，她把整個北京都留下了。

六四在他們身上刺下烙印，對他們分別產生不同的應激反應。陳哲一回港便決定接受媒體訪問，他在鏡頭面前語速極快，把自己在清場時的所見所聞一股腦全倒出來。

林洋鋐則把頭幾年的時間沉浸在抑鬱的情緒裏。他本是個喜歡早起、有幹勁的人，從北京回來後，常常在學聯睡到下午兩點多才起來。

「年紀那麼小，我當時相信，我們的參與會讓世界變得更好。誰知這麼大一場運動，最終也會被鎮壓，甚至政治制度變得更加封閉。這是

對我信仰的崩潰和衝擊。我投入我的生命和青春，然後發現原來這是錯的，再大的投入也是沒用的。這很震撼。」林洋鋐說。

林亦子也過著混沌的日子，思緒紛亂。學聯在彌敦道的辦公室堆積了大量六四前後的報章，林亦子就天天上去剪報、整理。一同整理的還有幾位中大學生，大家都不怎麼說話。

「一心想，我們要留下這段歷史……隱約感覺這段歷史又將會被刻意抹去。」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

隨著時間流逝，陳哲相對快地重拾生活。他成為一名中學老師，三十年如一日，教書育人。漫長的時間似乎磨蝕掉一些六四的記憶，如今，他坐在學校陽光明媚的會議室裏，對記者說：「（六四）沒之前那麼重要了。我是這麼覺得。我想也是有點覺得，覺得沒什麼作用。一開始大家都想著（中共）很快就倒台，但現在這麼久了，對不對。」

他請我去聽他給學生講解六四的事情。講到一半，台底下好幾個學生都睡倒了。

他預感，一切就像電影 Silence 一樣，「沉默可以是很長一段時間的。六四可能要沉默很長一段時間了。」

沉鬱數年之後，林洋鋐嘗試過做售貨員，避開任何新聞，每天早出晚歸。後來他加入政府體制，做一名AO（編註：政務主任），以為「AO也可以拯救地球」，最終還是決定放棄。再後來，他跑去港大讀法律，在40歲那一年成為律師，自嘲「超齡了」。

如今，他經常為街坊、工友、佔中等社運參與者、社會貧苦人士提供義務的法律諮詢，律師行掛滿政府頒發的義務法律服務獎項。報紙稱他為「人權律師」，他則連連擺手，說自己頂多算「街坊律師」。

回首過去，他依然會忍不住想——為什麼我是倖存者？為什麼死的不是我？

「我們共同面對了這個政權，有些人因為他的身份，最後犧牲了；而我們這批人沒有像那樣犧牲。有些香港人可能覺得，為什麼劉曉波坐完牢，08年還要繼續搞，到死為止。其實要走入他的世界，就要明白，那個倖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實，可能我也是應該死了的。」

**無法和解的回憶**

從北京返回香港之後，林亦子從社會學轉而讀醫，成了一名醫生。

「有時也會接近死亡，我一定會想起鎮壓那一幕，在香港是不會輕易見到槍傷的，在那裏會。」

走出最初的陰霾之後，整整25年，她不碰任何六四資料，直到五年前，當年赴京支援的中大同學們組織大家寫一本六四回憶錄，她才決定重新執筆，逼自己重返1989。這些年來，她很少接受媒體訪問，當她向我們談起六四的種種親歷時，依然激動和憤怒，不自覺以雙手拍打臉頰。

「和解」始終是她最渴望的。

「為何這麼幾十年，都沒有給機會讓所有目睹的市民去釋懷？這些事一定要在死之前解決，但這麼多年，創傷沒法解決。我到現在也沒辦法和這件事和解。這件事和解不了，我和國家都『冇計傾』。」

林亦子說，六四刺激了她的國族觀念。曾經她對中國有強烈的身份認同，如今，她覺得自己「不是很中國人」，「很多事情不認同，看不過眼」。

她感覺，八九之後，「國家把你關在外面了，不讓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護這裏（香港），就像我守護北京一樣。」

「為何（國家）不與我們和解呢？我們難道做錯了什麼？」她不斷去問。

同樣無法和解的，還有她與林藹純的友情。她沒有料到，返回香港沒多久，林藹純和陳耀輝便和他們「紮曬馬」：在林亦子回憶裏，林藹純她們認為，如果沒有中大學生的物資支援，北京的學運應該一早就結束了。

「我估計，她覺得我們是『罪人』。」林亦子輾轉聽到消息，心裏如此判斷。香港學生從北京回港後，香港輿論亦曾出現認為這群香港學生「有罪」論的聲音。

她和林藹純從此再也沒說過話。林亦子知道，這些爭論和分歧，某程度上，至今也是一群同學的心結。八九後過了兩三年，她曾與曾憲冠到浸會大學做六四見證的分享會，一路上，兩人不自覺再次提起這些當年辯論的問題：角色、資源、權力、主導問題……說到最後，只剩下沉默。

25年後，2014年，林亦子在回憶錄中寫道：「海外的推波助瀾是不是導致了屠殺呢？如果是，我們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使掌權的人起了仇恨、起了殺心。……我們不合時宜地觸怒了權威，我們不成體統地冒犯了天朝。可是到今天我還沒搞清楚什麼是時宜，什麼是體統，什麼是權威，什麼是天朝。殺人難道不是一個底線嗎？」

現在，林藹純在《星島日報》任職管理層。端傳媒曾嘗試聯絡她就六四經歷進行採訪，她回應說「因為我現在工作的關係，不方便做這個問題」。

兩三年前，林亦子終於和林藹純在一場義工活動上見了一面，彼此無話，更別談六四的事情。其他同學卻十分為她們開心：「你們終於見面了！你們以前是孖公仔來的，為什麼不見面呀？」

那些爭吵過的問題，至今在中大這群同學裏仍是一道裂縫。不過，林亦子一直無法淡忘這個當年形影不離的好友：「我很想知道她現在的看法，林藹純。」

（實習記者徐涵、郭芷甄、梁敏琪和余美霞對本文亦有貢獻。）




*1989年，在北京支援民運的香港學生。圖：陳清華提供*



*林亦子，現在是一名醫生。攝：林振東/端傳媒*



*每一年聖誕假期，中大國是學會就會組織交流團到大陸不同地方遊學，尤其是八六學潮興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陳哲都去過。圖：林亦子提供*



*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圖：陳清華提供*



*林洋鋐（原名林耀強）與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等人開會。圖：陳清華提供*



*天安門廣場上的帳篷區。圖：陳清華提供*




*北京學生在晚上奔跑。圖：陳清華提供*



*陳哲（化名），現在是一名中學教師。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林洋鋐（原名林耀強），現在是一名律師。攝：林振東/端傳媒*



*陳哲在課堂上向學生簡述六四當晚發生的事情前，會先讓學生看一段由香港樂隊Beyond演唱《抗戰二十年》的MV。攝：Stanley Leung/端傳*

*媒*




*北京馬路上的坦克車。圖：陳清華提供*

# 六四報導在香港：抵抗時間流逝、採訪管控和中央劃線

特約撰稿人 鄭美姿丨2019-06-01

香港電台《鏗鏘集》高級監製薛友德，上月突然收到消息——「張健死了」。2019年4月15日，張健乘搭飛機時突然昏迷，航班急降德國，張健經搶救後不治，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離開人世，時年48歲。

薛友德最後一次見張健，在十年前，時值六四二十周年。薛當時是《鏗鏘集》編導，跟同事潘達培抓破頭皮，構思報道。兩人翻查1991年播出的《鏗鏘集》，其中紀錄八九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約有五百人。「二十年過去，他們想家嗎？他們能夠回家嗎？」二人萌生了重訪流亡者的念頭。

這個六四系列報導最後以「回家」、「解結」、「延伸」和「守望」為題，一連四集播影，張健就出現在第一集「回家」裡。薛友德回憶當日跟他見面，是在巴黎一幢舊式公寓的閣樓，「那是張健的家，十分狹小，但他似乎十分知足。」張健平日在唐人街一家烤鴨店為客人剁燒鴨，工餘時間幾乎都投身海外民主運動和教會的侍奉。斯是陋

室，唯吾德馨；也是在這一塊安全的天地裡，張健才能透過網絡「回家」，跟遠在北京的母親用視像「見面」。

**與時間競賽的六四採訪**

八九六四時，張健年僅十八歲半，是北京體育學院的運動員，在廣場上擔任學生糾察隊的總指揮。六四凌晨，他在天安門廣場向一個中校軍官以死相諫，請求釋放被抓民眾時，遭軍官連轟三槍，被送往醫院搶救後，救回一命；但那顆射穿了左腿骨頭的子彈，則一直沒有機會動手術取出。張健隨後用假證件在北京、東北和內蒙等地匿藏，12年後因參與一宗維權事件，身份不慎曝光，遂逃亡到法國。薛友德探訪他之時，張健已流亡巴黎8年，更碰上他進行手術、把留在大腿裡面足足20年的子彈取出來的日子，「我記得當時張健說，如果這是仇恨的子彈，希望就是最後一顆。」

那一集的「回家」，片末的鏡頭設定在北京：2009年的農曆年三十，張健日夜惦念的母親，在《鏗鏘集》的鏡頭前，把眼睛笑成一條線：「有時他想我想哭了，他一哭我就笑。我不跟他哭什麼，我不讓他掂掛。」說畢，張母靜靜地翻兒子的相簿，卻泣不成聲。一直很想回家的張健，在巴黎接受訪問時，也在鏡頭前這樣說過：「有時我太想家，跟媽媽說，不如我回去投降了？媽說，你要找一個很好的理由，如果沒有一個讓你良心過得去的理由，健，相見憐如不見。」

被鏡頭紀錄下來的畫面依然清晰，但轉眼十年，張健已經離別人間。收到張健離世消息的當天，薛友德請同事把當年訪問的片段剪輯，放上臉書以作悼念。張健遽然離世，也震驚了民運圈子，不能回家的他，只留下了最後一顆仇恨的子彈，送給了香港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展覽。

除了張健，還有曾經在1991年和2009年兩次接受《鏗鏘集》訪問的前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亦在2014年去世。陳是趙紫陽的智囊，因六四時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而遭通緝，被迫流亡美國。他同樣於六四二十周年「回家」一集中出現，陳一直想家，終亦客死異國，終年78歲。薛友德說：「這些流亡者心裡都想回家，但要回家，當局就會開條件，好幾人因此寧願不回。陳一諮當年亦靠不少人傳過話，他曾收到訊息表示可以回去，但再去到更高一層時，忽然就沒有下文了。」

過去三十年，在華人國度，年復一年堅持跟進六四相關的人和事的電視台，大概越發稀少。這種年復一年插秧式的報道和記錄，在不知不覺間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圖、推開了一扇亦假亦真的歷史之窗。不過只是身處其中的記者，大概沒有為意。

其中很多珍貴的六四採訪片段，諸如21名被通緝民運領袖名單中的項小吉和周鋒鎖，《鏗鏘集》亦有記錄過；已去世的劉曉波被拘捕前，港台電視部的記者更曾拍攝了他六分鐘的訪問片段，成為了劉曉波在鏡頭下最後的定格。

時間是記憶最大的小偷，報道六四的慘劇，一如跟時間競賽；距離八九年日子愈久，這場學運的見證者年紀愈大，能重現他們的機會就愈少。薛友德說，海外的流亡民運人士對香港記者都有特殊感情，緣於不少人當年經由香港出境，或曾得「黃雀行動」之助。「他們口中常提及，香港每年舉辦的悼念活動，竟從沒停過。他們總是很感激香港記者，這麼多年來仍然關注他們，會重訪他們，只要不是立場已變，他們一般都很願意跟記者再談六四。」

**兩個版本的六四回憶**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陳韜文，過去十年跟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合作研究，拆解為何三十年來，香港人仍對六四念念不忘，並烙印成一種集體回憶。陳韜文解釋，其中香港傳媒所擔當的角色，甚為重要。

「關於六四最核心的集體回憶能否保存，當中有一種政治權力的角力；一般來說，政府和建制會產生主導作用。以內地為例，建制和民

間主流的集體回憶往往一致，但在香港則相反。主流的六四回憶，不在官方，竟在民間。」但他亦不諱言，若把視野放大至整個中國，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回憶，以人數來計，則變成非主流的少數了。

陳韜文指出，香港人今日的六四記憶，能跟北京官方的六四版本分庭抗禮，其實是有賴三十年以來，傳媒和民間團體如支聯會等的互為作用。他解釋，八九六四的初期，中國政府試圖用他們的宣傳機器，去把事件改寫，「官方的說法是，學生受外界顛覆、受外國煽動，強調的是民間暴力、軍人被打，參與民運的民眾試圖顛覆共產政權。整個論述就是將責任放在學生身上，引證鎮壓暴亂有理。」

這種經改寫的回憶在內地廣泛散播，卻沒能改寫香港人的主流記憶。陳韜文認為，香港傳媒在其中的作用，飾演了「記憶動員」的角色，包括年復一年對於六四燭光晚會的報道，或者個別媒體逢五年和十年的回顧、跟進和採訪。

不過陳韜文也承認，隨時日過去，不少傳媒的取態已有所改變，「八九年的時候，即使左派傳媒都有派人到天安門採訪，作出了很多報道。但事件過去後不久，香港左派報紙對六四已改變態度，採取了迴避、封存的策略，不再觸及。加上香港很多傳媒亦已被收編，又或者出於自我審查，因此媒體的力量確實是慢慢減弱。」不過，陳韜文認為，一些較親中的商業報紙仍有報道六四的悼念活動，即使數量上很

少，「也不是全部變成左報，他們能否過到自己那一關？他們的讀者又是否能信服？報道的數量是少，是絕對比不上明報和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的六四情意結**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曾經在不少訪問裡說過，八九六四是他人生的轉捩點，沒有六四，就沒有《壹週刊》。黎智英本來從商，是佐丹奴時裝連鎖店的創辦人，六四時曾捐贈二十萬件印上標語的恤衫，予參加遊行的香港市民；其業務因而遭中央封殺，最後他只能把手頭上所有的佐丹奴股份出售。黎智英赤膊投身傳媒，其想法是資訊能令人自由，《壹週刊》遂於六四發生後九個月面世（註：《壹》印刷版已於2018年2月停刊），而《蘋果日報》則於1995年創立。

雖然這個老闆的政治立場鮮明，但目前於《蘋果日報》任職副社長的陳沛敏，卻說出了發生在編採部的另一番景象。陳沛敏加入蘋果日報23年，她由港聞版記者做起，至副採訪主任、總編輯，現任副社長，曾於九一一時赴美採訪恐襲、也去過日本福島的海嘯災區，並曾參與很多六四系列的採訪報道。

八九六四時，陳沛敏正於香港中文大學工管系念二年級，也是學生報的編委。當年5月20號凌晨，電視播放北京宣佈戒嚴的消息，住在赤柱的陳沛敏在電話裏跟同學約定，立即前往新華社示威。那是個大風大

雨的夜晚，她一邊哭一邊執拾出門，從不理政治的母親，卻沒有出聲過問半句，彼此心裏知道，那是一個特殊的時刻。

轉眼數十年，六四已成為她職業上的內化價值。「逢五逢十，大家都自覺要較大規模去做六四題材。記得對上的二十周年，我和幾個同事本來打算由五四開始，一直做到六四，如果能連續一個月，每日也有六四篇幅，已經好棒。」誰料他們愈做愈起勁，最後這個「六四系列」竟然由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開始，「動員了幾個同事，每日最少刊登一版有關六四的報道，周圍發掘很多不同人的故事，一直到做六月五號，報道燭光集會，足足一個半月。」

問陳沛敏報道六四題材，是不是收「柯打」必做，她說沒有從上而下的指令，反而有一種前後相繼的承傳。「我由做記者開始，看見前輩和同事是這樣做，於是每年到時到候，你就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去報道。更貼切的說法是，並非有個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卻成為了一種內化的傳統。」

**曾經鬧雙胞的6月5日**

她認為，如果有一日《蘋果日報》不再做六四的報道，她相信讀者會是第一個問「點解」的人。蘋果日報自從創刊至今，每年6月5日皆以六四燭光晚會作為報紙頭條，陳沛敏說，對上一個十年，時值六四二

十周年，他們的頭條便鬧了雙胞，「那時我不是決策層，不知道內部進行了甚麼討論，但報紙印出來後，就是燭光晚會的封面頭條，以及李澤楷已為人父的頭條，雙封面。」

陳沛敏說，若非碰上六四燭光晚會，李澤楷必成頭條，「但對我們來說，六四翌日的燭光照片，有一種特殊意義。但我相信，對其他報紙來說，則未必有這種『六四』的考慮。」

不過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始終要衡量新聞的價值，「新聞始終要秤，一般來說，自會做六四燭光晚會。但若然蘋果有一日放棄用六四晚會行頭，必須有很大的理由去justify（合理交待）：點解唔做？那必定是有一單極具影響力、涉及很大公眾利益的新聞發生。」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傳媒環境跟十年前相比，又起了更大的改變。陳沛敏直言，目前蘋果日報已將更多資源投放發展網上新聞，即使是六四的報道手法，也跟以往不同，「例如今年的燭光集會，一幅相已經不夠了，當晚更要在網上做live。網的同事也想出很多主意，四月已把『自由花』重新編排，拍了一條三分幾鐘的MV，找童聲演唱。另外又以舊曲新詞方式，請港人合唱六四的回憶。」至於今年的六四專題，同樣也是4月15號胡耀邦逝世之日開始，將會每日出版，直至6月5日。

最近幾年，香港開始湧現「六四關我乜事」的聲音，陳沛敏說，這也是他們要思考的問題。「蘋果日報的報紙讀者，年紀較大，未必有這個疑問，但蘋果網的讀者，就可能會出現這個想法。我們需要用不同的介面和手法去吸引不同讀者，但對於一些完全不關心的人，自由社會就是有不同意見的人，我們也只能夠繼續做好本份。」

反而對於傳媒因政治環境而噤聲，她更為慨嘆，「現在最常說的鼓勵是：大家盡做啦！有得做就應該做，若果等到有一天六四成為敏感詞，要打擦邊球才能報道的話，那就太戇居了吧？」

**六四兩字比以前更敏感**

其實，中大學者陳韜文亦有提出，香港傳媒現今對於保存六四記憶的作用，已見收縮和限制，「因為權力轉變，致媒體自我審查，對六四的報道就有所收斂。六四的敏感性已比以前更高，非常不利於集體回憶的承傳。」

至於本土那種「六四關我乜事」的看法，陳韜文認為，此亦是未來阻礙六四記憶承傳的不利因素。「本土主義的興趣，其實跟中國的打壓，是連在一起的。香港人有本土傾向本是正常，只是不會變成一套主義。關鍵是當香港人失去了本來享有的高度自由，你愈打壓，本土

就走出來，令人愈覺得跟中國疏離，於是連帶六四也會割離，因為事不關己。」

他認為，若要繼續維繫香港社會對六四的集體回憶，而不被另一種中國官方或本地左派所建構的六四版本取代，香港傳媒以及公民社會，必須較以往三十年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捍衛。他說：「時間會把一切沖淡，這是不可違抗的自然力量，加上官方有意打壓，以及有經歷的人逐漸老去，還有本土的意識愈強，那六四的記憶更難承傳。」

## 記者採訪遭干涉和扣查

香港電台高級監製薛友德，回想過去多年處理六四系列的專題報道，也有類似感受。在他看來，中央對六四的管控似乎愈發收緊，六四似乎比以前來得更為敏感。「二十周年的時候，同事潘達培主要負責回內地採訪六四異見者，當時的感覺是，環境相對寬鬆，只要有適當部署，媒體還是可以接觸到死難者家屬，甚至拍攝到他們到萬安公墓拜月祭的鏡頭。」他續說，2009年之後，港台再於六四二十五周年時，派同事到北京做訪問，情況已大為不同，「有些被訪受二十周年時找到他們，廿五周年時已經不能接觸到了。」

港台在六四廿五周年時，製作了「囚語」和「扎根」兩個特輯，採訪上也遇到莫大困難。其中訪問北京民間智庫「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

時，記者甫抵達南京便遭便衣公安跟蹤，最終被迫取消訪問。但其實於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候，記者曾成功跟隨郭玉閃到南京造訪郭的六四啟蒙老師；而同樣於二十周年時訪問過的六四死難者家屬郝建，亦於五年前的五月，亦即記者的訪問季節，突然「被消失」了。

薛友德直言，五年前那一趟實在是「很惡劣」，當日他收到新聞行家打電話去港台公關部，要求確認：「你們是否有記者在內地被拉？」今日回想，他仍顯得憂心，「當時我未清楚情況，不能對外講太多。」究竟實情如何？他說：「同事做訪問時一直遭到內地部門的跟蹤和干涉，試過在酒店被警告，另一次直接被扣查。」事緣記者當日跟天安門母親新發言人尤維潔聯絡之後，就被公安指她涉嫌藏有危險物品，扣查了整整九個小時。

**劉曉波的最後定格**

作為主管，薛友德從不害怕同事退縮，卻最擔心他們衝得太前，他搖搖頭笑道：「記者總是勇往直前，當他們認定那個值得做，就好盡力。你做主管的，就要提醒他們，始終我們最顧慮的是人身安全。很多事情不能預計，要有分寸，是否必須冒很大的險去做？是否一定要衝到最前才能看到，退後一些，是否也可行？」

薛友德1994年加入港台《鏗鏘集》，從助導做起，經歷編導、監製，至今為高級監製，曾兩次去到南亞海嘯的災區採訪。他第一次參與六四報道，是九七回歸那一年。之後六四十周年、二十周年、廿五周年等，他都以不同的身份參與製作，「六四報道跟其他的採訪不同，是一件幾十年的事件，牽動的範圍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檢視它不同的意義。」

大型採訪需要周詳的規劃和部署，但採訪的念頭很多時都是一念之間，「有時是當下一個moment你決定去採訪，做了就是做了。過多幾年，可能情況已不容許，當刻如果roll機記錄了，片段就很寶貴。」他難忘11年前的2008年，就在《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被拘捕前兩個月，有同事一念之間找他做了個訪問，「那時也不知道是否埋到身，結果真的見到面，終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訪問片段。」

那六分鐘是劉曉波人生中的最後一個訪問，之後不斷被同行借用，「有些東西記錄了，就是記錄了。」

**下一個十年，燭光不是必然**

中大學者陳韜文和李立峯的六四研究，已進入尾聲，陳韜文說，希望能盡快將報告書寫成文稿刊登。問他這個香港版的六四集體記憶，未來將何去何從，他說，過去三十年來要維繫這個記憶，本來已經困難

重重，「過去也絕對不是一帆風順，實際上考驗亦很多。例如董建華回歸時已叫香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然後是市民的淡忘，近年又屢受本土派的挑戰，這些全是真實考驗，香港克服過很多的壓力之後，才有今日的狀況，算是保存到六四回憶的核心部份。」

那麼放眼下一個十年，將會跟香港已經歷的十年，有甚麼最大的不同？陳韜文提出了這樣的憂慮，「很多年以來，本來香港左派報紙對六四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但近年起了變化。你看一些建制派的網頁，如香港G報、港人講地、幫港出聲等，已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言論，例如控訴支聯會『掠水』，也多番輸出諸如『六四有鎮壓必要』的言論。」

他直言，建制派在社交媒體這個新興的空間，主動輸出了很多親中言論，造成了一個效果，就是令人覺得「六四也可以是有爭議的，甚至是可以質疑的」。

香港社會目前所面對的形勢，已不只關乎保存六四記憶的問題，而是涉及香港未來是否仍能享有高度自治、實踐一國兩制，讓傳媒和市民也能暢所欲言，報道或表達跟官方不同版本的事實和意見。陳韜文正色道：「現在中央也試圖劃線，如果把這條線再劃去六四，傳媒就必然受到影響。而且首當其衝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傳媒。實際上，已

經有人試圖劃線，並以六四為界，例如譚耀宗去年已經提出，燭光晚會嗌的『結束一黨專政』口號，可能違憲。」

下一個三十年，香港的六四記憶還是我們今日熟悉的面貌嗎？陳韜文認為，若未來將按香港目前的軌跡運行，「我想，傳媒和公民社會，都必須作出很大努力。」假如未來的政治氣氛是加快收縮，比當下的運行軌跡跑得更快，「那麼，要能繼續以目前的方式來紀念六四，或是不可能了吧。」




*時間是記憶最大的小偷，報道六四的慘劇，一如跟時間競賽。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薛友德最後一次見張健，在十年前，時值六四二十周年，更碰上他進行手術、把留在大腿裡面足足20年的子彈取出來的日子，「我記得當時張健說，如果這是仇恨的子彈，希望就是最後一顆。」網上截圖*



*陳韜文：若把視野放大至整個中國，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回憶，以人數來計，則變成非主流的少數了。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陳沛敏：「我由做記者開始，看見前輩和同事是這樣做，於是每年到時到候，你就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去報道。」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如果有一日《蘋果日報》不再做六四的報道，陳沛敏相信讀者會是第一個問「點解」的人。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薛友德：「六四報道跟其他的採訪不同，是一件幾十年的事件，牽動的範圍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檢視它不同的意義。」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1997年6月9日，鏗鏘集以《揮不去》為題，製作有關六四事件八周年的新聞節目，更找來司徒華為節目題字，原稿保存至今，擺放在薛友德的辦公室內。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 香港記者陳潤芝的六四記憶：「每隔二十分鐘，軍人就開槍，砰砰砰砰砰」

記者 楊子琪|2019-05-21

2005年，47歲的陳潤芝在長安街上看到的，是圍滿燈飾的高樓大廈，天安門張燈結彩，恍如白晝。

時值歲末，「國情研習班」的大巴，載著包括陳潤芝在內的一群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駛過長安街，在座的有採訪過八九民運的記者，也有媒體老總。此時陳潤芝早已從亞洲電視轉入有線新聞工作。身邊讚歎聲此起彼伏：「好厲害啊！你看這邊這幢，有一條街那麼寬！」「不對，你看這邊，這幢更誇張，簡直是凱旋門十倍！」「前面叫司機開慢點啦，那邊那幢更嚇人！我來不及拍啦！」

這一刻，坐在大巴裏的陳潤芝不會想到，三年後，汶川遭遇強震，毒奶粉事件曝光，劉曉波身陷囹圄；再向後，習近平於2013年上台，兩年後大批維權律師被捕，四年後劉曉波病逝。

當彩燈照進大巴，陳潤芝跌進記憶，那是1989年6月，天安門廣場上的燈，熄滅了。

**入京：報道六四，是「歷史把我放到了那個位置」**

1989年6月3日凌晨兩三點，陳潤芝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Ida（陳潤芝的英文名）！起來了！好多軍隊入城！」同事在電話裏大叫。陳潤芝睡眼惺忪，立即衝去同事的房間，這是北京飯店12樓，所有記者聚在房間露台上，攝影機對準近在眼前的長安街。只見一列軍隊沿著長安街，自西向東，向天安門廣場小跑前進。他們看起來年紀很小，都是「娃娃兵」。

和逾百米寬、如今有雙向十車道的長安街相比，這列軍隊看起來「好像一條線」。陳潤芝和同事們討論，都認為軍隊的陣勢很奇怪，如果要入城、圍天安門廣場，「兵力是單薄到不堪的」。

很快，就在記者眼皮底下，大量民眾從天安門廣場湧過來，把長長的軍隊攔住。雙方對峙之下，有市民將單車扔向軍隊，試圖沖散他們。

這是陳潤芝赴京第四天，也是她加入亞視第四年。這年七月，她就要移民加拿大。報道六四，在陳潤芝看來，是「歷史把我放到了那個位置」。

從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開始，香港媒體就高度參與到北京學運的報道中，連被視為有官方背景的《大公報》、《文匯報》皆大力報道。5月20日中共戒嚴，翌日《文匯報》發表四字社論「痛心疾首」，這是1949年之後中共報業史上第一次有傳媒「開天窗」寫社論。彼時風頭正勁的亞視，更陸續派出十幾名記者和攝製隊成員上京，在港的新聞編輯部差不多空了。亞視是整個華人地區首間電視台，新聞質素一直為人稱道。

香港民眾從未對國內事務產生如此高的關注度，局勢起伏，他們日夜守在電視機前，緊盯現場報道，為記者鼓掌。試過北京那邊衛星傳播被中斷，後來又接通，記者做衛星直播時，仍在港的陳潤芝接到新聞部樓下接線生電話：「好多人打電話進來讚你們！」整個五月，鮮花成批成批送來，新聞部都被擺滿了，花籃子直擺到外面電梯大堂裏。

新聞總監包雲龍原以為陳潤芝即將移民，來不及赴京。但陳潤芝眼見北京的同事們相繼病倒，主動請纓。5月31日，海關在陳潤芝回鄉證上蓋章，她正式加入報道八九學運的隊伍。

一到北京，陳潤芝馬上到天安門廣場採訪民眾。官方宣佈戒嚴已過十日，她嗅到廣場上已經渙散的氣息，整個運動似乎失去了方向。陳潤芝感覺清場即將到來，「以為會像『四五』（運動）那樣，用棍棒打你（清場）。」

事態正在走向失控，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似乎已被丟棄。檯面底下，暗流湧動，水即將沸騰。

## 戒嚴：「我真的怕得要死」

6月3日早上，娃娃兵進城後，帶著困惑，陳潤芝到六部口巡街，看到一些已被市民攔下的軍車，裏面有槍。她爬上一輛軍車，眼前的軍人個個灰頭土臉，也不肯回答她的提問。周圍市民秩序井然，他們看守著軍車，有意識不去碰觸槍支；一見記者，就為他們開路：「記者來了，讓路給記者採訪。」

採訪完市民後。下午四五點，陳潤芝正和幾個同事在飯店休息，彼時已有傳言，說新華門有軍人和學生發生流血衝突，有軍人被打中腦袋。她感覺「水已經沸騰起來」。忽然一個男同事叫道：「外面有好多軍隊呀！」有女同事稍微打開房門，朝外看了看，轉過頭，陳潤芝看見她嘴唇發紫。「我第一次見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我就知道，外面一定是軍隊。好恐怖。」

他們立即把所有安全鎖、防盜鏈全部扣上，然而十幾個大漢已經來到房門外，把門拍得彷如山響：「你開門！你開門！」

陳潤芝拖慢語氣道：「我們裏面有兩個女記者，你們進來會不會打人？」

他們不理：「你先開門！先開門！」大漢個個身高六尺，其中一人拿著一圈鑰匙，早已把門打開，只剩防盜鏈扣著，這顯然有點激怒他們。

另一位攝影同事已經打電話回港，原來在做即時電話報道。陳潤芝眼見沒法拖延，只好溫聲道：「這裏有女記者，你進來不要打人。」就把他們放了進來。穿著制服的大漢們向他們吼道：「你知不知道現在在戒嚴？！你們還在拍攝？！」陳潤芝好聲好氣說：「我們不熟悉而已。我們不拍了。」

一通警告過後，房間內氣壓驟降。陳潤芝打電話回家，是父親接的。她的父親是一名香港警察，「什麼都見過，殮房見過，暴動也見過。」但當陳潤芝報告情況、安慰家人時，父親語氣雖鎮靜，卻說：「喂，冇理由唔驚呀（沒理由不害怕）。」

那一刻陳潤芝崩潰了。之前她一直沉浸在工作的興奮裏，現在才回過神來。「我真的怕得要死。我連房門都不敢出。」

晚飯過後，從北京飯店後方的小巷回來，見到一些軍人坐在地上好像被揍過、敗兵之將的樣子，陳潤芝和同事們都覺得「今夜一定出事」。她回到房間，站在浴室裏，哭了足足十分鐘，然後對自己說：「停啦，妳停、停、停。」

這是6月3日的夜晚。電視不斷播放通知，警告市民不要外出。而亞視記者謝志峰已帶著一班記者，只裝備沾水的毛巾，一頭扎進廣場的夜色裏。

**槍響：三輪車載著流血的傷者離開，又再來，再走**

長安街上，人頭湧動。一輛裝甲車如雷轟鳴，從天安門廣場，朝北京飯店樓下方向疾馳，那裏站滿了民眾。陳潤芝看得目瞪口呆，「裝甲車原來跑起來這麼快」。直到裝甲車衝抵的最後一兩秒，人群才開始移開。「後面的人怎來得及挪開？太殘忍了。」陳潤芝並不確定，裝甲車有沒有撞到民眾。

她嚇得趕緊給廣場上的同事打電話：「我在高處看（情形）好危險，你們快點回來。」謝志峰他們不肯：「我們這邊還可以，可以做多一陣。」

手機在當時是救命的寶物，陳潤芝不敢消耗同事的電量，又趕緊打給回去香港給總編輯伍國任：「不要再用他們的報道了，會死人的，叫他們回來吧！」伍國任說：「他們說現在走回來，比留在那裏還危險。」

「改革開放進行中，你卻搞一場這樣的屠殺。就像你有一間漂亮的缸瓦舖，你在慢慢修復古董，怎知一頭狂牛衝了進來，撞爛所有的東西。」陳潤芝說，「那些人命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

第一下槍聲響起。不可置信的感覺向她湧來。

然後「砰砰砰砰砰」，接二連三，槍聲不停。

救護車駛過來，架著大木板的三輪車駛過來。流血的傷者被載走，車再來，又再走。那個情景，正如人們今日能看到的照片。

陳潤芝不能相信。1982年她唸大學，還會到大陸旅行，感覺一切都在慢慢進步。1987年，她去昆明報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議過後，她和香港代表司徒華、李福善、李柱銘、烏維庸、廖瑤珠和譚惠珠，以及中方官員鄭偉榮一齊，在大廳裏唱歌。那時氣氛融洽，大家「是有朋友傾的（可以做朋友的）」。

當槍聲響起，歷史的巨輪轉向。一切都改變，李柱銘與司徒華隨後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這一晚幾乎無眠。同事李少媚負責做電話報道。陳潤芝和同事不斷觀察廣場狀況，每在槍響時便趕緊躲回房間；她們都為廣場上的同事憂心。6月4日凌晨五點鐘，她累得昏睡過去，一小時後再醒來，早晨已降臨，槍聲卻未遠去。

早上十點鐘左右，一些市民踩自行車回到現場，不斷試圖靠近軍隊。每隔二十分鐘，軍人就開槍，他們不止站在隊伍裏，還衝出來開。砰砰砰砰砰，陳潤芝和同事李少媚趕緊躲回房間。再回露台時，只見軍隊前面已倒下十幾個黑點——這樣的場景不斷重複。

中午，陳潤芝做電話現場報道，一聽到那邊香港同事徐佩瑩的聲音，她已差點哭出來。

「可以這麼說，我們現在目擊的……（哽咽，無法說話）是一些令人很難過的鏡頭。那些市民是沒有武器，也沒有任何橫幅或者什麼。他們只不過踩單車在接近軍隊的地方兜圈，或者很不明智地集結。」

她終於哭了起來，再強忍下去。

三十年過去，她坐在桌前，對記者說：「真殘忍啊。」

**撤離：六四令她更加關切中國人權事件**

6月5日晚上，陳潤芝和大部分香港記者、學生一齊，登上港府派來的港龍包機。就在起飛前，忽然十幾個公安人員走入機艙，稱有人證件有問題，需要查看。氣氛立即十分緊張，眾人懸心等待發落。然而此時，支聯會李卓人主動站起來，對帶頭公安說：「這班機是我負責。」公安便把他帶走。學聯成員李蘭菊激動起來，想衝出去找李，被亞視新聞總監包雲龍制止。港龍的空姐紅著眼睛，向大家說明航空規定，飛機無法繼續留在原地等候。

飛機就這樣起飛了。

當飛機降落到香港啟德機場，機上所有人鼓起掌來，然後哭成淚人。就在此時，手臂戴著黑紗的機場人員和香港市民湧上前來，夾道歡迎，溫暖與苦澀在記者們的內心交織、勒緊。「把同胞都拋棄在北京了，他們會怎麼樣？」陳潤芝無法回答。

6月8日，經歷三天軟禁，在中國官方要求下，李卓人簽了「悔過書」，獲准登機回港。

陳潤芝一直留在了新聞行業裏。六四過後，她按原計劃移民加拿大，因當地華人新聞媒體影響力較小，於93年回港，加入有線新聞，退休

前為有線新聞直播新聞台台長。「我比較現實，人首先要解決自己的生活。」

她仍像剛入行時那樣充滿行動力和敏銳觸覺。像1986年她迅速電話採訪了劫持華航飛機到北京的機師王錫爵的太太、並獲上司賞識一樣；2000年，她又採訪了新當選為台灣副總統的呂秀蓮，這一次，她的獨家新聞，被時任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批評為「鼓吹分裂」。

她說六四從未過去。「六四是共產政權最殘酷、極致的表現。它的殘酷，其實到現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達，包括逮捕人權律師、強力打壓所有為民請命的人。」

六四的經歷也令她更加關切中國人權事件。近日最新發生的維權新聞，她逐一數來：「危志立，幫工人爭取權益，被捕了；然後北大馬克思學會幫工人爭取權益，又抓了。（中共政權）高度敏感到一個程度，不容許任何第三方力量去糾正一些錯誤的行為，社會如何進步？」

「當一些事成為日常以後，你就覺得，是這樣的啦，沒眼看。香港人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如果有一日來到你面前，你怎麼辦？」經過2003年，香港以一場百萬人大遊行而改變政府23條立法的決定，她更覺面對政權的打壓不能坐以待斃。當身邊有人覺得「我出聲都沒

用」，她堅持認為，不能以功能性去看待一切——「如果七百萬香港人都這麼想，你豈不是像澳門那樣？人最終都要去見上帝，你中間的過程是否也應該過得好好的？善用你的blessing。」

**六四三O：「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

2008年底，陳潤芝自費、請假到美國採訪吳仁華、程真、陳一諮、王軍濤等，又跑去深圳訪問人權律師浦志強，寫成《六四二O》。她希望不止著眼六四，更要碰觸「後八九」的中國狀況。她在書中問道：「今天的祖國，有沒有比廿年前更開放、民主、廉潔？傳媒自由度，有沒有比廿年前多了，還是少了？」

她那時還約訪當年的「廣場四君子」、「零八憲章」發起人、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劉曉波爽快答應：「行！你來吧！」一個星期後，劉曉波被捕了。

八年多後，2017年，服刑中的劉曉波病重的消息登上世界各大新聞版面，陳潤芝在香港，和眾人一樣從新聞中得悉噩耗。她再次發出歎息：「好殘忍。」

今年六四30週年，她再次自費出書《六四三O》，採訪對象包括王丹、王超華，還有「後八九」的維權律師滕彪等。她仍說：「是歷史把我放在那個位置。」多年從事新聞，來到這一刻，「我退休了，有時間、資源、人脈，那我運用這些知識和經歷，去多做一點事情，引起香港人對國內人權狀況的關注。」

「我只是觀察者，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作為一個小小的記者，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訴大家，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

她說對中國的感情，來自於在採訪、在新聞中所見的各種維權和民運人士。「包括危志立的太太（鄭楚然），包括譚作人犧牲家庭幸福，明知會坐牢，夫妻倆完全無悔，連女兒的教育都犧牲了。」

她在新書裏訪問了王丹，王丹第一次坐牢是坐四年，去到三年零六個月，官方告訴他：你寫悔過書，我早點放你。王丹母親說：都坐了三年半了，把它坐完！不寫！

「你有沒有見過這麼厲害的媽媽？如果我兒子被捕了一天，叫他寫悔過書，我會說：快點寫，快點寫，不要說那麼多。王丹媽媽卻說不要寫。我真是服了。」

如今再看陳潤芝珍藏的那張1987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後照片，司徒華、李福善、烏維庸、廖瑤珠都早已去世，只剩李柱銘和譚惠珠仍健在。六四之後，他們走向不同的道路：譚惠珠後來成了港區人大代表，一度稱國民教育教材無需納入六四內容；而李柱銘則在六四翌年成立港同盟（民主黨前身），每年風雨不改參與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陳潤芝也會去維園燭光晚會。有一次，她乘的士過去，司機知道她參加六四紀念晚會，對她說：「也把我的心帶過去。」當她向媒體憶起這一幕時，不禁落淚：「香港人還是明辨是非、站得堅定。」她認為，紀念六四，「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出聲，但可以出聲的人要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地方，是不是更有一個道義的責任去發聲？」

如今，大陸的言論空間急劇收窄，政治愈加高壓。也喜歡做台灣新聞的陳潤芝說：「一個對比：228事件，當年我是看著李登輝道歉的。但我覺得，我不會看到中國領導人就六四事件道歉。」

「習近平也說過，不搞三權分立，不搞獨立司法。那我看不到希望在哪。但你不能因為渺茫而什麼都不做。因為你知道事情沒有希望，你才會去努力。」



*陳潤芝：「我只是觀察者，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作為一個小小的記者，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訴大家，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5月31日，海關在陳潤芝回鄉證上蓋章，她正式加入報道八九學運的隊伍。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陳潤芝到天安門廣場現場報導八九民運的新聞報導截圖。圖：受訪者提供*




*香港傳媒六月五日離開北京前在北京機場合照，前左一為李卓人，上機後被帶走。圖：受訪者提供*




*今年六四30週年，陳潤芝再次自費出書《六四三O》，採訪對象包括王丹、王超華，還有「後八九」的維權律師滕彪等。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1987年，陳潤芝去昆明報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議過後，她和香港代表司徒華、李福善、李柱銘、烏維庸、廖瑤珠和譚惠珠，以及中方官員鄭偉榮一齊，在大廳裏唱歌。那時氣氛融洽。圖：受訪者提供*

# 「我當時，可能真是做對了一件事」——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上)

記者李志德|2019-05-25

「這是我第一次去大陸，」高源流生平第一次踏上大陸就是為了採訪，而且是舉世震動的六四事件。

高源流當時是台灣《聯合報》地方新聞中心副主任，以往主跑司法、社會新聞，和國際、大陸新聞距離很遠。之所以在六四時被派到北京，高源流回憶從五月學生運動開始，每天編前會總要花很長時間討論最新情況。五月下旬，解放軍將動手鎮壓的傳聞無日無之。總編輯開始物色資深記者增援北京。「他說要有採訪經驗，懂得趨吉避凶，總編輯剛講完，眼睛就一直看著我，大家就只看著我，......就是你，這個是你最有經驗，你去！」

高源流訂下六月三日下午飛香港轉北京，同行的還有大陸新聞中心主任蒲叔華。落地後發現預訂飛北京的班機停飛，會不會、什麼時候恢

復沒有人知道，只能在機場坐等。正在回報，台北告訴他解放軍已經進城鎮壓，當下情況危險，要求高、蒲兩人先回台北。

「我人都在香港了，你要我再回去，這不是臨陣脫逃嗎？既然來了，就再等等看。」

到晚上九、十點，班機恢復，上了機「我我前後坐的都是大陸人，他們還很不安的問我，你怎麼這時要去北京？我都不敢講為什麼，只說去做生意。」

「北京機場燈都是暗的，也沒有什麼海關的人。」在行李轉盤邊，一位「個體戶」來拉生意，問高源流兩人要去哪裡。進市區？對方回答今晚不可能，只能到接近市區的麗都飯店，天亮再見機行事。　「那時候北京幾乎失去秩序，沿路都是解放軍的車子，軍車、裝甲運兵車，也有坦克車。我一生沒有見過這麼多軍車」。高源流從車窗往外看，有些解放軍士兵就在軍車底盤下和衣就寢。載他們的「個體戶」司機邊開車，邊喊「解放軍萬歲！」「解放軍萬歲！」還把手伸出車窗揮動著。

為什麼要這麼喊？「他們說這樣比較容易通過」。果然沿途沒有任何人盤查，一路開到麗都飯店。

## 行李轉盤邊的「個體戶」

胡元輝也是在行李轉盤邊遇上「個體戶」司機招攬生意。他比高源流晚三天，六月七日晚間降落首都機場。 胡元輝當時是《自立晚報》採訪主任，他也是第一次到北京，來接下駐京記者黃德北的棒子。黃德北從學運初期就在北京採訪，經歷廣場抗議、學生絕食、解放軍進城鎮壓，身心俱疲，而且經費用盡，有些帳單需要胡元輝來「解決」。

胡元輝和高源流受訪時不約而同提到，自己是帶著上萬美元進大陸，有現金、有旅行支票，在1989年，這筆錢在台灣已經可以付買房子的訂金。除了現金，兩人也都提他們另外還帶著十來個「金戒指」、「金項鍊」，以備碰上「留下買路錢」之類的不時之需。

胡元輝和個體戶司機談好的進城車資是500美元，原本就很窄的車裡，胡元輝坐在中間，左右各有一位「乘客」，胡元輝問這些人是誰？司機只答「他們可以保護你」。車子開出機場不久，忽然一轉彎開進樹林裡，停在一座貌似農舍的住宅前，司機和同乘的「乘客」問他：身上有沒有美元？

「車子一轉彎我就知道大事不妙，我想奪門而出，但也只能『想』，因為我的腳在發抖。」他暗忖著，自己把一萬美元分三個地方放，皮

夾裡是800元，其它在身上另處和箱子裡。他抽出皮夾，告訴司機，有800美元。

「好，我們跟你『換錢』」，按當時的市場價格，100美元應該兌800元人民幣，但司機的「匯率」是100美元兌200人民幣。「換錢」之後，個體戶司機將胡元輝載到城外一處飯店附近，一見燈光就趕他下車，胡元輝自己拎著行李走到飯店。

胡元輝事後回想，自己之所以沒有碰上「更壞的事」，可能是因為他最初跟司機說，自己是應作家協會邀請來參加活動，市區裡有領導正在等著我。司機忌憚如果胡元輝沒有赴約，恐怕引發公安強力調查。

「不可能說是來採訪，但我行李裡頭有一大疊稿紙，就跟他們說我是作家好了！」胡元輝笑著說。

## 只要在大陸的記者，都到北京報到

六月四日一大早，高源流搭上同一部車繼續往市區走，通往市中心的路上有不少路障，「那個司機很厲害，到處轉，遍地都是碎石頭、碎鐵塊，撞爛的鐵欄杆。沿路可以看到被燒的卡車、軍車，有些還在冒火、冒煙……。」

和同事會合前，高源流和蒲叔華請司機先開到北京飯店，這裡離天安門廣場只有五、六百公尺，兩人希望先看一看現場情況。一夜清場之後，廣場四周仍然氣氛嚴峻，還沒走到天安門廣場就撞上一條封鎖線，軍人趴在地上，槍口朝外。成排的軍人後頭是成排的坦克。 高源流看著看著，臥姿的解放軍突然向兩邊散開，坦克車向著群衆前進，抗議者紛紛走避，邊逃邊罵。這時車上的機槍突然打響了，高源流連忙拉著司機跟著群眾避開，他說，所幸它是對著天空開槍，沒有打中或打傷人。

如果在舊報紙上點數記者的名字，會認為當時《聯合報》為了北京學運派出了龐大的採訪團。但其實並不是，所有參與報導的記者，只有王震邦是為了採訪學運而到北京，其它都是因為不同的事件恰好在大陸，都被要求留在北京。例如採訪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訪華的孫揚明和翁台生、採訪台灣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陳承中、參加其它行程的藝文組記者景小佩等等。原本到福州採訪偷渡集團的汪士淳，也在五月中到北京加入採訪，六月四日凌晨，他在天安門廣場留到最後一刻，報導了學生、教授和市民最後撤出廣場的情形。

有趣的是，1989年儘管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已經解除戒嚴，但兩岸關係體系尚未完整建立，中共統治大陸的事實還不完全被政府承認。因此《聯合報》依照政府規定，記者署名仍是「北平報導」。

## 「肖斌事件」之後，所有人都沈默了

胡元輝所屬的自立報系有《自立早報》和《自立晚報》兩份報紙，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非常重要的反對派報紙。1987年9月，自立報系率先衝撞政府禁忌，派記者李永得、徐璐前往大陸採訪，寫下台灣新聞史上的重要一頁。

自立報系這次的規劃是在鎮壓之後加派胡元輝到北京，另一位記者到上海。胡元輝在北京採訪六四後續，之後北京交給徐璐，胡元輝自己轉往成都，沿長江往東一路採訪；到上海的記者南向採訪沿海城市。自立報系希望藉助這個行程，比較完整描寫當時中國各地情況。不過宥於六四之後的嚴厲氣氛，這兩條路線都沒有走完。

六月八日一早，胡元輝雇了一部車前往北京大學，車費要價100美元。他想試試能不能訪問到一些市民對事件的看法。到了北京大學外，還沒有進學校，就看到人行道上擠滿了市民，人人都在高談闊論，找受訪者完全不是問題，甚至「你不必開口問，只要靜靜旁聽，都可以聽到一堆可以寫報導的材料。」

但情況在「肖斌事件」後隨即改變了。肖斌是一名來自大連的工人，六四事件時他在北京出差，目睹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接受美國ABC電

視台採訪，講述了自己見到軍隊鎮壓的情況，包括推估的死傷人數。新聞一播出，肖斌隨即遭到大連警方逮捕，日後被判刑十年。

「電視上就出現一張字卡、一條新聞：『造謠大王肖斌抓到了』，從那時開始，路邊再也聽不到有人談論這件事，也不會有人接受你的採訪了。」胡元輝說。

**蹲著就不要站著，該趴著就不要蹲著**

軍隊進城鎮壓後的幾天，北京城氣氛依然肅殺。高源流和孫揚明曾經目睹一輛戰車在馬路上，士兵以機槍射擊一幢房屋，子彈在牆上打出一個一個彈孔，水泥碎屑四濺。孫揚明說，戰車攻擊民宅的原因，是裡頭裡疑似有人持槍射擊士兵。

碰上這種情況，「大家都在台灣都當過兵的，該蹲著就不要站著，該趴著就不要蹲著。」孫揚明曾在六月四日凌晨，遇過一次「一股很熱的風擦過臉頰」，是不是子彈，他也不敢肯定。另一次，一顆催淚彈就在他腳前炸開，逼得他閉住氣，摸到身邊的腳踏車，拼命騎出幾十公尺才換了口氣。孫揚明回憶當時語氣輕鬆，說那時並不太擔心自己真的會有生命危險。

高源流也說自己不曾有過「接近死亡」的感受。最驚悚的一次經歷，是軍隊鎮壓後兩、三天，他和孫揚明騎車出門採訪，騎過紫禁城靠東側的圍牆，遠遠看到路的那一頭是兩輛坦克車，一大隊士兵站在兩側，整條路只剩中間一條通道。

要不要往前走？ 高源流說，就在他倆進退兩難時，對向一位老人騎著車過來。「他低著頭一直騎，都沒有看我們，騎到我們旁邊嘴裡就念著：不要回頭，不要回頭，不要回頭，不要回頭......」得到老人的「忠告」，兩人硬著頭皮繼續往前，騎過坦克車和解放軍中間時，「我第一次感覺到『毛骨悚然』這個字，那些解放軍可能一進城以後都沒有休息，全身髒兮兮，眼睛都是血絲，他們就這樣一直看著我，我真的是背脊發涼。」　「你那時穿著是什麼樣子？」　「一看就知道不是大陸人的樣子，我腳上還是一雙NIKE球鞋」，高源流回答。

## 衝突的痕跡迅速抹平

天安門事件期間，不少外地青年學生、工人和民眾也到北京參與聲援。胡元輝曾經搭上一趟往天津的火車，看看這個左近北京的城市，有沒有留下民主運動的跡象。

車廂裡有不少年輕人，胡元輝攀談了幾位，有人就提到自己是進北京參加運動的學生。就在談話之間，車廂裡出現三名軍警，「隨機抽

點」盤查行李。「『你，打開行李』，大概三個人就有一個被點到，必須打開行李讓他們檢查。」胡元輝親眼目睹，一位青年的行李箱打開之後，發現裡頭有一張運動期間的傳單，立刻就被帶走。「如果是我被點到，那真的完了。他只有一張，我行李裡有二、三十張啊。」

結束了在北京階段的採訪，胡元輝開始走預訂的成都行程。但當時國台辦嚴格監控在大陸台灣記者的動向，怎麼可能隨便讓他前往成都？胡元輝說，那時是以採訪「都江堰」和「貓熊保育基地」的名義提出申請，而國台辦也真的准了，但同時也派人隨行。 成都是六四事件期間另一個發生激烈衝突和嚴厲鎮壓的城市，當時就有傳聞位於市區的「人民商場」整個被燒掉；錦江賓館也發生激烈衝突等。只是在隨行中共官員的監控下，胡元輝除了老老實實採訪「都江堰」和「貓熊保育基地」外，沒有辦法獨立進行任何採訪，看著手上可以聯絡採訪的電話，一個也不敢打。

胡元輝的確住進了錦江賓館，傳聞裡在衝突中被打碎的大廳吊燈的確不在了，但其它地方看不出任何異狀。車子路過人民商場時，土地一片平整，偌大的商場就像憑空消失了一樣，完全沒有暴力鎮壓的痕跡。

這趟不成功的成都採訪之行一直被胡元輝擺在心裡。他說，在後來的採訪裡，他有機會採訪許多大陸人士，有一次真的碰到一位來自成都

的教授，胡元輝談起89當年的傳聞與報導，那位教授回答，當年自己就是參加抗議的學生，錦江賓館和人民商場的事，大致都是事實。事後這一席談話更讓胡元輝感慨，極權政府抹除社會記憶的效率，可以如此驚人。

## 長長的撤僑車隊直奔機場

在北京，聯合報採訪團原本住在和平賓館。高源流回憶，六四後全市氣氛肅殺，住客漸漸搬走，賓館到最後只剩下採訪記者。有一天凌晨三點，門外有人拍門要求查房，高源流回憶，進房公安人員荷槍實彈，上上下下把房間翻了個遍，但沒有查扣任何裝備物品。當時採訪團發稿回台北全靠一台傳真機，當時就在床頭，但高源流猜測，當時傳真機還是非常罕見的東西，公安應該不知道這是什麼，或者以為是旅館物品，才逃過被沒收的噩運，採訪團也能夠繼續發稿。

經過查房之後，採訪團決定搬到建國飯店。當時幾乎所有還留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都住在這裡。牆上貼滿了各種語文打印的使館通告。西方記者進進出出，晚間還有菲律賓樂隊演奏，和門外的北京城彷彿是兩個世界。

六四事件期間，西方國家也在北京啟動撤僑作業，「那個情景就像二戰或者逃難電影一樣」，高源流說自己生平第一次見到撤僑，「大使

館他們通知僑民到大使館報到，之後就派出車隊，一次總有十多部，有轎車有廂型車。是英國，車頂、側面就貼英國國旗，還有美國國旗、日本國旗」，時不時就見到一支支車隊呼嘯而過，直奔機場。在機場，主要西方國家的撤僑工作似乎都由美國負責，美國國務院在機場設了一處櫃台，停機坪上專機待命，「一坐滿就起飛往東京，像巴士一樣」。

說起撤僑，高源流地沈默了半晌，說起一件沒有公開過的事。

「事實上我們那時在和平賓館，『收容』了一對帶著小嬰兒的夫妻。」高源流說，這件事並不是採訪團每個人都知道，因為這家人非常低調地住在飯店裡。這家的男主人，是一位中國公費留學生，學成返國服務不久，妻子是台灣人，曾經是聯合報系員工，在美國認識了先生，兩人在美國結婚，生下一個孩子，一家人一起回中國生活。

高源流說，這家人的男主人在學運期間，出於滿腔熱血參與了部分活動，六四之後深怕遭到秋後算帳，妻子於是出面向採訪團裡的老同事求助，躲進了和平賓館。

「我在機場的時候一看美國外交官有人在那邊，我就想到這幾位可以送走」，回飯店後，高源流問清楚孩子是在美國出生，確實有美國

籍，就說動男女主人同意，第二天收拾行李，一大早就用採訪團的車將他們送到機場。

一進機場直奔櫃台，高源流拿出孩子的護照，問「這位能不能撤僑」？美國官員回答當然可以，細看發現是個小嬰兒，忙問「他的爸媽呢？」這時男女主人上前，各自拿出護照，「他們一家人三種護照：媽媽拿中華民國護照，爸爸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小baby美國護照。」　登記結束，一位美國官員引著三人往出境通道走，「他們走在那條通道上，我一直提心吊膽，就怕有人會把他們擋下來」，直到三人走到盡頭，準備上飛機，「他遠遠的這樣轉身過來，跟我揮揮手，我也跟他揮揮手，從此我再也沒見過他們。」

這個孩子，現在應該也過三十歲了？　「對！差不多。我跟你講，如果沒有送走他，他後來的命運我就不曉得了。後來我常常想到這件事情，想著我當時，可能真是做對了一件事情。」



*當年曾採訪六四事件的記者高源流。攝：陳焯煇/端傳媒*



*胡元輝。攝：陳焯煇/端傳媒*



聯合晚報

UNITED EVENING NEWS

# 中國共產黨 殘民以逞 人民解放軍 屠殺同胞

## 洗天安門 廣場頓成殺戮戰場 死者近三千 上萬學生民眾受傷

## 我政府 嚴重譴責暴行

### 李總統沈痛要求中共停止血腥鎮壓

## 學生撤離天安門

## 布希爲中共悲哀

## 總統下令 三軍戒備

*《聯合晚報》六月四日的六四報道。攝：陳焯煇/端傳媒*



布希 明晨舉行記者

死難的莘莘學子致上哀悼與敬意

孩子，你已經愛過……

*六四期間的《聯合晚報》。攝：陳焯煇/端傳媒*



聯合晚報

UNITED EVENING NEWS

要聞1版

不要開槍！

共軍坦克車直升機沿街示警

北平市民怒責士兵殺紅了眼

中共冷血屠殺竟稱合理正當

人民解放軍叫囂：還要打一場漫長苦戰

勇敢的中國人

美擬停止軍售中共

股市 跌破紀錄

*《聯合晚報》六月五日的六四報道。攝：陳焯煇/端傳媒*



*六四期間的《聯合晚報》。攝：陳焯煇/端傳媒*




*《聯合晚報》內高源流的六四報道。攝：陳焯煇/端傳媒*

# 「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中)

記者 李志德|2019-05-29

王震邦家裡仍然有兩整書櫃的「六四書」，他順手抽起一本，翻動之間，幾張夾在書裡的紙落在地上，撿起來細看，是這本書製作之初，日本出版社有意接洽翻成日文，請求代轉王丹授權的傳真信函。

架上的六四書大多數是絕版「珍本」，王震邦仔細挑了兩、三本重覆收藏的遞給我，「這送你吧，有興趣帶回去研究」。但對我始終盯著的另一本，王震邦正色說道：「這不能給你，我只有這一本了」。

《六四的內情 未完成的涅槃》，作者包遵信，八九民運期間被官方定性為「幕後黑手」。廣場鎮壓之後，包遵信逃亡了一陣子，與王丹先後被捕，判刑五年。王震邦受訪時反覆提到這位八十年代在中國知識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在六四鎮壓之前力勸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的學者。

王震邦最早認識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大學的行程，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達到最高潮 —— 當然，那時不可能有人知道八九年將發生什麼事，自然意識不到八八年已經到了「最高潮」——王震邦受邀在北京大學演講，談兩岸關係。私下辦的沙龍，沒有海報宣傳，但仍然吸引滿座的學生。

在那趟行程裡，王震邦結識了包遵信、李澤厚和湯一介，也發回了方勵之的專訪和馮友蘭的直言不諱：

**「現實經驗證明，今天全世界推動社會主義而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不是都在尋求改革？這說明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並不如馬克思所說是科學的，而是空想的。」**

1988年的北京行， 讓王震邦採訪八九民運有了比較豐富的消息源。他也是《聯合報》當時在民運現場的記者裡，唯一一位專程為學運而到北京採訪的記者，而不像同報系其它記者，是因為其它行程之後留在大陸支援採訪。

**「【特派記者王震邦／北平卅日電】北平各大學今天紛紛貼出了大字報，交相指責中共官方沒有和學生對話的誠意，參加對話的北大學生更慘遭大字報指名批鬥。**

**在北大校園貼出的大字報以「忍無可忍」來形容學生對對話事件的憤怒，指責官方和學生的對話是一小撮人的安排。並要求同學不要上當。**

**有的大字報則指出，對話層次不高，在沒有實質對話出現前，並有了具體的進展，絕不能停止罷課，廿九日的對話不過是一場聊天會，有的學生更指出，那是官員在向學生們示威，向學生訓話。」**

這是王震邦採訪八九民運的開端。用他的話說，那時民運處在「即將走出學校外」的階段。五月十二日，絕食靜坐即將開始，王震邦拍下北大教師在燕春園為絕食學生開的餞別宴。十三日他寫道：

**「二千多名北平大學生今天誓言絕食，黃昏前陸續集結天安門廣場，......只見到處是「絕食」「絕食」的字眼，掌聲中聽到的是「絕食」「絕食」的呼聲，把上個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後引發的學生抗議活動，推上了另一新高點！」**

在部分學生發起絕食的同時，另有一批學生前往蘇聯駐北京大使館，「邀請」即將訪問北京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 (戈爾巴喬夫) 到北大演講，但使館回答戈巴契夫行程已滿，學生碰了個軟釘子。但八九民運確實因碰上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一時間得到全世界的關注。不少原本

申請採訪戈巴契夫行程的記者，日後就直接留下繼續採訪學運，孫揚明就是其中一人。

孫揚明、王震邦和另一位聯合報記者汪士淳，是聯合報系六月三日當晚最靠近衝突現場的三名記者。六月三日晚間，軍隊大舉進城的消息傳到和平賓館。孫揚明和汪士淳商量了一下，說好汪士淳進入天安門廣場留守；孫揚明騎腳踏車往沿著長安大街往西奔，尋找軍隊和民眾的接觸正面。王震邦則在南池子大街，隔長安大街觀察情況，事實上，當時再想接近廣場，也已經過不了長安大街。

在五日的報紙上，孫揚明發出了四日清晨的現場報導：

**「凌晨一時正。戒嚴部隊從公主墳、木樨地沿西長安街強行推進，遭逢民眾強烈抵抗，有數十輛裝甲車被搶占後，澆上汽油燒毀，當時百姓歡聲雷動，不旋踵軍隊對空鳴槍警告，隨即傳來有人被部隊的子彈所傷，惟數目不詳。**

**群眾開始撤退至民族宮前時再度聚集，以木棍、磚、石與土製汽油彈攻擊部隊，部隊則以催淚彈還擊，由於群眾勢張，部隊向後退撤約兩百公尺至民族飯店門口雙方展開拉鋸戰，一時間滿天磚塊、石頭與任何可能當武器的物品飛舞，部隊由於有頭盔、透明盾牌因此**

**轉為有利，但由於向前衝鋒，因此至少有八人重傷，被送入民族飯店做緊急處理。」**

三十年之後，孫揚明受訪時，大致準確地重現了當年自己筆下的這一幕現場，但時間讓他抽出了不同的元素，而他現在，更願意強調這些元素：

「部隊就一路拉進來，中間看到的其實不只是外傳的，坦克車嘩拉嘩拉一路打進來，那是過度簡化了事件的真相。我們看到的是「打來打去」。所謂打來打去，是我們看到，或者聽到群眾拿著磚頭、石頭、木棍往解放軍丟，丟的同時還喊「衝」，幾個來回。部隊剛開始沒有動用熱武器，就是用槍，後來才動槍，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

「打來打去」，看起來是「(軍隊、學生)各打五十大板」的評價，但孫揚明意欲與之對話的，是一種日益「善惡分明」的扁平敘事。訪談之間，他不斷追憶當年的諸多細節，反覆提醒歷史現場的複雜。例如前幾年曾有媒體報導，號稱引述「英國解密檔案」指出當年天安門廣場死亡超過萬人。孫揚明和當時在廣場留守到最後的汪士淳，特別發表一篇長文，描述當年在廣場所見的情況。至少就他們所見，最後清場階段在廣場上沒有人死亡。

在南池子大街的王震邦，也有同樣的判斷：

「整個廣場是我掃瞄的視野所在。我看不到任何衝撞性的行為或是動作，足以導致死人.......那至於說有人睡在帳蓬裡面就被輾過去的，我覺得在那個時候的情境裡面，不可能。除非他吃了藥，沒有人。我只相信有人幾天幾夜沒睡，我不相信有人在現場可以沈睡。」

「在街上解放軍有沒有開槍？當然有。有沒有打死人，當然有。但廣場有沒有？我們當時所見是沒有的。分辨情楚這些細節， 對於理解當時那個複雜的情況，以及後來各方對運動的詮釋，非常重要。」孫揚明強調。

天安門廣場有沒有人死去？只是30年來諸多公案中的一起。孫揚明記得的還有：當年進城之時的解放軍，行經外交公寓時遭到槍擊，子彈來自樓上不明人士；六四之後，北京一處高樓也有子彈攻擊坦克車上的軍人，引來戰車開槍向這處民宅射擊。這些衝突、對抗的前因後果是什麼？時隔愈久，孫揚明愈覺得不該簡化箇中的關係。

如果把鏡頭再推一點，血腥鎮壓是最後的結果，但這結果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孫揚明和王震邦受訪時，不約而同提到在八九民運期間，從五月到六月，曾有兩次廣場上學生的抗議行動幾乎無以為繼，但一來當時「恰好」進來了大批外地學生；二則，每當討論學生「是不是該

撤退」時，激進的主張總是壓倒一切，包括知識份子們到廣場勸退學生，結果也相同。兩輛相向而行的火車終於對撞。

王震邦受訪時這樣總結：「當時共產黨內的兩種力量，一是通過學生，取得自己這個路線更大的空間；另一條是控訴學生。這兩種力量互為擠壓。」而他想問，激進路線每每在關鍵時刻取得勝利，「究竟是誰扮演了這種角色？而這個角色的動能是從何而來？」

五月十三日，學生在天安門的絕食行動開始；隔天，包遵信連同一批著名學者到廣場與絕食學生溝通，同時發表一篇《緊急呼籲》。首先要求中共中央承認學生是愛國、民主的行動，不秋後算帳，不採取暴力手段；但同時也呼籲學生「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

改良派知識分子向左向右喊話，卻沒有一方理會他們。在清場之後的逮捕中，這些基本立場支持學生的學者、作家也同步落難。七月一日，在法國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籌備處發布了六四後遭秘密逮捕的中國知識分子領袖的名單，包遵信「理所當然」在列，其它的還包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王魯湘、《中國青年報》學校部主任李大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等等。

對這一批改良派知識分子在六四之後的遭遇，王震邦為他們在憤恨不平，又滿懷虧欠。這樣的心情，與他對學生運動「應退未退」的遺憾和批判互為表裡：

包遵信六月下旬被捕，八月傳出被「雙開」的消息。「後來包遵信在牢裡不是認罪了嗎，還有人罵他。我說：沒有坐牢的人，沒有權利罵人。」王震邦說。

「包遵信坐牢出來之後窮途潦倒，我去看他，我對他有一種虧欠感。」說起那一年的採訪團隊拿下了當時台灣新聞界最高榮譽的金鼎獎，王震邦聲音變得低沈，「他坐牢了，我寫的新聞得獎了，這算什麼？！」

過去三十年來，王震邦說自己幾乎不曾受訪。而問他認為記者在現場的意義是什麼？王震邦認為，意義在於：在一個歷史激烈變動的現場，能參與進去，這不是一般人有的機會，因而那樣的經驗帶來的反省力量也異常巨大。

但王震邦不樂於訴說這些，或者不樂於簡單地訴說。因為太簡化的表述，「就像魯迅說的，吃人血饅頭。這個吃人血饅頭，就一個悲劇來講的話，(記者這一行)就變成殯葬業而已了。」

時隔三十年，王震邦大概可以比較無所顧忌地談，當時在北京，包遵信帶他進入許多新聞現場；戴晴帶他到了一處「豆花庄」，出入其間的，有教授、記者、政治人物的幕僚......在民運期間，這裡是各路人馬交換信息的中心，不少報上的獨家新聞都從這裡來。讓王震邦津津樂道的一次，是趙紫陽辭職，他就是在豆花庄裡聽到消息，再觀察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的談話內容，覺得八、九不離十了就出手，之後美聯社也證實跟進報導。劉曉波被捕的消息，也來自這間豆花庄。

在八九民運期間，真消息確實有，但假訊息更多。例如鄧小平已死、王丹傷重不治......等等，事後都證明是假消息。甚至會有這樣的信息見諸報端：

**「親趙紫陽的第廿八軍已開抵北平，今天下午並派出戰車與士兵，與親楊尚昆的第廿七軍在北平西邊主要街道上，捉對廝殺。」**

或者

**「南苑空軍基地。一名上校級指揮官和政委被戒嚴部隊司令部扣留，於是三十八軍兩個營拒絕撤出，戒嚴部隊便在清晨派出裝甲部隊封鎖空軍基地所有通道。基地官兵和三十八軍團結一致，聲稱反對『楊家將』和打倒李鵬。」**

王震邦和六四之後進入北京採訪的《自立晚報》記者胡元輝，都提到了當時訊息滿天飛，但真假難辨的情況。王震邦坦言，很多新聞是「餵」的，「哪條新聞是被餵的，發稿的人心知肚明，而且還不能不發，有時甚至挺高興的，謝謝餵食的人。」

假消息見諸報端，如果不是因為利益交換，那就是記者對事件已經有道德判斷，一廂情願地從「應然面」做文章，專門選符合自己期待的訊息，但和真實情況完全不同。例如「共軍內戰」這類新聞。

胡元輝則說，那時「自己找上門」的關係確實不少，供來的信息真真假假，不要說查證，連第二消息源都沒有。所幸那時自立報系並不盲目要求記者「拼獨家新聞」，因此舉凡這類訊息，他可以只留筆記本上，不必發稿。

信息採取的偏失，事實上和消息來源有關，王震邦就坦言，會多用學生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供的消息的主要原因之一：「學生們願意和我討論訊息，願意和我討論，官員不會這麼做的」。

而一個更大的情境是，在整個八九民運裡，學生儘管人多，但就是這麼弱勢，面對著如此強大的國家機器，記者會不會出現一種心態，自動就站到學生這邊來？

「當然有，包括我在內。」王震邦坦率承認。

更有甚者，「在這麼一個混亂、動盪、強者和弱者如此分明的情境下，一個記者會不會、能不能跨出採訪工作的「紅線」？不管是主動去救死扶傷，或者回應別人的求助？」

胡元輝被問道這個問題時，語氣變得非常緩慢、猶豫而不確定。他說自己確實知道民運期間有外國記者參與後來的民運人士救援工作，但台灣記者並沒有。但即使記者不主動參與，也有被動遇到別人求助的情況。

「我不敢確定我一定會說『NO』，因為這是一個......這是一個天人交戰的課題。它牽涉到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安危。」胡元輝說，一般做法是幫忙把求救訊息傳遞給真正在進行援救的人，「我也許就會這麼做，而不直接成為援救者。」但胡元輝也也坦承，「我不在那個情境裡，我也不敢說一旦真的面對那個情境裡，我會怎麼做。」

該怎麼評價八九民運？孫揚明的答案是：目前沒有辦法。

「要再等三十年，六十年以後回過頭來看這個事情。」他認為，目前談這件事，還有太多的個人、黨派乃至於國家的力量糾纏在中間。必須再等一段時間，這些人、事和關係慢慢都遠去或者逝去了，到時才

可以從一個比較凌空、沒有個人情感的角度出發，給它一個比較好的或公正的評價。

八九民運的結果則重擊了胡元輝。他說，這場採訪讓他親身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點。他說，那時自己原本對中國有一份樸素的期待，希望走向自由經濟、民主開放。但六四事件活生生地向觀察者展示，這些期待中國改革、變化的可能性， 如何硬生生地被共產黨切斷。抗爭者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聲音，如何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消失；就如同他在成都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幾天前發生過一場抗議行動，帶來流血鎮壓。但所有的跡象，都可以在極短時間被抹除，高壓政治會變得如此的有效。胡元輝說，這一段經歷令他「驚駭莫名」。

王震邦沒有給出直截了當的答案，但從他對包遵信和一班改良派知識分子的虧欠之情，或許可以爬梳出他真心認同的狀態，是一個由八十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諸如包遵信、湯一介、戴晴、嚴家其、蘇紹智、任畹町、蘇曉康、方勵之......引領思潮和改革的中國。如果這樣的期待成真，現今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但無奈的是，歷史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轉了彎。



聯合晚報 天安門特別報導

坦克進場

它 無情地輾碎了血肉之軀
卻 撲不熄爭取民主的怒火

主！自由！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聯合晚報》。攝：陳焯煇/端傳媒



王震邦。攝：陳焯煇/端傳媒



十字會代轉捐款

中共血腥暴行 各國同聲譴責

日本：研判情勢恢復平靜

加拿大：盼中共停止屠殺

西德：血腥鎮壓可恥行動

悲憤的中國人

敬告讀者

敬我同胞！
悼我手足！

讓全世界都知道！
中國，依然是人的國度！
一人，兩人，千萬人，十億人！
燃燒吧！天安門！

讓全世界都知道！
中國，必然是民主的國度！
自由，平等，民主人，民主國！
燃燒吧！中國不死的民主精神！

聯合晚報 編輯部全體同仁 敬悼



*六四期間的《聯合晚報》。攝：陳焯煇/端傳媒*



*孫揚明。攝：陳焯煇/端傳媒*



*《聯合晚報》六四期間的報紙。攝：陳焯煇/端傳媒*




*孫揚明在六四期間的報導。攝：陳焯煇/端傳媒*



天安門特別報導

譴責中共血腥鎮壓！

全省青年 明天中午大集合

北高聯來信 支持兩岸對歌

兩岸對歌 心靈相契

滯大陸台胞 都很安全

計畫要去的人 請緩一緩

國父銅像 贈與南京

返鄉舉步怯 彼岸招手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聯合晚報》。攝：陳焯煇/端傳媒



胡元輝。攝：陳焯煇/端傳媒

# 自認「逃兵」的謝三泰，30年後解封的民運照片——那個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灣記者們(下)

特約撰稿人 陳亭聿|2019-06-01

「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後，報社一直叫我回台灣，我請求好幾次讓我留下。沒用。」台灣攝影師謝三泰說，「他們斷絕我的經濟來源，當時住飯店、吃、喝用的都是外匯券，人民幣上蓋個章，就能賺我們二十多倍的匯差。我一下就沒錢了，沒錢就沒輒，只好回來。」

「我拍的最後一張照片，是民眾朝毛澤東像潑漆的照片。」回台灣的十天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慘遭血洗，八九民運從此成了謝三泰心裡永遠的痛。這30年來，他選擇塵封這批照片及回憶，至今講起這事，他還是語帶悔恨，「我覺得自己是個逃兵。」

就在八九學運的兩年前，台灣開放民眾到中國探親，同樣在1987這一年，謝三泰進了《自立晚報》擔任攝影記者。同年9月，他在桃園機場的候機室拍下同事徐璐、李永得和發行人吳豐山的照片，待徐、李二

人搭機離台，回程車上，吳豐山才神祕兮兮地跟他揭曉，「三泰，我們正在執行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問任務為何，吳笑稱，「到中國。」

1987年，《自立晚報》成為首個進入中國的台灣媒體，當時是非法行動，報社保密到家。事後更引發徐李二人回台被移送法辦的軒然大波，最終獲判無罪，二人儼然成為記者界的明星。「從小到大台灣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教你中國歷史和地理，又一直被灌輸說他們很窮，都在啃樹皮。」彼時才30歲的謝三泰直言自己也很好奇，「我真的很想親眼看看它到底是長怎樣。」

1989年4月17日，謝三泰再度受派機場，只是這一次他不是到候機室拍照而已。當時台灣政府除了放寬探親，終於也開放媒體進入中國採訪，「我們是第一批合法進入中國的台灣記者。」謝三泰從報社接獲指令，要去對岸拍攝亞青盃體操賽、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戈爾巴喬夫)訪中行程。亞銀年會台灣由時任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這是第一位到中國出席國際會議的台灣政府官員，當時倍受注目。

就在採訪團出發前兩天，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發猝逝，北京高校學生自發悼念，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集結。知有此情，謝三泰自香港轉機北京後，一落地便忙和講好集體行動的採訪團分道揚鑣。他人還拎

著行李，已跳上同家報社的文字記者黃德北來接應的出租車，驅車直往天安門。

1987到1989年間謝三泰任職《自立晚報》時，適逢台灣群眾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幾乎每天博愛路、立法院都有陳情抗議活動。當時的重大街頭運動，舉凡機場事件、五二〇農運等等，謝三泰以攝影記者身份幾乎無役不與，還常私下提供拍攝的照片給黨外雜誌和一批反國民黨影像工作者組成的「綠色小組」。

聽到天安門有學運，謝三泰情緒有些亢奮，「我在台灣天天跑街頭運動，沒想到北京居然也有街頭運動可以跑。」

當時的他自然不知道，這場運動將演變成一場血腥屠殺。「台灣採訪團的攝影記者多是跑體育的，不太去天安門，畢竟那是危險的工作，可我覺得很刺激。」謝三泰成天揣著個相機奔波，成了人群中的醒目標的。「無論是在北京街道上，或是到天安門廣場，只要我相機一拿起來，人就圍過來了。」

「他們衝著我問，你打哪兒來？」學說兒化韻的謝三泰顯得有點吃力，「我不太清楚對方底細，既然自己中文腔調是南方的，就順勢說

我是南方人。還不死心，追問我，南方哪裡啊？靠，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講，又想了想，我爸媽祖籍是泉州，就改口說我是泉州人。」

「到後來我才慢慢鬆口說來自台灣，有個廈門大學的學生聽我這麼說，就開始跟我用閩南語抬槓。」聽到熟悉鄉音，謝三泰的神情顯得輕鬆不少，可讓他錯亂的事不獨一樁，「還有一次，我跟個學生說我從南方來的，他問我，你是外省人啊？」

圍繞身前攀談的學生固然親切，可跟文字記者分頭行動的謝三泰孤身北京，仍感到頓失所依，「在台灣跑群眾運動，人圍過來的時候要很警覺，要判斷究竟是請願人士，還是所謂的『抓耙子』(編按：指會向官方通風報信的民眾)。幾年記錄運動的經驗累積下來，才慢慢找到方法，譬如跟兩、三個記者群體行動，知道怎麼跟群眾和警方搏感情。」

「可是在北京身邊沒有同業，外表裝沒事，心裡其實一直處在很緊繃的狀態。」當時從當地官方主導的媒體無法得知任何相關新聞，來自學生、文字記者，或台灣報社的訊息都很有限。「事後我才知道中南海裡李鵬、趙紫陽之間的政治鬥爭，可當時在現場還真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只記得到了4月20日那天，感覺不太一樣。那一天有點小雨，學生撐傘藉弔祭胡耀邦之名集結，最後整個移師新華門。門裡頭就是中南海，學生和武警發生衝突，開始推擠。」謝三泰說，「我拿著攝影機拍，心想萬一門一開，解放軍就出來了怎麼辦？」

謝三泰指著照片裡寫著「新華門」楷書的橫匾，當時他將相機高懸頭上，拍學生推擠時鏡頭沒有晃動，單從畫面絲毫讀不出記者的忐忑，但如今的他仍心有餘悸，「置身極權國家，會發生什麼狀況，沒有人知道。」

「我扛了一整個暗房去，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還有底片，黑白、彩色和幻燈片都有。」回到下榻的西苑飯店，謝三泰動手改裝廁所，一個大男人委身小室裡沖印放相。「相片洗成5乘7吋大，5乘7吋就是A4一半大小，拍下當天就傳回台北。」

「那時候沒有網路，要傳輸一張照片要透過國際電話線，還有一台我從台北帶去的，由美聯社獨家研發的滾筒傳真機。」他邊說邊比手畫腳，「滾筒大概這麼大，邊上有卡榫，照片附著在上面。一張黑白的照片傳輸過程要7分鐘，彩色要21分鐘，RGB的嘛。」

「傳真的聲音也蠻大的，喀啦喀啦喀啦。」謝三泰先是模擬傳真機聲響，然後切換成拍擊聲，「咚咚咚，飯店的人聽到聲音他以為你在打

電報，敲門關切，咚咚咚。我打開門，對方問，你在幹嘛啊？我若無其事地說，沒有啊，傳照片。然後拿洗好的體育照片給他看。」

「你知道嗎？電信房都知道你在使用國際電話，時間一久，他們想知道你在做什麼，講白一點，飯店裡頭的幹部都是中共的人。」有時候電信莫名就被切斷了，「斷線就要重來，我天天被傳真搞得很不爽。」

「有一次我怎麼傳都傳不出去，怎麼掛線都掛不上去，掛上去就斷，掛上去就斷。我氣到當下提著傳真機，跑到同業住的另外一家飯店，我付他們一些電信費，就在他們那裡傳真。」謝三泰賭氣道，「說什麼也要把照片傳回去。」

在廣場上久了，謝跟學生漸漸熟絡起來，「兩年前《自立晚報》已經在北京大學打響名號了，他們會問我徐璐、李永得怎麼樣？也問我台灣現在怎麼樣？」如今看來，謝三泰有點哭笑不得地說，「我跟他們說台灣很自由，他們也跟我説他們很自由。」

「我當時在現場確實很驚訝，不是一個極權國家嗎？怎麼容許學生在這裡集結這麼久，後來當然知道是裡頭在政治角力，才放縱學生如此。」4月底前的學運現場，在那官方尚未定性學運、宣布戒嚴和展開

鎮壓的時刻，他指認猶在廣場上流竄的樂觀氣息。盯著筆電螢幕上學生衝著鏡頭笑的照片，謝三泰有些出神地說，「當時的政治氛圍說不定比現在還寬鬆。」

他的鏡頭也捕捉到許多學生領袖拿著擴音器的畫面，包括柴玲、吾爾開希，還有王丹等人。謝三泰隔著相機，將掛戴著一副大眼鏡的王丹，以及他的領袖氣質鉅細彌遺地看在眼裡，「在天安門廣場，我發現王丹這個人講話很有條理，很實在，特別有好感。我和文字討論做學生領袖的專題，我們打算在自立做個半版。」謝三泰向黃德北指定，「我選擇王丹。」

「王丹在天安門廣場上講話很有煽動性，可下台的時候，卻有反差，是個很可愛靦腆的年輕人，要上鏡頭還要整理一下頭髮。」為了製作專題，謝三泰、黃德北跟著王丹中途離場回到北京大學，「不到3坪的宿舍裡塞著6個，還是8個上下舖，我們還參觀他們在學校裡辦的北大沙龍，類似英國肥皂箱的概念。」

「他們生活拮据，可是滿腹理想。我也和王丹聊到他父母對他做這些事的支持，雖然常常他說很多話，然後那北京口音我也不完全懂，你知道。」謝三泰說，「可我心裡很佩服，覺得這個朋友值得交。」

「20多年後王丹來台灣教書，我和他在網路上約好碰面，親手把當時拍他的照片給他。他問我，有沒有打算把這些東西整理成攝影集？我說不行，我跟他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待到六四。」都幾年的事了，他還是很糾結，「王丹跟我說，沒有全程參與有什麼關係？你參與的部分很少人看到。我說好，你下次回來再說。」

就這樣又拖了七、八年，直到2019年八九民運30週年的今天，謝三泰終於在台灣攝影師前輩張照堂的煽風點火下，出版他記錄八九學運的攝影集，名為《吼叫1989》，「我請王丹給我寫序，他二話不說就寫給我。」

我們在桌案兩端，就著筆電光束，瀏覽正處在付梓階段的攝影集電子版。就像王丹所說的，謝三泰以攝影機見證的現場，和那些思及六四，幾乎已成膝跳反射般顯影的畫面——兵臨城下的武裝部隊、坦克人、濺血場景與民主女神像確實不同。

在這群黑白影像裡，無論是北京街頭的常民、自治會的高校學生、醫護人員和電台媒體，甚或武警和解放軍，他們朝鏡頭比劃擺定的多是和平手勢，他們的眼裡和臉上的光彩，混合著某種榮譽感和令人心碎的一派天真。

「這些高校學生文學底子比台灣學生要強，還有人把遺書穿在身上，告訴爸媽，請原諒他們的自殺行動。」看著白布條，因墨漬噴散似仍未乾的口號，他像發現新大陸，驚奇於北京學生運動裡摻混著的濃烈文藝氣息，言談至此他的臉上似有30年前、而立年紀的神情，「那是一種很浪漫，很浪漫的革命情懷。」

謝三泰在北京待了40天，幾乎天天去廣場報到，他待的時間或比一般外媒都要長，卻是沒走完全程。5月20日李鵬宣布北京部分戒嚴不久後，報社顧及人身安全，召回了謝三泰。

職是之故，謝三泰親眼見證的浪漫革命最戲劇性的片刻，至多是學生絕食不支送醫的時候：「後來我住到多數外媒駐在的北京飯店，人稱寫字樓，到了晚上喔咿喔咿喔咿(編按：救護車警報聲)不絕於耳，就知道又有學生被送到協和醫院。」

是遊行群眾坐大的時候：「開始有聲援的民眾，包括《人民日報》、電視台都慢慢加入行列。好像是517那天，我們從北大走到天安門，走了整整一天。隊伍好長，塞滿天安門廣場，整個都塞滿了。那段路，沒有幾百萬人，塞不滿。」

是解放軍逼近對峙，但尚未執行鎮壓時候：「戒嚴開始，解放軍一車一車載到二環之外，民眾阻攔軍用車，用各種方式圍堵不讓他們進

來。當時警民相安無事，還特別握手，擺給我拍。」

是人前激昂吶喊，人後仍有拉撒需求時候：「有把公車拿來當作屏障，也有把公車改裝成廁所的，我就進去過一次。一進去，每個屁股都對向我，學生也是，大媽也是，前後左右都開放的。那味道我不會形容……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景象，很可怕，我真恨自己，當初怎麼不拍一張照片。」

最多最多，也就是那最後一張民眾朝毛澤東潑漆的照片：「拍那張照片時我真的很緊張，當時已經城管，整個氛圍都不對了。我只敢遠遠的拍，根本不敢靠近。拍完之後我就衝回飯店，沖照片，傳回台灣。」

「召回還好，但到六四之候，我的心情很不好。」回台後，謝三泰輾轉拿到一捲指定轉交給他的錄音帶，「那時候錄音帶很小一個，錄音機也很小，可以藏在懷裡。中國記者朋友在六四現場錄的，可是我實在沒有勇氣去聽。」

終於提起勇氣聽了，「裡頭都是砰砰砰砰的槍聲……好像也有對方在掙扎的聲音。」高頭大個的謝三泰把話說得斷斷續續，「我心裡很不舒服，不知道從何聯絡對方，根本無從聯絡起。」

2000年初的時候，謝三泰受邀去北京拍照，這才重新聯絡到中國《民族畫報》的另一個記者。「我問他說，這個人跑去哪裡，他說不見了，不知道……哎。」說到這裡，謝三泰把話打住，說要去抽根菸。

「坦白講，30年前的事情，我一直選擇忘記。」根菸成燼，對坐者回來，他的眼裡殘些水沫，鼻翼仍輕微充血。不願回顧，除了缺席的遺憾，恐怕還有一份濃重的無力感。「你知道，在那個訊息不對等的社會裡頭，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採集影像，如此而已。」

「我把我在台灣接觸到的社會運動，經驗和公式套在那裡，去拍那些照片。」謝三泰曾將看顧台灣社會的熱望投向對岸，曾以影像採集過他們眼裡燃起的期待，「回頭看，你會發現那個時候，他們是有機會變成一個開放的國家的。」

相對於小錄音帶裡捲動與迴放的痛楚，謝三泰的黑白影像守護與封存的，是在希望被碾壓敗壞之前，人心還滾燙搏動，難以按捺掩息的理想和激情。

六四之後，謝三泰負氣在核銷單據裡夾了份辭呈，毅然決然離開報社。然而，不出兩、三個月，《自立晚報》還是把他勸了回去，謝三泰和他的相機再次復出江湖，還是照常對準了運動現場。

1990年3月，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九名台灣大學學生拉開了「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揭開了野白合學運的序幕。「後來學生成立了全學聯（全國學生運動聯盟），這些學生組織慢慢懂得怎麼跟政府討價還價，具體地提出像是『解散(萬年)國會』這些主張。」

「某種程度上，台灣的學運也是跟北京八九學運學習。」謝三泰從台灣的社會運動拍到八九學運，又回身在台灣學子身上看見被感染的理想和激情。「那個時候，我也是天天陪學生在現場，把一些經驗跟他們分享。」

只是這一次，他走完了全程，也看到了故事的不同版本。野百合學運成功廢除萬年國會，推進台灣民主。自此，台灣和中國的命運在89、90年之交，走上截然不同的岔路歧途。

「後來我輾轉拿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攝影集，我發現中國官方通過影像，意圖要將八九學運群眾定性為暴民。」說起這事，謝三泰語氣有些高亢，「那些照片遠比我想像的還血腥，屍體多到我看了震撼不已……但他們只片面呈現官方的死亡，通過照片想扭曲事實為：是這些暴民縱火等暴動行為，致使解放軍不得不展開鎮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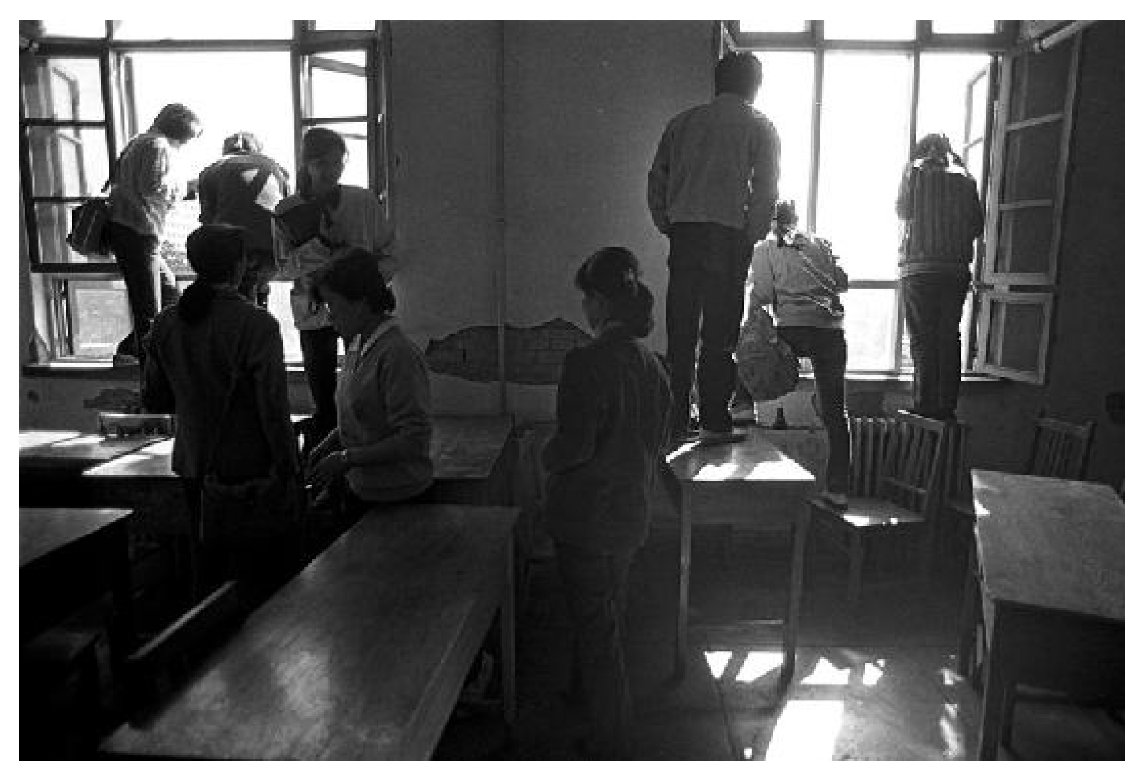
「我在上紀實攝影課的時候，我跟中國交換學生說，中國1989年有一個叫做六四天安門事件，知道嗎？他們說，不知道。縱使知道，他們也說不知道。」謝三泰像在繞口令，「他們那是選擇不知道。是家長要他們噤聲，或是家裡和學校根本不告訴他們。」

「我又逼問他們，你們知道當時死了多少中國學生？」30年來不願提的，謝三泰終究還是記掛在心上。當他發現遺忘成了一種噤聲的策略，他知道，該是時候由他和他的攝影來讓那些被消音的，被再次聽見。

如今面對選擇遺忘的人，謝三泰選擇不再遺忘，他對著他們說，「八九學運時，我30歲，在那裡待了40天。」



*攝影家謝三泰。攝：陳焯煇/端傳媒*



*1989年4月26日，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聯合會記者會。攝：謝三泰。*



*1989年5月11日，北京學運。攝：謝三泰。*




*1989年5月14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王丹。攝：謝三泰。*




*1989年5月17日，北京學運的天安門廣場。攝：謝三泰。*



*1989年5月1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攝：謝三泰。*



*1989年5月17日，北京首都醫學院。攝：謝三泰。*



*1989年5月23日，北京學運期間，毛澤東畫像遭潑漆。攝：謝三泰。*

# 【第二章：紀錄與重現，讓謊言無所遁形】

# 從「白宮戰情室密件」一窺美國眼中的八九民運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研究員姚躍華、郭熙堯|2019-05-18

編按：近年英美政府保存的「六四事件」檔案陸續解封，民間掀起解密潮。六四三十周年，《端傳媒》與「香港前途研究計劃」共同策劃，翻查「白宮戰情室六四檔案」，試圖還原六四事件期間美國駐華人員如何預測中國政、經局勢走向；檔案中也看到出兵鎮壓後，各地駐華領事描述中共當局意圖操控輿論，製造假新聞「漂白」鎮壓事件。

自第31任總統胡佛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都會在家鄉所屬的州設立自己的總統圖書館，存放任內的白宮決策文件。根據這個慣例，1989年1月就任職美國總統的老布殊（布希、布什）亦在家鄉德州建立總統圖書館，其中存放了286份六四事件有關的公開信、報告、電報、會議紀錄等，更包括由美國駐華領事人員親手撰寫的「白宮戰情室報告」。

「白宮戰情室」由前總統約翰甘迺迪在1961年豬灣事件時成立，旨在為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顧問及總統提供情報及危機處理支援。戰情室主要工作是為總統、副總統、白宮高級人員提供日常匯報。日常匯報工作包括一份名為《早報》（Morning Book）的國家情報系統報

告，內附國家情報日報（National Intelligence Daily）、國務院早晨簡報、外交電報、情報報告等，並放在國家安全顧問的坐駕上，另帶一份中央情報局（CIA）為總統準備的《總統每日簡報》（President's Daily Brief），惟因情報內容異常重要，故由中央情報局人員親自交給總統及國安會高層。由於戰情室每日更新最新局勢發展，對於掌握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後中國各地狀況及局勢研判，屬於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

基於上述的架構設計，在老布殊總統圖書館的「戰情室報告」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美國駐華大使及駐上海、成都、瀋陽總領事撰寫，並提交到美國國務卿的每日報告，部分更會轉發到美國印太司令部。這些每日報告內容包括使領館人員於各地所收集的新聞整理、消息匯編、工作內容報告及初步局勢研究等。

第二類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寫給國家安全局局長的戰情報告。由於《美國資訊自由法》規定，涉及國家安全的保密資料可以豁免公開，故總統圖書館內有關天安門事件發展的中央情報局戰情報告現時整份文件列作「Denied in Full（全面拒絕）」類別而不予公開，但根據現時公開的「每日報告」，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美國領事系統提交給國安會、國安顧問及總統對於六四前後各地局勢變化及中共領導層變動的第一手觀察及分析。

## 「中式人為洗白」與「大謊言運動」

在天安門鎮壓發生後，美方一直追踪北京、瀋陽、上海、成都、廣州等地局勢變化，除了觀察當局如何在城內調配軍隊外，也特別留意到當局在各地進行的反宣傳活動。美國駐上海總領事Charles Sylvester在「戰情室報告」描述，北京當局在鎮壓事件發生後，除了在官方媒體通篇批評學運外，亦開始透過一系列「目擊者報告」及書信去批評《美國之音》等媒體發放假新聞「造謠」，上海及整個華東地區的各大電視台重覆官方對北京事態發展的講法，當中上海電視台反覆播放一系列名為「北京真相」的節目。他認為此舉旨在令民眾對於外媒報道產生懷疑，並形容這類反宣傳活動為「中式人為洗白」（artful Chinese white-wash）。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甚至在另一份戰情室報告中形容是「大謊言運動」（Big Lie Campaign）。

這類反宣傳不單是「打空戰」，Charles Sylvester在戰情室報告中亦留意到，上海市內的居民委員會及政策部門也參與其中，他們會在市內各處設立大聲公及宣傳站，並派出多架宣傳車在大街上四處廣播，連公安局前門亦擺放了多支大聲公，大肆宣傳「恐怖的北京反革命活動已經被鎮壓了」，呼籲上海市民復工。

不少人或會懷疑這種單向度宣傳的實際成效有多大，Charles Sylvester認為這類「中式人為洗白」有一定影響力。他在報告中形容，不少原本被認為較理性的外國人都被說服，並提到一名不具名的外國駐上海代表曾與美方使館人員談及官方反宣傳的意見，對方表示「或者他們（居民委員會）所說是對的，畢竟誰真的看到軍隊曾經射殺過無辜的婦孺？」反映官方反宣傳有一定效用。Charles Sylvester這裡特意在「意見」部分下了一個註腳，表示外國人雖然不會立即相信官方講法，但觀察所見，大部分上海市民眾「不知道有什麼可以相信了」，有機會動搖他們對於北京鎮壓事件的理解。

若然比較美國不同駐地使館所撰寫的戰情室報告，不難發現官方宣傳策略的成效因地而異。譬如李潔明發回的一份報告以「大話（說謊）在天津不管用（The Big Lie Isn’t Working In Tianjin）」為題，指出北京發生鎮壓時，天津市面沒有太大反應，市民及官員沒有公開批評當局鎮壓行為，但往往私下向美國使館人員質疑官方說法的準確性，並打探方勵之及吾爾開希等人下落。例如有餐廳待應一見使館人員在看《天津日報》便大聲叫道：「這報只會撒謊」；有路邊小販一見使館人員外國人的面孔，便問到「你是否美國人」、「是記者嗎」，當知道是在使館工作後，對方便說「噢，告訴我有關方勵之的事！」。他們在李潔明的報告中被形容為「渴求不同觀點的人」（extremely interested in hearing differing viewpoints）。

李潔明分析天津民眾之所以較其它地區懷疑官方說法，除了官方事後快速應對事件外，其中一個原因是天津與北京相距較近，兩地只有兩個小時的火車車程，不少天津市民都有參與及目睹天安門鎮壓景象。李潔明報告中又提到，天津領導層內部並非一面倒反對學運，例如天津市外經貿委副主任張煒以辭職抗議戒嚴令，大批民眾到其住所表示支持，事件反映民眾普遍對政府抱有不信任。
由於官方宣傳攻勢在天津等地不甚奏效，當局便要改變官方宣傳。若然說上海當局以大聲公播音的反宣傳手法是製造另類「天安門真相」，李潔明在戰情室報告中指出，或者因為天津當局意識到民眾對於官方講法抱有懷疑（populace's skepticism），所以市政府宣傳機器不是旨在說明「政府是對」，而是警告民眾「不要讓同類事件在這裡發生」（Not letting it happen here），天津市政府打出的口號是「防止動亂」、「保護人民」、「保護天津」、「防止流血」。

## 「一切正常」運動

這類「洗白」固然一方面旨在針對平民，防止他們同情學生，與此同時是針對外商。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外資企業大舉撤資中國，為了拉攏外資回華做生意，當局公開作出呼籲。根據《大公報》6月16日報道，由於外商擔心中國是否維持對外開放政策，滬蘇浙等地官員紛紛訪問當地中外合資企業；時任深圳市市長李灝亦呼籲國外投資者支持特區經濟建設；《大公報》亦報道，時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鄭拓彬

在6月15日表示需要「讓更多的外國廠商看到，中國的局勢是穩定的，在中國投資是安全的，中國的政策是有連續性的」，國家旅遊局同日亦發表公告，稱「海外來華旅遊觀光者的人身安全一直沒有發生問題，是可以有保證的」。

為了令外國人相信國內局勢已受控制，大陸當局特意訪問不少在華外國商人，李潔明在戰情室報告中形容是「一切正常」運動（Back to Normal Propaganda Campaign），他亦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天津市政府收到指令，要求當局必須小心處理外國人，因為「他們想法跟我們不一樣」。雖然李潔明沒有詳述大陸當局如何「小心處理」，但從其他戰情室報告中見，中方天安門事件後積極與留華外商進行訪問，營造中國仍然適合投資的景象。Charles Sylvester在戰情室報告中提到，有不具體的外國代表向美國駐上海領使館人員表示，上海傳媒機構有一天突然派記者到自己公司，表示要撰寫報道讚揚該公司在「動蕩時刻沒有放棄上海」。

美方一直留意中國政府的宣傳策略，其中之一是當時一部分美國商人非常急於回華做生意，根據一份由美國國務卿貝克交給駐華大使的戰情室報告可見，當時美方估計最少有50名美國商人滯留在香港，他們急於由返回中國繼續做生意，而其他外國領使館亦面對同樣問題。貝克在報告中指出，擔心過早回華很容易發放「錯誤信息」。雖報告沒

有具體指出「錯誤信息」所指何事，但可以肯定的是，美方當時的角色主要是針對回華的美國商人，防止他們成為中共宣傳機器所利用。

不過，這不代表外商百分百相信官方說法，相反地還有可能惹來外商的反感。李潔明在報告中表示，自己曾經向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官員反映，在華經商的美國商人主要有四大憂慮，官方一系列反宣傳的「洗白」活動就是其中之一，其餘則為：北京實施戒嚴令、北京街頭處處都是解放軍、當局公然處決異見分子。

### 阻撓記者 控制輿論

大陸當局除了透過不同方法製造論述外，與此同時便是控制資訊，其中一個打擊對象便是身在中國的外國和香港記者，防止將學運的採訪資料穿越中國的封鎖線送到境外。為此，中國政府採取各種方式阻撓、騷擾記者採訪，而這些針對記者的舉動早在五月底已經出現。北京當局5月底頒布《戒嚴令》後，已經逐步收緊對外國記者限制，如當局5月20日頒布的第三號《北京市人民政府令》提到，戒嚴期間，未經北京市政府批准，外國及港澳台記者「不得進入機構、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相等活動」，一旦違返規定，當局強調「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至5月底，當局開始加強對外國記者管制，如中央電視台在5月30日報道外交部通知，警告外國人及外國記者必須留意當局規定。

除此之外，當局亦加緊對外國記者施壓。據美國駐華大使館所知，北京公安局在5月底開始陸續警告美國廣播公司（ABC）及香港亞洲電視（ATV）不要再報道北京學生運動，英國廣播公司（BBC）首席駐華記者更被恐嚇後果自負。美國CNN亦受到當地公安騷擾，加拿大廣播公司甚至收到中方官員提醒，表示該公司記者以旅遊簽證入境，不應進行採訪及直播活動。

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當局亦在外國記者的簽證下工夫。六四事件前後，外國記者主要用兩類簽證入境，除了上述提到的旅遊簽證外，一部分外國記者是用採訪時任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訪華時申請的工作簽證入境，但相關簽證當時已經過期。記者曾向中國外交部查詢，但中方表明不會續簽，但表示由於工作簽證已經過期，記者亦不能在此重要時刻選擇離境，故記者在無奈下只能繼續留在北京採訪。事實上，早在鎮壓發生前，中國當局在5月30日已經指兩名英國記者違返旅遊簽證限制，在成都拍攝並訪問兩名學生，故成都公安局下令驅逐該兩名記者。

面對中方5月底突然加強對外國記者施壓，美國駐華大使館形容事情變得有點混沌不明，甚至在報告用上中國成語「殺雞儆猴」（kill the rooster to scare the monkey），指中國會驅逐一兩名記者去警告其他外國記者不要再報道事件。然而，這不減採訪工作，報告指大部分記者

計劃繼續採訪工作，希望利用國際輿論去防止當局強力鎮壓，部分記者甚至對當局可能發動鎮壓作好了準備。

外國傳媒機構六四期間都要靠衛星天線進行實時轉播廣場上的影像，1987年至1995年間CNN北京分社社長齊邁可（Mike Chinoy）早前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5月15日訪華，CNN和其他外國媒體獲大陸政府許可自帶碟形衛星天線，到戈爾巴喬夫離開中國翌日，北京政府開始中止實時影像傳輸。在齊邁可記錄中，有兩名大陸官員來到CNN下榻的喜來登長城飯店，要求停止信號傳輸，及後只能用電話進行實時報導，並將影帶亦偷偷帶到香港或東京。

根據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在5月30日記載，北京當局甚至派出官員到喜來登長城飯店，直接拔去酒店衛星傳送器的電掣（插頭），並拆走部分零件。由於衛星傳送器無法使用，一眾外國記者無法進行實時報道。實時報道被中斷，記者只能用電話繼續報道事件，直至CNN借出零件，才能繼續將實時影像傳送回國，可惜只能以黑白形式傳送。

事實上，在上述「拔掣事件」發生前一星期，當局已經逐步收緊對外國媒體的限制。根據李潔明撰寫的多份戰情室報告顯示，隨着戒嚴令在5月20日生效，CNN、NBC、CBS自家的地面收發站被迫停用，有新

聞機構亦被當局恐嚇會中斷其長途電話。當局雖然容許外國電視台使用中國電視台的衛星，但不給予任何收發時間，CNN等多間主要美國新聞機構更被北京當局要求中斷每日午夜12點後的衛星廣播，當時有機構已指事件有政治意味。儘管限制處處，不少記者則選擇無視禁令繼續拍攝，並託即將離開中國的旅客將影帶帶回美國。

為了防止採訪片段流出國外，當局往往仔細檢查記者隨行物品，例如多名駐北京的美國記者向美國大使館指，外國記者離開北京時，機場的海關人員都仔細逐一翻查他們的行李，一有錄影帶，都會被充公，一名美國新聞雜誌攝影記者的兩部相機及護照亦被收走。採訪過示威現場的記者都會被公安局警告不要報道他們的所見所聞。然而，記者事後通常選擇低調行事，希望當局早日歸還被收走的財物。

鎮壓發生後，新聞管制再度收緊。為了限制外國記者活動範圍，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6月10日向所有外國領使館傳達口頭通告，要求駐京外國記者若要跨省採訪，需要10日前向當局申請批文，又批評部分記者在上海違法採訪，故要求各國領使館須通知記者，以防「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使館回應時沒有積極配合，強調固然不希望意外發生，但表示其職責不包括規定美國公民在華活動。

外國記者向美國駐華大使館投訴，在6月10至11日期間被中國當局大規模騷擾及監視，其中有記者表示自己6月11日在上海同濟大學內採訪

時，多名身穿便服的人將自己趕離校園，同樣地復旦大學亦有暴徒將另一名記者趕走。另一個上海消息人士向美方表示，無論記者到哪裡，都有黑色房車尾隨其後。　另一個重要課題便是「資訊戰」，即大陸當局嘗試透過不同方式去影響民眾如何理解六四。

**戰情室報告：洩形勢分析切入點**

除了反映事實情況以外，「白宮戰情室」檔案也讓外界有機會一窺美方如何評估及分析中國局勢變化。「戰情室報告」大體分為兩部分，一是當地領事人員撰寫的當地局勢概況，當中除了整理官方公告及發言、新聞機構報道及街頭觀察外，亦透過接觸各個消息人士而整理出來的匯報及意見，後者往往以「Informant」或「Contact」去標示，惟因《資訊自由法》關係，具體姓名及消息人士背景往往會隱去。

另一種是美國使館人員基於當地局勢最近距離觀察而作出初步形勢分析，他們往往在戰情室報告文末部分加入自己的見解，並以「Comment（意見）」形式分開編注。雖然這些消息人士對局勢分析未必精確，部分分析只是一廂情願，最後沒有實現，而使館人員亦未必完全盡信消息的報告，但領事人員往往在「意見」中說明這道消息如何提供切入點，有助美方高層了解中國當局，故這些戰情室報告其實有助了解美方對於中國問題的觀察。

局勢分析報告便是針對中共領導局的觀察及分析，當中尤其關心保守派在天安門事件後能否繼續掌握？白宮戰情室報告內有一份由美國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6月21日發送給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室（Defense Attaché Office）的戰情室電報，由於檔案涉及美國國家偵察局及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相關檔案中的官員名字都被隱去，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份電報至少涉及「國防情報局」、「美國國家偵察局」及「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三大情報部門。
負責發送這份電報、但姓名被隱去的國防情報局官員指出，自己六四過後一知道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共總書記，對此固然感到意外，但一直認為保守派掌握中國國政的狀態只會維持一段短時間，鄧小平與保守派的強硬派聯盟只是為了壓制民主運動而締結的「政治婚姻」（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六四後的清算、打壓等事件並未解決未來領導人選的問題，最多只是顯示了保守派的最後反擊。該官員認為若鄧小平去世或失勢，中共將會失去可以團結不同派別的力量。之後將會是一系列不穩定、短命的保守派聯盟上台，這些保守派聯盟會由中共老人和其黨羽組成。他們無能力、無遠見維持社會穩定和作出長遠經濟發展需要的決策。

更重要的是，上述國防情報局官員認為，除非中共老人陸續「退場」——不論是因為去世還是政治清洗——否則保守派聯盟根本無法為中國長遠穩定著想，而將政治改革重新放到中國改革議程當中。美國認

為保守派這些「缺陷」會削弱保守路線，最終會失信於公眾。美國估計三年內，中國迫切的經濟問題將會使溫和派重新擔任一些重要職位，最終會使處事作風靈活實際的領導層上台。

除了領導層變動，美方在天安門事件後亦關心「中國局勢如何走」的課題。在一份由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送出的白宮戰情室報告顯示，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人員在6月10日問到多名消息人士對於中國未來局勢的分析。雖則消息人士身份都被隱去，我們無法直接得悉這些消息人士背景，但根據駐上海總領事Charles Sylvester在「意見」部分的陳述，他提到「上海知識分子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及「大部分消息人士都繼續期望改革」。

戰情室報告中首要關心北京學運及鎮壓活動會否衝擊中國經濟狀況，甚至有機會演變成城市動亂。報告引述消息人士估計，雖然外資最後會回到中國發展，但血腥鎮壓的陰霾會令他們避免參與長期發展計劃。再加上整個鎮壓過程需要軍隊的支持，這種強硬路線需要當局日後用用巨額軍費開支維持，會對日後公共財政造成壓力，有機會釀成比天安門事件更大型的反抗運動。

農民在戰情室報告中亦是另一個不穩定因素。報告引述同一批消息人士指，城市有大量勞務派遣工及常住人口，一旦城市經濟收縮，故被迫返回農村，但同時無地可耕，則容易演變成抗爭活動。

不過，在美方眼中，這些分析重點不是這些沙盤推演多大程度會發生，使館人員亦未必認同消息人士所有講法。美國駐上海總領事Charles Sylvester當時在「意見」部分雖然沒有點明哪個方案最有可能，但報告則指出上海當時有成千上萬的移民工，而使領人員親自接觸臨時工，發現他們對於官方宣傳徹底不信任，但又表示示威活動打亂了建材的運送，短期內無法開工，加上當時城市內的工程項目減少，市政府亦煩惱如何安置城內失業的建築工人。由此可見，在Charles Sylvester眼中，城市工人的不滿有機會是未來社會不滿的根源。

Charles Sylvester根據這些來自上海知識分子圈子的消息人士對於局勢描述，認為當時上海知識界對於前景相當消極，雖然改革派希望中國可以持續地推行改革及民主化，但至少短期內肯定無望。

「戰情室報告」生動地呈現美國在六四期間對於中國局勢的研判，屬於美方對華的最前線消息來源之一。基於美國《資訊自由法》所限，現在戰情室報告只公開了涉及使館系統交給白宮的分析，其他重要情報部門如中央情報局等檔案沒有解封，亦不包括由白宮戰情室發出的總統決定。這難免令人好奇，這些情報機構對於中國局勢研判究竟與使館系統的分析有何出入？兩者所作出的局勢判研在「後六四」對華政策制訂上扮演什麼角色呢？



*1989年天安門學運期間，中方於五月底突然加強對外國記者施壓，然而報告指大部分記者計劃繼續採訪工作，希望利用國際輿論去防止當局強力鎮壓，部分記者甚至對當局有機會鎮壓作好準備。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在1989年1月就任職美國總統的老布殊在自己家鄉德州建立總統圖書館。圖為布殊於當年2月訪問中國時，向天安門廣場的一群中國圍觀者揮手致意。攝：Getty Images*



*天津與北京相距較近，兩地只有兩個小時的火車車程，不少天津市民都有參與及目睹天安門鎮壓景象。攝：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大陸當局除了透過不同方法製造論述外，與此同時便是控制資訊，其中一個打擊對象便是身在中國的外國和香港記者，防止將學運的採訪資料穿越中國的封鎖線送到境外。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 一個人的戰鬥，沒有退路的吳仁華

特約撰稿人 楊平|2019-05-31

「我是第一次跟一個戒嚴部隊的人坐在一起。」5月18日，在台北的六四三十週年研討會上，輪椅上的六四受難者方政說。

1989年6月4日清晨，清場結束，方政是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在撤離天安門回校的路上遭遇坦克追軋，失去雙腿，同場坦克還施放毒氣彈。彼時，吳仁華則在稍微靠前一點的位置，差一點點，撿回了一條命。三十年後，吳仁華成為研究六四真相的重要人物。當年戒嚴部隊中的一員李曉明，是迄今少有公開經歷的軍人，他坐到方政身邊，這兩人分別屬於加害者及受害者陣營，同以研究對象身份獲邀，擔任吳的論文評論人。

這個由支聯會和華人民主書院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吳仁華是首場發表人，他一身黑色西裝，表情肅穆，準備了整整13頁長的論文，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裡，以極快的語速連珠炮似地念出包圍天安門廣場的戒

嚴部隊番號，當中包括輾過方政雙腳的坦克編號為106，乃隸屬於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團長為上校羅剛。

方政希望吳仁華能再找出輾軋的命令是由誰下達，如何下達，為何要下達。「我最想知道，已經完成了鎮壓命令，學生都已經撤出了，為什麼還要追殺我們呢？」

但實際上，六四研究已超出吳仁華的負荷，這份落落長的論文，幾乎是他自2011年後首次完整書寫的研究文章。他本還打算趁六四三十週年之際，將手上已有的700多位受害者名單在Twitter上公開發佈。但終沒按期公佈，「我非常自責，也非常遺憾」。

1989年，吳仁華33歲，是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刻，全程親歷了八九民運。翌年流亡美國後，他一直搜集和面對血腥的屠殺資料，常常夜不能寐。2009年起，他發現自己和人交流談話沒有問題，但一打開電腦文檔要寫六四的研究，就做不下去。「就是心情非常痛苦，腦中一片空白。」

然而關於六四真相的研究，迄今仍是吳仁華生活的最大主題。

## 一、揭開真相的苦行僧

今年4月中旬開始，吳仁華的Twitter上就不再有別的內容，全是六四、六四、六四。2011年4月15日到6月9日，他已在這個帳戶上逐日回顧八九天安門事件，即為其第三本著作《六四事件全程實錄》的雛型，此後每年這個時間，都逐日轉發。

1989年，他在中國政法大學擔任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員。此前，他是中國文革結束後首屆恢復高考就考上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的高材生，有碩士學位。他沒有料到的是，這些考據學、版本學的訓練，日後最大的用處，竟是搜集、比對和追蹤六四事件中戒嚴部隊的資料。

從1990年流亡美國至今，他出版三本專著，被視為中國六四真相研究的重要人物。首本《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巨細靡遺地記錄了6月3日至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第二本《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則破解了19支戒嚴部隊的番號，在6月3日進駐北京城的每一條路線，並附上3000多名參與鎮壓的軍人名單。

這是花費吳仁華最多心力，也是資料搜集難度最大的研究。他先閱讀大量中國官方在六四之後美化、嘉獎戒嚴部隊的宣傳資料，包括光明日報出版社在1989年9月出版的《新時期最可愛的人——北京戒嚴部隊英雄錄》，解放軍出版社同年10月出版的《共和國衛士之歌——首都

戒嚴部隊英模事跡報告文學集》，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編寫的《首都公安幹警平暴紀實》等等。

比對這些官方資料，他設定40個以上的關鍵詞，例如「中槍」、「受傷」、「倒地」，在網上日復日地搜尋戒嚴部隊的聊天記錄，從隻言片語去追蹤，再用版本學的方法比對不同人在同一時段、同一地點的描述，確認真偽，最後才能像拼圖一樣地把每一支戒嚴部隊的進軍路線拼出來。

這樣特殊的研究方法，令他經常通宵達旦地守在電腦前，「有時候你好不容易在網絡上跟蹤到戒嚴部隊在聊天，要是離開電腦，你可能就再也見不到他們的聊天記錄了。」正因如此，他有時連續二十幾個小時，乃至三十幾個小時盯著電腦，長期沒有正常的節假日，生活清簡，自己簡單煮個麵就是一餐，像個苦行僧。

然而這樣的心血，隨著六四事件一年年的過去，已經越來越少被公眾看到。在美國洛杉磯生活，他過去以擔任《自由新聞導報》總編，來應付日常生活的開支。三本書最初都在香港自費出版，封面下方寫著其實不存在、由他創辦的「真相出版社」，連封面都是自己用 word 文檔設計，「很難看、很粗糙」。直至近年，終於有台灣出版社找他再版。

吳仁華為六四研究的前景擔憂。「三十年過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錄，誰會買呢？」他說。無人買的書，自然不受出版社青睞，若無其他收入，研究者幾乎不可能全職投入其中。但為了讓更多人接觸到他的研究，他早已不計成本地將大部分研究成果在Twitter上公布了。誰還在期待六四研究？這樣的苦戰，是在為誰而戰？

在台北的研討會上，被坦克壓斷雙腿的方政對吳仁華說，他還在期待。「作為受害者，我認為吳老師的工作很珍貴。」他希望吳仁華可以繼續研究下去，「把這些軍隊的罪責確定下來」。

「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到法庭上，找到那個開坦克的戒嚴軍人，跟他對質。」方政說。

找出答案很艱難，但吳仁華無法放棄。研究屠殺逼迫他長年面對血淋淋的資料，又是親身經歷，他形容，時時刻刻讓他感到悲傷、痛苦、憤怒。「所以早期我寫第一本書的時候，經常深更半夜寫著寫著，就自己趴在鍵盤上失聲痛哭。」他說，「因為那些都是屠殺的場面啊。」

整理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名單，對他來說，是「對個體的尊重」，也是「對歷史的尊重」。他說：「像六四屠殺這麼一個人權的災難性事

件，沒有這兩方面的記錄，（研究）是不夠格的。」揭開真相的人，無可避免地劃破自己的手，可又必須去揭。他告訴自己必須做下去。

## 二、賭上一生的知識分子

吳仁華的家庭經歷過不止一次的政治運動，父親曾被下放到偏遠的南麂島，他自己也曾在70年代下鄉插隊。好不容易捱到回城，參加了文革後的首屆高考，一舉考上北大，特地報一個讀古書的專業。「具體做什麼不知道，就是想遠離政治，躲進古書堆裡，一心只讀聖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他說。

他出生在中國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一個東海畔的小漁村。考上大學時，他第一次登上由溫州開往北京的長途火車，足足搭了30多個小時，沒有座位。從1978年進入北大到八九民運爆發前，他一直實踐當初的想法，一心一意做個專心學術的知識分子。

但身處北京，知識分子間的友誼建立得很快。吳仁華北大畢業後，去了中國政法大學當青年教師，同事陳小平和曾參加四五天安門運動的王軍濤關係不錯，常一起過週末，吳仁華也同往。但一談到政治，他就主動避開，連讀書會也不參加。

直到胡耀邦在1989年去世，他回想過往幾十年整個學界在政治上的壓抑，深感青年知識分子不可再犯「軟骨症」，於是才抱著十年寒窗付之東流的決心，賭上一生，捲入運動。

當年4月17日，他和陳小平一同帶領八九民運第一次有組織的遊行，送花圈到天安門廣場祭奠胡耀邦。4天後，北京各高校第一次聯合遊行，他又說服同事劉蘇里拿出原本要打家具的上好圓木，請木匠加班加點做了兩塊大看板。一個月後，他決定與學生共進退，開始絕食。

更兇險的時刻很快就來臨了。6月3日上午，軍隊在新華門附近的六部口發射催淚瓦斯，動用警棍和木棍來驅散民眾和學生，吳仁華感覺鎮壓隨時會發生。

那天下午，他帶領一支40人的特別糾察隊前往天安門廣場保護絕食「四君子」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周舵的安全。出發之前，弟弟從溫州來電，問他北京情況怎麼樣，有沒有參加？他回答：「我沒事，我還是在學校讀書做研究呢。」他當然沒有告訴弟弟真實的情況，「我就是讓他告訴母親，讓她放心。」那是整場運動中，他唯一接到來自家裡的電話。放下話筒，他就出發去廣場。

至6月4日凌晨4點，天安門廣場熄燈，到4點半開燈，吳仁華形容，那是最恐怖的時刻。「在場所有人都覺得，最後的時刻到了。」留下來的幾千人都抱著死志，吳仁華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最高層台階上，身後就是劉曉波絕食的帳篷，他一直和同事劉蘇里在一起，「我要盯著他，我要讓他在我的視線裡」。

因為劉蘇里的妻子把不到兩歲的孩子一個人放在家，跑到廣場找丈夫，請他為了孩子，一定要保重。她還哭著拜託吳仁華，「你一定要關照好劉蘇里。我就跟她說只要我在，我就會關照好」。

許多民眾身上帶著血奔到廣場，給他們報信。他知道屠殺正在逼近。廣場四周佈滿了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頭戴鋼盔，手持槍支，還有許多裝甲車。廣場上空不斷有發射子彈劃出的彈道，「像節日放禮花一樣」。

在這種時刻，吳仁華竟然遇到一位溫州老鄉，是一位脖子上掛著相機的姑娘。「這是歷史的最後一刻，我應該把這最後一刻用相機記錄下來。」她說，又要給他照張相。吳仁華想到母親，覺得這可能是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張照片了，請她照完一定要寄回溫州老家。他給這個素不相識的老鄉寫下老家的地址：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金釵街34號，還寫了母親的名字。對方一口答應。

但直到現在，吳仁華都沒有收到這張照片，擔心她很有可能已遇難。多年研究六四，讓他非常清楚，照相的人在當晚特別危險。天津師大中文系本科生李浩成、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陳來順，還有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的孩子、當年還是高中生的王楠，都是在照相的時候被殺的。

他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官方不想讓人留下屠殺記錄，二是當年攝影技術未夠發達，相機須使用閃光燈。他在上大學前曾當過溫州的公安邊防兵，知道要開槍，有光的地方就是靶子。「有時候點根煙，煙頭的火就是靶子，更不用說閃光燈，很容易被擊中。」

血腥清場結束，他在溫州朋友父母的家裡住了三個多月，輾轉來回北京幾次，終決定逃亡。這一次，他又登上了連接北京與溫州的長途火車。十幾年前那個少年北上要做家中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十幾年後，他帶著整場八九六四的親歷記憶，走同一條鐵路，卻是走向流亡。

1990年，他如常回家，和家人過完年，不告而別。先從珠海偷渡到澳門，他喝下蛇頭給的一大瓶人參蜂王漿，吊住精神，在寒夜裡用4個小時游過海灣，再經由「黃雀行動」輾轉到香港、美國。再回家，已是22年後。

## 三、沒有退路的「不孝子」

「立此存照：盡速完成六四寫作計劃，不計代價，以自己選擇的方式回中國，給父親上墳，給母親叩安。」2011年1月19日，吳仁華在Twitter上這樣寫道。

那一年，他的母親85歲了。母親很早就做了寡婦，孤身養大五個孩子，吳仁華從小農村考上北大，又做了大學老師，是其中最有出息的。他走後，母親、哥哥、弟弟都受牽連。中國官方從浙江省級的，到溫州市級的，再到蒼南縣級的，至今仍然年年找他母親談話。弟弟本來是全省十大優秀畢業生，省委組織部選定的後備幹部，享處級幹部待遇，但1989年以後，公務員資格被取消，降為普通職工，前途止步。家人間從不談論這件事，但吳仁華十分不忿，覺得是國家對不起弟弟。

母子兩人都性格剛強，定期通電話，不說想念，母親也不曾喊他快回來。「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是現實政治不允許我們母子團聚，所以說這個話不能解決問題，只能增加對方的傷感。」

2011年，同是吳仁華發現自己因持續研究六四而精神受創的年份，他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全身心地撲在研究上，像機械一樣無休地勞作；身心都在告訴他，該回家了。

他秘密辦理過去多年一直不願拿的美國護照，洛杉磯最大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有許多代辦中國簽證的小廣告，只要多付錢，就可以幫忙免去一些麻煩，例如可以不用向官方提供本來的中文名。1200美金，他買到了45天的中國簽證，終在2012年底靜悄悄入境回去溫州。至平安回到洛杉磯，他才敢在網上說，回家的感覺，是「汗下如雨」，是「吸煙定神，頭暈欲倒」，是「像做夢一樣，不敢想象」。

45天裡，他有一天去祭拜當年藏了他三個多月的老夫婦。「他們那時冒著風險，寧可跟著坐牢，也不讓我離開他們家，還抱著我的東西不讓我走。我覺得人要感恩。」其餘的44天，他每天都陪母親散步兩次，二人還去了一趟海南旅行。

對於吳仁華當年做了什麼，這些年又在海外做些什麼，母親一句也不問。他起初以為母親是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母親不在家，他進到母親的房間，在枕邊發現了自己寫的兩本書。他大為震驚。

第一本《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已經被翻得非常爛，書角都已經捲起，「我沒見過哪本書可以損傷成那樣的」。第二本寫戒嚴部隊的書卻完好如初。

「我就想，我母親在很多個不眠之夜，可能就是翻那本書。那她為什麼翻第一本，不翻第二本呢？我猜是因為第一本書的作者前言裡，我寫了一段是給我母親的。我說忠孝不能兩全，我是個不孝子，下輩子，如果有來生，我一定做個孝子，我其他都不做，就要侍奉我母親。」

他突然明白母親對他做的事一清二楚，只是不願意問。「因為她要是問了，就很為難。你說問吧，因為做這些事寫這些書不能回家，給她增加這麼大的壓力，她是勸我好呢，還是不勸好呢？要不要按照中國官方的要求來勸我放棄呢？所以她裝作不知道。」回家前，他本來想好在母親和妹妹面前絕不掉眼淚，但那天心中感觸太深，還是掉了淚。

後來，中國官方告訴他，以後再無入境可能。要想再回去，就要寫悔過書、保證書，在某程度上跟中國官方合作，出賣一些自己的同道。這是唯一的路。「但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歷史記錄者，不能走這條路啊。」吳仁華說，「因為有更重要的東西需要你考慮啊。」

這個更重要的東西，就是歷史記錄、六四研究。三十年很快就過去，許多親歷者、目擊者、知情者都可能已經不在了。「這是一個搶救性的工作。」六四歷史記錄如果欠缺，對他來講是「無法忍受的」。

但資料獲得的困難，資源的限制，讓他越來越感覺六四真相研究仿佛是他一個人的戰鬥。他已經63歲，如果在學術機構，恐怕早已經到了退休年紀，可是六四研究領域的現狀，卻讓他沒有退路，別無選擇。「現在逼得在這種精神狀態、身體狀態下，還要繼續把剩下的計劃完成，我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資料欠缺，又是禁區。港台的研究機構也開始有學術的自我審查，跟中國大陸有很多學術交流。一些台灣的大學怕陸生減少，也不敢碰這些問題」。沒有團隊，沒有資金，他只能獨立地做研究。

「這真是一個悲哀，也是一個遺憾。」吳仁華長歎一口氣。

## 四、家在海那邊

去年4月，吳仁華受台灣民主基金會和東吳大學邀請，到台灣擔任訪問學人。這一年時間，是他流亡後，休養得最多、最好的一段時間。

他需要回家調適心理，卻無法歸去，選擇台灣，是因為覺得像溫州。「台灣隔著海峽，對岸就是溫州。」他所出生的溫州市平陽縣有座南麂島，是台灣不少大陳眷村居民的故鄉。少年時，他在溫州家中打開短波收音機，總是因為太近，而不小心收到台灣的波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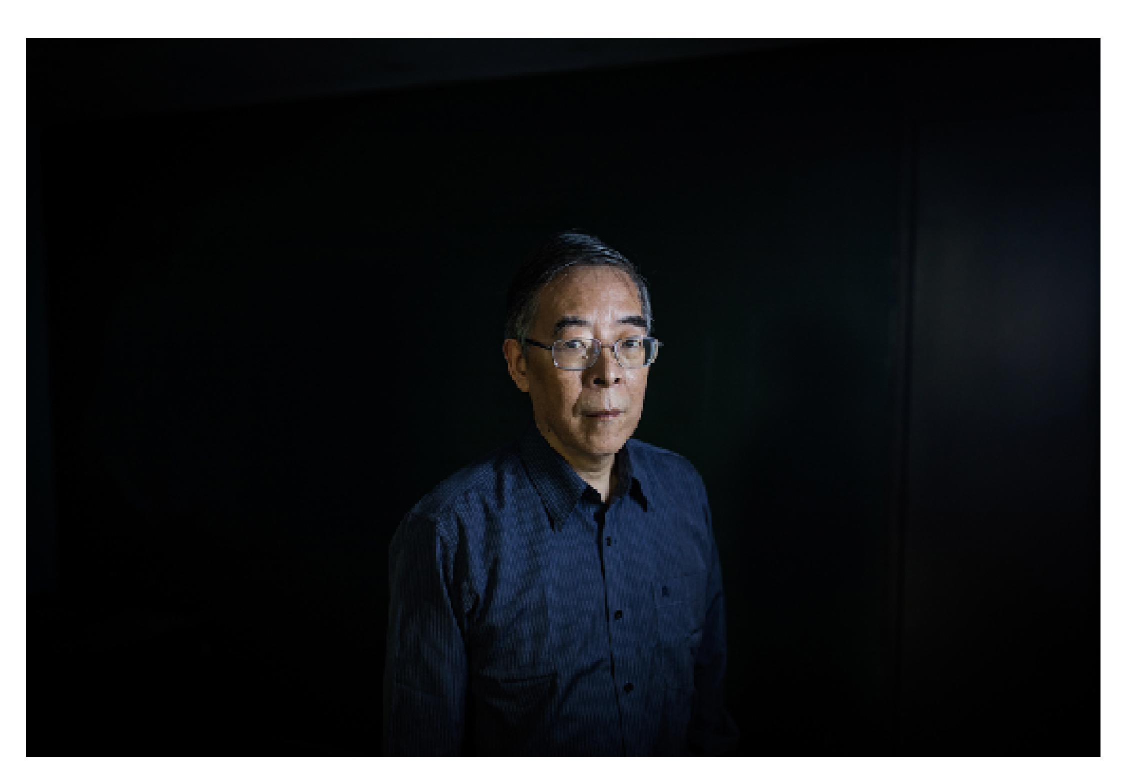
他看到故鄉的影子，包括多雨的氣候、好食海鮮和甜食的飲食文化，還有雖不會說，但卻聽得懂的閩南話（台語）。溫州是浙江省最南端的市，接壤福建，許多人既講溫州話，也通閩南語。他還在台北公館一帶的溫州街和泰順街找到了兒時吃過的早餐「燈盞糕」，裡面裹著白蘿蔔絲，外皮炸至金黃，多角的形狀。

「我希望在台灣做一個好的休養，可以讓我盡快調整好，就可以盡快把想做的研究計畫做完。」吳仁華不想一直把自己困在六四的城堡裡。「我也是嚮往自己的生活的，但這個課題佔用了我太多的時間。」他說本性貪玩，是圍棋和德州撲克好手，並不願意每天都苦大仇深的。「人家問我最想做什麼，我很少這樣回答媒體，其實我就是想按照自己的愛好，去過自己的生活。我希望回歸真正的我。」

吳仁華宣告，給自己設定生涯最後一個六四研究計劃。翻查官方資料，他發現截至1989年6月25日，全中國就已經有11013人因為六四事件而被捕，還不包括陝西和西藏的數據。這些人叫什麼名字，因何被捕，如今在哪裡，此後的際遇如何？

吳仁華希望，將那未完成的受害者名單盡可能做到最全，在被捕之外，像方政那樣受傷、被取消學籍，或是像吳仁華的弟弟那樣受牽連影響的人，還有更多。他計劃整理手上已有的700多人名單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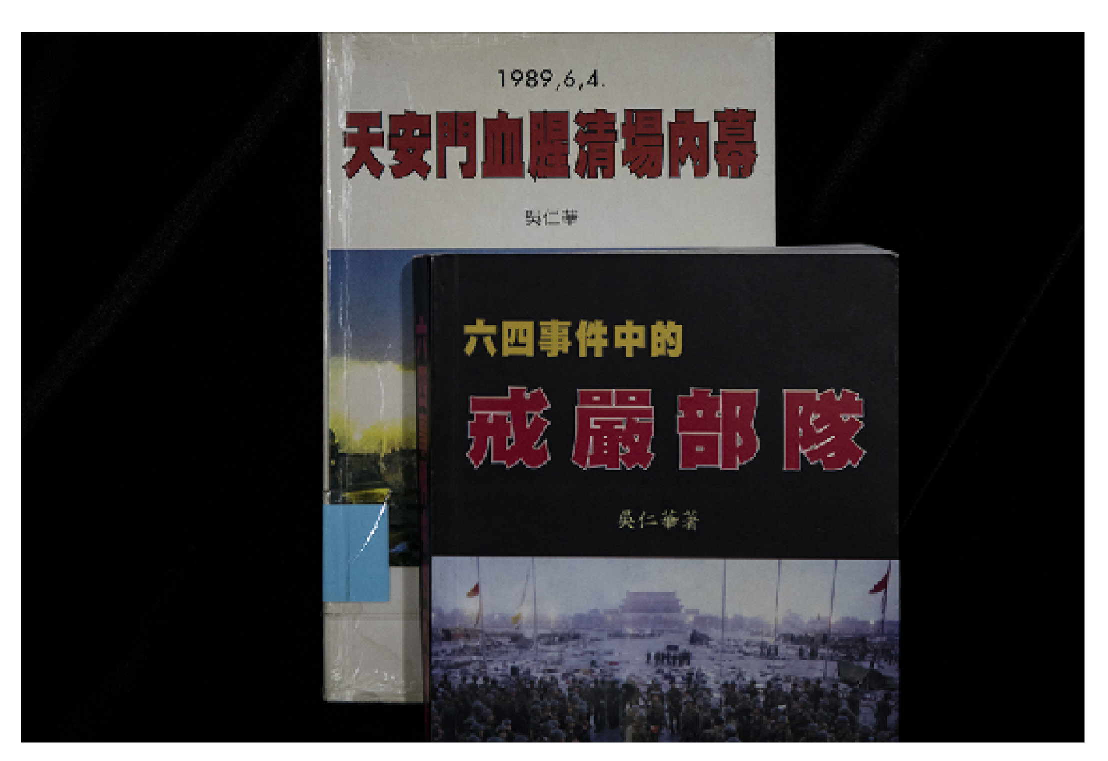
Twitter，引出有類似經歷的網友，一同從民間找尋資料，完成第四本書的寫作。吳仁華的六四真相研究，還在繼續。



*吳仁華。攝：陳焯煇/端傳媒*




*方政(左)及李曉明(右)出席「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吳仁華的《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5月19日，吳仁華參加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攝：陳焯煇/端*

*傳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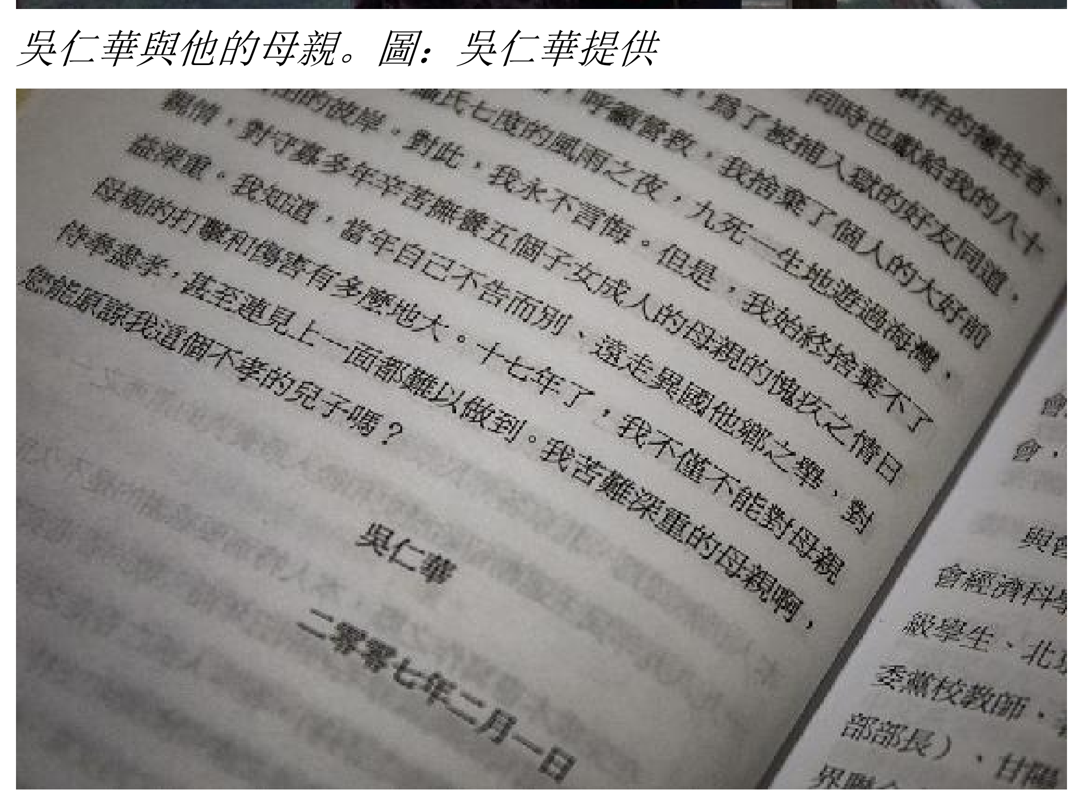
*1989年4月22日，吳仁華(前排右起第五)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時，被當時的香港記者司徒元拍下的一張照片。攝：陳焯煇/端傳媒*



*吳仁華的大學畢業照。圖：吳仁華提供*



*吳仁華與他的母親。圖：吳仁華提供*



……的彼岸，對此，我永不言悔。但是，我始終捨棄不了親情，對守寡多年辛苦撫養五個子女成人的母親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當年自己不告而別、遠走異國他鄉之舉，對母親的打擊和傷害有多麼地大。十七年了，我不僅不能對母親侍奉盡孝，甚至連見上一面都難以做到。我苦難深重的母親啊，您能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嗎？

吳仁華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

*吳仁華的《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前言中，關於母親的一段話。.*

*攝：陳焯煇/端傳媒*



*吳仁華來香港後的照片。圖：吳仁華提供*

# 六四舞台莊梅岩：我們不能不做，香港人不會習慣那種沒自由的生活方式

特約撰稿人 陳喜艾|2019-06-02

5月31日晚上，由編劇莊梅岩及導演李鎮洲拍擋操刀、講述八九六四的舞台劇《5月35日》正式公演。經歷干擾、恐嚇、觀眾反應越來越冷淡，主辦單位「六四舞台」在六四三十週年重振聲勢，門票開售三小時已售罄，劇團成立十年以來，首次加場。

演員謝幕後，掌聲一度長達半分鐘，幾乎沒人離座，留下參與演後座談會。有人問莊梅岩，演出前曾受到干預是什麼回事，她沒有說來龍去脈，但說了另一件事——首演當天早上，她在微信收到曾訪問的難屬傳來一張花束照片，她想，花束該是對晚上演出的祝福，於是以一個微笑表情符號回應了。「這種交流很隱晦，我其實並不習慣。我們香港，仍有自由，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我們現在是方寸必爭，勢力是有如坦克車般來。我們日常工作的確很忙，但這些事我們不能不做。我們香港人，是不會習慣那種沒自由的生活方式。」

2014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政治氣候急轉，遊行人數銳減，六四燭光晚會在出現「行禮如儀」的批評、學生團體如學聯及八大學生會表明不參與之下，越來越冷清。但這一晚，在劇院裏面看，香港人對六四的熱熾，似乎從來沒有冷卻過——座談會之後，場外水泄不通，排隊購買劇本和紀念品的人龍，擠滿大堂與樓梯；「你們捐多少？」一個中年女人拿著500港元紙幣，問身邊兩個同樣拿著500元的朋友，一個是婆婆、一個雙手撐住拐杖。

看著十年來反應最熱烈的場面，受到鼓舞的監製列明慧，整晚在舞台前後打點，充滿幹勁。但她沒有就此忘記了這年頭的風高浪急，在台上致謝時，一貫的沉穩冷靜：「我是前線醫護，目睹過有病人在臨死前的確會好像康復一樣。今日的六四舞台這樣精神奕奕，我也不知道這是否迴光反照，每一年，我們都當是最後一年演出，全力去做。」

十年前，有參與過燭光晚會義工的列明慧，與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六四舞台」，開始以藝術的形式傳承歷史。第一年的《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票房九成；翌年，舞台收到打壓電話，更是一夜成名，劇場一票難求。其後，除了每年的公開演出，舞台還主動舉辦學校巡迴表演，劇目包括講述黃雀行動的《讓黃雀飛》和劉曉波夫婦的《大海落霞》。不過，舞台近年同樣受到社會氣氛影響，反應轉淡。

至前年，莊梅岩主動向「六四舞台」提出，想為六四寫劇本。「如果這個社會沒有人說應該忘記六四，我或者無咁激動，覺得要講囉。這事情，就是不應該忘記。你覺得可以忘記，是因為你沒從中拿到經驗。」 那一年，佔中九子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被落案起訴、林鄭月娥當選第五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四個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裁定宣誓無效失去議席；那一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第三年缺席燭光晚會，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論壇，主題為「香港中國，漸行漸遠；六四意義，從何說起」。

由構思到正式公演，莊梅岩花了2年時間完成劇本，當中大部分時間用在資料搜集。執筆寫《5月35日》前，她看了不少關於六四的書籍、文章、影像紀錄，也訪問了不少人，甚至到過北京尋找靈感。

「我坐在幾個難屬當中，努力看進她們的眼睛，三十年，要說的都說了，但我想從她們眼中找出檔案裏沒有的，結果人的溫度真的可以傳遞，思念會感染，我得到遠超越劇本所需的資料搜集；我坐在流亡者當中，眼前受訪者穿著西化也時髦，然而一開口就是濃厚的北方口音，在異鄉流行曲襯托下訴說著當日落荒而逃的悲滄和不忿，一輩子都回不去的家國、一輩子都無法彌補的遺憾；還有幾個香港記者，讓我看到烙在目擊者心上的印記，時代見證有時是個沉重的包袱，尤其當你看到當日出生入死、義憤填膺的同袍一個華麗轉身，拋下專業操

守與良知去指鹿為馬、助紂為虐。」莊梅岩把種種感受，寫進了《5月35日》場刊中。

莊梅岩2001年從演藝學院畢業，做編劇十八年，曾五次獲得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劇本獎。她的劇本寫實細膩，思辯式的對白字字珠機，當中不少直接探討社會議題，包括寫無國界醫生的《留守太平間》、以牧師性騷擾案為題的《法吻》、詰問教育制度的《教授》。

在寫《5月35日》之前，六四早觸動莊梅岩的創作靈感，所以才有了被譽為其最偉大劇本的 《野豬》——2010年，「六四舞台」被傳媒阻撓宣傳有關六四的話劇，莊梅岩當時想到香港的新聞自由，於是透過《野豬》探討傳媒問題、操控審查。

在《野豬》正式公演時，她在場刊中曾寫到：「看著一個荒誕劇慢慢變成一個寫實劇，我的難過和憤怒不比當事人少。」

「那時只覺得六四舞台威脅事件只是個別事件，所以並沒多擔心。」但社會變質的速度超越她想像，她沒想到，自己終究也被捲進「審查」漩渦之中。

在六四舞台公布三十週年的劇本由莊梅岩執筆以後，有人曾聯絡她，要求她不要做和六四相關的創作。「你問我收到這樣的聯絡有沒有震

驚？我當時是立刻打了一個很長的信息給李鎮洲，傳送之後，立刻就把信息刪除了。然後我打電話給一個朋友，想告訴他這件事，但我不想在電話裏說，於是直接上他的家，當面地說。我好驚。」

《5月35日》還是如期推進了，莊梅岩如常曝光，接受媒體採訪，講六四，講六四舞台。

訪問的日子，正值《5月35日》密鑼緊鼓排戲之時。春夏之交，傍晚時分，在何文田民居的天台，香港的天空由黃金泛紅，逐漸走進暗黑一片。莊梅岩亮起一盞燈，看著李鎮洲，「在提出合作的時候，我已告訴監製，我想找李鎮洲導這劇」。莊梅岩從演藝學院畢業後不久，因為《聖荷西謀殺案》認識李鎮洲。她一直很欣賞李鎮洲，說他總能在文本之中發揮想像力，突破文字的局限，讓劇本表達更多。

「我這個劇本傾向寫實，發揮不多，很需要他的幫助。」為了劇本，莊梅岩堅持花長時間搜集資料、閱讀大量資料，為的是要尋找觸動自己的人與事，然後把被觸動的情緒好好記住、消化，再轉化為劇本的養分。18年來，在寫作的過程中，她試過被自己寫的劇本牽動情緒感覺抖不過氣，但會邊寫對白邊眼泛淚光，還是第一次。

「有幾場獨白，寫爸爸憶述屠城之後，未有兒子音訊，他媽媽心裏還是有過希望。但我作為編劇，知道這媽媽將會接到兒子死訊，等待、幻滅，寫到這裏，情緒比較波動。我從未試過寫這樣沉重的劇本。」故事之所以沉重，不止是因為它是個悲劇，還因為它在歷史之中真實發生過。

「我們去『六四博物館』做資料搜集，看見有父母捐出了一皮箱兒子的遺物，裏頭有這個青年向父母道歉的遺書，這個我還是想像到的。但令我動容的，是一本筆記本，封面寫上『宇宙銀河系太陽系地球亞洲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西城區一五四中學初三五班吳向東』，若是我兒子，他也許只會寫『小三丙班』。」

「這看上去是很微小的事，但我覺得，這正是人與人之間的分別，我好像看到這青年寫的時候是怎樣的模樣，然後有一種與不相識的人突然有了連繫的感覺。又有另一本筆記本，貼上很多從報章剪下來的logo，令我想起自己由小至大的成長過程中放棄過多少興趣。人人都是這樣走過來，他走到那裏，就在那個位置中止了。」

錐心的故事，不止在一個人身上發生，而是在數以千百計的家庭重複。莊梅岩一而再請記者、請觀眾看《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名單》，「你們去看看，裏面的故事比我寫的劇更戲劇性。我們未必能

立刻做些什麼，但我們可以把看到的記在腦裏，帶給自己的孩子、自己身邊的人。當暴政來臨的時候，你就會首先發覺得到」。

莊梅岩以自己的人生代入歷史中的人與事，額外痛心。九年前，她生下現在讀小三的兒子；近年父母患病，她開始體諒年老父母的想法。但她想像，即使自己沒有孩子、沒有看見父母年老，單就這些年的社會氣氛，也足夠造就《5月35日》。

《5月35日》講述在六四失去兒子的一對年老夫婦，臨死前決定要為兒子做一件事。莊梅岩說，劇中的人，並不是「天安門母親」。「天安門母親，是選擇了抗爭的一群人，但我寫的夫婦，當年沒有選擇抗爭，他們一直有個鬱結，現在想去填補。」「劇本的風格是寫實的，故事不是很虛冚（大場面）那種。年老夫婦為兒子做一件事，整個劇，就是這樣簡單。」

2018年初，接到莊梅岩電話後一口答應當導演的李鎮洲，收到劇本的半完成品時，就覺得自己的決定沒錯。李鎮洲說話平靜溫文不徐不疾，與快語連珠的莊梅岩形成強烈對比，但他們都因為喜歡簡樸平實成為了好拍檔。「我喜歡這種簡單的起點，不花巧、不耀眼，反而令整個戲劇有更多空間發展，讓戲劇的張力出現。我很想令劇本成形，把文字變為聲音、變成舞台上的movement。」

一年過後，今年4月，在導演與演員正式開位排練前、圍坐讀順劇本的圍讀當天，莊梅岩終於把完整的劇本交到監製手上。

第四場戲，故事說到三十年前在天安門失去兒子的一對老夫婦，聲嘶力竭把冤屈都咆吼出來：「係你叫阿大否認佢係死難者、你唔畀我哋去追究，你驚件事牽連到你，你叫阿大求其影幾張相向我交代就處理咗捷捷——軍隊濫殺無辜啊你知唔知？佢哋殺咗我個仔......」

「那種歇斯底里、鬧出來的說話，其實是我們放在心裏好長時間的想法。它或許會令你也想鬧埋一份，或許覺得『哇，鬧得很爽！』，還有的是，它其實勾起我們這一代對六四的回憶。」

八十年代，李鎮洲開始演舞台劇，中英談判的年頭，戲劇界掀起過一系列追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劇目，當中1985年李鎮洲參演的《我係香港人》至今已成一個時代的標記。1989年，30歲的李鎮洲身在香港，與所有香港人一樣從新聞片段中看到血腥畫面。「北京人民如何湧出街道阻擋軍隊入城，最後有軍隊在街上驅散、開槍，當晚發生的事、種種畫面、後來香港人的反應......全部記憶回來了。」

李鎮洲的六四烙印是深刻的，三十年來，悲憤過、熱血過，也曾經放下過。「起初的一年，當然沉重，但始終不能不放下，實在太辛苦，

但這不代表我們會忘記。」六四翌年，李鎮洲刻意尋歡作樂，故意放低，想自己暫時忘記不去想。李鎮洲與莊梅岩，這些年都少到維園悼念，但他們都沒有忘記過當年自己目睹的事。

「那時候我六年級，事件醞釀時，經歷過文革的父母常從內地親戚聽到消息，然後在家議論紛紛、經常鬧政府。發生翌日，年輕的班主任在講台上哭起來，然後帶我們做壁報。小時候，老師都是神聖的，她哭起來對我來說很震撼，記憶很深。」莊梅岩說，如今她雖然沒去燭光晚會，但如果新聞沒大篇幅報導，她會覺得很怪。「根本未追討完，為何突然不值一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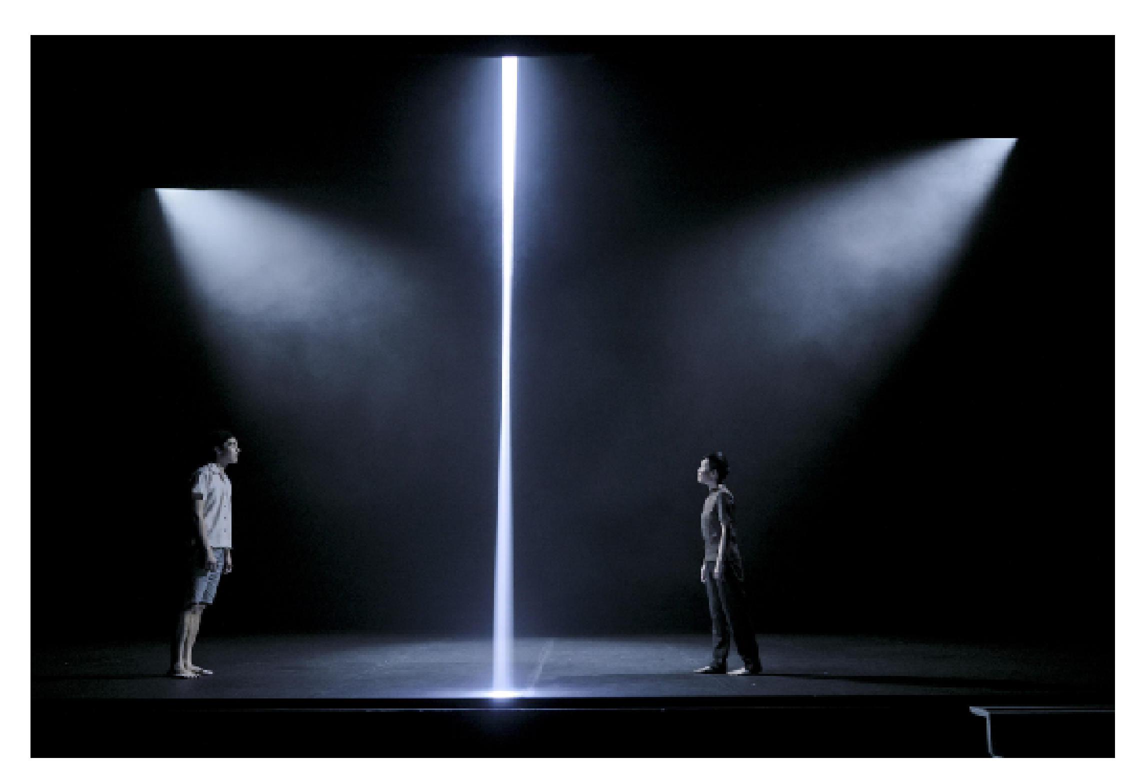
「或許因為我是做創作的人，這十年社會的變化，讓我越來越尋根究柢地問，什麼才是重要。」莊梅岩創作《5月35日》，說到底不是因為覺得編劇有社會使命云云，而是六四在她人生中本來就是一件大事，就像愛情、家庭一樣。

「為了這劇，我訪問了一些內地人，雖然我覺得很重要，但其實沒有內地創作人會訪問他們，因為他們明知不能寫，又何必要訪問。但你明知這件事重要，而你又不可以去認識、不可以去寫，創作人不能回應社會，這種狀態對我來說是很扭曲。

六四三十週年紀念之際，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也燒得火紅火熱，社會人士擔心這是當局打壓異見的又一重大舉措。端傳媒記者問李鎮洲，有沒有想過自己會因為《5月35日》，而與自己扯上關係？「也有這樣想過。」

說到這裏，莊梅岩仍然無法想像，不同意政府的說話就等於與國家為敵。「我從來沒想過。」壓在腦海深處的事，一直沒刻意提起，而他們也沒想到，直至來到第三十年，才終於覺得是時候要做點事——並不只是因為事情經過長年的沉澱、人生經歷多了、心態轉變了等，而是因為社會也變了，變得越來越扭曲。

「如果沒有人刻意在模糊焦點、企圖洗走記憶，也沒那麼容易勾起我們反抗的情緒。你哪會想到，如今的學校要老師不要提六四，社會的影響之下，年輕人對六四的看法開始扭曲，這類事情是排山倒海的來。我們和年輕演員談六四，感覺是六四離他們很遠，無論是如何重要的大事、如何無法磨滅的歷史，只要你不刻意守住，當一代一代過去，原來真的可以被磨滅......」李鎮洲一口氣說完，未及感嘆，莊梅岩就斬釘截鐵：「歷史就是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5月35日》劇照。攝影：Cheung Chi W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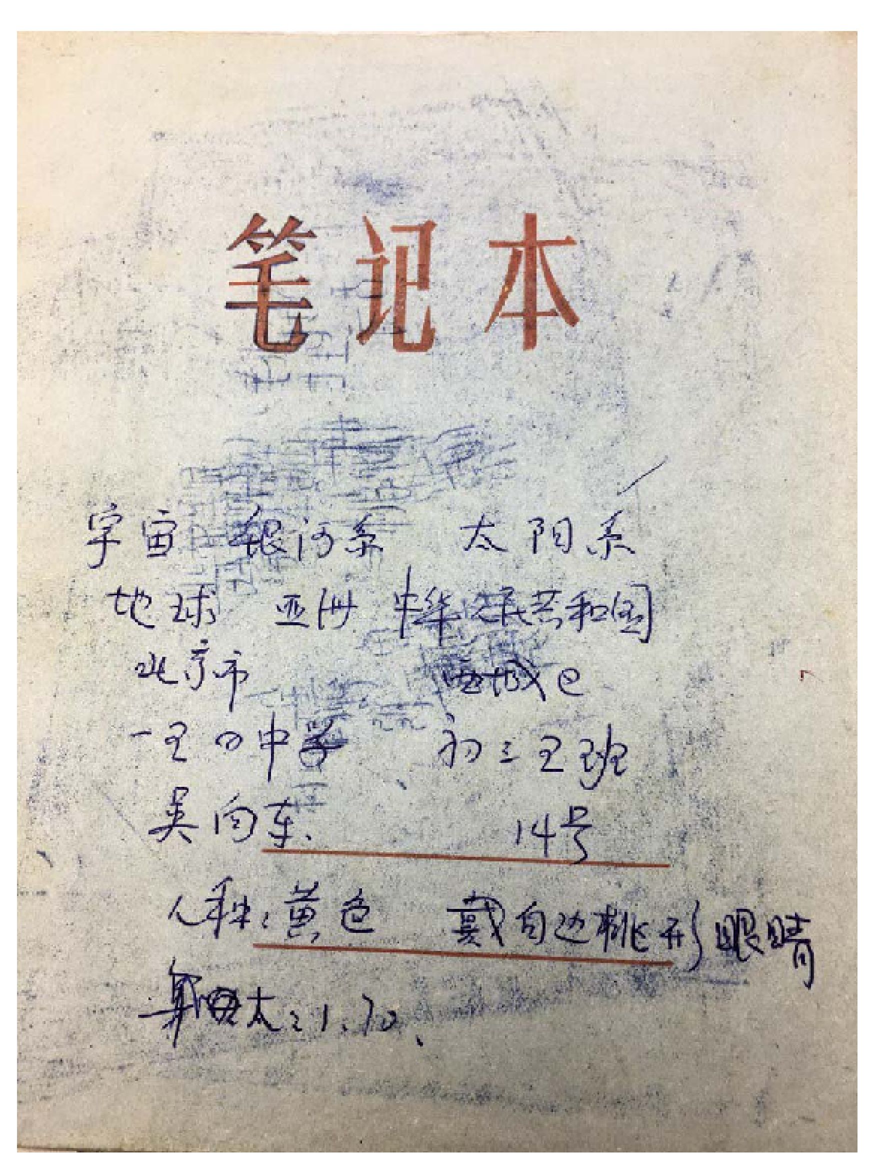
*《5月35日》劇照。攝影：Cheung Chi Wai*



*《5月35日》編劇莊梅岩。攝：林振東/端傳媒*



*《5月35日》劇照。攝影：Kit Chan*




*六四紀念館的遺物。圖：六四舞台提供。*



*《5月35日》劇照。攝影：Kit Chan*

空由黃金泛紅，逐漸走進暗黑一片。攝：林振東/端傳媒



*《5月35日》導演李鎮洲。攝：林振東/端傳媒*



*《5月35日》導演李鎮洲與編劇莊梅岩在何文田一幢民居的天台上，天空由黃金泛紅，逐漸走進暗黑一片。攝：林振東/端傳媒*

# 【書摘】程翔：天安門屠殺促進蘇東集團解體

2019-05-26

【編者按】本文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一書節選，作者為《文匯報》原副總編輯程翔。該書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編輯委員會合編。一班曾採訪八九民運的記者發起「我是記者－六四30」項目，將當日所見所聞、日後所思所感，再做一次紀錄，公諸於世，以為歷史見證。端傳媒經作者授權刊發本文，以饗讀者。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屠城30周年，也是「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當年很多人的心情都經歷了從6月時對中國的傷感、沮喪和憤怒，轉到11月時對德國變天的歡呼、振奮和鼓舞。北京和柏林雖然相隔七千多公里，但直覺告訴我，這兩件大事必然有其內在的關聯（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所以我同當年的朋友互勉：不要悲傷，雖然天安門前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但天安門的精神卻在遙遠的柏林開花結果。

雖然有這個直覺，但作為一個記者，我有必要去尋找相關的證據。所以我在2009年趁德國政府舉辦「慶祝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的盛大慶典時，走訪柏林及前蘇聯和前東歐等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探索天安門屠殺和柏林牆倒塌的關係。

在柏林，當我問德國朋友圍牆是如何倒下的？他們指我到萊比錫。原來，柏林圍牆的倒塌，其壓力的發源地不在柏林，而是遠在150公里以外的萊比錫。對我來說，萊比錫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基督新教（Protestant）的誕生，就是源於1519年7月，馬丁·路德在萊比錫參加一次反對羅馬教廷的大辯論（即 Leipziger Disputation），質疑羅馬教廷一系列政策，包括煉獄、銷售贖罪券、告解的必要性和方法，以及教宗權威的合法性。

另一件同萊比錫有關的歷史事件，1842年12月，普魯士查禁《萊比錫總彙報》，馬克思針對這件事在《萊茵報》寫了七篇文章，抗議專制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偏偏今天中共嚴禁新聞言論自由，實在有辱師門）。無獨有偶，這兩件歷史事件都是同爭取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自由有關。看來爭取自由成為萊比錫的歷史傳統。

原來當年在萊比錫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的周一祈禱會（Monday Prayer）爆發出來的壓力，最終導致柏林圍牆倒塌。這說起來如同天方夜譚，但奇跡就是這樣發生。當然，從萊比錫的祈禱會開始到柏林圍牆的最終倒塌，中間還要經歷一系列的事件才能大功告成。但是如果我們略去其詳情及細節，則可以毫不懷疑地說，萊比錫的祈禱會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

那麼萊比錫的祈禱會為何就能夠產生這麼大的力量、去影響全國以至最終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這就要談到天安門屠城的影響：一方面，

東德人民從天安門民眾的英勇中（特別是坦克人）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天安門的殘酷和慘烈也震懾了東德的當權者，使他們不敢貿然開槍。

如果我們略去細節，則歷史的大脈絡是很清晰的，天安門的屠殺的確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這個過程可以簡述如下：

自從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戈巴卓夫、戈巴契夫）在1985年上臺後，他積極推動蘇聯版本的改革開放政策（Glasnost and Perestroika），於是整個蘇聯東歐集團自1986年開始，普遍產生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從1986-89年間這些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爭取民主自由的活動。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大氣候」。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觸發大規模學生運動。五月戈爾巴喬夫訪華，目睹天安門的和平民主抗議浪潮深受感動，同情學生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給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

- 6月4日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鄧小平所說的「小氣候」），中共殘酷鎮壓民主運動。通過西德電視台轉發的電視訊息，東德人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人民勇敢抗擊暴政的畫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坦克人」。

- 6月5日，萊比錫第一次舉辦了有關中國「六四事件」的示威活動。
- 6月25日萊比錫市中心尼古拉教堂（Nikolai Church）牧師克里斯提安·富勒 (Pastor Christian Fuhrer)舉行和平崇拜抗議中共屠殺人民。這位富勒牧師就是後來在整個萊比錫抗暴運動中的一個關鍵的領導角色。通過集會，群眾本來已經對東德當局不滿，更藉機提出各種民主自由的訴求。在富勒牧師領導下，萊比錫的抗議活動迅速遍及全東德。

- 6月8日東德議會對中共屠城表示理解和支持。10月1日東德共產黨內定接班人克倫茨（Egon Krenz）訪華慶祝中共建政40周年，他代表東德公開支持中共的暴行。

- 10月6日東德慶祝建政40周年，在此時刻東德共產黨迎接中共副總理姚依林。姚向當局傳授天安門經驗，東德共黨領袖昂納克再度發表聲明支持中共的鎮壓。在會見姚依林時，昂納克說：「有充分證據證明帝國主義的階級壓迫者正採取具侵略性的反社會主義行動來達到扭轉社會主義發展的目的。」他強調，「在這情形下，我們可以從北京的反革命騷亂中學到一個帶有根本性意義的教訓。」（英文：In this respec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lesson to be learned from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unrest in Beijing）。昂納克此言被解讀為可能效法中共的鎮

壓。從此萊比錫天空出現當局擬以「天安門模式」來鎮壓群眾集會的陰霾。

- 事實上為維護政權，「中國模式」已經進入東德當局的思維，東德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局（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 Wolf）已經接到昂納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他發出了動員令：「同志們，從今天起這就是階級戰爭……今天就將決定階級戰爭的結果，獲勝方要麼是他們，要麼是我們。所以要保持階級警覺。如果棍子不夠好用，那就用槍。（如果兒童在抗議人群中）那是他們活該。我們有槍，我們有後盾。」沃爾夫為此做了一個極為清晰明確的判斷，這道命令一旦執行，「後果可能比北京的更嚴重」。

- 東德當局確實做了準備以「天安門模式」來處理萊比錫的群眾集會。他們向示威者說：「不要忘記天安門」，暗示當局可能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但是在富勒牧師領導下，群眾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模式來面對東德的軍警，他們也同樣對當局說：「不要忘記天安門」，警告當局不要重蹈中共的覆轍。德國電視台一篇評論說：「中國為支援民主的抗議活動給東德既帶來希望，也帶來恐懼」（China's pro-democracy protests struck hope and fear in East Germany）說明

同樣一句「不要忘記天安門」，既表明當局的殘暴本質，也表明人民的抗暴決心。

- 在東德民主浪潮期間，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華沙條約國會議時宣布，「每個國家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這表示蘇聯將不會以軍事力量干預華沙條約國的改革訴求。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宣布，表明蘇聯改變政策了，不再像1953年、1956年、1968年那樣直接鎮壓東歐國家的和平抗議活動了。戈爾巴喬夫還敦促東德領袖昂納克盡早改革，他在那時說了一句名言：「生活將懲罰那些遲到的人」！

- 10月23日萊比錫30萬民眾示威（東德歷史上最大規模），當局已經做好血腥鎮壓的準備，但民眾警告克蘭茲不要忘記天安門事件。他們高呼：「克蘭茲，不要輕舉妄動，我們不會忘記中國和員警鎮壓」。民眾的勇敢和無懼終於迫使當局放棄鎮壓措施。

- 我採訪時，翻看紀錄，知道當年他們步出教會時所呼叫的口號是：「記著天安門！記著天安門！」。民眾高呼「記著天安門」是在警告東德秘密員警，若他們動手的話，便會發生另一件「天安門事件」。在群眾大聲呼喊下，東歐的秘密員警也不敢導演另一場「天安門事件」。當時有記者問他們：「為何你

們會這樣勇敢，不感到害怕？」他們就舉出「坦克人」那幅圖畫，他們說：「中國人這幅畫深深的感動我們。」這段對話，也紀錄在歷史資料中。

- 萊比錫民眾的勝利鼓舞了全東德的抗爭活動。在運動中新成立的團體「萊比錫新論壇」對該市連續的星期一遊行作出這樣的總結：「在這裡，東德市民學會站起來走路。示威者要求的是讓人民重拾尊嚴。難以置信的是沒有人提出物質要求，他們要的是公民權利和人權」。這個組織的出現，是抗爭運動從萊比錫擴散到全國的關鍵組織，也是從推倒柏林圍牆到東西德統一的關鍵組織。

- 11月4日，首都柏林在舉行了50萬人大示威要求新聞、言論和集會自由。集會中著名作家 Christopher Hein 讚揚：「萊比錫：英雄城市」。他說：「不要忘記誰首先擊潰令人窒息的體制，並結束理性的沉睡」。

- 在抗議運動遍佈全國的情況下，11月7日整個東德政府內閣宣布總辭。11月8日德國統一社會黨（即東德共產黨）宣布政治局集體辭職。

- 11月9日東德政府宣布人民可以自由出國旅行，當晚東德群眾越過柏林圍牆進入西柏林，標誌著柏林圍牆的倒塌。

所以，天安門鎮壓與柏林倒牆的關聯可以以此來表述： 天安門中國人民的英勇 –> 激勵了萊比錫人民抗暴的決心 –> 萊比錫人民粉粹當局的鎮壓計劃變相鼓勵了全國的抗爭運動 –> 全國抗議迫使當局總辭並廢除出國禁令 –> 人民越過柏林圍牆逃到西柏林 –> 柏林圍牆實質被推翻。

作家北明在其長篇記載《萊比錫的燭光—柏林牆的坍塌》一文中有一個標題，我覺得十分貼切，故引用於此來作為本文的總結：

「中國失敗的鮮血催開歐洲自由花朵」

（程翔，1981-1987年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1987-1989年任《文匯報》副總編輯。）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屠城30周年，也是「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北京和柏林雖然相隔七千多公里，但直覺告訴我，這兩件大事必然有其內在的關聯，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攝：Jacques Langevin/Sygma via Getty Images*




**《我是記者—六四印記：六十名新聞工作者著述》**

出品方：《我是記者—六四印記》編輯委員會

出版日期：2019/06




*東德軍警向示威者說：「不要忘記天安門」，暗示當局可能採取血腥手段鎮壓萊比錫的群眾集會。但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模式來面對東德的軍警群眾，同樣對當局說：「不要忘記天安門」。攝：Bernard Bisson/Sygma via Getty Images*

# 【書摘】《重返天安門》：八九民運成都現場紀實

特約撰稿人 林慕蓮|2019-06-02

編者按：本文是《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第八章的節錄。作者林慕蓮藉著採訪親歷八九民運的諸多當事人，重建許多運動期間的重要史實。特別是本文所節錄在成都發生的民運和鎮壓，由於遠離北京，留下的可信史料一直很有限。林慕蓮訪問多位當時在成都的外國商人、遊客、外交官以及當地民眾，補起了一段巨大的歷史空白。

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覺醒來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煙的公車，現場出奇地安靜。而且唯獨只有國家的財產遭遇攻擊，政府大樓的每一塊玻璃都被打碎，而旁邊的私人企業則毫髮無傷。現場沒有警察出現。就連交通號誌也停擺了，就好像政府一夕之間突然從公共生活中完全消失一樣。當太陽升起之後，街道上擠滿了人，一開始是好奇的路人在拍攝殘骸的照片，然後漸漸地聚集了越來越多的抗議者。

政府當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國電報指出，武警部隊的人數遠遠不及民眾人數，他們為確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

市政府大樓。每一次武裝部隊試圖出擊的時候，都因驚人的群眾數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爾向人群投擲幾顆煙霧彈。

六月五日晚上，通往毛澤東雕像的人民路上再次擠滿了抗議群眾。晚上九點左右，金．奈嘉德和人群在一起。正當她與其他歐洲旅客在交換各自這幾天經歷的故事時，他們聽到一聲爆炸聲，奈嘉德認為是槍聲。「人們開始尖叫，開始跑動。那條路上所有人都開始朝遠離毛澤東雕像的方向跑，當然我們也開始跑。」她回憶道。他們跑回自己下榻的飯店——錦江賓館，那裡也是美國領事館的所在地。但不久之後，飯店的警衛就關閉了大門，將尋求避難的人群拒之門外。奈嘉德憂心如焚，擔心外面的人會被逼進的武警部隊殺害。她拜託警衛讓更多人進來，但警衛拒絕了，並命令她回自己的房間。她從走廊的窗戶觀察情勢，發現恐慌的群眾變得越來越具攻擊性。頃刻間，群眾開始猛烈敲擊飯店的大門。她聽到樓下大廳玻璃破碎的聲音，她害怕飯店可能會被燒為平地，於是決定向美國駐成都總領事尋求庇護，魏然的辦公區就在飯店後面。

她發現那裡已經聚集了十五名西方人，他們用家具堵住門，並在浴缸裡注滿了水。外面傳來一陣嘈雜的噪音，被困住的外國人爬到陽台上看看外頭發生的事。同時屋內庫特．懷爾（Kurt Weill）《三便士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的音樂震耳欲聾，讓奈嘉德覺得自己彷彿置身於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的電影中，有種超現實的感

覺。她聽到魏然告訴駐北京大使館，成都領事館被包圍了。魏然在電話裡說：「這裡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警察的影子。」在一份解密的國務院電報中也提及這通電話。美國外交官還報告，許多工人舉行了罷工，而且暴動造成的死亡人數還在持續攀升中。

對魏然來說，庇護外國同胞的行為也曾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讓人想起了1900年北京的「八國聯軍之役」。當年北京爆發一場名為「義和團」的反洋人、反基督教運動，叛亂份子將九百名外國人士和兩千多名中國基督徒圍困在北京使館區，時間長達五十五天。他對我說：「我當時想像使館區被包圍，我們吃驢肉喝香檳——除了我們既沒有驢肉也沒有香檳，也許有幾瓶香檳。」最終，他只是庇護了其他外籍人士幾個小時的時間，在判斷情況還算安全之後，就讓他們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事實上，無論是外籍人士抑或美國領事館，都不是群眾襲擊飯店的目標。翌日，魏然在電報上說，有傳言稱當晚還會有更多攻擊發生，他說，「這些攻擊事件似乎再次跟領事館本身無關，也不是對外國人有不滿情緒，但與這些飯店的進口香菸、啤酒和白酒的存貨有關。」第二晚的攻擊行動並未如期發生。但其它外籍人士認為，許多中國年輕人面臨了嚴重通膨和經濟困難的問題，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把這些東西當作目標；說到底，這些官員拿來招待親信的時髦國營飯

店，就是腐敗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象徵，而這正是北京和成都抗議活動的引爆點。

與此同時，在飯店的另一邊，抵達的武警部隊以殘酷的方式恢復了秩序，他們在飯店院子裡圍捕了數十名抗議人士。一名西方遊客在電子郵件上描述了她從五樓陽台上看到的情況。這名女士因為還要跟中國打交道，所以要求匿名。她看到了大約二十五個人跪在院子裡，頭朝下，雙手綁在背後。他們先是被推倒在地，然後衛兵圍著他們走來走去將近一個多小時。最後，指令下來了。這時「穿黑褲子白襯衫的人上來用鐵棍把那些人的腦袋敲碎。」現場的慘狀令人作嘔，她嚇得在浴室嘔吐。幾天後，她逃離了中國。後來她告訴一家北歐的報紙，「他們一個人一個人地殺，那些還活著的人不斷哀求他們給一條生路。」

那些躲在魏然辦公區的人，全然不知飯店另一頭發生的事。不過在魏然宣布當局已控制住情勢之後，一些人在回自己房間的途中仍瞥見了慘案的部分場景。目擊者包含一名原先在上海學中文的年輕奧地利人珍．布里克（Jean Brick），她剛好在那天抵達成都，因為她非常想了解在成都發生的事。當天早些時候，她從火車站走到飯店的路上遇到一群當地人，他們氣沖沖地說，前一天有四十人到七十人被打死，其中包括那名被盛怒的群眾殺死的警察。

從魏然那裡返回自己的房間時，布里克目擊到一群囚犯的處境，這群人被關在大門旁邊的一間小警衛室裡。她在給國際特赦組織的證詞中描述了事情的經過，「抗議的人一個一個被拖出警衛室。士兵們圍成一個圈，人挨人。圈子中間有幾個士兵用棍棒打那些抗議的人。打完之後，那些人被抬或拖回警衛室。完全無法判斷那些人是否還活著。」即使過了二十五年，每當她憶起那些場景時，那些場景一直都以黑白的形式呈現，所有的顏色都被過濾掉了。「當時心理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創傷，」她告訴我，「它就像一部黑白電影在我腦中，沒有色彩，讓我稍微好受一點兒。」

她還記得有看到警察躲在路旁的灌木叢或梧桐樹後面，然後突然跳出來抓住不知情的路人，這些路人遭到毆打，隨後被帶回警衛室。清晨的時候，她看著武警把他們毆打的那些人拖出警衛室。「沒有一個能走路的，全都沒有知覺，」布里克告訴國際特赦組織。「我不知道有多少被捕被打的，因為我沒有一直在看，而且我當時也很絕望。」

當金．奈嘉德從領事處回到她的房間時，她從窗外看到一個奇怪的景象。在昏黃的燈光下，一堆堆沙袋疊放在飯店的院子裡。她還在納悶那些沙袋是做什麼用途時，突然注意到有一個沙袋在動。她不寒而慄地意識到，沙袋裡裝的其實是躺在地上的人，他們手被綑綁在身後。她僵在原地，看著武警將其中一名囚犯的手臂捆在背後。「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當時我在想，『天吶，他們那樣做會把那些人的胳膊弄

斷的！』很明顯那完全是故意把人弄殘的。」她告訴我，「現在想起來還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難受。你知道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你卻在旁觀。當時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一定要留下來做見證。」最後，她被一名站在身後的中國警衛強行送回房間。

但在此之前，她先看到兩輛卡車駛入，武警人員開始裝載那些人體。「他們把人扔進卡車裡，就像在扔垃圾，」奈嘉德說，「我不記得還有人尖叫。沒有任何聲響，只有人摞在人身上的聲音。肯定有死掉的人。即便有人還活著，他們也不可能在人堆中存活。太恐怖了。」

另外四名目擊者也描述了同樣的場景。珍．布里克說，這些人體被吊上卡車，「就好像他們是一塊塊的肉。」五樓的西方遊客寫信給我說，「我太震驚了……他們把人扔進卡車，就像在扔大袋的馬鈴薯。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都被打死了，但很多肯定是死了。腦漿流到地上，我覺得這種情況人不可能存活。。」另一位目擊證人在話語中多次使用「屠體」（carcasses）這個詞來形容那些卡車上的軀體，但他謹慎地說，自己並沒有看到任何表明這些囚犯已經死亡的跡象。最後一名目擊者則在證詞中直截了當地說，「被那樣對待的人不可能還活著。」他們看到被扔進卡車的屍體數量，估計大約落在二十五到一百具之間。

至於那些被毆打者的身分，除了他們的衣著，幾乎沒有其他什麼線索。一些人戴著學生用的白色頭巾。其他人則像工人一樣，穿著白襯衫和海軍藍的褲子。大清早卡車開走之後，珍．布里克走到前門，看見地上遺留了三十到四十雙的塑膠夾腳拖鞋，就是工人、農民和無業遊民經常穿的那種拖鞋。

美國外交官對這些拘留的情況是知情的。他們在一份電報中描述的狀況與那些目擊證人提過的類似；當時有兩百名戴著頭盔的人民武警部隊和五十至七十名的便衣警察部屬在錦江賓館。一個小時之內，他們恢復了旅館院區到對街岷山飯店區域的秩序，逮捕了「大約三十名在外面或院子裡捕獲的搶劫犯。飯店警衛一一確認這些人的身分。這些被拘留者被迫身體曲前地跪在地上一個多小時，然後他們的手被反綁在背後，臉朝下，直直地被人往地上推倒。後來他們被扔到人民武警部隊的卡車上載走。」電報中沒有提及暴力事件，可能因為發報者覺得大使館的通訊不夠安全。

為了尋求證據，我轉而去找中國的官方消息來源。在《成都騷亂事件始末》中，有一段提到了拘留事件。書中提到，當武警抵達飯店時，「暴徒」已經砸碎了大廳裡的一些大花瓶，以及飯店大廳商店裡昂貴的燈具、玻璃門和玻璃窗。一個布告欄和地毯著了火。這段資料描述了「經過半小時的戰鬥，他們在現場拘留了七十名暴徒。」至於官方的暴行，《四川日報》則以讚許的口吻提到，「六月六日清晨五點，

一群暴徒在案發現場被捕獲，其中一名暴徒持鐵棍瘋狂反抗。他被我們現場的準軍事警察襲擊並打傷，此舉重挫了暴徒的傲慢。」據另一份官方報導的說法，住在旅館的外國人很高興看到武警恢復了秩序，他們「熱淚」盈眶表示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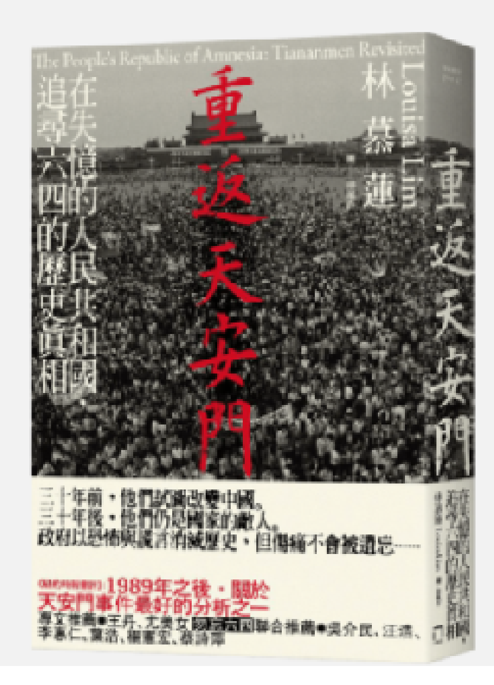
在美國領事館避難的那些外國人沒看到暴力事件，不過第二天就有人告知他們了。其中一人是奧地利人類學教授卡爾．胡特爾（Karl Hutterer），他在離開中國後向《紐約時報》投書。刊登出來的文章標題為〈成都有自己的天安門大屠殺〉。他指出，控制示威者並不是政府的主要目的，因為「受害者即使已經倒在地上，仍然遭到毆打，並被軍人踐踏；醫院被禁止接收受傷的學生（至少有一家醫院的一些員工因違抗命令而被逮捕），在暴力鎮壓發生的第二天晚上，警察還阻止救護車值勤。」胡特爾堅信，武警的行動是為了消滅學生運動。他同時對旅館遭自發群眾襲擊的事件存疑。他指出，幾個小時前，飯店工作人員曾警告住在那裡的一些外國人說，旅館將受到攻擊。在投書文章中，胡特爾譴責美國官方「謹慎批評」的立場是不夠的。

各方估計的死亡人數差異很大；美國外交官認為，成都的動亂共造成十到三十人死亡，受傷人數高達三百人。胡特爾則估計有三百人死亡，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也是這個數字。報告還指控，相關單位下令秘密處決異議份子，並監禁了全國約一萬名與抗議活動有關的人士。中國否認了所有的指控，稱這些指控「毫無根據，毫無道理」。

在暴亂發生後的接下來幾天，成都政府採取了迅速而嚴厲的報復行動。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內就執行了第一場處決，受刑者是兩名被控縱火焚燒車輛的農民。至少有三人因「肆無忌憚地打、砸、搶、燒」被處決，還有一人因翻倒一輛吉普車並縱火而被處死。還有三名被控縱火、搶劫和擾亂治安的人，分別處以無期徒刑。成都從未出動解放軍。但警察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聯手鎮壓抗議，使得公眾對其的敵意非常強烈，以至於有段時間一些警察不在公開場合穿制服。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發生響應北京民運的學生示威同樣遭到軍隊武力鎮壓。攝：AFP/Getty Images*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作者：林慕蓮( Louisa Lim )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9/05/08

*八旗文化提供*

# 8本六四文學書：廣場和燭火就是理所當然的救贖嗎？

特約撰稿人 關天林|2019-05-26

從文學閱讀六四，意味著回到個體的擔荷，回到經驗的錯綜及其表達的純粹，回到那個並沒有結束的夜，和更多消亡又接續的黎明。紀念難免抽象，當歷史的證辭欠缺想像的洞察和開闊的叩問，希望和絕望也容易流於空洞，當我們把廣場和燭火視作理所當然的救贖。在尋覓答案、塑造角色和意象的夜路上，以下文學書籍的作者和編者均展開了理解、思考六四的更多不同角度。

**01 誰能回避「自由」：《廣場》**

廣場備受忽略，廣場揮之不去，但廣場的雨「沒有發出一點足音就潤濕了整個廣場」。

在陳寶珍這部以回歸前夕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裡，位處城市邊緣的廣場串連了一些角色的悲歡，但這種串連是若即若離的，就像那些角色對待政治的態度，不分階層、身份，都在投入定期集會與日常煩惱之間度日，為各自的前途盤算、競爭，然而，他 / 她們最終也回避不了

「自由」這個命題。陳寶珍尤著意刻畫幾位女性角色的困境。她們的掙扎以至自我的追索，和那座在故事後段，由一心想警醒世人的男藝術家豎立在廣場的「死亡之塔」相比，就像路人在雨中狼狽地穿過，算不上壯舉，但她們也同時站到了那片屬於自己的廣場的中央，掌管自身的脆弱和嚮往，拒絕外來的界定與救贖。

廣場不怕冷清，卻怕成為權力的工具。作者在後記說她的恐懼與思考來自一個「壓」字。的確，對勇氣、自由的碾壓無處不在，時至今日，所謂鎮壓已變為技術更精密的滲透內化，「一片虛構的廣場是否可以提供一點思想的空間？」作者在開首刻意強調「不是天安門廣場」固然是為了把關注拉到香港，也明顯有從歷史事件的關注拉到切身現實的用意（畢竟那城市沒有命名為香港，而可以是任何一個處於強權牽連範圍的城市）。在這部小說裡，廣場其實沒有成為象徵，也沒有單純作為精神遺產來接收——廣場是一個問題，不管你知不知道、在不在意它的存在。

**02 我只怕對不起我的苦難：《瘋狂》**

一個知識分子的瘋狂更令人不安，卻可能是自我救贖的掙扎。

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哈金，當年很大程度是因為六四，才決定留在美國，並改以英文寫作。與《等待》、《新郎》相比，《瘋狂》沒那

麼著名，卻可算是哈金最早的一本小說，在1988年就動筆，取材自他仍在中國讀書時照顧一名中風教授的經歷，一年後天安門屠城，深受震撼的他決心把事件也寫進去。小說的主線很簡單：愈接近六四，中風後的楊教授愈瘋狂，他偶然吐露至理名言，同時夾雜著絕望的懺悔，關於知識分子的失位、墮落。他更自揭家醜，卸下心防也卸下學養，讓他的親友蒙羞，讓他在升學路前徬徨的學生萬堅，也就是小說的主角，震驚繼而窘迫地反思。最終，個人的感情危機和上一代人遺留的創痕驅使他半夢半醒地赴身局勢逐漸失控的北京。

哈金不僅以楊教授的崩潰點出了八十年代民主運動背後，知識分子自我拷問的精神譜系：歷劫的尊嚴在龐大的體制之前如何安放？偶然清醒的楊教授把這句話噙在嘴邊，像道救命符：「我只怕對不起我的苦難」，但更多時候就在背誦但丁《神曲》、唱革命歌曲，甚至像孩子那樣懇求自己的學生「救救我的靈魂」。而當六四，以至當六四後的麻木與虛偽招來更多劫灰，我們該如何面對新的凶暴和自身的脆弱？

**03 迷霧中投石：《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

以《沒島戀曲》寫佔領中環的陳寶珣，六四時就在現場，他是記者，回港後不到一年就發表了這篇小說，但直到黃傘也已斂收的2016年才出版。香港人已經歷過兩次政治運動的洗禮，由彼方到此地，這個歷史時機，的確耐人尋味。

小說並不如書名那樣具攻擊性，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視或犬儒式的訓誨，記者的身段在小說中有充分的體現：冷靜，並且盡量平等地呈現不同涉事者的聲貌。事發數月，這些與事件擁有不同距離的角色，或一頭栽進某種情緒，或急於下結論，或保持孤獨的思考，或尋找抽離之法，作者潛行於時而相碰、但大多各自封閉的心靈間，最突出的姿態是不去掌控，容讓人物的牽引折射，於是小說既達致一定程度的報導實感，又向願意深思的讀者開放。戲分最多的是車段長和幹部之子，前者曾走在最前線，劫後餘生，換了一副沉潛的面貌，作為開始反思的工人階級，工廠環境只是與他更格格不入，至於幹部之子，事發時在巴黎，他無法舒適地浪漫化，卻只能抽離地想像，並自以為與車段長是氣質相通的伙伴。這個角色設定無疑有助把思考的可能、理性的可能這命題更尖銳地提出來。而我們也可從中見到，在那段日子的低氣壓下，實際的行動雖然退隱，心靈事件仍在持續發酵。故事的尾聲傳來羅馬尼亞革命成功的消息，現在聽來就像迷霧中投石的遙遠回音。

**04 見證沒有終點：《六四詩選》**

詩人孟浪離開我們時，留下他銘刻般的對反抗地活著的謳歌、對未來真理的證辭，也留下這部堅實的詩選。

詩選收錄了從1989年到2014年初，近四分一世紀為六四而寫的詩作，其中的作者來自兩岸三地，年歲橫跨五六十載，從廣度來看，可說是承載著超越時空的見證力量，密度上則同時展現著由豐富的見證路徑構成的版圖。見證是重要的，因為它沒有必然的終點。不該遺忘的需要挖掘，證辭及其背後的信念更在交相傳遞觸發中愈見鮮明，這就是孟浪重視詩的原因，詩總在超越單一的事件、記憶而帶來更多詩的發生。孟浪這次編集，並不是因為六四作為重要歷史事件被遺忘，而是文學作為六四精神向度被忽略了，他要告訴我們某種歷史詩學已建構起來。

在序中，孟浪用「迎臨」一詞指涉詩人的體驗，而在一百位入選者裡，他舉出的核心詩人，便可說是迎臨震盪最深切、開挖自我與歷史的對話空間最有力者，包括創作不輟的廖偉棠、陳家坪、蔣浩等，但沒有明說而分別編入首輯和尾輯的劉霞的兩首詩，卻是暗中迎臨著整個深淵的一根弦，拉出的不是闊度，而是震顫的重低音。另外，這部詩選除了挖掘了一些未發表的作品，也在年代的分輯中讓我們看到某些持續寫作者的變化，如殷龍龍的鋪開、顏峻的凝練。呼喊未必就是力量，正如孟浪坦言最早的六四詩選都未及沉澱，我們也不能忽視相對冷靜抽離的寫法，如周佑倫〈想像大鳥〉的抽象哲思，宇向〈取義波蘭〉的客觀，都有獨特的洞察。第一輯所收錄的非常接近現場的抒發固然重要，屬於時刻發光的經驗底層，但新一代、八九十後的詩

人，也不一定遠離事件，如申屠嘉、唐不遇，便發出了清晰的聲音。對孟浪來說，最重要的始終不是多少詩被寫過，而是詩將會繼續寫下去。

**05 由支援到成為主體：《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

詩選的名字來自一場紀念六四20周年的朗誦會，編者序裡提到，故意在沉重的黑夜後面加一個頓挫，「持守對黎明的期待」。

編選上，這部以香港詩人為主體的詩選，較強調距離的作用，除了收錄作品時詳近略遠，不按年月而按主題分輯，也看出對六四作為持續激盪的漣漪，如何激發不同層次回響的見地。第一輯突顯時間性，回到現場的直接反應，其他六輯都是傷痕和思考的深化、延伸，但距離不表示定型和旁觀，而是更多進入事件複雜性的角度。正如編者所指出的，維園一年一度的燭光晚會早已成為節日般的存在，在北京發生的六四被香港傳承為本土事件，香港人也從支援民運的角色變成執著的主體。要是不執著，滲透到日常生活器物層面的真理追問，以至其他異議命題的轉化，又將如何可能？以主題分輯，容有含糊之處，但以香港在歷史和地理的曖昧位置承受的六四卻注定是更流動的，與其簡化或求精準，倒不如像面對未經打磨的晶體那樣切出多一些斜面。

廣場、維園、青年、母親，固然是貫穿其間的主題和意象，但還有一些未必那麼宏大卻鮮活的意象，體現了不同香港詩人的獨特的觀照，如飲江〈破鏡〉以節奏形式的破碎演出見證的艱難，也斯以〈家具〉的古典家具的虛飾隱喻民族的噤聲，西西在〈凱撒的作品〉漫談尖沙咀海傍折翼天使雕像的命運，廖偉棠為哀悼八九死者而重寫〈錄鬼簿〉，諸如此類，都足以擴充毋忘六四的文學光譜，足以在待旦時刻以光澆灌「死者的記憶／夜的知識」（北島〈紀念日〉）。

**06 每一點微光：《燃燈者》**

由一個人的燃燈者，到時代的燃燈者。燃燈的意義，畢竟不獨在於照亮黑暗，也在於爝火不息。紀念可以是一種守護，守候也是為了傳續。趙越勝這部回憶錄回想了他與三個人的緣份，他們在不同時代環境有所持守、行動的精神啟發了他、導引著他，而他也因為以回憶點燃他們在黑暗中愈發清晰的身影，而真正成為跨時代的同行者。

周輔成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卻與趙越勝識於文革的苦難尾聲，呈現在作者面前的，仍然是愛知求真的勇者，1991年他寄信給已流亡海外的作者，當中的反省足見一股清明的心、純真的勇氣：「過去我們對這個世界沒有好好地愛它，讓它少受陰影的干擾，有負於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竟然也隨著陰影活動，作了它的順民、奴隸、幫凶」，正如他從不以長輩自居，更引作者為同守暗夜的伙

伴。默念「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一代可能稍嫌太樂觀，但作者受用的是由經驗洗煉而來的睿智：「我以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倫理學，首先不是把仁或愛（或利他、自我犧牲等）講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義（或正義、公道等）講清楚」，因為「愛而不公正比沒有愛更可怕、可恨」。風雨未明，又已沉淪，劉賓雁是另一個，而且更走在強權的正前方，以記者見證苦難，甚至主動擔起他人的生命。趙越勝道出革命語言暴力掌控下語言的無家狀態，而劉賓雁正是以他的言說重新面向真實，把本來空洞的人民，還原為個體，他的荊棘滿途自然是求仁得仁。唐克與作者是同輩，但作者同樣引為導師，只因音樂上的啟蒙，讓他在「只知道政治口號的時候」學會歌唱。

後記引漢娜．阿倫特的話，說照明黑暗時代者，不是理念，而是一個個人的生活與著作。在有權期待照明這件事上，讓我們銘記每一點明滅不定的微光。

**07 什麼是自由、穩定、完整：《媚行者》**

幾乎完全沒有直接描述八九民運，黃碧雲這本小說卻以1989年6月以後「穩定壓倒一切」、「中國才是國家。香港不是」的社會主調為繞不過的背景，反覆追問自由、穩定、完整為何物。

「我們理解自由，總是相對於政治壓迫而言。這是對自由的，最庸俗最淫褻的誤解。」黃碧雲不是從歷史事件發問而走向簡化，而是嘗試回應一個更困難的問題：面對愈來愈多的壓迫與苦難，我們還可以怎樣談論自由？首先，自由是一種困難的選擇。在意外中失去左腿的趙眉問她的醫生、義肢矯型師和物理治療師：「自由與穩定之間，何者為輕，何者為重。」而被問者本身也受困於不可解的打擊，於是提問形同拷問，敘述者亦同處於無法回答的平等行列，只能開始去理解，「從腳，理解自由。從破碎，理解完整。失去，理解存在。」甚至理解痊癒和痛一樣殘酷：「猶如骨頭無休止的生長，刺穿組織和皮膚，痊癒多麼邪惡」。事實上，《媚行者》也通過寫作形式理解著自由的可能，繁複蔓生又對位折射的章節，擺明以細微的敘事手勢，對抗著、拆解著恢宏視角，以便重新貼近個體生活的疼痛與忘失。跳舞的黃碧雲大概最能理解自由，最初就是一種輕省、回旋，腳步的躍現，不是旋律，更沒有成為集體的重苛，體制的目標。小說後半部跳接於客家人的流徙和巴爾幹半島上比人的生命還長的戰爭，吉卜賽的媚行者形象在歷史與自由的空場上躍現，她們不問，她們只與生活搏鬥，與命運對抗，最重要的是憑意志保持展開，接受生命的召喚，即使熱情和痛苦釋放後也會遺忘。流血辜負以後，我們還是可以理解那個最初：自己渴望的、追求的心，為之犧牲、流徙的心是甚麼？這是自由。「人民會忘記。人民為甚麼不可以忘記。如果不可以忘記，實在太可怕了。」這也是自由。

**08 不會畫鳥的樹：《劉霞詩選》**

廖亦武在序中特別指出鳥和樹的意象，而我們看到〈一隻鳥又一隻鳥〉這首1983年的詩確實觸目驚心，因其彌漫著生活就是緩慢行進的悲劇的沉抑氣氛，但之後的六四屠殺和接踵而來的憂患困厄卻為劉霞的生活與詩蒙上真實的陰影：「誰也看不見走在街角的你／眼睛裡飛翔著一隻鳥／一顆青果倒在無葉的樹上／經歷了秋天的那個早晨／它拒絕成熟／／一個目光炯炯的女人／開始夜以繼日地書寫／連綿不斷的癔語／鏡中之鳥依然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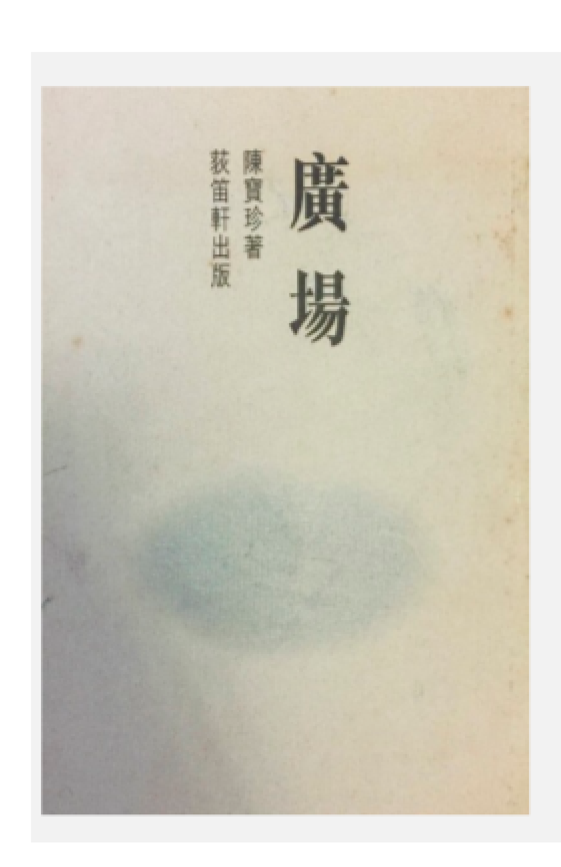
樹是被固定的、徒勞的生命，隨時被閃電摧毀，鳥則是遙不可及的瀟脫自由。我們很容易從樹想到鳥，她卻自比為不會畫鳥的樹。劉霞的詩強烈地表現在一段政治逼害下的不穩定關係中的焦慮徬徨，她向被二十年前的槍聲決定了生命，「愛與亡靈們為伴」、「永遠活在死亡裡」的劉曉波訴說：「你愛你的妻子但更驕傲她與你共度的黑暗時間／你讓她隨心所欲更堅持讓她死後繼續給你寫詩」。她沒有完全絕望，卻剩下令人痛心的掙扎。除了樹和鳥，夜的黑暗、夢的驚醒，以及久坐、枯坐，同樣是反覆出現的景象。她常說「之外」，彷彿一切皆不可把捉，孤立得連一個詞也在窗外，也比她自由。於是她尋找與其他藝術心靈的對話，諸如梵高、卡夫卡、尼金斯基，這些與世格格

不入，卻憑意志超拔的人。我們會覺得談他們的時候她是在滑翔，在休息。

〈呼喊〉一詩令人不安地預言了大廈將傾，「紅色天空下／死亡無可奈何的足音」，當惡夢降臨了十多年，〈從未結束的夜晚〉裡的她仍然必須跟在成群幽靈後面，「百合花也不願令她佇足」。作為倖存者，她無悔但歉疚，且負擔著夜的重量，繼續往前走。當然，詩也承載著她卑微的嚮往：「我想去有光的地方」、「我要緊緊抓住閃光的玉米穗子／這是世上最難的事情之一」。生命很難，詩卻往往寫得簡潔、輕銳。這是她的鳥。




*從文學閱讀六四，意味著回到個體的擔荷，回到經驗的錯綜及其表達的純粹，回到那個並沒有結束的夜，和更多消亡又接續的黎明。攝：Eric Bouvet/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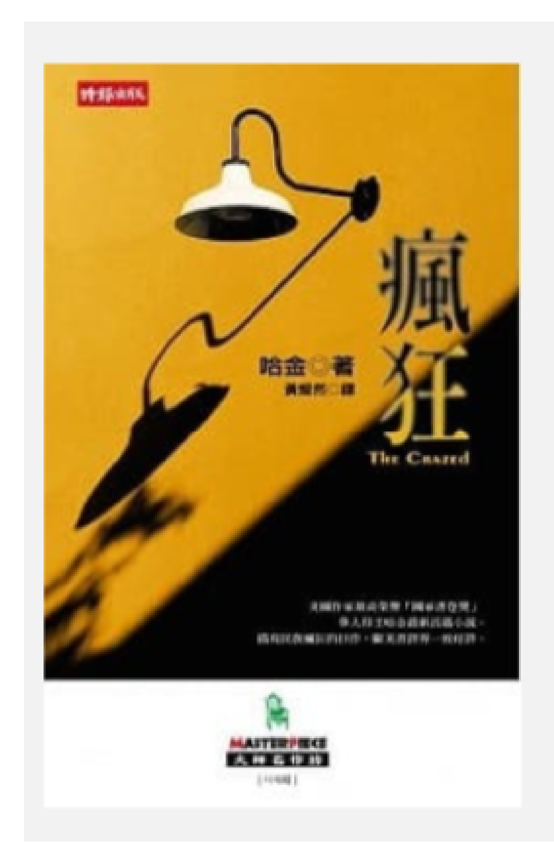



## 《廣場》

陳寶珍 著

荻笛軒（香港）

1997




## 《瘋狂》

哈金 著

時報出版（台灣）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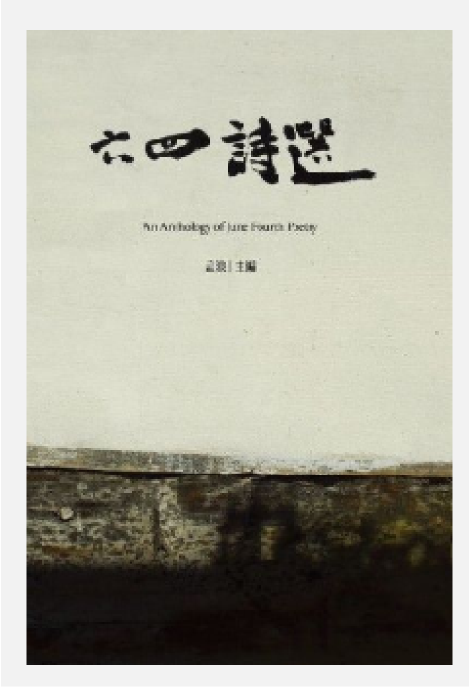



## 《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

陳寶珣 著

文化工房（香港）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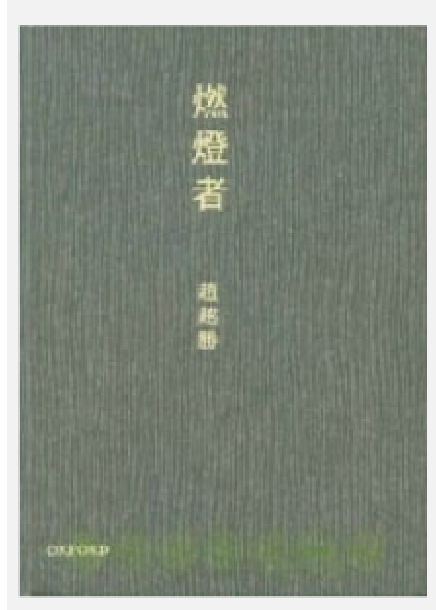

## 《六四詩選》

孟浪 主編

黑眼睛文化（台灣）

2014




## 《燃燈者》

趙越勝 著

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

2010




## 《媚行者》

黃碧雲 著

天地圖書（香港）

2000

劉霞詩選
Liu Xia
Selected Poems
傾向出版社

## 《劉霞詩選》

劉霞 著

傾向出版社

2014

# 英劇《Chimerica》追尋坦克人：討論六四？抑或一場美麗的誤會？

特約撰稿人 甄拔濤|2019-06-01

我仍然記得，當我在倫敦的超市，看到英國《衛報》將那場在2014年9月發生於香港的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命名為「雨傘革命」時，我是何等激動。如果沒有名字，沒有影像，世人是無法談起我們的運動。而「雨傘革命」，又是多麼符合香港、不落俗套。晚上，跟一位定居倫敦的香港人談起，他說，是的，西方媒體很聰明，透過命名及識別運動中的突出人物，攫取大眾的關注。所以，歷經三十年，每當念及六四或天安門民主運動，西方社會仍然會記得那個手提兩個購物袋、擋在坦克面前的男子，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近，英國電視台 Channel 4 便改編了劇場作品《Chimerica》（或可以譯作《中美共同體》)。此劇於2013年5月20日在倫敦 Almeida Theatre首演，由英國編劇露西．柯克伍德 （Lucy Kirkwood）撰寫劇本。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兩位華人演員均為香港移民的後裔。

Benedict Wong 飾演 Zhang Lin，他常常參與電影如《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及《奇異博士》等。 David K.S. Tse飾演 Zhang Wei及 Wang Pengsi，亦曾參與《東京裁判》（Tokyo Trial）等電影。數年前我已讀過這個劇本，執筆前亦再重讀一次。我稍為看了一下電視改編，發現相當跟從原著（電視劇也是由柯克伍德改編），那麼，本文就以劇場版本為據寫成。

## 西方編劇要講中國故事？

故事以一個年輕的美國攝影師 Joe 為主角。1989年六四的時候他19歲，意外地拍攝到坦克人。二十年後，他因採訪而重訪北京，跟生活在中國的朋友 Zhang Lin 閑聊過後，勾起了他尋找坦克人是否在生的慾望。後來Joe 得到消息坦克人身在美國，而他同時也厭倦了報導總統選舉的工作，反而全情投入去尋找坦克人的下落……

西方編劇講一個中國／他者的故事，本身已引起觀眾的疑慮。在此，我想起德國編劇羅蘭．希姆芬尼（Roland Schimmelpfennig）的劇作《金龍》。此劇是關於在德國生活的黑工。希姆芬尼的聰明之處是，首先承認我不可能成為他者（黑工），代他者說話，於是安排年輕演員飾演老人，老人演年輕人，男扮女，女扮男，適度地拉開距離，提醒觀眾編劇不是要代入他者。柯克伍德也很聰明，明知道無論多努力

做研究、資料搜集，她也不可能正面處理天安門民主運動，因此，她借一個美國攝記的眼睛及心路歷程說故事。

於是，整個劇本大部分情節均發生在美國。對編劇來說，這顯然較為駕輕就熟。此外，劇名《中美共同體》也表示了此劇並非代言八九民運，而是意欲昭示中美兩國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一部分，其實是比較深刻的。劇中有這麼一場戲：當 Joe 知道自己工作的美國媒體即將邀請中國公司入股，他質疑他的老闆 Frank。Frank 辯解那是為了公司數以千計的員工保有工作，自己也要支付患白血病的孩子的醫藥費，有些事情（審查）只是副作用。另一場戲：Zhang Lin上網指控中國政府霧霾指數做假，中國政府要求美國電腦系統公司供出 IP 地址，負責人只是稍微反抗了一下便和盤托出，心裡只惦記和情婦的約會。柯克伍德直指中國是如何買起美國（甚至全世界），不知道有沒有觀眾因此如夢初醒。有的話也不錯。

**肥皂劇削弱思考空間**

可是，柯克伍德終究不是希姆芬尼，她採用寫實主義手法，不及《金龍》可以借用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Alienation effect）——即不斷提醒觀眾他們在看戲。而柯克伍德的局限在於，她沒有辦法不直接說中國，戲中有最少三分之一的場景發生在那裡，而她一說中國便露底了。首先，她想講當代中國的問題，但看來都只是從媒體報導獲得資

訊，最後變成大雜薈（血汗工廠等等）。例如，Zhang Lin 的鄰居 Ming Xiaoli 不停咳嗽，編劇以此說明北京的霧霾問題。既不是很有趣，也沒有新鮮角度。另外，一些對話也顯得有點奇怪。譬如，幾個中國人角色都有把毛澤東的「女人能撐起半邊天」掛在嘴邊。現在還有人把它當口頭禪嗎？另有些中國人角色，見面時會互相問候「How are you?」「I am fine.」

上述或許是一些技術性問題。以編劇的視野來審視劇本，會發現柯克伍德無意或無力討論八九民運對中國及世界的歷史意義。整個劇本的主線集中於 Joe 尋找坦克人，過程猶如偵探小說橋段。最後是 Zhang Lin 的錄音告白，原來他就是坦克人。他手上拿著的購物袋，裝載著他剛剛被解放軍槍殺的妻子的遺物。他走到街上擋坦克，正是因為出於一腔憤怒和絕望。所有事情到結局都得到了圓滿解釋，又能給觀眾一點意外驚喜（啊！原來是他……）。不錯是很對觀眾的胃口，但肥皂劇式的結構，大大削弱了本來可以深挖下去的思考空間，也暴露了編劇處理大題目時的有心無力。最重要是，劇作變得庸俗了。

不過若從編劇技藝的角度來看，柯克伍德是相當成熟的。她寫《Chimerica》時才29歲，但在結構、佈局、角色塑造等方面的造詣已遠遠超越她的年紀。全劇最有趣的是戲謔 Joe 這種思慮不足的白人男性。首先，他自陷於中年事業危機（不停質疑美國傳媒的膚淺無聊），又因為罪疚感而想追尋坦克人下落——因為他總覺得自己的照

片連累了他，很想他仍然在生。在過程中，Joe 又因為太天真而連累更多的人：他以坦克人為題目傳電郵給 Zhang Lin，後來成為中國政府捉拿 Zhang 的罪証；Joe 在美國追查到一間水果店，期間發生爭執、鄰居報警，結果水果店的中國人黑工被捕。柯克伍德對大白人男性的批判力度恰到好處，十分準確，看得很過癮。劇本末段，Joe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對！柯克伍德總要在西方社會找一場運動和八九民運並置一下）中，重遇一直若即若離的前女友 Tess。Tess 剛剛中了胡椒噴霧需要幫忙，Joe才發現 Tess 懷了他的孩子，但Tess 拒絕和他繼續關係，Joe 最後仍然不知如何是好。編劇在此再插 Joe 一刀，諷刺他的優柔寡斷，進退失據。意外地，這是全劇最真實、最感動的一幕。

## 英國劇場的策劃及市場定位

看到這裡，可能會問，為什麼不找一個熟悉八九六四的編劇呢？這跟英國劇場的策劃及市場定位有莫大關係。英國觀眾最興趣的是和自己、或遠一點說——西方社會——有切身關係的題材。他們不是不看外國歷史、政治事件，但通常所期望的觀眾數量相對較少。《Chimerica》定位於接觸面最大的英國觀眾群（Almeida Theatre 是倫敦西區其中一間最受歡迎的劇院），將八九六四連繫英美是比較保險的做法。所以，就算他們找來一個熟悉八九六四的編劇（不過相信在英國本土很難找到），策劃方向依然不會變，無可避免一定失焦。如果你以為他們想作一個戲來深入討論六四，那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但也不能說《Chimerica》就毫無作用。雖然不會是很深入的認識、思考，至少英國以至全球觀眾可以再次勾起自己對坦克人的記憶，稍稍窺探八九六四。讓更多人知道，更多人記得，總是好事。

常常說，劇場是最當下的媒介，因為演員在現場和觀眾交流而不是錄影，所以用英文文法來比喻，劇場永遠是現在進行式，電影則是過去式。但正因如此，觀眾進入劇場時，比較容易問：這齣戲和我們有何關係呢？這不囿於英國觀眾，全世界亦然。但是這條接近條件反射的問題，會否也反過來窒礙我們看更遠更廣闊的東西呢？這倒是值得深思的。



*《Chimerica》舞台劇劇照，於2013年5月20日在倫敦 Almeida Theatre 首演。網上圖片*



*《Chimerica》舞台劇劇照，圖為飾演 Zhang Lin 的華裔演員 Benedict Wong。網上圖片*

# 【第三章：延續三十年前本該有的思考】

# 被圍困的六四論述，需重新對接後冷戰的時代光譜

特約撰稿人 夕岸|2019-05-27

Netflix脫口秀節目《愛國者有話說》（Patriot Act）今年初的一集中，攝製組詢問兩個在美的中國年輕人，歷史書上是否有「六四天安門」事件。顯然這是一個「難題」，他們略作遲疑，搖頭表示書上沒提過。主持人哈桑（Hasan Minhaj）一臉「難以置信」地評論到，這就像你問美國高中生歷史書上是否有911，他們困惑地回答說：「911？是JayZ發布專輯《The Blueprint》的日子嗎？」

這短短的一幕，代表了三十年來六四在民主社會主導性的媒介鏡像。它往往不獨立出現，而是作為當前社會問題的參照系而存在。運氣好的時候，六四尚且被看成一場人道主義災難，運氣不好時，它就只是個用來嘲諷中國的笑料。當然，並非只有六四遭到了這般待遇。從拉美諸國的反政府抗議到中東的革命，將威權國家的群眾抗爭與革命他者化，作為己國民主的反面對照，構成了歐美社會常用的精神勝利法之一。

在1989後的前二十年，這種冷戰思維主導下的精神勝利法尚可被威權國家的行動者策略性地利用，來為資源匱乏的民主運動提供些許活動空間。然而，過去十年全球政治的極化、文化代際的更替，已經讓支撐海外八九六四論述的這套二元話語失去了大量群眾基礎。紀念方式的固步自封，加上媒體和商業力量的推動，也使六四在全球的群眾運動抗爭版圖上顯得越發孤立、無關緊要。在三十週年的今天，當脱韁的世界把後冷戰的自由主義共識遠遠甩下，我們需要新的力量和批判，新的盟友和想像，把被圍困的六四論述和時代光譜重新對接起來。

**六四話語的主流與邊緣悖論**

三十年來，境外的八九六四記憶，呈現出一種詭異的兩重性。一方面，「坦克人」（Tank Man）的形象在民主社會早已深入人心。它出現在大學講堂、紀錄片和歷史博物館裏，閃現在街頭文化衫、網絡meme和宣傳片中。一個出生成長在歐美社會的普通人，即便對當年事件的來龍去脈知之甚少，也不太可能從未見過坦克人的影像。中國以外的社會，幫助保存了大量關於廣場的記憶，提供了討論六四的寶貴空間，也慷慨接納了八九一代的流亡者。

但是另一方面，六四在中國境外被喚起的方式是既膚淺又建制化的。膚淺表現在它往往是為了服務其他的中國議題：媒體審查，人權侵

害，中國威脅，民族主義等等，其中尤其常見的就是用於解釋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在這類文章中，六四僅僅是一種維基百科式的腳註，來說明各種精妙的審查機制。這也導致大多數普通人對六四的印象，反反覆覆也就只有那張坦克人的照片而已。六四話語的建制化，則表現在它與民主國家政治精英之間的聯繫，要大大強於它和民間社會，包括社會組織、高等院校、抗議團體等之間的關係。

這樣一種主流和邊緣並存的兩重性，看似矛盾實則一脈相承。它的主流為虛，邊緣是實，主流只是邊緣的一種扭曲映射而已。諸多圍繞六四的討論，並不真正在乎歷史的淡忘與記憶的流亡，而只是為了構建一種後冷戰時期的「民主例外論」，最終也只是為了美國等國的國內政治或外交政策服務。也就是說，針對六四的討論和紀念，越來越只剩下工具價值。只有它能夠和主流建制派議程結合的時候，它才會被人搬上台面。

建制派議程旗下當然包括不同的意識形態分支。在保守主義一側，它是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甚至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堅信只有特定的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arcy）可以讓社會免於獨裁的困境；在中間派和精神燈塔主義看來，它是「貧窮的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又一例證：中國社會本質上懦弱奴性，叢林法則，缺乏民主文化的教養——是這樣一群精神貧困的人民造就了獨裁的政府；進步派眼中的中國相對更為積

極，但這種關注也大多帶着福音主義的色彩，相信民主的力量終究會感化到政治落後地區，福澤全世界。

不管六四與哪種建制主義結盟，這種合流帶來的都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Systemic Racism）、對自下而上抗爭本身的忽視，和對中國行動者的實質性孤立。

這成了橫亙在中國所有反體制人士，特別是流亡行動者和移民面前的最大悖論。在瀰漫着「歷史終結論」（The End of History）的政治氣氛下，反中被等同於親歐美，紀念六四等同於承認歐美政府的合法性，並沒有一條反對所有建制力量的道路。因此，他們也往往選擇把西方政府和政黨，而非與前者競爭博弈的公民社會看成天然的盟友；對自己所在國的其他社運和社會問題，他們鮮少關心，更不用說介入。異議者的身份，反而限制了他們參與本地的政治——自由主義移民融合的邏輯簡單粗暴：政治移民應當對接受他們的民主社會感到感激，任何對後者的批判都是忘恩負義。

與境外建制精英的結盟也許是無可奈何，或是出於策略性的考量。但這卻使以六四為代表的人權議題始終困囿於一個極端狹小的論述語境裏，遠離自由主義社會的主流議題。民主運動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罪證，幫助新移民尋求政治庇護的材料，卻鮮少成為其他國家、領域行

動者汲取靈感的源泉。它是一個逐步內卷（Involution）的場域，國際移民的擴張和數字媒體的普及，反而讓其在眾聲喧譁中更加邊緣。

**紀念與抗爭主體的消失**

除了建制話語的圍剿，對六四的紀念本身，也在加速使其成為一段死掉的歷史，既沒法和中國當前的思潮與運動形成呼應，更沒法與其他地區的社運產生任何積極的聯繫。

社會運動之所以重要，除了自身改變社會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其生產出的經驗，可以給後來的運動以啟發。事實上，現代社會運動的誕生，也恰恰在於遊行、罷工等模式化抗議形式的出現，擴展了運動所能波及的範圍和影響的人群。抗議經驗一旦成為體系，就可以更快地形成可資借鑑的理論和實踐綱領。八九年的運動自身也是學習、積累、創新的產物，是孔浩烽所說的「中國特色的抗議」：它與文革和紅衛兵一代有着藕斷絲連的聯繫，它的結社、佔領、搭台、請願、絕食等劇碼是傳統與現代風格的混搭。它充斥着自我矛盾的口號，階級政治的張力，跨越國境的網絡——這些本都可以成為後來的運動研習和反思的素材。

但六四並未發揮這樣的正面作用。恰恰相反，它象徵着當代歷史的斷裂，一個被履帶碾碎的幻夢。如果說從學術層面，這種對斷裂的認知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鎮壓與其後改革間動力循環的弔詭，它卻也不經意間將六四作為當代史上重要社會運動的價值給一併抹去了。正是因為它是一場失敗的，以血腥收場的民主運動，它的抗爭過程與經驗被理直氣壯地省略。值得討論的問題似乎只剩下國家的暴虐與遇難者的正義。連高層的權鬥，都看上去比群眾抗爭中的智慧更能吸引觀眾的注意。

圍繞六四的種種紀念，複製着這種去動員（demobilization）的邏輯。支聯會主導的燭光紀念，儘管每年都在試圖吸收新元素，其骨子裏的保守色彩是一成不變的。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對支聯會的批評不在少數，但多是從本土意識形態出發嘲諷其大中華主義，鮮有從左翼視角出發反對其議程的聲音。事實上，燭光紀念中體現的良心和團結，與歐美建制精英的精神勝利法是一脈相承的。它所宣傳的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無孔不入，和少數被臉譜化的異議者；它所包含的出於本能的恐共情緒，要遠遠大過對社會運動價值的認同感；它弱化歷史的抗爭色彩，將「中國」和「中國人」他者化，來反襯出香港社會的民主、香港人的堅持，特別是支聯會三十年如一日在推動民主中國上的莫大作用。這其中當然不乏真誠的情緒，香港在六四中扮演的作用確實值得一書。但只要燭光紀念繼續弱化普通人在社會變遷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它就只會是記憶維繫、運動學習的絆腳石。

最終，記憶的政治進入一種惡性循環，越是強調人民不會忘記，真正的抗爭主體就愈發消失在歷史的盡頭。對於六四的紀念，構成了一道阻斷之後運動間學習和反思的屏障。它將80年代的政治參與看作一道罕見的光亮。這道亮光不是為了照亮之後的歷史，而是反襯之後三十年的黑暗與平庸，和大多數中國人的順從、恐懼和冷漠。去年的中國#MeToo 發生後，有分析家驚訝地表示這是六四以後最令人振奮的社會運動。這與其說是評論者對中國行動者的激賞，不如說是無知帶來的傲慢。他們不能放下中國人被洗腦的預設，看不到後續行動者對一九八九的超越，更別說理解六四以後中國抗爭政治的複雜圖景。

六四，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運動歷史複雜性的遺失，可謂是中國官方和民主社會的「共謀」。如果說中方負責掩蓋歷史，民主社會則負責簡化歷史，他們的通力合作保證了這個話題永遠都只能和一小撮人聯繫起來。

## 六四與進步社運的斷裂

限制六四想像的當然不只是建制精英和紀念儀式，更是與普通人日常生活關係更緊密的各種商業和媒體力量。4月，萊卡相機委託巴西代理公司製作了短片廣告The Hunt，講述了外國攝影師在威權和戰亂國家的遭遇。視頻中的三個故事，無一例外都泛濫着男權主義和白人救世主的情結：來自文明世界的白人男性，拯救着第三世界被有色人種暴

政所蹂躪的弱者。在主線天安門清場中，唯一的焦點是中國軍人的野蠻，學生、工人和市民的抗爭徹底缺席，核心的群眾運動被當作了模糊的背景版。不了解背景的觀眾，大概要以為當年現場只有歐美記者在記錄，是他們與各類邪惡政權的搏鬥，才保證了記憶的延續和歷史的真相。

這樣的敘事，套用在任何與歐美社會密切相關的運動上，一定會遭到集體抵制。即使刨除其中的種族主義色彩，將政治抗爭商業化的做法也常能引發社運團體的不滿：2017年，百事因為在廣告中浪漫化Black Lives Matter，洗白警察暴力而引發爭議，最後被迫撤回視頻。今年初，吉列的超級碗廣告以 #MeToo 為主題批判主流的男性氣質，引發保守派抵制的同時，也被進步派批評是消費嚴肅的社會運動。

相比百事和吉列的自由派小清新氣質，萊卡廣告不僅粗暴地商業化了流血抗爭，而且幾乎每一秒內容都準確踩中了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雷區」。這樣的廣告居然出現在2019年，也正是因為六四並不被歐美社會的媒體精英認為是當代進步運動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它和那些發生在中東的民主抗爭、拉美的土地抗議、非洲的族群衝突等，一併被歸為「原始的叛亂」。這些運動所爭取的民主、土地、食物、免於恐懼的自由……被認為是西方社會早已經擁有的。後者國土上發生的種族、女權、環保、勞工、移民的運動，才是更加「高等文明進步」的後物質主義鬥爭，才適用於更高的道德標準。在廣告策劃者看

來，那些連選票都沒見過的抗議者們，大概沒有資格進行更具批判性的討論。

可惜的是，中國大陸社交媒體上用戶對萊卡的反應，只有辱華和反華兩個極端，缺乏任何對資本、種族和性別的反思。儘管這些討論不能代表大陸的公共輿論，卻能反映出關注六四這部分網民群體的平均價值觀。他們眼中的民主單薄而偽善，已經和當前的時代產生了嚴重的裂痕。

從直接的後果來說，中國用戶越是不在乎政治抗爭的媒體呈現形式，六四就越是遠離當今與階級、種族、性別交織着的社會運動。歐美的商業和媒體力量，就越是可以肆無忌憚地複製建制精英的冷戰話語，把六四等政治抗爭的草根內核徹底掏空。就這樣，網民們得以與商業力量聯手，把六四議題逼進更邊緣的境地。

## 時代精神與八九歷史的反向重建

如果說八九歷史與主流進步社運間的隔離是從來有之，那麼在主流左右式微，激進左右崛起的當下，這種隔離又被進一步拉大了。當1989年的Tear down this wall 變成了2016年的 Build the wall，當自由民主國家在危機前自顧不暇，對政治精英來說，那些國境線外歷史的「利用

價值」就開始大幅貶值。而對崛起的民粹左右翼來說，它們的當務之急是本國的建制派，更不需要將別人的痛苦納入進來。

激進右翼支持文化衝突和種族隔離，反對政治正確，其意識形態決定了他們不僅不會關心中國的社運和民主化，甚至會嚮往當局的全面法西斯化；但理應國際主義的激進左翼對中國的遠離，則來源於1989的衝擊。歷史學者Max Elbaum在去年再版的書籍《革命在即》中，分析過從文革到八九六四等一系列事件對美國激進左翼的毀滅性打擊：六四鎮壓之後，左翼不再能夠只把蘇聯失敗的社會主義實驗看作一個例外，而是必須面對這條道路整體上無法走通的可能性。從90年代冷戰廢墟中走出來的新一代人，要麼徹底脫離了左派成為保守主義者，要麼擁抱模糊的「民主社會主義」概念，極少數堅持下來的人，也變得更加本土主義，鮮有關心國境線外的歷史沉浮。

從此，中國在左翼社會運動場域中成了一個尷尬的存在。激進左翼往往避免觸碰中國民主運動的話題：為中國政權背書當然道德上不正義，但批評中國又會被添油加醋成支持資本主義民主。於是，保持沉默成了一種妥協的結果，人權議題繼續被建制精英所壟斷。相比關心中國，在巴勒斯坦、委內瑞拉、巴西等問題上發聲站隊，才是歐美左翼定義自身的最常用方式。

相似的尷尬也存在於學術圈。正如駱斯航的總結，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導致了學術界自由主義霸權的確立，馬克思主義被整合進了建制學術體制，成為諸多政治理論流派中的一員。不願意直面失敗的左派學者們，也往往回避討論中國社會主義的問題，更別說嚴肅地評價六四。一直以來，從激進左翼視角出發分析中國八九的學者寥寥無幾；少數的另類觀點，也流於大而化之的浮皮潦草。比如女權運動家、學者Silvia Federici早在上世紀末就評價到，六四是中國反市場改革、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偉大開端，而不單是一場民主運動，她更是希望將六四案例融合進她目前對共有概念（Commons）所做的理論思考裏。這種樂觀主義當然挑戰了主流論述，但也只是學術左翼為了反對而反對的一廂情願。Craig Calhoun就曾經批評以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誇大了勞工階級的激進性，認為他們筆下萌芽的階級意識，僅僅是起於草根的保守思潮對工業化的本能反應。普通人並非天生的變革先鋒，反而更容易成為民粹右翼的後備軍。

把歷史的解釋框架一百八十度對調，並不是打破單調論述的最好方式。如果說建制派、主流媒體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將一場社會各階層捲入，波及全國各大城市的大規模社會運動，縮減成一場單純的精英學生爭取民主運動，那目前零星的左翼觀點也同樣在反對前者的過程中，將話語窄化到了單維的層面，不僅沒有提供更多的分析深度，而且也缺乏對大規模群眾運動局限性的反思。

六四之所以能被自由主義話語所完全劫持，本就說明了它自由主義的底色。在20世紀的革命浪潮中，1989的系列革命（東歐劇變）潮畢竟不同於1968（全球反抗運動）和1979（70年代非洲獨立運動和伊斯蘭革命），不管後人如何將激進性的成分賦予它，它都不可能超出那個時代所能具備的歷史想像，它充其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已有的群眾自發性。借用社會學家Asef Bayat的說法，當前的世界只剩下有「運動（Movement）」，卻沒有「改變（Change）」的革命。社會運動喪失了激進的想像作為臟器，唯餘激進的形式作為骨架。當年的六四面臨着相似的歷史困境，時代打碎了其激進的嘗試。因此，它的價值不在於已經提供了什麼，而在於暴露出那些尚未實現，卻對當前運動至關重要的構想與目標。對民主運動有限的格局進行批判、解構、重塑，是將其與現實抗爭勾連的最有效方式。只有這樣反向的記憶方式，八九才能繼續存活在行動者如今更艱難、也更廣泛的日常鬥爭中。

**新的聯盟和想像**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面對右翼民粹的反撲，歐美本土政治的失序，六四將處在一個越發尷尬與邊緣的地位。在中國境內，它依然是每年一度的互聯網維護日、鍵盤抵抗日、公共知識分子抒情日。在國際舞台上，它是標準化的媒體和外交辭令，一種必須履行的國際人權上的「政治正確」，但也如同谷歌的每日Doddle般稍縱即逝。這成了一種循環往復的共謀：所有人都認為這個國家短期內即使有什麼改變，也

只是往更糟糕的方向發展。大家心照不宣地重複着這個越發雞肋的紀念儀式，把心底的那份絕望努力掩藏起來。

三十年了又如何？到了第三十一年，關注又會漸漸褪去，等待下一個逢五和逢十。當年的抗議者和獨裁者會老去，情感維繫着的憤怒終究是老人們的抱團取暖。這是已經發生在墨西哥特拉特洛爾科屠殺上的遺忘過程，儘管有着學者和詩人的記錄，儘管有着民主轉型後更開放的政治氣氛，圍繞屠殺的大眾記憶也早已支離破碎。這個世界每天都在發生着大大小小的災難，日曆上擠滿了對平民的屠殺紀念日，用良知、道義、普世價值來申明紀念的意義，並譴責普通人的沉默和反對，越發成為無力的辯詞。「失憶共和國」當然來源於對真相的恐懼，但它絕不僅僅是恐懼。「失憶」可以是一種對更有批判性論述的呼喚。

把遺忘歸結於普通人的不作為，是行動者所能做的最壞的決定。大眾是聯合的對象，精英的「好意」才需要被謹慎對待。今年伊斯蘭革命四十週年紀念日當天，特朗普發推譴責伊朗政權制造了「四十年的腐敗、鎮壓、恐怖和失敗」，並未經授權使用了2017年末伊朗攝影師Yalda Moayeri拍攝的著名照片：德黑蘭大學抗議現場一名舉起拳頭的女性。Moayeri隨後憤怒地表示，這張照片是獻給伊朗人民的，而特朗普盜用了她的作品為自己的政治議程服務。她樂於見到這張照片成為自由的象徵，但絕不希望它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籌碼。Moayeri的表態代

表着新一代威權國家的行動者需要學習的不卑不亢：在利用建制力量的同時，堅決拒絕自己被反向利用。為了打破記憶和動員的瓶頸，新一代人需要有獨立於建制力量，重新搭建運動聯盟的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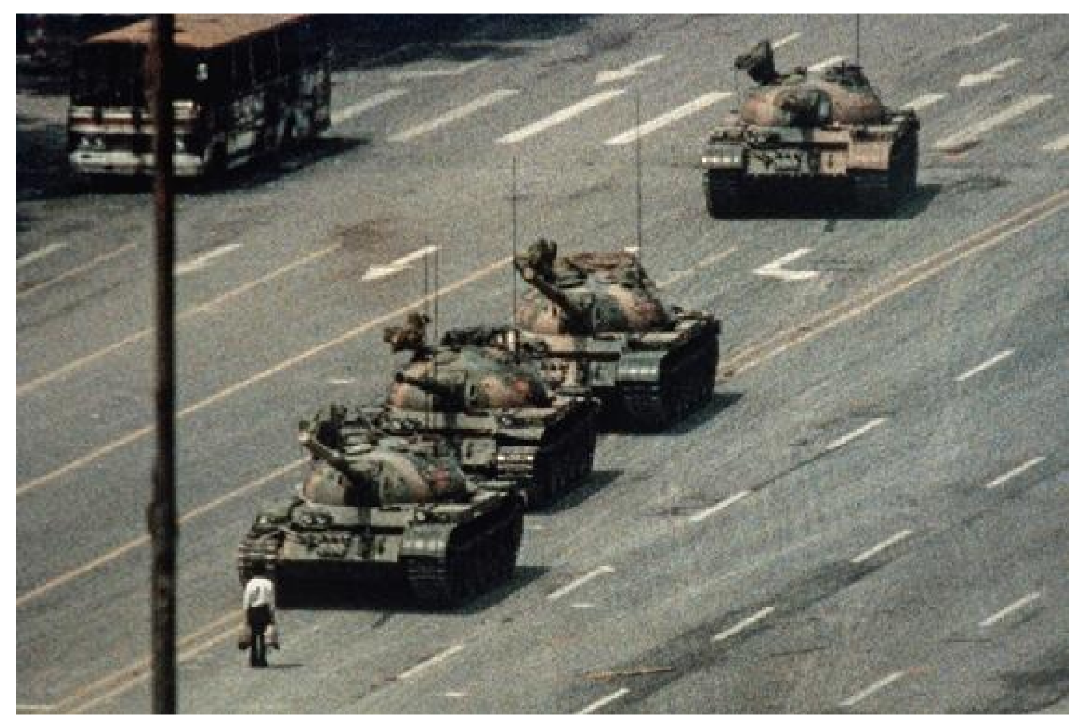
當然，這種瓶頸指向的也可能是一種積極的斷裂。未來的革命，大概會完全超越當前的策略構想和理論預言，以目前的行動者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開。它既可能繼承，也可能完全拋棄掉1989的遺產。但不管怎樣，如果這真的是一場基於「改變」的革命，它一定會打破國界和運動之間的隔閡。而必然會被另一個未來甩下的我們可以做的，是移除那些維護着隔閡的既得利益，不論他們習慣戴着威權還是民主的假面。

前進。圖：Bettmann/Getty Images



*2006年6月4日，香港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攝：*

*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



*1989年6月5日，王維林在北京長安街上阻擋中國人民解放軍坦克車隊*

*前進。圖：Bettmann/Getty Images*

*《Leica 'The Hunt'》視頻截圖。*



*2019年5月23日，台灣藝術家的作品，一個巨型的充氣坦克人放置在台灣中正紀念堂。攝：陳焯煇/端傳媒*



*《Leica 'The Hunt'》視頻截圖。*




*2017年5月28日，香港一名示威者於六四二十八週年遊行期間，背著中國軍用坦克模型。攝：Dale De La Rey/AFP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6月4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集會。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 通脹中的六四：失敗的改革如何引爆革命

特約撰稿人 楊路|2019-05-31

六四發生的前一年，全中國都在搶購。杭州市民在夏天搶購毛衣毛褲；四季如春的昆明，人們搶購滯銷的電風扇；武漢有人一次性買200公斤食鹽；南京有市民買下500盒火柴；廣州有一位女士扛回10箱洗衣粉。「越漲越搶，越搶越漲」——中國人記憶中的上一次通貨膨脹，還是國共內戰時期的「金圓券」危機，如今中國的教科書還常常將其視為國民黨「腐敗無能」的證據。

政治壓力迅速上升。副總理田紀雲在國務院會議上發出警告：「如果（物價）搞到兩（位）數，我們能不能穩坐在這裏開會？」

兩位數最終還是出現了。1988年中國的官方通貨膨脹率是19%，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按照這個速度，物價每三年多，就要翻一倍。

1989年4月間，與學生幾乎同時開始在天安門廣場聚集的，是北京的工人和市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包括通貨膨

脹、腐敗和政府的無能。六四運動中，抗議通貨膨脹、抗議「官倒」（官員利用權力倒賣重要物資謀取利益）、以及抗議腐敗的訴求貫穿始終。由經濟混亂所引發的市民和工人對政府的強烈不滿，是天安門抗議迅速從學生行動擴大為普遍社會抗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到底是什麼引發了物價失控？是什麼讓表面上用意良善的改革反而引發了革命？1980年代的這一場通貨膨脹故事，是理解中國改革邏輯的一個核心線索。

**價格雙軌制：權宜之計還是「沒有輸家的改革」？**

如果說市場經濟有一個最大特徵的話，那就是「價格」。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正是在價格信號的引導之下，「自發」地做出各種經濟決策。沒有價格，也就沒有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當然也有名義上的「價格」，但往往是不真實或者扭曲的。年齡稍長的中國人會很熟悉那個買東西需要各種「票」的年代——有錢並不能保證買到東西，還需要「憑票購買」。這些「票」，本質上是政府的物資配額，是以行政取代市場對資源進行支配的表現。「價格」在計劃經濟下，大部分時候只是一種會計手段，不能反映市場供需關係，也起不到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經濟，價格的信號作用極其有限：農民以人民公社為單位，以指定的價格，將農作物賣給國家（土地無法交易，所以沒有價格）；城市工人在國營企業中，領取國家指定的工資，購買由國家指定價格的消費品；國營工業部門以指定價格購入原料，再以指定價格，賣出產品；銀行以指定的價格（利率）貸款給國營企業，再以指定的價格吸收存款。

價格信號失靈的後果，就是普遍的「短缺」。缺少價格調節，有需求的商品生產不足，而沒需求（或者質量不好）的商品則生產的太多。這常常造成嚴重後果，如1958-1962年期間造成上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官方稱「三年自然災害」），原因之一，便是以「配額」取代「價格」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嚴重扭曲資源配置，造成生產嚴重不足。

計劃經濟的另一特徵是相對價格的扭曲，主要體現為「城鄉剪刀差」，其本質是以農村補貼城市，以農業補貼工業。國家以低於市場價向農民收購糧食和原材料，再以低價提供給城市和工業部門。因為城鄉隔離（戶口制度）的存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8億農民無法離開農村，長期忍受極端貧困。而城市居民和國營企業的工人，則受惠於制度性的補貼。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一旦市場化改革開始糾正這一補貼，城市居民和工人的相對利益就會受損，這也是為什麼80年代通貨膨脹在城市和工人中激發了極大不滿。

社會主義制度再「優越」，人民吃不飽飯終究還是說不過去。以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決策者終於承認計劃經濟是死路一條。開始經濟改革後，市場化的價格也隨之出現。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農民在完成國家收購指標之後，可以將剩餘的收穫以高於官方定價的市場價格賣出（「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因此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而這本質上就是一種價格雙軌制：同樣的產品，有兩種價格。

改革往往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進。經濟學家錢穎一、劉遵義和羅蘭（Gérard Roland）在1997年的一篇經典文章中將中國的價格雙軌制總結為「帕累託優化」(Pareto-improving)，也就是一種既在增加全社會福利的同時，不造成任何人福利損失的方案。價格雙軌制是在不觸動計劃經濟「存」量蛋糕的前提下，對經濟「增」量採取市場化分配的方法。這使得改革在政治上避免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在經濟上避免了短期的劇烈波動，在許多人看來，是一種「沒有輸家的改革」。

然而價格雙軌制的前提，是政府可以通過再分配來平衡受益者和受損者的利益分配，甚至還需要主動維持一些計劃經濟的舊有做法，這就製造了權力尋租和經濟套利的空間。同時，全世界的經驗都顯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物價上漲無法避免。以食品為例，中國的農民長期被迫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向政府出售農產品，一旦實行市場化

定價，食品價格必然大幅上漲。為了平抑食品價格的衝擊，政府勢必通過擴大財政赤字的方式來補貼消費者，而財政缺口需要貨幣增發來彌補，這就推動了通脹。

1985年，改革從農業和農村，進入工業和城市。價格雙軌制這種一部分資源由政府分配、一部分資源由市場分配的改革思路，也作為一種成功經驗而被全面推廣。官方定價的工業產品從1984年的120個大類，縮減了一半，到1987年的60個大類；根據官方統計，1986年，53%的鋼鐵，42%的煤炭，16%的水泥，以及30%的木材由政府實施計劃供應，其餘全部採取市場化供應 。1987年11月，在改革開放的第十個年頭，《人民日報》宣布，全國範圍內，50%的原材料已經實現市場化配置。

到此為止，中國的價格改革大體是成功的，農民收入增加，城市物價上漲速度可以接受，經濟也出現了良好的增長。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裏，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0%，平均物價漲幅卻控制在5%以內，是相當好的表現。

### 「價格闖關」：提出，擱置

然而，價格雙軌制終究是一種過渡手段。改革在最初的十年內，完成了從國家幾乎完全包辦資源分配，到50%的資源由市場分配的變化，

自然是極大的進步，但這遠非理想。套利驅動下，腐敗滋生。

根據經濟學家張曙光的整理：1986年3月，時任中國國家總理趙紫陽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兩次講話，認為當前是新舊體制膠着對峙、相互摩擦、衝突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久。因此，要在1987年和1988年採取重大的步驟，促使新的經濟體制能夠起主導作用。國務院改革方案研究領導小組隨後提出了一份價格、稅收、財政、投資的配套改革方案，希望向市場經濟加速前進。

這一份方案建議以鋼材為突破，用兩年的時間完成「兩軌並一軌」，使鋼材價格全面市場化。鋼材是最重要的的上游工業和建築材料，一旦實現完全市場定價，將帶動工業和建築業整體向市場定價轉軌。

但這個方案的挑戰和風險也同樣巨大。以6毫米圓鋼為例，當時的計劃內政府定價是693元/噸，而計劃外市場的均衡價格在1200元/噸，相差近一倍。要實行價格並軌，必然產生政策兩難：如果原材料價格大幅提高，政府又不對國企增加補貼，那麼工業產出和基礎設施建設將要萎縮，經濟會減速；如果既要保證經濟增長，又要價格並軌，那就需要政府加大補貼。而這又意味着必須開動印鈔機增加貨幣投放，否則財政無法維持。而貨幣閘門一開，通貨膨脹將無法避免。

同時預測上游產品造成的通脹，在技術上非常困難。1986年，趙紫陽問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如果實施鋼材市場化定價，會有多少通貨膨脹？安志文承認說「我說不準」。（註）因為在此之前的中國價格改革，只調過最終產品，沒有調過上游產品。一旦鋼材調價，小五金、農具、機械工業、建築材料全都要調價，最後通脹會是多少，沒有人能夠準確計算。

鑑於物價風險，1986年的改革方案即便得到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最高決策者的一致認可，但趙紫陽仍然顧慮重重，最終在1987年11月決定擱置。據張曙光記述，在1987年8月7日的一場談話中，趙紫陽講了老實話：「決策者不是避開價格風險，而是要避開政治風險。」事後證明，趙紫陽的擔心絕非多餘。

需要再次說明：通脹風險的根源並不是調價，而是貨幣的超發。諾獎得主，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弗裏德曼）有名言：「無論何地，通貨膨脹都永遠是貨幣現象」(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

就是這位弗裏德曼，1988年初在另一位經濟學家張五常陪同下訪華，並與趙紫陽見面。兩人討論的重點就是中國的改革與通脹難題。根據張五常記述，趙紫陽對弗氏坦言「正當我們準備進一步進行價格改革

時卻出現了難題，既明顯地出現了通貨膨脹。因此，我們不能不把今後的價格改革同治理通貨膨脹一起來考慮。」

弗利德曼則說：「…抑制通貨膨脹只有一個辦法，這就是約束貨幣供應量，在中國就是要少印鈔票…我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不在於投資或消費，而是錢印得太多了」。弗氏並不是第一個提出通脹警告的人，1985年9月的巴山輪會議上，另一位諾獎經濟學家託賓（James Tobin）就警告說中國有嚴重通貨膨脹的危險，並建議採取緊縮政策。

從1979年開始，中國經濟的所有指標都比以前要快得多。投資和消費雙膨脹的背後，是貨幣流通量的迅速擴大，平均每年貨幣增速超過20%，1984年和1988年的貨幣增速更是史無前例地超過40%。也即，出現「貨幣超發」。

在中國「帕累託優化」的邏輯下，政府往往需要補償那些因為改革而可能利益受損的人，他們可能是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國有企業，也可能是食品價格上漲的城市居民和工人。而這樣的財政補償，往往需要以發鈔支持，否則企業就會減少投資，居民會減少消費，經濟就有可能衰退。這是一個常見的「轉型陷阱」：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諸多東歐國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間，往往在高失業和高通脹之間進退失據。

在補貼和通脹之間，政治家常常傾向於後者。邏輯很簡單，取消補貼，一小部分人承擔了大部分代價，容易形成集中的政治阻力。而通脹，則是以「鑄幣稅」的形式讓全體社會平攤改革代價，不容易形成集中的政治阻力。但必須注意，這裏的前提是通脹在可控範圍之內，一旦通脹超出限度，那將是全社會的動盪。

**突進，潰敗**

1988年，陷入泥潭的改革，已經快要被革命趕上。價格雙軌制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政府定價和市場定價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官倒」橫行。以鋼材為例：如果有辦法以政府定價購入，再以市場定價賣出，一轉手便是近100%的利潤，民怨日盛。

此時的中國最高政治權威鄧小平，與改革執行者趙紫陽，在價格改革問題上並無明顯分歧。甚至可以說，在經濟改革的速度問題上，鄧小平很多時候更為激進，他在1988年5月，發表了著名的「過五關斬六將」談話。「價格闖關」在一種近乎悲壯的氣氛中展開：「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的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這次副食品價格一放開，就有人搶購，議論紛紛，不滿意的話多得很，但是廣大人民群眾理解中央，這個決心應該下。現在過這一關，能否成功，今天還不能講，但我們希望成功…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

風險、迎着困難上。要讓全黨和全國人民懂得，這是很艱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針、十全十美的辦法是沒有的，面臨的都是新事物、新問題，經驗靠我們自己創造。」

而此時的趙紫陽也轉變了態度，他在增長和物價這個兩難選擇中，選擇了增長優先。在1988年4月的專家座談會上，趙紫陽說：「生產資料兩種價格，問題太大了…我們是到了不進則退的時候了…輪番漲價要承認它，關鍵是如何駕馭它，如果物價漲了，工資也能提上去，經濟有發展了，我看就不怕」。

一邊印鈔機還開着，一邊又有強烈的漲價預期，一場通貨膨脹的「完美風暴」終於撞上了中國經濟。1988年4、5月份，部分地方發生了零星的搶購。存款利率遠遠低於通貨膨脹率，上半年銀行現金支出增長46%，居民排隊取錢。6月物價上漲17%。 7月，政府放開部分煙酒價格，強化了漲價預期，通脹率達19%。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當月冰箱、電視、洗衣機增銷83%、56%和130%，商場擠壓的殘次品也被一掃而空。

在兩位數通脹下，北京被迫「急剎車」。8月29日，代理總書記趙紫陽提出明年工作重點從「深化改革」，轉向「治理環境、整頓秩序」。翌日，總理李鵬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發出《關於做好當前物價工作

和穩定市場物價的緊急通知》，經濟政策開始轉向收縮。然而價格有其「粘性」，通脹一旦發生，很難立刻停止。在供給不增加的前提下，政府本能的「限價」舉措，反而可能加強通脹預期。兩位數的通脹，伴隨着政府在半年之內經濟政策180度轉彎的強烈不確定情緒，貫穿了血雨腥風的1989年。

有些諷刺的是，讓許多人付出政治乃至自由代價的這一場悲壯價格改革，最終的完成，竟然是因為六四之後中國的經濟寒冬：經濟從過熱轉為停滯，市場價格下跌，與計劃價格逐漸靠攏，價格闖關的難題，自行消失。

## 三十年後改革的保守底色

1988年的通貨膨脹是六四爆發的直接導火索之一，也是為什麼天安門抗議迅速地從一場北京的知識分子運動，迅速擴展到了市民和工人階層，乃至全國各地。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1988年的物價失控，其直接原因並不是政府拒絕改革，而正是因為改革的突然加速。單兵突進的激進改革釀成了悲劇性後果，這一歷史經驗成為了後世中國政治精英的某種創傷記憶，也給之後三十年的改革塗上了一層保守的底色。此後每每出現「迅速過河」的市場化改革提議，88年的「落水」經驗便鬼魅般浮現。自

此，改革的話語開始強調「頂層設計」，漸進、折中、穩健的思路開始成為主流。這並沒有讓中國經濟從此就一帆風順（鄧小平南巡之後，1993-1995再次出現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更加造成改革階段性地陷入停滯的泥潭。

1988年的通貨膨脹提醒了中國社會，改革不可能無痛。但問題是：誰應該來承擔改革的代價？計劃經濟顯然是死路一條，但計劃經濟沒有通貨膨脹。面臨市場經濟的通貨膨脹，許多人又將矛頭指向改革派，對於從始至終反對市場改革的保守力量來說，價格闖關的失敗提供了一個反攻的良機，北京迅速颳起了一股「倒趙風」，矛頭間接指向鄧小平。而對於自身利益受到衝擊的國企工人來說，1988年的通貨膨脹則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工人階級當家做主」到底是什麼關係？在之後的六四運動中，工人與知識分子，雖然有着表面的聯盟關係，但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的取向大相徑庭，按照一些評論家的說法，幾乎成為「兩場運動」。這一分歧，一直在今天的中國，都依然具有強烈的分裂效應。

80年代改革理論百家爭鳴，其中很重要的一派意見主張從企業經營所有權入手，如厲以寧主張股份制改革，華生則提出了資產經營責任制。現在無法假設如果這些改革和價格改革同時推出，歷史會不會有所不同。但即使同步推行企業改革，價格改革仍然要面臨通脹的挑戰（程度或許不同）。而90年代的中國國企改革經驗也顯示，決策層最

後選擇的改革路徑其實很有可能進一步衝擊、而不是維護傳統國企工人的利益。

中國經濟今天表面上的成功，很容易讓人們忘記改革過程中的曲折與兇險。與官方敘事相去甚遠的是，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沒有什麼「宏偉設計」。人們需要摸石頭才能過河，謹慎之外，更可能是根本看不到方向。改革從來兇險，所有錯誤都有代價——包括血的代價。

（楊路，自由撰稿人）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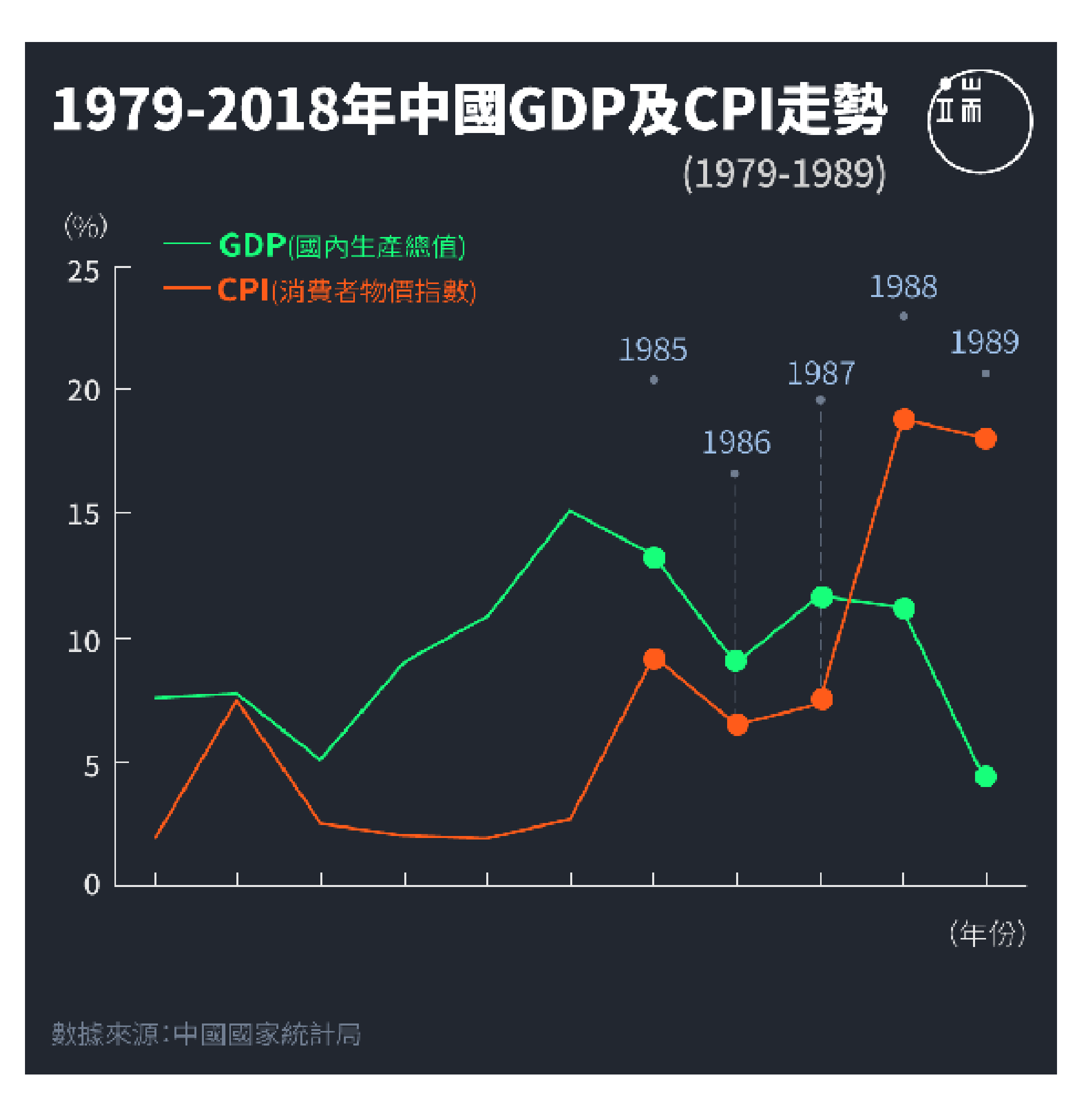
Lawrence J.Lau, Yingyi Qian, and Gérard Roland. Pareto-improving Economic Reforms through Dual-Track Liberal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 Vol. 55, Iss. 2, August 1997:285-292.

Yi, Gang. The Price Reform and Inflation in China, 1979-1988.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Baskingstoke Vol. 32, Iss. 4, (Winter 1990):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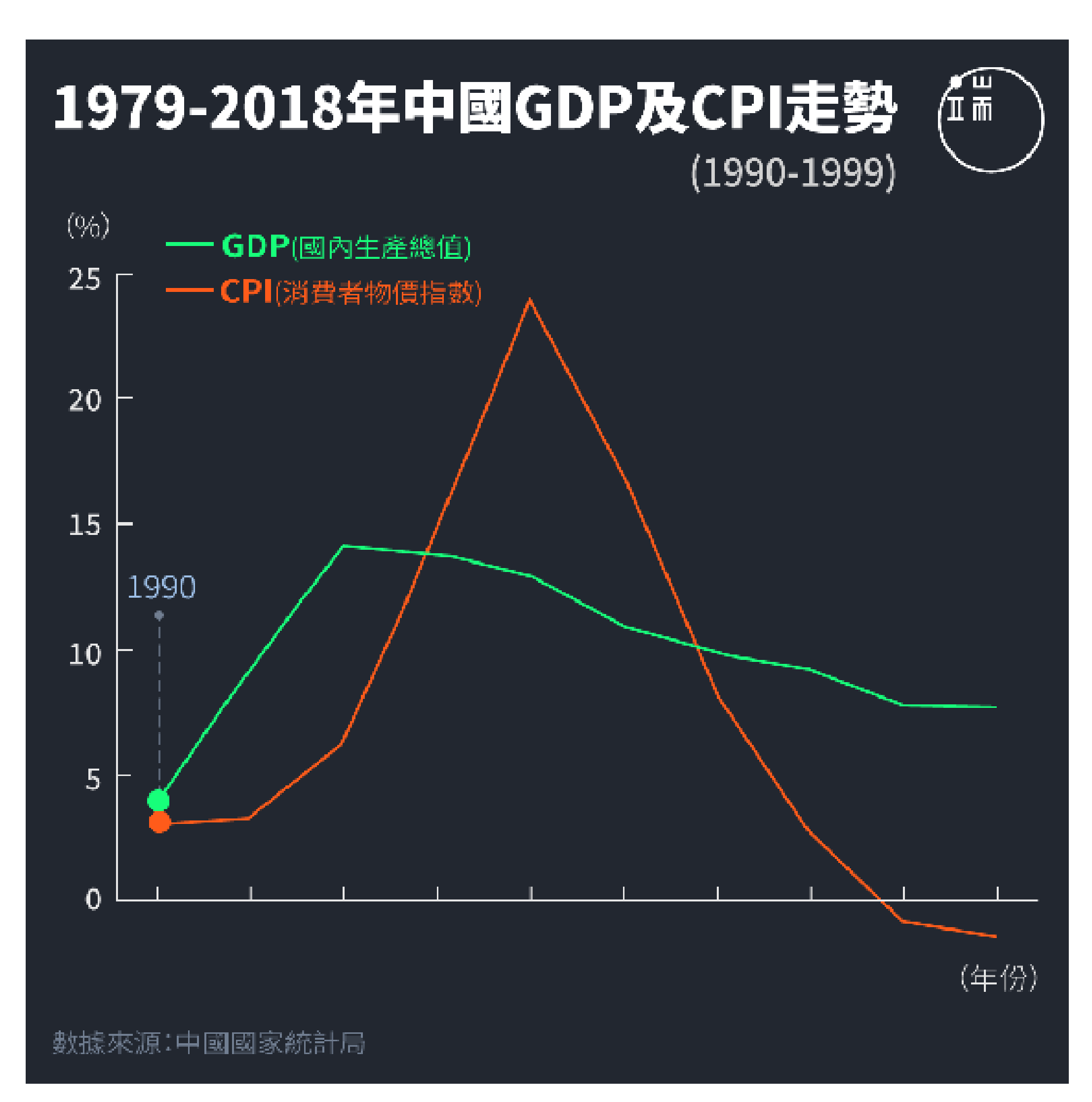
張曙光，《中國經濟學風雲史》，上卷（II）.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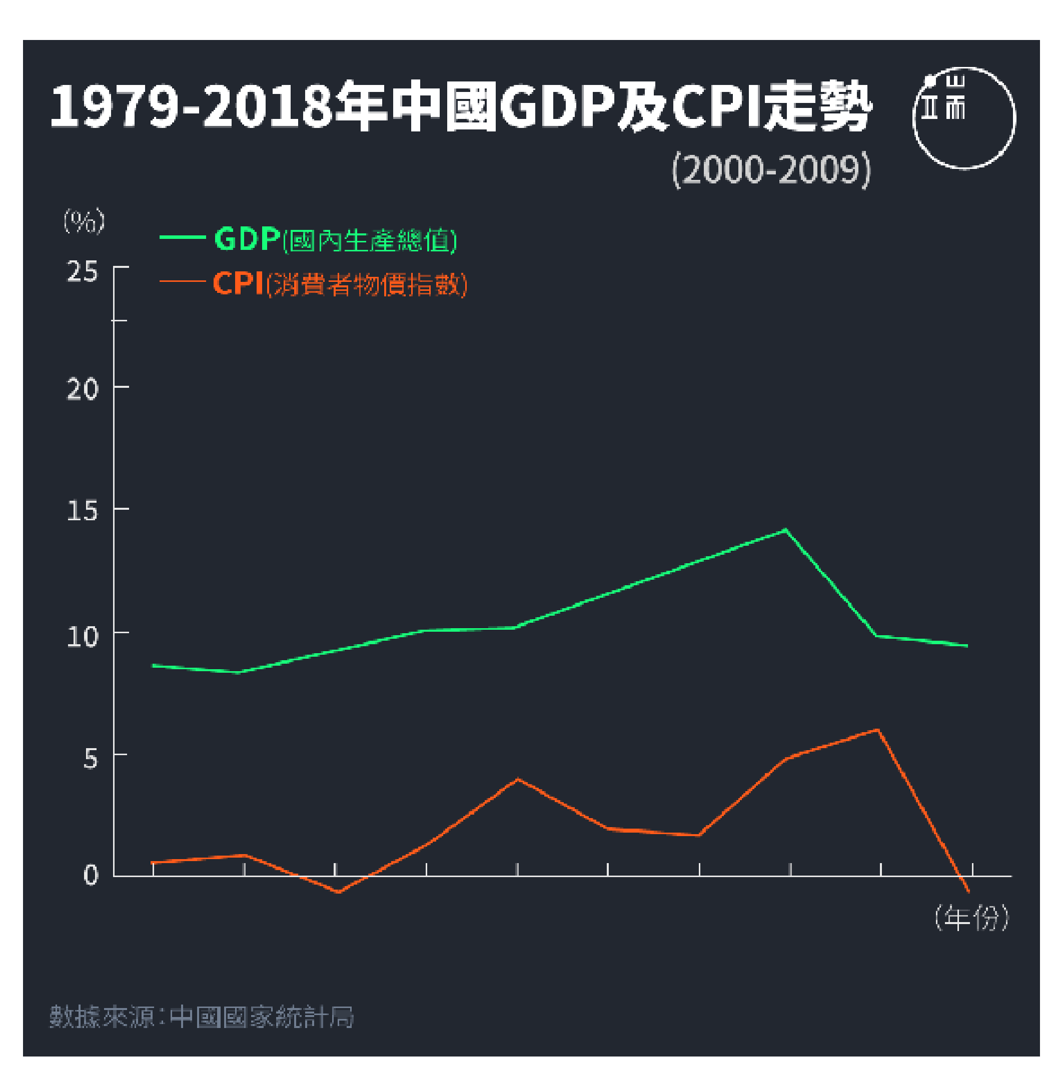
*1989年4月間，與學生幾乎同時開始在天安門廣場聚集的，是北京的工人和市民。六四運動中，抗議通貨膨脹、抗議「官倒」及抗議腐敗的訴求貫穿始終。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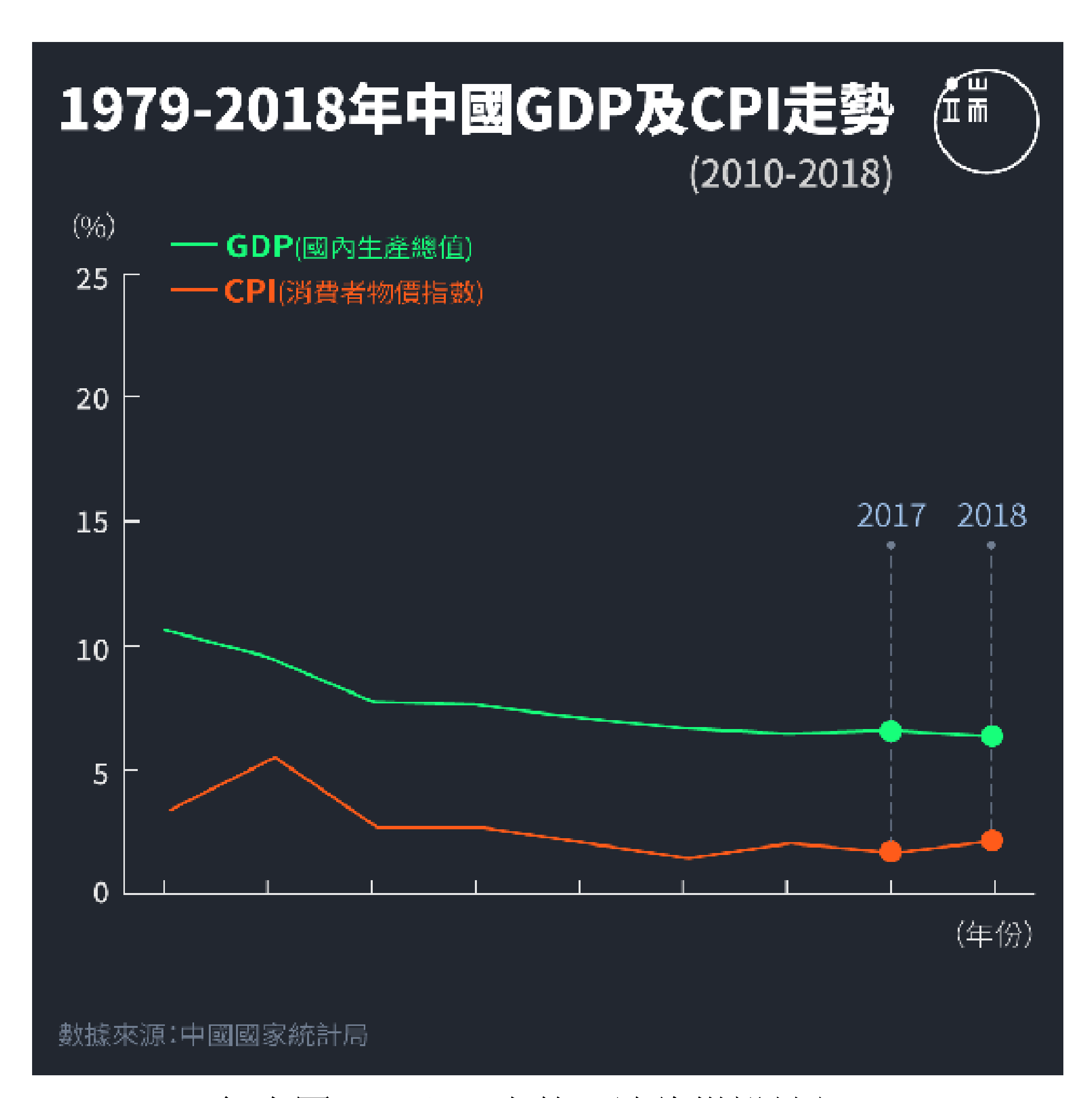

*1979-2018年中國GDP及CPI走勢。端傳媒設計部*




*1979-2018年中國GDP及CPI走勢。端傳媒設計部*




*1979-2018年中國GDP及CPI走勢。端傳媒設計部*




*1979-2018年中國GDP及CPI走勢。端傳媒設計部*



*1988年中國的官方通貨膨脹率是19%，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按照這個速度，物價每三年多，就要翻一倍。*

*攝： VCG via Getty Images*



*1958-1962年期間造成上千萬人死亡的大饑荒原因之一就是以「配額」取代「價格」的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嚴重扭曲資源配置，造成生產嚴重不足。攝：George Silk/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1988年，國務院改革方案研究領導小組提出一份價格、稅收、財政、投資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建議以鋼材為突破，用兩年的時間完成「兩軌並一軌」，使鋼材價格全面市場化。攝： Keystone-France/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1988年5月，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過五關斬六將」談話。攝：John Glannini/AFP/Getty Images*

# 邊緣化的六四論述：八九春夏，其實發生的是「兩場運動」

特約撰稿人 吉漢|2019-05-29

關於六四運動的歷史敘事，比較常見的是兩種版本。其中最為主流的版本，當然是把運動放在「民主vs威權」的框架下來理解。這一敘事中的「民主」，往往指的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民主。80年代，中共逐漸告別「階級鬥爭」的傳統話語，開始走一條重視經濟發展的務實路線。市場化改革伴隨着思想和言論領域的放鬆，西方自由主義思潮開始在大陸青年與知識分子中流行。隨着知識分子對歐美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了解加深，自由民主價值的實現也成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期望所在。

然而令知識分子和學生們感到失望的是，80年代中共政治改革、政治自由化的進展遠遠滯後於市場化經濟改革，而且幾次出現倒退——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對以「放開民主選舉」為主要訴求的一波高校學生運動的鎮壓，這次鎮壓直接導致了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下台。在這一敘事中，這些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們，逐漸累積的不滿

終於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徹底爆發，他們走上街頭，希望當局加速推進此前頻頻受阻的政治自由化進程，從而讓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齊頭並進。

而另一種講述六四運動的敘事，則是將運動放在「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的框架下理解。這一敘事在公共輿論中的影響力雖然遠遠不及第一種，但在一些特定的左翼社群——比如中國大陸的一部分毛主義左翼、西方的一部分反斯大林主義左翼——中頗為流行。在這一敘事中，1980年代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將中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帶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變革過程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也造成了大量腐敗問題，降低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民主vs威權」敘事不同，「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的敘事認為學生、工人、市民不滿的真正原因是市場化改革所造成的一系列經濟亂象，這些不滿聚焦為對腐敗官員的憤怒。

在這一敘事看來，六四運動是一場由經濟訴求引發的反市場化改革、反資本主義運動。它的核心訴求並不是民主，而是反對市場化改革和資本主義轉型所帶來的一系列弊端。「反腐敗」、「反官倒」、「控制通貨膨脹」的口號的確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遊行和集會中隨處可見，也是學生代表和政府官員對話時提出的核心訴求；學生、工人、市民只是希望當局解決腐敗、官倒（官員利用政治權力在市場中倒買倒賣）、貧富差距擴大、通貨膨脹失控的問題，這一希望並不意味着

參與運動的人們都支持以「民主」為核心的政治改革。這一敘事背後隱含的一層預設是，既然運動抗議的對象是鄧小平時代經濟改革所帶來的一系列亂象，那麼運動參與者的憤怒中也必然帶有對於經濟改革之前的那個時代——毛澤東時代——的些許懷念。

這兩種敘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問題的。在「民主vs威權」的敘事中，運動的主角幾乎永遠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嚴重忽略了同樣踴躍參與運動、在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人和市民。事實上，不管是從六月三日晚上、六月四日凌晨清場的死傷狀況看，還是從運動過後當局的鎮壓力度看，工人、市民所付出的代價都要遠遠大於知識分子和學生。這一局面和1980年韓國光州運動相似。而在「民主vs威權」的敘事裏，工人和市民幾乎完全失去位置。

「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的敘事雖然提及了工人和市民在運動中的角色，但完全不能解釋關於這場運動的最基本事實：對於「民主」的訴求，毫無疑問是這場運動的核心主題，這不是「反資本主義」、「反市場化改革」可以概括的。更何況，雖然對於市場化改革的不滿確實是刺激工人和市民參與運動的重要因素，但在運動中幾乎沒有出現任何對於毛時代或者毛本人的懷念。換句話說，參與運動的許多人固然對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後果不滿，但他們所希望的，並不是簡單倒退到市場化改革之前的時代，也不是僅僅希望當局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

而是用一種全新的、系統的政治想像，提出了既拒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拒斥市場化改革的替代方案。

對於六四運動的深入理解，需要我們同時跳出這兩種敘事：既告別「知識分子中心論」、重視工人和市民的參與，同時承認「民主」的確是工人和市民參與運動的核心訴求。最關鍵的是，工人與市民所理解的「民主」，和學生、知識分子所擁抱的民主觀念有很大不同：那是一種突出工人階級主體性的社會主義民主（後文會詳細介紹這種社會主義民主的想像）。作為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運動，六四的這一維度極為重要、卻又極容易被忽略。

## 八九中的工人運動

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龔小夏在199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為線索，深入梳理了工人、市民參與六四運動的過程。在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逝世之後，各大高校的學生開始在校園內為胡耀邦設立靈堂。與此同時，開始有工人和市民三三兩兩地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交換對於時局的看法。此後幾天，工人和市民的聚集人數增多，達到數十人。在「新華門事件」之後，被警方粗暴對待學生所激怒的少數工人決定成立一個組織，這便是「工自聯」的前身。也就是說，「工

自聯」的成立還要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早幾天。

然而，彼時的「工自聯」只是幾十人組成的非正式組織，既沒有公開活動，也沒有成型的組織結構，甚至成員彼此之間也不熟悉。在四月份，運動的節奏一直牢牢掌握在學生手裏。從4月17日的天安門廣場遊行、到隨後的「新華門事件」、到4月22日胡耀邦葬禮當天的遊行、再到4月27日抗議《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十萬學生大遊行、最終到5月4號更大規模的紀念五四遊行，這一系列示威活動的參與者基本完全由學生組成。

然而5月4日之後，學生運動轉入低潮，大多數學生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從，也對運動的進一步升級心懷疑慮。許多學生結束了罷課。在運動面臨停滯不前的困境下，一部分較為激進的學生開始計劃絕食行動，希望藉此將參與熱情維繫下去、把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在這個意義上，絕食的學生也的確實現了他們的目標。5月13日，數百名學生絕食的第一天，天安門廣場上參與示威的人數多達30萬，創下了運動開始以來的記錄。

絕食的開始，對這場運動的走向來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點。大多數學生的參與熱情雖然在短時間內再次被點燃，但還是不可避免地繼續衰落下去。在5月13日之後，學生的參與整體上不斷下跌，逐漸顯

露出頹勢，越來越多人從廣場上撤回。然而，學生絕食行動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工人和市民的參與。普通工人的熱情，不僅體現在參與人數上，更體現在工人開始自發組織他們自己的示威遊行、打出他們自己的橫幅和標語。工人逐漸成為運動的主力。刺激工人大規模參與運動的，既有對於絕食學生的樸素的同情心——或者說「心疼」——也有對於政府在絕食學生面前不為所動的道德義憤。用我所訪談的一位參與運動的北京工人的話說，他只是覺得「政府這麼欺負學生太過分了」。隨着工人蔘與人數的暴增，「工自聯」開始在五月中旬公開活動，大範圍招募會員。

進一步刺激工人參與運動的，則是5月20日戒嚴令的頒布。在軍隊浩浩蕩蕩地從四面八方開進北京城的時候，無數工人和市民自發在城市外圍的各個地方阻攔軍隊進城。他們排成人牆、堆起路障，阻止軍隊進一步前進。他們給士兵們提供食物和補給，和士兵建立友誼和信任，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勸說士兵們放下武器。換句話說，在戒嚴開始、局勢的危險程度大大增加之際，敢於和最為強力的國家暴力機關正面對抗和交涉的，不是學生，而是工人。而工人們也確實取得了暫時的勝利：軍隊進城的步伐被阻攔了。

歷史學者吳仁華在《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中也回憶說：「在八九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天

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着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

用德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羅莎·盧森堡的話說，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是在鬥爭過程中不斷培養起來的。六四運動也印證了這一點。在阻擋軍隊進城的過程中，工人們逐漸意識到他們自發的組織和行動當中所蘊含的巨大能量。這像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自我解放。一大波「自我組織」的浪潮開始了。根據魏昂德和龔小夏提供的數字，從五月中旬開始，工自聯的成員人數開始暴增，到六月上旬已經多達兩萬人。與此同時，其他各式各樣的工人組織也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

組織的發展帶來行動的激進化。工人們開始組織各種「糾察隊」、「敢死隊」等等帶有自我武裝性質的類民兵組織，以便及時觀察、傳遞軍方的動向，同時維持城市治安、不給軍方鎮壓提供藉口。魏昂德與龔小夏的論文也指出了這一點。我曾經訪談的一位運動親歷者回憶說，工人開始阻攔軍車的一週之後，光是長安街西向延長線北側（也就是木樨地、軍事博物館北側）的月壇、甘家口一帶，就活躍着十幾個工人糾察隊。工人們三班倒或者四班倒，及時觀察社區和街道上的情況、幫助維持秩序。我曾經訪談的另一位運動親歷者說，這時候的北京幾乎成了一座工人和市民自我管理的城市。這讓人不由想起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間那段時間，俄國工人階級成立的自我武裝組織。

同時，工人們開始在更多的街道上築起堡壘和工事。不少工廠的工人們開始有組織地發起罷工和磨洋工。鮑樸整理的《李鵬六四日記》也顯示，到五月底，已經傳出消息說首都鋼鐵廠（「首鋼」）的十萬工人正在籌備罷工，令中共高層震動。首鋼是當時北京規模最大、最具標誌性的工業企業之一，一旦首鋼工人罷工，很可能在整座城市掀起大規模的罷工潮。而且當時工自聯已經明確提出「籌備發起總罷工」的口號，不少工人着力在各個工廠之間建立聯繫，為總罷工做準備。

自我武裝、自我組織、發起罷工，這些行動的意義與示威、遊行、佔領不同。後者的意義主要是「自我表達」，而工人的這一系列行動，本質上是「自我賦權」，是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取得控制生產、管理社會的權力。這些行動本身，就具有遠超出示威、遊行、佔領行動的激進性。這便是運動發展到五月底、六月初時面臨的情形：學生的運動陷入瓶頸，規模滑坡、內鬥不斷；工人的運動卻在不斷升級的自我組織、自我動員中發展壯大，激進性與日俱增。

我們無從確證當局為何在6月初最終下定決心暴力清場。我認為，一種不無道理的猜測是：讓當局恐慌的不是已經顯露頹勢和敗相的學生運動，而是快速發展、不斷激進化的工人運動；工人們的自我武裝、自我管理，以及總罷工的籌備，才是令當局真正害怕的。而清場當天與清場之後的種種行動也確實表明，當局對工人的鎮壓烈度（人數和判

刑）遠遠大於對學生的鎮壓——這一事實既被歷史學家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研究和吳仁華的《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所記錄，也被我訪談的六四親歷者所證實。

**知識份子與工人的兩種民主想像**

在運動展開的一個多月中，話語權和媒體的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學生和知識分子身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表達能力、外語能力、和媒體互動的能力更強。相對學生而言，工人一直處在失語的位置上。而正如前文所討論的，工人們對於民主權力的追求，首先不是體現在他們的言說當中，而是體現在他們的行動當中。用行動爭取權力的過程，本身就彰顯着工人們的主體性，本身就是一種激進的民主想像。

此外，雖然工人在參與運動過程中留下的言說和文字少於學生，但如果我們細細檢視這些言說，便會發現：工人們對於「民主」的表述，是獨特的、不同於學生的。

從魏昂德和龔小夏對於「工自聯」傳單的分析來看，工人們首先關注的當然是與切身生計相關的經濟議題：通貨膨脹、貧富差距。這些市場化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當然使得城市工人對市場化改革態度極為負面。然而，工人們並不是就經濟論經濟，而是為經濟議題提供政治化

的解讀，並以此為基礎建立關於民主的論述。在工人們看來，不管是通貨膨脹還是貧富差距，造成問題的根本原因都是官僚系統：「斯大林主義式」的「專制官僚」——這樣的詞語在工自聯的傳單中反覆出現。

在工自聯看來，之所以出現通貨膨脹，是因為控制生產定價和進口環節的官僚們故意把商品價格定高、從而在中間賺取利益。因此，解決通貨膨脹和貧富差距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推翻官僚制、將產品的生產和流通過程控制在工人自己手上。這種以反官僚為基礎的民主論述，不禁讓人回憶起1966-1967年早期文革運動中的工人造反派。

工人們對於官僚制危害的切身體驗，並非來自於在政治生活中缺少言論自由和選舉權，而是在工作場所中缺少話語權。「專制」的最徹底體現，是企業中的廠長負責制。魏昂德和龔小夏所採訪的一位工自聯成員說到：「在車間裏面，是工人說的話管用，還是領導說的話管用？我們後來聊過這個。在工廠裏面，廠長就是獨裁者，他說什麼就是什麼。如果你從工廠出發看這個國家，就能發現其實是一回事：一人專制。我們的目標並不高，就是希望工人能有自己的獨立組織。」

也就是說，參與運動的工人毫無疑問是在為民主奮鬥，但工人眼中的「民主」首先是工作場所的民主、是勞動權益的民主。工自聯對民主的論述，從始至終交織着對官方工會系統（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批

評，認為官方工會無法真正代表工人，希望工人有組織獨立工會、監督企業管理者、集體談判的權利。在工自聯看來，這種「工人自治聯合會」的組織形式提供了一個契機，鼓勵更多的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場所成立自治組織，讓工人們聯合起來和官僚抗衡。這遠遠超出對市場化改革本身的反對，而是直擊市場化改革的政治基礎：官僚獨裁。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對工作場所「廠長獨裁」的體驗，還是對於整個國家政策層面經濟轉型的無力感，都讓工人們更加確認「官僚獨裁」才是問題的根源。我曾經訪談過的親身參與六四運動的幾位工人也表示，在他們看來，1980年代末期的經濟政策反覆無常、自相矛盾，一會兒過於寬鬆造成大規模通貨膨脹，一會兒又過分緊縮造成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吃虧的總是工人。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表明執掌國家權力的官僚們顢頇無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官僚們見風使舵、讓改革為自身的利益需要所服務，不顧工人的死活。魏昂德和龔小夏所訪談的多位工人，也表示了類似的意思。

因此工人所定義的「民主」，是推翻官僚制、用工人階級的自我管理取而代之，而實現這個目的的第一步，就是爭取工作場所的民主、建立工人的自我組織。

這一民主構想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它建立在工人階級的主體性之上。這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構想，和學生、

知識分子對民主的認知有很大不同。在後者的論述當中，「民主」是由一系列普世的自由價值構成的。雖然學生們同樣要求嚴查腐敗、清除官倒，但這一訴求所指向的是抽象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而不是像工人一樣，認為民主首先應該建立在工作場所和勞動過程之中。

在工人眼中，民主和市場化改革是截然對立的。市場化改革讓本就掌握巨大權力的官僚們更加肆無忌憚，市場化改革和官僚獨裁兩者相輔相成，因此必須同時推翻；而在學生眼中，民主和市場化改革是相伴相生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的腐敗、官倒等問題，是市場化改革不完善的結果，更是民主化改革沒能跟上市場化改革的寫照。因此學生開出的藥方，是讓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行。事實上，在被稱為「六四運動預演」的1986-1987年學生運動浪潮中，「繼續推進經濟自由化」就已經被學生們列為抗議的核心訴求之一。

工人所要的民主和學生所要的民主，前者是建立在階級話語基礎上的民主，後者是去階級化的民主；前者首先指向工作場所的民主，後者則是在抽象的個體自由基礎上的民主；前者是拒斥市場化改革的民主，後者是擁抱市場化改革的民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工人們所追求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而學生們所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民主。

**無法形成的跨階層聯盟**

工人與學生在六四運動中的參與軌跡不同，對於「民主」的認知也大相徑庭。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在整個運動中，工人與學生之間為何存在巨大的鴻溝。

這種鴻溝，首先體現為學生對工人參與運動的排斥。學生們認為這場運動應該是完全屬於學生自己的，並竭力保持運動的「純潔性」。魏昂德和龔小夏指出，在五月底之前，學生們一直排斥工人組織進駐天安門廣場。學生們甚至不願和工人組織溝通，尤其是不待見建築工人的組織（當時的建築工人主要都是北京周邊郊區的農民）。邁斯納的研究也表明，在學生組織的幾次大遊行中，學生們手挽着手、在道路兩側搭起人牆糾察線，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市民「混入」遊行隊伍當中。也有運動親歷者表示，學生們在調配香港和海外捐贈的補給物資時，特別注意不讓這些物資落入工人手中。

這裏恰恰蘊含着這場運動的諷刺之處。運動中的學生領導者多次表明要用自己的行動「喚醒」民眾，但從上述種種表現看，他們對那些根本沒有在睡覺、不僅醒了而且還積極參與運動的民眾愛答不理。這種精英主義的自我優越感，一方面來自於精英高校學生的「天之驕子」心態，另一方面還透露出古典的中國士大夫情懷：將自身看作是社會的道德擔當，是整個國家的良心所在，肩負着為民請命的重擔。這便

是學者趙鼎新曾經指出的關鍵事實：在運動中，學生使用的話語是西方自由主義話語和中國傳統道德主義話語的混合體。

在學生的排斥之下，不少參與運動的工人也開始對學生失去信任。在工人看來，學生們自我感覺過於優越、不尊重工人，只會空談大詞而不解決實際問題。最讓工人警惕的是，他們所憎恨的官僚制精英做派，開始在學生身上出現。學生的組織中充斥着各種「主席」、「總指揮」的名頭，而且內部權力鬥爭不斷。相反，以「工自聯」為代表的工人組織，內部結構往往扁平化，不突出個人的領導地位。

更讓工人接受不了的，是運動中的學生領袖享受特權。當時在工人當中就有傳言，說柴玲和封從德的帳篷裏鋪着一張席夢思床墊。這傳言的真實性無從考證，但從中可以看出：任何與等級制、官僚化有關的跡象，都深深切中工人的痛點。

與此同時，學生和工人在運動策略層面也存在分歧。從運動剛開始時，學生就擺出懇求當局的姿態，寄希望於能感化當局、使得當局讓步，從而實現改革。為了爭取當局信任，學生在遊行示威中還特意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標語。相比之下，工人們就沒那麼客氣了，工自聯的傳單中一直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壓迫。

到了五月份，在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對「如何回應運動」產生分歧時，一部分學生們寄希望於和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合作，利用黨內領導人之間的派系衝突為自身爭取空間。這也是為什麼，學生堅決反對工人的總罷工主張，認為那是「搗亂」。而在工人看來，學生的策略不可理喻，趙紫陽就是利用市場化改革為自身牟利的專制官僚的典型代表，溫和派和強硬派沒有本質區別。工自聯甚至指出，和黨內官僚合作的結果，就是運動成為官僚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正如鄧小平借1976年的「四五運動」上位一樣。工自聯認為，運動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靠運動參與者在不斷的自我組織、自我武裝中積蓄力量，最終將官僚推翻。這也是為什麼，工自聯在傳單中號召大家向法國大革命學習、「攻陷20世紀的巴士底獄」。

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1989年所發生的不是一場運動，而是兩場運動。學生的運動和工人的運動，雖然發生在重疊的時間和空間，相互之間也有交叉和互動（工人五月中旬開始的大規模參與最初也是為了聲援和保護學生），但始終沒有匯合到一起。學生和工人之間，沒有互信，沒有充分的溝通，也沒有戰略層面的協調，更沒有「並肩作戰」的團結感。

1989年發生的事，和七十年之前發生的五四運動形成鮮明對比。五四運動中，在最初主要由學生參與的遊行示威浪潮後，不少學生轉而在市民和工人中間進行宣傳、組織和鼓動，最終在6月份引發上海工人的

總罷工，這才使得北京政府向學生訴求妥協。在中共官方的歷史敘事中，五四的意義恰恰在於，學生們在總罷工中認識到工人所具有的巨大政治能量，因此一批學生開始專注投入工人的組織、與工人建立紐帶、動員工人抗爭，並在此過程中完成了馬克思主義轉向。

使五四運動在中共官方敘事中顯露出獨特意義的元素，恰恰就是六四運動所缺少的元素。

**工人與學生的團結感，從什麼時候消失了？**

如果要追溯1989之前中國學生與工人在社會運動中建立團結的例子，其實並不需要追溯到遙遠的1919年。學者安舟（Joel Andreas）即將出版的新書指出，在文革剛剛啟動的1966-1967年，學生和工人之間的串聯十分頻繁，這是運動得以發展的關鍵。工人走訪各個高校，學習學生開展運動的經驗，而許多學生也來到工廠，幫助工人在工廠裏成立「造反」組織、表達自己的訴求。

從1966年到1989年，短短二十多年間，學生和工人之間的團結感消失了。這是為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通過回顧這二十多年的歷史來尋找。

毛澤東之所以在1966年發動文革，是因為他認為黨內的官僚主義現象已經嚴重到不少官僚希望恢復資本主義路線（也就是所謂的「走資派官僚」）的地步，因此只能通過大規模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將走資派從黨內清除，並實現毛個人在黨內的權力進一步集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毛看來，群眾運動的意義是為了改革體制，不是推翻體制。出問題的不是體制本身，而是體制裏的一部分人，因此只要通過群眾的力量將這些人像切除腫瘤手術一樣除去，體制就還能正常運轉。這也是為什麼，毛在一系列表態中都反覆強調大多數共產黨幹部是好的，走資派只是少數。

然而毛沒有想到的是，在他發出了群眾運動「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號召之後，群眾「造反運動」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目標，也越來越不受他控制。或者說，毛只是想打開一道縫隙，但工人和學生（尤其是工人）自我組織的激進動能卻通過這個縫隙噴湧而出。 學者吳一慶的研究表明，1966年底，在毛發出鼓勵群眾建立自發組織的號召之後，城市中的臨時工人、非正式工人就開始積極成立「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等組織。這些組織並不是按照毛的預想、挑戰和批判所謂的「走資派官僚」，而是批判充滿歧視和不公的二元用工體制，要求當局做到「同工、同籌、同權」。這一系列挑戰制度性用工歧視、追求平等的組織和運動，被文革領導層扣上了「經濟主義」的帽子，最終遭到鎮壓。

1967年一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取代了原先的上海黨政機關，被毛和其他文革領導人讚揚為「群眾奪權」運動的典範。但在「上海柴油機廠工人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等激進工人造反派組織看來，以毛為首的文革領導層只是借用了「群眾奪權」的名義，實際上在上海建立了由軍方主導的「革命委員會」，並不是由真正的工人和群眾掌握政治權力。「聯司」認為官方在強力恢復秩序、鎮壓造反運動。「聯司」希望成立真正由工人階級自我管理的巴黎公社體制，和「革命委員會」進行了長達數月的武裝鬥爭。

同時，也有許多工人和學生「造反派」，順着毛對「官僚主義」、「走資派」的批判繼續思考，最終得出了比毛更激進、更深刻的結論。在這些工人和學生看來，毛準確地抓住了官僚主義的現象，但他開出的藥方是錯的；官僚主義的源頭不在具體的官僚個人身上，而在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這種體制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的。他們認為：要徹底破除官僚主義，只能通過廢除一黨專政，真正由工人按照民主的方式自己管理生產資料。在這一思考方向上最有代表性的論述，來自於「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在這些論述中，清晰顯現着馬克思本人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構想。

這些「造反派」運動超越了毛所設定的議程範圍，明確挑戰了文革領導層的權威，並且開始號召系統性變革和制度化民主，因此令毛和文革領導層大感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從1968年開始，毛公開允許軍方

介入，對「造反派」進行了大規模鎮壓。根據魏昂德的研究，文革中所造成的死傷當中，絕大部分都來自於1968年以後官方對「造反派」運動的鎮壓。從傷亡數字看，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官方鎮壓事件。在一些城市，工人造反派組織還和前來鎮壓的軍隊展開巷戰，但最終慘烈失敗。與鎮壓同時，官方也開始批判造反派的「社會主義民主」論述，將其斥為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

這是一段讓人唏噓、痛心的歷史：毛所發起的群眾運動，按照不受毛本人所控制的軌跡發展起來，逐漸蛻變為挑戰中共權威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終於讓毛感到威脅，最終親手鎮壓了它。用吳一慶的話說，文革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

1968-1971年的鎮壓運動，影響極為深遠。一方面，大批「造反派」工人和學生被肉體消滅，這一部分遭到鎮壓的「造反派」是最富戰鬥性、組織力最強、思想最激進的一群。另一方面，毛從鼓勵「造反」運動到鎮壓「造反」運動的「180度大轉彎」，也讓許多工人和學生陷入政治幻滅和虛無，不願再參與政治。許多工人覺得毛背叛了他們，更認為其他文革領導人——如陳伯達、江青等——是機會主義者，只想通過運動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出人意料地為「造反派」發泄對1968-1971鎮壓運動的不滿提供了機會。在今天看來，「批林批孔」運動是

十分詭異的，林彪和孔子這兩個人風牛馬不相及，怎麼會放在一起批判？江青等文革領袖們之所以發起如此詭異的運動，還是因為想借此在中共高層政治中打壓異己、強化自身權力。

工人「造反派」的確痛恨林彪。在1971年政變失敗身亡之前，林彪的權力基礎主要來自軍隊，在軍方鎮壓「造反派」的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領導角色。因此，一些在1966-1967年活躍、後來受到鎮壓的「造反」運動參與者，藉着「批林批孔」運動的機會，大力批判林彪、抒發對鎮壓時期的不滿，希望重啟1966-1967年的群眾民主運動。這其中最典型的論述，就是廣州出現的以「李一哲」為筆名的大字報，影響遍及全國。

但「批林批孔」運動的結果讓「造反派」們感到失望。李一哲的號召沒有得到毛本人的支持，一些文革領袖甚至主張禁止大字報繼續流傳。這使得造反派對文革領袖、乃至對毛本人的不滿進一步激化，直接導致了1976年「四五運動」的發生。

「四五運動」發生在1976年清明節前後，許多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剛剛逝世不久的總理周恩來。但在悼念周恩來的同時，運動參與者實質上是在發泄對文革領袖的不滿。天安門廣場上到處都是「打倒慈禧太後」、「打倒英吉拉-甘地」的標語，暗諷以江青為代表

的文革領袖。更有甚者，運動中甚至出現了「打倒秦皇」的口號——「秦皇」所指的，正是毛本人。

「四五運動」的爆發，標誌着民意對文革領袖和毛本人的反感達到頂峰。正是藉助這一民意基礎，中共黨內的部分官僚才得以在毛去世之後，憑藉宮廷政變完成了對文革領袖的清繳。反過來，文革領袖們的覆滅，也再次點燃了一些「造反派」的希望。他們盼着當局能為他們所遭遇的不公與鎮壓平反，也盼着高壓的政治環境能夠鬆動。同時，1976-1978年間的鄧小平，為了在和華國鋒的黨內權力鬥爭中鞏固自己的民意支持，也確實釋放了一些政治寬鬆的信號，進一步強化了造反派的樂觀。

造反派的樂觀情緒，終於在1979年匯聚成了「民主牆運動」。邁斯納指出，參加這場運動的主力，多是在1966-1967年活躍、之後遭到鎮壓的工人、學生「造反派」，而不是知識分子。「造反派」們組成政治社團、組織公開討論、發行自己的出版物、張貼大字報。運動的影響很快就從北京向其他城市蔓延。他們的論述，着力批判官僚主義、和導致官僚主義出現的一黨專制體制，復活了文革早期的社會主義民主論述。對於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而言，這場運動的意義也恰恰在於：1966-1967年的那場運動，在遭到強力鎮壓後，終於有了再次向前推進的機會。從這個角度說，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是1966-1967之後的第二次社會主義民主運動。

1979年，鄧小平已經在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中取得勝利，成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1966-1967年的運動讓毛澤東感到多恐慌，1979年的運動就讓鄧小平感到多恐慌。像毛澤東一樣，鄧小平同樣開始鎮壓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並說他們是「無政府主義分子」。對民主牆運動的鎮壓，使得工人和市民在1968年之後不斷累積的政治虛無感更強烈了。在此之後，社會主義民主的論述幾乎完全從公共輿論中消失。這一論述的消失，也意味着階級話語在政治中變得越來越邊緣化——畢竟，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就是將「民主」放在階級話語中來理解。這一變化，和鄧小平越來越強調「不爭論」的實用主義政策路線、越來越遠離「階級鬥爭」話語的趨勢在時間上一致，可以看做一枚硬幣的兩面。

「民主牆運動」被鎮壓，導致工人階級在公共空間中被消聲，政治討論越來越成了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專利。隨着社會主義民主論述和階級話語的退場，關於「民主」的討論也在自由主義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明顯的例子是，到了1980年代後期，關於「民主還是威權」的知識分子討論，往往都預設了市場化改革本身的正當性。學者陳佩華（Anita Chan）指出，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討論，幾乎從來不會提及工人階級。

今天的許多論述，往往都對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抱有一種浪漫化的想像，說那是一個自由的、充滿希望的理想主義時代。然而事實上，如果我們要評估1980年代，就不僅要考慮我們看到了什麼，還要考慮我們沒有看到什麼。西方思潮的引入、言論空間的放鬆、社會團體的活躍，這些現象的背後是工人階級在政治生活中的退場、社會主義民主論述的消失，而這來源於民主牆運動的慘烈結局。換句話說，1980年代的「自由」，恰恰是政治鎮壓的產物。

我們如果要討論「自由」，就必須要問：究竟是誰的自由？1980年代的自由化紅利，不管是輿論的放開、思想的多元還是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基本完全被知識分子和學生所享受。鄧小平為了鞏固自身民意、贏取市場化改革的合法性，大幅提高知識分子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而且大大強化了高等教育的精英主義色彩。這使得知識分子和學生參與政治討論的過程，也同時成為了不斷強化自己精英身份認同的過程。80年代末廣受關注的紀錄片《河殤》，就是這種精英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

與此同時，城市工人階級享受了什麼「自由」？1980年代對工人生活影響最大的改革，可能並不是價格改革，而是國企經營權的下放和廠長負責制的推行。這一系列改革，大大強化了國企管理層的自由裁量權和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成為常態的廠長專斷制度，幾乎等同於事實上的廠長私有制。隨着職工代表大會漸漸名存實亡，工人在工廠中有

限的民主決策渠道也成為一紙空文，工人在勞動過程中越來越直觀地體會着「官僚專制」。隨着工人覺得在工廠中「被壓迫」、「受欺負」、「失去尊嚴」、「越來越不平等」，國企管理層只能通過物質激勵手段來調動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換句話說，工人物質待遇的提高，恰恰是他們在勞動場所的民主權利被大大削弱的結果。而到了1980年代後期，工人們的物質待遇隨着通貨膨脹止步不前、甚至不升反降，工人的不滿情緒更加強烈。

因此，整個1980年代，一直見證着學生、知識分子群體和工人階級的分化過程。而這種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毛時代、鄧時代兩次對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鎮壓，最終使得階級話語在政治中被邊緣化。到了1989年，積累了強烈不滿的工人們終於爆發，在1966、1979年曾經出現過的社會主義民主論述再次成為工人的武器。而不幸的是，在長期的分化過程之後，此時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訴求既不理解、也不關心。

**分而治之，威權維持的關鍵？**

到了90年代，知識分子群體和工人階級的分化進一步加劇。當局對於參與六四運動的學生與工人的不同態度——對學生們蜻蜓點水地「小懲大誡」，而對工人們嚴酷鎮壓毫不手軟——也成為貫徹整個90年代的主題。

90年代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加速，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批受過精英教育的大學畢業生們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機會。早有觀察者指出，許多參與過六四運動的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在市場化浪潮中，搖身一變成了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變成了擁護共產黨現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某種程度上，市場化改革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共產黨當局對那一代六四運動學生參與者的吸納和收買。我接觸過不少在80年代末就讀北京名校的大學生，他們幾乎全都參與過1989年的遊行示威活動，但今天作為光鮮體面的中產階級，信奉「穩定至上」。回首往事，他們認為自己當時參與民主運動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現，是「受人操縱」的。

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在「收買」學生和知識分子群體的同時，對城市工人階級造成了毀滅性打擊。隨着大量的國有企業改制、裁員、私有化，無數城市工人被迫下崗或買斷工齡，失去了工作機會和基本的勞動保障。分析者歷來認為，驅動當局開啟國企改制的主要是經濟方面的考慮，但回看六四運動的軌跡，我們也許可以猜測——即便這種猜測還缺乏足夠的證據，但或許我們可以去思考和討論——政治動機在當局的決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當局也許正是因為忌憚城市工人階級在運動中表現出的組織力與激進性，才決心在整體上摧毀這一階級。

知識分子群體和城市工人階級在90年代的迥異命運，構成了後六四時代斷裂的社會格局，一直延續至今。這種將不同階級「分而治之」的策略，成為了共產黨威權體制得以維持的關鍵因素。這是六四運動給今天留下的最重要遺產之一。

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革命理論、殖民主義語境下的民族革命理論，還是對於西班牙、韓國、波蘭等國家在20世紀後期民主化運動的研究，都強調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等體力勞動者之間的聯結和合作是政治運動成功的關鍵。然而在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受益於現體制提供的經濟機會，大多對政治抗爭沒有興趣，成為中共威權統治的「基本盤」，與工人階級之間沒有任何團結感可言。在21世紀初期，主要由部分學者、記者、律師、NGO從業者等少數中產階級職業群體所構成的公民社會運動和維權運動，也基本不關注勞工議題。這意味着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盟無法形成，更意味着大範圍的、持久的、既具備組織基礎又具備話語論述能力的抗爭運動幾乎沒有出現的可能。近幾年，一些青年學生介入工人運動的嘗試雖然可貴，但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階級斷裂的社會格局，依然會在中國持續較長時間。

參考文獻

Andreas, Joel. 2009. The Rise of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reas, Joel. Forthcoming.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 Anita. 1990. 「China's Long Winter.」 Monthly Review 41(8): 1-15.

Meisner, Maurice. 1999. Mao's China and After. Free Press.

Walder, Andrew G. and Gong Xiaoxia. 1993.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1-29.

Wang, Hui. 2003.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Theodore Huters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u, Yiching. 201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Zhao, Dingxin. 2001.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李鵬六四日記》，鮑樸整理。

《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吳仁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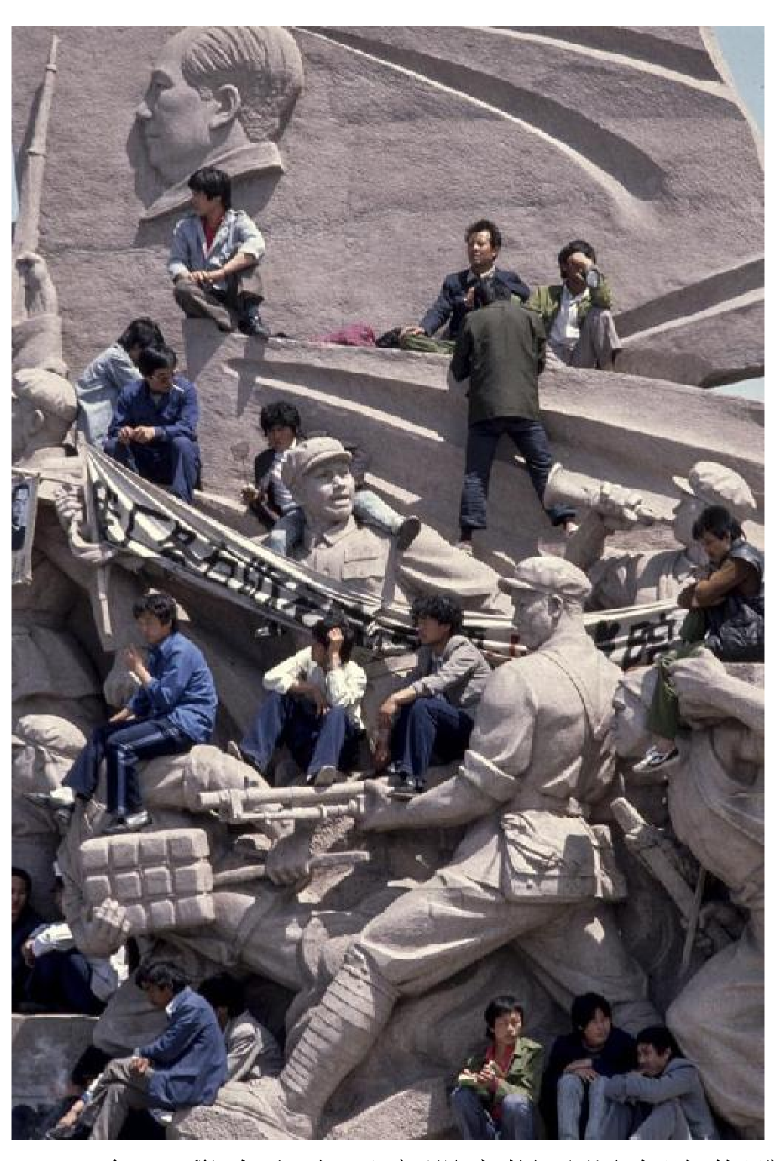
*1989年5月18日，工人在北京街道以電單車遊行聲援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攝：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1989年6月1日，北京留守天安門的示威學生在廣場彈吉他。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5月18日，超過一百萬中國工人湧入北京街頭，支持天安門民主運動。攝：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1989年，學生爬上天安門廣場毛澤東陵墓雕刻上抗議。攝：Peter Turnley/Corbis/Getty Images*



*1989年6月1日，北京的學生示威者帶著“民主女神”像前往天安門廣場。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 「北京公社」的八個瞬間（上）：六四三十年，對於「反思」的反思

特約撰稿人 吴强|2019-06-01

對於親身經歷過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的人來說，過去三十年意味着什麼？還在記憶中留下什麼？這大概讓年輕人、媒體或是國際社會感到好奇。

儘管市場經濟早已經最大限度地佔領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和大腦，儘管黨國機器以去政治化和高壓手段儘可能刪除了所有記憶，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每一天，對許多人來說，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在反思中渡過。

而且，三十年間所有的這些改變和刪除本身，理論上似乎也屬於「另類反思」，就像運動結束後，官方組織的批判正是以所謂「反思」的名義進行，然後以實際上禁止紀念、防範反思的方式，無時無刻不提醒人們那個歷史事件的存在，以及對未來歷史進程的意義。

# 反思的反思

直到今天，大概除了婁燁的《頤和園》和若干紀錄片，人們很難看到以六四為背景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對那場運動的反思和討論，也集中在對運動進程的復原和對個人記憶的打撈上，譬如吳仁華在海外收集了三千多名參加「平暴」官兵的證詞，王丹的回憶，趙鼎新運用社運理論分析學運如何在1980年代變動的國家-社會關係中誕生於特定的北京校園空間，等等。

雖然還有不少學術論文和比較社運研究，試圖從更具體的角度解釋運動的起因和失敗，也有劉曉波和丁子霖發起的「天安門母親」運動如同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運動一樣，提醒着這場運動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庭，但是大量的紀念仍然是感傷性的，大量的反思仍然圍繞着「5.13」絕食代表的激進路線的爭論，因此總體上更傾向假設「5.20」戒嚴後如果及時撤出可能帶來和平轉型，從而否定運動的後半階段。

不能不說，這種反思局限在運動的「激進vs温和」路線對黨內分裂的影響上，將運動主體導向黨內兩股力量的競爭勝敗上，也暗合了鎮壓者的鎮壓邏輯和鎮壓後推動市場經濟改革的邏輯，即1989年的民主化條件不成熟，而必須先穩定、再經濟、後民主。

這是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戈巴卓夫（戈爾巴喬夫）時表態的思路，甚至也是鎮壓之後爭取美國合作（乃至在整個1990年代都逐年批准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共識，國際社會也相信，市場經濟發展所促進的公民社會和中產階級力量，最終將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甚至從理論上說，這也合乎後來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者對自由和民主的分開敘述，既得以讓新保守主義在1990年代的中國哲學課堂上大行其道，也為迎合最終的世界範圍內消解民主、即今天的全球民主危機埋下了伏筆。事實正是，中共當局在1989之後的三十年，正是通過所謂改革開放一點點釋放「自由」，而無限拖延着民主化的進程。

這場運動之後的反思就此原地打轉，絕大多數事後反思，就和廣場學生當時眾口一詞地停留在民主的抽象價值和口號一樣，在過去三十年都在繼續尋求當時可能的最終解決，從而困在既有的權力關係中，在與鎮壓者——中共當局——的話語和道義競爭中始終落於下風。廣大同情者對他們、以及整個運動的評價，也難以更有力地向「前後三十年」擴展，或者向更久遠的歷史和未來發生影響。

運動的兩位關鍵人物——劉曉波和趙紫陽——在1989之後雖然各自在困境中繼續以撰寫評論和回憶錄的方式，影響了過去三十年的反對運動和公民社會，但是他們的反思沒有超出國家-社會或政黨-轉型的框架，也未能在更溫和的改良立場上集結力量、推動共產黨的社會民主化。即便更具跨度、可溯及1970年代末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魏京生，也

和他後來在北美所領導的流亡運動一樣微弱；反映這些民主鬥爭歷程的長篇小說戴蘋的《好嗎兄弟》主人公之一魏小濤，今年1月在巴黎去世，和幾年前劉曉波、趙紫陽先後去世一樣無聲，沒有對中國政治發生什麼影響。

**歷史的終點還是起點？**

難道六四運動就此將淹沒在歷史的長河和破碎的記憶中嗎？在20世紀的革命、起義和反抗的歷史中，三十年也許並不是一個太長的時段。譬如，曾經在1998年控訴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的西班牙法官加爾鬆，2008年下令挖掘內戰期間的19具受害者遺骨，遭遇了種種阻礙，壓力來自政治與司法、還有記憶和仇恨，七十年仍未消散。

台灣「二二八」事件也是一樣，直到四十年後的1987年「解嚴」，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動下，才等來了反對黨第一次公開紀念；伴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直到1995年中華民國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並定每年「2.28」為和平紀念日，得以正式平反。其實，可能根本沒有人會懷疑，1989年學生運動真正被平反，也需要等到更為久遠的未來，也就是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那一刻。

換言之，從中國與冷戰關係的角度看，作為1950、1953、1956、1968、1980年以來在東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共產主義

國家發生的一系列反抗運動的最後一場，無論動員規模和對抗烈度，天安門運動可能都居於最末，並沒有中國知識分子所臆想的更多新意，其被鎮壓的殘酷程度也難超過其他起義，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在一個前所未有湧進大批西方記者的鐵幕國家內部發生，然後通過大眾媒體開啟了福山所謂「歷史終結」的進程，而被世人銘記。

在槍聲還未打響的前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6月發表《歷史的終結》，認為自由主義的民主將在冷戰中全面勝出，雖然一時洛陽紙貴，卻很快遭受各種質疑。如前文所述，冷戰後的歲月裏，新民族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新民粹主義輪番登台，今天幾乎已經沒有多少人懷疑全球民主危機的到來。不過，三十年後的今天，再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對照時局發展，對天安門運動的歷史意義也會產生新的認識。

在《歷史的終結》最後，福山寫道，「當歷史結束後，我和周圍的人們能夠感覺到一種強大的懷舊力量」，這股懷舊力量在冷戰後逐漸上升，甚至強大到足以改變「歷史終結論」的程度，那就是各種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民族主義的復興：包括在「911」前後猖獗一時、不久前才證明失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包括從巴爾幹危機以來的民族主義復興到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更有習近平代表的毛主義懷舊，正在將1960年代為世界恐懼的「輸出革命」改換包裝為更令人疑懼的「一帶一路」，而且如福山所料的，在三十年後還是沒能融入民主世界。

這意味着什麼？在我們回到「歷史終結」的那一歷史事件時，透過黑格爾曾經在1806年耶拿戰役後看到騎在馬背上的拿破崙、然後意識到「世界騎在馬背上」所開啟的歷史觀，所有的目擊者所看到的，或許就是「中國站在坦克前」。（瞬間一）

只是，這樣被記錄下來、然後得以反覆推敲的歷史瞬間並不太多，無論是「站在坦克前的中國人」，還是著名攝影師劉香成拍下的「平板車上的傷者」，圖像猶存但姓名已逝，人們無從了解傷者的主張和行動，也無從了解「站在坦克前的中國人」的下落，更無法理解幾年後世界與這個「坦克中國」的媾和、以及三十年後所面臨的困擾。（瞬間二）

鄧小平在1989年面對學生民主運動的高漲和隨之而來的黨內動搖，下決心採取強力鎮壓，基本上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在1973年底復出後、結束毛澤東式運動、而以「治理整頓」和「與美媾和」開始建設進程中的極權主義政權性質，表明其自中共在1956年匈牙利危機爆發後敦促蘇聯介入以來的初心未變。同樣，1989年運動正是共產主義陣營裏發生最晚、也是最後一塊多米諾骨牌，鄧小平充分認識到，因為政權性質的自殺性暴露、而徹底毀滅了共產主義政權的全部合法性，不得不在冷戰結束、大局已定後，自己動手推動中國向市場化的威權主義轉型，包括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民族主義（國家）轉型。這也才是

習近平上台伊始自承所謂「前後三十年一致」的聯結點，也是他如今呼籲「不忘初心」、防止蘇聯式崩潰重演的起點，以至於在1989學運三十週年之際如此緊張，號召全黨動員保衛政治（權）安全。

如此路徑，由若干個瞬間構成，卻常常被德國哲學家貝克所謂「巫毒式國家崇拜」的歷史所遮蔽，也在過去三十年的反思中面目模糊，很類乎海德格爾晚年曾經提出的概念Ereignis。在德語中它是「事件」的意思，也包含着「開始」，阿甘本則將其解釋為「最後的事件」：「通過該事件，從歷史命運中給予並被抓住的東西正是歷史原則的被遮蔽本身，也即歷史性本身」。在海德格爾那裏，存在是對兩千年哲學一味追問存在者的反動，但在戰後新馬克思主義者那裏，例如巴迪歐，存在主義的求是而非傳統追問是什麼的本體論，瀰漫着一種對在場和失去的起源的懷舊。這可能正是納粹興起的哲學根源，海德格爾之謂哲學終結後的結果，也是福山三十年前所擔心的冷戰-歷史終結後的副產品，如伊斯蘭世界、俄羅斯、中國、甚至歐洲和美國都正在興起的強大的懷舊力量，無論是原教旨主義、新民族主義還是新民粹主義。

對馬克思主義的巴迪歐來說，與海德格爾早年的存在主義歷史觀相反，歷史是在存在極限處的呈現。這是對自由主義者如羅蒂以及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無論1980年代還是之後）所期望的無對抗政治的否定。相反，激進政治所理解和期望的歷史，是具現的，本來就充滿各

種不確定，要求運動中的多樣性、多元性和衝突的存在。這種歷史觀，不僅適用「事件」，這不僅暗示海德格爾晚年的微妙轉變，也指向對1989學運這場運動-事件的懷舊的反思。

如阿甘本所示，對事件的理解和介入，在本體和認知之間是一種「非國家和非法律的政治學與人類學生活，一種尚未完全被思考過的政治學和生活」。這也正是我個人在經歷了1989學運之後，作為當時最年輕的大一學生、學運的邊緣人物而倖存下來，卻在其後從未停止過思考，並且走上政治學和人類學道路、和與此相應的動盪與反抗交織的生活方式。我一直試圖在自由主義主導、卻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從與1989學運、冷戰結束同時興起的後馬克思主義，來觀照這56天，它可能並非自由主義的運動，而是政治學與人類學的運動和生活。

譬如，1989年5月13日晚開始、歷時一週的絕食行動，在過去的三十年裏都一直無法擺脱來自各界的指責：造成運動升級、引發殘酷鎮壓從而導致學運失敗、斷送趙紫陽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和同情的力量。在傳統國家-社會的反思框架內，這一行動無疑是挑戰性的、激進的、發起人在把握行動和責任關係方面是有問題的，即左傾冒進和不負責任，為鄧小平實行戒嚴提供了藉口，特別是戒嚴實施後仍未見好就收，最終導致強力鎮壓。

但是，任何有過當時廣場經歷的人，大概都會記得廣場上從悲壯向節日氣氛的轉變；公開絕食行動引發了「5.17」遊行，這場百萬級別的大規模市民聲援捲入了各大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公職人員和工人，超越了絕食前學運第一階段的學生運動，把學運變成了一場至少在北京範圍內有廣泛參與和同情的民主運動；絕食後的佔領以及戒嚴後的抵抗，到6月3日晚間當局採取清場行動前，維持了半個月近乎自治的局面（至少是街面上的自治），形同「北京公社」。（瞬間三）

56天的「北京公社」雖然短暫，卻堪比巴黎公社的72天，抵抗烈度雖低，仍堪比西班牙內戰叛軍一方對共和國平民的大屠殺，在過去三十年的反思中完全被忽略。人們只記得5月30日左右廣場上樹立起來的民主女神像（瞬間四），卻淡忘了廣場指揮部的自治管理下自由自在的佔領生活，包括著名搖滾歌手的獻唱和不知名情侶在廣場舉辦的婚禮。（瞬間五）

尤其是這場婚禮，如同阿倫特所講的新生（Natality），人們通過共同行動所創造的全新政治體驗。這半個月的廣場體驗為一代參與者帶來持久的、無法泯滅的政治記憶，而佔領行動則為全世界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成功行動模式，不僅讓東德領導人面對柏林牆危機時不敢採取武裝手段，而且甚至最終轉化為2011年馬德里、開羅和紐約所發生的廣場佔領行動，也包括2014年香港發生的「佔中運動」，後者與1989民主運動的聯結顯然更為緊密。這大概就是1989年事件所開創的

更為重要的歷史起點，意義絕對無法僅僅局限於中國三十年的歷史維度中。

（吳強，時政觀察者、自由撰稿人）




*過去三十年的每一天，對許多人來說，都在反思中渡過，而且，三十年間所有的這些改變和刪除本身，理論上似乎也屬於另類反思。攝：David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5月，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醫護人員在傍監察學生身體狀況。攝：Peter Turnley/Corbis/Getty Images*



*圖像猶存但姓名已逝，人們無從了解傷者的主張和行動，也無從了解「站在坦克前的中國人」的下落，更無法理解幾年後世界與這個「坦克中國」的媾和和三十年後所面臨的困擾。圖：Bettman Archives via Getty Images*



*56天的「北京公社」，在過去三十年的反思中完全被忽略。人們只記得5月30日左右廣場上樹立起來的民主女神像，卻淡忘了廣場指揮部的自治管理下自由自在的佔領生活。攝：David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 「北京公社」的八個瞬間（下）：以「無政府主義」視角重構六四

特約撰稿人 吳強|2019-06-04

## 一個無政府主義視角

當然，在社會運動的策略層面，如果5月28日廣場表決是傾向撤出的話，我們很容易想像這代表着運動的和平結束，然後執政黨內的分裂也公開化，可能發生持久的內部爭論和分裂，或者民主派將佔上風，或者最終以政變形式結束這場爭論。將來如果發生一場類似哪怕更小規模、時間更短但是又有足夠規模的公開抗議的話，其政治效應也可能同樣如此。

這可能就是中國統治當局在1989年之後極力防止任何大規模公開抗議的根本原因，因為只要發生這樣一場抗議，對執政黨來說就可能是致命性的。類似的，這可能也是他們的意識形態至今還要裝點着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字眼，作為所謂「核心價值觀」要素的原因之一，擔

心反對派可能輕易地使用這些簡單口號就能區隔、動員。這是一個貌似強大政權的脆弱一面，也是它不對稱地使用大規模軍事力量鎮壓一場和平抗議的根本原因。

而在更為廣泛的理論層面上，1989年北京發生的大規模絕食行動和廣場佔領，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歷次大規模抗爭運動當中，如此要求民主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又是幾乎唯一的，聯結了共產陣營的內部抗爭和冷戰結束後在西雅圖、紐約、開羅的抗爭運動，而後者受到後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高度評價。

具體地說，2011年「佔領華爾街」行動中的無政府主義，早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中就已經暗暗主導着佔領行動和民主運動的後半階段。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佔領運動的理論家格拉伯（David Graeber），認為1989年冷戰結束意味着國家社會主義的破滅、而2008年金融危機則意味着資本主義的破滅，從此迎來無政府主義的復興。而他所簡單描述的一個不需要軍隊、監獄和警察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秩序，幾乎和一百年前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論述沒有任何差異，也讓1989年的「北京公社」更像一個無政府主義運動，而不是一開始就建立了自己武裝和法庭的巴黎公社。

也因此，三十年後，當我們面對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和全球民主的危機到來，可以從左派的立場重建那一時刻的本來面目，那個被自由主義

者所遺忘的所謂「未知的已知」，需要重新發現那場運動的另一面——無政府主義。

畢竟，廣場上的學生雖然喊着民主的口號，但是對1980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們來說，他們更熟悉的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及其歷史。如果能想到什麼具體的民主經驗樣板，一定是源自馬克思經典《法蘭西內戰》的巴黎公社，而不是古雅典或者美國的民主模式，猶如學生們在撤離廣場時唱起的「國際歌」。

當他們開始摒棄教條馬克思主義後，首先着迷的是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盧卡奇（Georg Lukács）到法蘭克福學派，還有各種存在主義，從薩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當他們開始表達異見的時候，往往冠之「青年馬克思主義」或者「青年論壇」，彷彿一場狂熱的原教旨主義運動或青年運動，試圖從共產黨自身的早期傳統當中尋找激情和解決。青年馬克思和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就這樣成為他們最主要的理論資源，而這樣的原教旨主義和青年主義的狂熱和路徑，在1980年代的黨內理論界和大學校園裏還是有空間的。

就這樣，五四運動中最為豐富、同樣被長期壓抑的無政府主義，間雜在被重新探尋的中共早期理論和歷史中，在青年學生對五四運動的傳統繼承中，以一種「未知的已知」進入到1989年的學生運動，儘管對

我個人而言，遲至1989年之後的寒冷學期，才有意識地選修中共黨史系的「20世紀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課程。

且不論過去半個多世紀人們對「五四」精神如何集中在德賽二先生的主題上，或者1980年代李澤厚所代表的「救亡」與「啟蒙」二元敘事，或者習近平在紀念「五四」一百週年講話裏刻意摘取所謂愛國主義作為「五四」精神，幸好，還有誠實的史學家，如楊念群在《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社會組織的誕生》一書中，再次肯定了無政府主義作為「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說，「五四時期真正力圖擺脱國家建設的政治主題，以及文化論辯中『激進-保守』雙峰對峙狀態的知識分子群體是無政府主義派別。」這大概同樣適用今天對八九的反思，如何超越國家-社會和激進-保守的反思框架，也很應景地構成對當下國家主義氾濫的批判——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還是所謂新左派們為之所做的國家主義辯護。

例如，八九運動中一樁最為爭議的公案——三青年潑墨案，在整個絕食-佔領運動中更能呈現「北京公社」的極限和局限。5月23日，來自湖南的三青年（魯德成、喻東嶽和餘志堅）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畫像潑墨，被廣場學生糾察隊短暫扣留後交給當地公安機關，三青年在當年8月被判重刑。（瞬間六）

1972年5月，德國紅軍派（RAF）對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的漢堡大樓實施爆炸，傷及無辜，此後在紅軍派內部引發長久爭論，這一爭論最終引發1977年紅軍派第一代高層領導在獄中的自殺。同樣，圍繞三青年潑墨的爭論，也在過去三十年埋下外界對八九學運的長久批評。流亡海外的多位運動領袖為此道歉，海外民運也沒有放棄對三青年的救援和幫助，並把他們樹立為堪與「坦克人」相提並論的民運英雄。

但是，若從「北京公社」的角度來看，加諸當時學生糾察隊的指責並不公平，這種指責可能遮蔽了歷史本身。

與巴黎公社不同，在戒嚴令實施之後，隨着北京市民廣泛支持學生的反戒嚴（即攔軍車），不僅戒嚴部隊暫時被攔阻在城外，北京城內的公安和黨政權力機關的運行，也處於某種蟄伏狀態，學生和市民至少暫時接管了天安門廣場、大學、小區和街面，尤其當北京市工人自治會（工自聯）在學生支持下成立之後，自治向更廣的社會空間發展，一改1976年「四五」運動的階級分裂（那一年以北京首鋼民兵為代表的工人階級被動員起來鎮壓廣場抗議者），而在某種程度上重複了巴黎公社的團結模式。就在5月23日上午，新成立的「廣場指揮部」取代「北高聯」，試圖穩定對廣場的佔領和控制，此前一天的凌晨，剛剛發生了吾爾開希號召撤離的混亂。這是「北京公社」的起點。

只是，「北京公社」與巴黎公社的最大區別，正在於是否接管警察機構和建立自己的自衛力量。而北京的學生們似乎也滿足於當時的秩序控制（如潑墨案時的表現），無意超出學生自治的特定區域和政治上的有限聯合體，也無意發展成更具實質性的市民自治（譬如接管公安機關）。

並且，隨着佔領持續，天安門和周邊的秩序管制出現了問題：一方面北京本地學生開始感到厭倦和疲勞，紛紛撤出廣場，或者回校回家，或者趁機利用火車免票到祖國各地遊玩；另一方面，外地學生與公民不斷湧入，5月23日外地學生在廣場的規模達到一個高潮（約七千人），在公共衛生、住宿吃飯和政治表達等多方面，都對天安門現場的秩序造成衝擊，本地學生和外地學生的矛盾悄悄上升，而學生糾察隊處在保持這一脆弱秩序的邊緣。後來形勢的發展，例如5月28日關於是否撤離的表決，主要被廣場的外地學生主導，他們反對30日撤離的提議。

在這一背景下，三個「外地」青年的潑墨行為，在當時的廣場學生眼中，第一印象便是對廣場秩序的挑釁，雖然任何運動或者宗教總是新進者表現得更為狂熱，但實在給只滿足於自治、而小心避免轉向「革命專政」的廣場學生和指揮部出了一個難題。對民主同質性的幻覺，似乎妨礙了他們接納這一來自個人自由主義的衝突，也無視即將到來的劇烈風暴。最後的悲劇，因此與其說是「北京公社」的局限所致，

例如「北京公社」的地域性（這甚至也是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不如說是對抽象自由民主的沉迷本身，妨礙了學生們——從領袖到糾察隊員們——更積極、更現實地面對政治衝突，並沒有做好介入政治的準備，擁抱運動中的偶然性和未決性。

1989年的激進政治從絕食和佔領開始，很快回到了自由主義幻想的無衝突的政治中去了，他們被巴黎公社、五四傳統其中「未知的已知」所阻礙。不過，即使在今天，對糾察隊員們的道德指責，仍然繼承了整個自由派理論例如羅爾斯的自由主義話語模式，對道德話語和政治話語不加區分，如激進民主大師墨菲（Chantal Murphy）所說的，無法辨識政治的本質，「衝突、對抗及權力關係消失了，政治學領域被化約為在道德約束下對私人利益的理性協商」。

這些八九後的自由主義者，往往以哲學腔調繼續公共發言，對政治活動任意道德化，特別是將政治的激進等同於道德的激進（以及相反），導致放任權力政治的惡化、並且對抗爭評價保守化，還甚至因此佔據道德溫和高地。這或許便是無政府主義的短暫復甦、卻終未衝破自由主義的桎梏而帶來的政治墮落。
簡單說，三十年後，對三青年潑墨案的任何道德評價，最終都應回到任何自由主義不應忘記的懷疑論基礎，如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 Ackerman）所說，「沒有隱匿於宇宙深處的道德含義」。

**這是一場內戰**

圍繞三青年潑墨案的批評還有其他維度。最關鍵的，不在於廣場秩序，而關乎身份，甚至因此影響了外界對這場運動性質的判斷。

所謂身份，指的是北京大學生作為當時的「天之驕子」、統治階級的預備隊，這一身份由他們所反對的權力關係所決定，以此展開的要求民主和自由以及反腐敗、反官倒的抗議，便很容易被看作青年官僚見習生們的撒嬌，也很難與儒生的公車上書區別開。事實上，絕食抗議最成功、最有感染力的瞬間，可能就是一位絕食女學生憔悴面容後的横幅：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瞬間七）

這一幅畫面，通過報紙突破禁令傳播出去，瞬間獲得了全國範圍的同情和支持，台灣詩人余光中甚至以此為題書寫詩歌。只是，公眾的同情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對大學生身份-權力關係的基礎上。這本來是學運動員無可厚非的天然資源，就像1968年革命中歐美中產階級子弟們的激烈抗爭對社會產生的震動。

但在持續的廣場佔領中，這一身份背景可能接納仍然是「國家主人翁」的工人階級聯盟，卻難以接納外省的非學生青年。後者被本能地排除在廣場的政治共同體之外，而更傾向於採取激烈的行動，從而威脅着民主。這幾乎是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發展過程中都要遭遇的問題，

但在半個月的廣場佔領期間卻難以解決。或者，指望這些運動前存在的身份問題（也是運動發生的條件）能在運動中解決，本身就是不現實的。

隨着佔領的延續，半個月內，廣場共同體在發生結構化：從學生自治，擴展到工人自治和學-工聯盟，再到學生-工人-市民的三方聯盟。6月3日晚上，當全副武裝的軍隊從各個方向進城之後，尤其在長安街的東西延長線上——這個1949年後模仿奧斯曼擴建巴黎香榭麗舍大道的城市改造大道，天然便利用兵——三方聯盟的力量站了出來，以幾十萬甚至更大規模的人肉之軀，推動公共汽車，投擲磚塊，阻攔由裝甲車、坦克和汽車組成的戒嚴清場部隊。（瞬間八）

從6月3日晚上10點到4日凌晨，竟夜的戰鬥以及後續一週的零星抵抗，其慘烈程度或許超過1968年「布拉格之春」。區別在於，「北京公社」的學生、工人和市民們在東西長安街的戰鬥，不是針對外國軍隊，而是阻攔本國最精銳的三十萬大軍的突擊部隊。這個昂揚在北京街頭的無政府主義瞬間，充滿了反抗國家與軍隊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運動轉化為一場對抗警察權的戰鬥，其意義相當深遠，決定了之後整整三十年裏中國警察權的膨脹。作為中國社會運動、民主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所要遭遇的主要控制方式，雖然軍隊和坦克不再出場，但代之以倍數增長的武裝警察、公安和更大規模的輔警、協警、保安、基層政府公務員等非正規暴力。

換言之，6月3日到4日的清場鎮壓，雖然是最精銳的機械化野戰部隊執行戒嚴任務，卻是行使針對無武裝平民的警察權，以驅逐廣場學生、恢復政權控制為目的。

重要的是，北京學生、工人和市民的戰鬥，也為這場歷時56天的民主運動和北京公社的性質、為鎮壓運動以及衝突的性質做了定義：這是一場內戰，一場堪比1871年「法蘭西內戰」的內戰，也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三場內戰。

相同的關鍵，是「北京公社」已經形成了一個公民共同體，這是霍布斯所稱內戰的條件，也是馬基雅維利式的市民共和主義的自由觀，以此基礎為避免奴役而要求市民們團結和政治參與，區別於一般自由主義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劃分、或者對自由和民主的割裂，而更接近無政府主義對個人自由和自由合意的強調。

因此，不管「北京公社」存在着與巴黎公社或者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多大的差別，僅此一點，就須歸功於激進的絕食-佔領行動的歷史性貢獻。如果繼續下去，按照列寧和斯大林都同意的內戰作為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方式，如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對內戰的假說，便是導向革命，而革命只是內戰的一種具體形式。事實上，在阿米蒂奇2018年訪問北京大學、並帶來關於內戰的著作和演講之前，1989年北

京街頭的人們就已經在談論內戰和革命，等到21世紀來臨，新一波的無政府主義浪潮終於再次檢驗它。

當然，這一返回馬基雅維利道路的提示，也完全合乎20世紀社會運動的激進主義如阿林斯基（Saul David Alinsky）對運動策略的要求，也恰是1989年學運、以及當時無論學生還是「長鬍子」的導師們所欠缺的。這是內戰的一方。

內戰的另一方，即使對按戒嚴令行使治安任務的軍隊來說，在其推進途中對無關平民和救護人員的射殺，明顯違反《關於保護戰時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第四公約）之第3條和第10條，即「在一締約國之領土內發生非國際性的武裝衝突之場合」，對不實際參加戰事之人員「不得有對生命與人身施以暴力……」等。一支有着「人民軍隊」傳統的解放軍何以犯下如此暴行？這個迷題同樣困擾着所有經歷者和反思者。

出動如此大規模軍隊、以極不對稱力量執行鍼對平民的治安功能，其不對稱程度大概是1950年以來共產主義國家所發生類似事件中最大的，意味着軍隊職能和性質的警察化，國防軍淪為治安工具（蘇聯紅軍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曾經執行類似任務），不僅超出了警察權在行使暴力時必需的最低限度原則，而且這種不對稱本身就必然導致大規模失控和暴行。

1989年鄧小平動員的裝甲洪流，正是他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的同時征戰十年所指揮的部隊，即從1979年對越反擊戰、到1988年以輪戰方式進行的對越邊境作戰。1989年超過20萬的戒嚴部隊動員規模，已經接近1979年對越作戰部隊（56萬）兩個作戰集之一的規模。執行清場任務的部隊，大部為曾經參戰、即「舔過血」的部隊，也是最精銳部隊和戰略值班部隊（如38軍、27軍和空降15軍），更緊急抽調當時正在青海駐訓、隨時準備投入對印作戰（計劃）的戰略部隊（如54軍一部）。

而且，這些部隊都是鄧小平1979年與西方陣營媾和後、用於對付北方威脅的核心力量。當戈爾巴喬夫5月16日訪華，實現關係正常化後，來自北方的戰略威脅剛剛解除，鄧小平就下決心調動原本擔負防衛任務的瀋陽、北京、濟南三大軍區精銳執行戒嚴任務，並且將江澤民調入北京、預備接班。如此「決斷」幾乎濃縮和再現了十年前的一個關鍵時刻：鄧小平先後排擠了華國鋒、與美國建交然後發起對越戰爭。如此的軍國主義，恐怕才是所謂「黃金十年」的1980年代自由寬鬆的另一面，即《血染的風采》從謳歌軍國主義、到紀念屠殺犧牲者所承載的政治意義變化。

另一方面，國家暴力性質以如此內戰模式呈現，固然出於維護政權的需要，卻是對政權正當性的最強烈否定，表明國家公共權力的重大分裂。而且，最高當局將應對公民的大規模和平抗議，等同於需要進入

國家緊急狀態以動員大軍的政權危機，從此至少理論上剝奪了公民集體抗議和協商的權利、切斷了知識分子與國家-政黨的傳統關係，破壞了在這一關係下，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享有自春秋時代到五四運動的特殊政治地位。

從此，執政黨的政治正當性在國內和國際都「自我清零」，也是內戰效應之一，不僅包括執政黨革命傳統所具有的歷史正當性和國際影響力，也包括對這場運動做「暴亂」之污名化或者以「政變」來掩飾大屠殺的任何藉口。這大概也是三年後鄧小平被迫另起爐灶、開始市場經濟導向改革開放的零點，也是從此中國社會生活「去政治化」的開始。中共也被迫從極權主義政治轉向威權主義統治，在被迫放棄革命黨傳統的同時轉向中性的執政黨，即通過追求經濟發展和治理模式的改善、以及更為嚴厲的社會控制，避免公眾和知識分子再度公開大規模集結抗議。

**結語**

在1989年學運爆發30年後，目睹無政府主義的再度興起，人們可能通過無政府主義的視角重新審視那場被傳統自由主義所遮蔽的民主運動，以對「反思」的反思，突破「未知的已知」、重構其中的無政府主義脈絡，發現它在所謂「歷史終結」的剎那，還因為它與更久遠過去的聯結、因為無數瞬間的保存而成為歷史的新起點。進而，如阿米

蒂奇所論述的，內戰首先是一種個人的和集體的經歷，從法蘭西內戰到西班牙內戰，「一旦這個概念出現，它就變得無法撤銷，作為一面可以審視衝突的稜鏡，也作為一個武器……就其含義進行的爭論，將會使它的未來必定和它的過去一樣，富有爭議性和變革性。」

這也許是我們未來永遠記住和思考那年春天「北京公社」八個瞬間的一個選擇。猶如法蘭西內戰對其後一個多世紀社會進步和抗爭的啟示，1989年的「北京公社」和內戰也已經、並且繼續對世界範圍的民主運動發生持久的影響。

（吳強，時政觀察者，自由撰稿人）



*1989年6月4日，一名示威者與一輛燃燒的裝甲運兵車。攝：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示威者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攝：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5月4日，一群學生抗議者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攝：Peter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6月4日，解放軍與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士兵在天安門廣場上跨越障礙物。攝：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6月1日，清晨一名年輕女子帶著吉他穿過天安門廣場。攝：*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 30年後，香港還能守住六四記憶嗎？—— 專訪李立峯

特約撰稿人 阿離|2019-05-15

一個人所聽所看的都是一縷縷生命絲線，如果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們從令人困惑的記憶線棒中抽出，那任何能人都能把它們編織成最貼合心意的各種信仰衣裝。（The things a man has heard and seen are threads of life, and if he pull them carefully from the confused distaff of memory, any who will can weave them into whatever garments of belief please them best.）—— The Celtic Twilight, William Butler Yeats

記憶是私密的，不過，個人的記憶也能被抽絲紡線，與他人的記憶縫合，編織成一幅寬博紛陳的記憶繁景。記憶屬於個人，也能被集體擁有。然而，這襲記憶的寬袍如何被編織、滲染和裁剪，卻是一趟曲折的鬥爭過程。六四的記憶，就是一場鬥爭。

在香港，二十多年來的6月4日晚上，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熒熒不滅；悼念、回憶和反思六四，是這個距天安門千百公里的小島的年度大事。時值30周年，一波波紀念與回顧早在3月披紛延展，鮮活沉甸的親

身見證，甚或是歷經年月淬礪的銳利評價，蒸得滿城盡是六四的輿情氣氛。然而，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官民對六四依然諱莫如深，網上刪帖封殺，網下抓捕扣查，務求把記憶從人民的腦中漂去。

「從學術角度，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並非必然，需要解釋它如何生成，為何能延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對端傳媒說。過去10年，他與陳韜文合作研究六四 —— 30年來香港人念念不忘的集體記憶，分析它的生成、延續，以及面對的挑戰。在〈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一文中，二人把集體記憶定義為「一個社會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經驗、利益、價值觀等出發而進行鬥爭、商議及互動，試圖影響社會對過去的記憶」。歷史事件能否再現於公共視界，進而被銘記為社會整體的記憶遺產，與不同時代的政經形勢息息相關，因著各方持份者的拉鋸互動而被形塑。

在學界討論中，現存的集體記憶個案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受官方承認並佔主導地位的記憶，得到官民共識，例如是世界大戰；另一類則是不被官方認可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屬於少數群體，如美國印第安人或巴勒斯坦人的歷史。李立峯認為，六四事件有別於這兩類，具有特殊性。

「六四的特殊性是，國家不想你記得，在大陸人們也普遍失憶，但香港仍有空間去記憶，而且在社會屬於主流，國家沒辦法禁止。」六四

在中國受到強力審查，但在香港社會卻依然佔有主導地位，即使是建制派或親中媒體亦難以否定其真確性，只能含糊其詞避免直接回應。

**追根究蒂，六四記憶何以歷經30年而不逝？**

以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研究為基礎，李立峯總結了六四集體記憶在香港的生成、延續和挑戰的6個過程：第一是記憶形成和價值化，第二至第四個過程有關記憶的延續，包括記憶動員、代際傳遞、記憶制度化；第五至第六個過程則呈現了記憶受到的挑戰及其回應：記憶修復記憶的巴爾幹化。

李立峯表示，過去30年，在這6個過程中，香港的傳媒、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不斷角力，而自由開放的社會為記憶的生成和延續提供了眾多有利條例，不過著眼當下，他觀察到，眾多的有利條件正在慢慢變弱。

「現在，六四記憶要應付的，是過去的有利條件的消褪。」李立峯說。

**記憶的生成：愛國、香港獨特性和普世價值**

六四本身是一個具有深刻的集體烙印（collective imprinting）的歷史事件。集體烙印是指大眾受激烈或密集的衝擊而造成的深刻印象，這種

印象包括影像的存在和深刻的情感。集體烙印愈深，受影響的人數也愈多，而認知和感情的記憶更刻骨（陳韜文、李立峯，2010）。然而，在90至95間，燭光晚會參與人數卻驟跌，令人奇怪香港人的熱情何以快速消退。李立峯認為，這種忽然冷漠應該根據當時的政治環境去理解，「大家有種面對現實政治環境的需要和心態，面對不可逆轉的改變，香港社會的整體傾向是解決如何面對回歸的問題，而非繼續吶喊六四口號。」

然而到了97年，大限迫於眉睫，社會竟出現了回溯自身的需要，使民情鋒迴路轉，「回歸前夕，大家都在整理『香港是甚麼』的問題，香港到底有何獨特之處？那一刻，紀念六四的意義便提升了，其中最顯著的，就是燭光晚會，它是一個象徵，代表了整片中國領土上相對的自由，大家可以點燭光，可以批評中國政府而不需要避忌。」

當時，香港人一方面恐懼香港會消失，失去其獨特性；另一方面亦害怕在中共專制下能否繼續紀念六四，「在媒界的體現就是把六四價值化（valorize）」，在這兩種恐懼下，傳媒開始把六四以一種道德勇氣的報導框架呈現，例如報導司徒華和義工如何大無畏地救助逃亡學生的事跡，「那一兩年把六四事件昇華到一件不只是純粹發生在幾年前的事，而是象徵了一種道德勇氣、香港的價值觀，以及香港跟大陸的相異之處。」這種價值昇華，令六四更加達到了一種道德高度，對其形成極為重要。

在近年香港對悼念六四事件的批評中，六四事件所包含的「愛國」價值備受爭議，但李立峯認為，一直以來六四所包含的價值不只有愛國，卻是結合了三種價值：愛國、香港獨特性和普世價值，「這個運動能吸引這麼多香港人的參與，不會純粹是一個情意結。」

事實上，在本土思潮尚未出現的30年前，愛國並沒有在香港受到很大質疑；然而，愛國亦不能在當時的香港牽起很大熱潮。李立峯提到保釣運動，在香港只有少數人關注，因為運動單純建基於民族主義，充其量是領土爭議，既不本土也不含普世價值，「六四可以牽連廣大，一定要有齊三個元素，如果純粹是愛國主義，只會有少數人參加。」

**記憶的延續：「不只紀念六四本身，也紀念香港人對六四的紀念」**

記憶的延續有賴於記憶動員、代際傳遞和制度化三個過程。記憶動員由傳媒和不同組織發動，其中較重要的是動員週期（Mobilization Cycle），大約由每年的4月中開始，傳媒報導、作家撰文、組織推廣、網上分享，把六四的訊息和記憶滲播到大眾。除了週期性的輿情傳播，恆常的代際傳遞更顯緊密有效，情感傳達力更強。根據李立峯的研究，不少人透過在學校和家庭的口耳相傳認識六四，親眼目睹老師和父母在談論六四時潸然淚下，烙下了他們對六四的第一印象。

然而，不論是記憶動員或是代際傳遞均依賴個人的主動行動，要更持久穩定地保存記憶便需要制度化，例如建館立碑，甚或把六四加入教材當中，都能鞏固六四記憶；然而，在欠缺官方認可下，制度化極為艱難，是故六四紀念館屢被阻撓滋擾，教科書對六四閃爍其辭甚或隻字不提。

李立峯的研究顯示，傳媒的角色對延續六四記憶極為重要。在96/97至13/14間，紀念六四在香港表面形成了一種社會共識 [註一]，「社會上媒體所呈現出來的是，紀念六四是不可挑戰的。如果你面對的議題是社會已有共識的，不太需要客觀中立。報導和紀念六四是一種default (預設)，上級給不給壓力是另一回事。我訪問的傳媒工作者也表示六四是default要做的，不報導的話要有理由。」六四對社會的集體烙印極為深刻，社會對其理解早有共識，而公民社會對六四事件多元的自發討論和行動，例如支聯會的紀念活動，文藝界透過劇場、文學或藝術形式傳遞六四記憶等，亦與傳媒對六四的恆常報導互為引動，令六四記憶保持熱度，推陳出新並擴大影響。

30年來，針對六四的論述和主題隨著時代遷移一直改變：「不同年份和年代都會有新的主題或議題被提出。」李立峯提到，始自2000年，年輕人大多沒有親身經歷六四事件，為免記憶斷層，支聯會等組織開始提出「薪火相傳」的主題，以把記憶傳遞給下一代。這變化在媒體亦有相應的呈現，例如是父母抱著孩子點燃燭光的照片。到了09年，

六四踏入二十周年，一些評論人開始把香港形容為「中國的良心」，「當時間愈長，會有很吊詭的影響。時間愈久，正常會淡忘，但另一方面愈覺得事件珍貴。堅持了廿年，愈長愈值得驕傲。廿周年有個很特獨的論述出現，就是不只紀念六四本身，也紀念香港人對六四的紀念。」價值化的過程再次出現，把晚會的意涵從紀念提升到長久的堅持。

然而，到底記憶動員有多大的實際影響？根據晚會現場調查，較多人都是預早或最後一兩天才決定參加，表示自己受到動員周期影響的人數並不多，「但這樣不代表與媒體的動員完全無關，因為人們何時決定參與是一回事，但決定的背後有種社會過程，尤其依賴媒體的提醒。當一個社會完全沒人提起，大家不理會，人們很容易忘記，因此記憶動員很重要。你說你關心六四，但不可能一年360日都記住何時是六四，生活會讓你忘懷。」記憶動員具有提醒功能，而從宏觀社會輿情連接到個人行動的傳遞過程往往需要時間。

**記憶的挑戰：年輕人真的不關心六四嗎？**

記憶不一定能世代相傳，過程中會遇到不同思潮和社會環境的衝擊和分化，需要被不斷修正延展。記憶修復的過程意指在面對挑戰時，集體記憶透過修補論述，嘗試吸納和包容不同的人。另一方面，集體記憶在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影響下亦出現巴爾幹化，記憶的過程亦被改

變。在社交平台這個半公共半私人的空間上，大眾可選擇寄居在自己的回音谷裡圍爐取暖，毫無事實基礎的極端言論也被分享甚至鼓勵，令記憶開始有分化的可能。

2013/14年，本土論述開始進入六四事件的討論，挑戰這個具有20多年歷史的集體回憶，但李立峯認為，由於當時本土派尚未出現年輕一代的代言人，因此其衝突並不太大，而真正有力的挑戰出現在雨傘運動之後：本土組織質疑紀念六四將把香港與中國綑綁，而中港理應各不相干；學聯分崩離析，大學學生會先後宣佈不參與六四晚會。李解釋，傘運對年輕人是一個重要成長經歷（formative experience），年輕人對世界的認知一般欠缺歷史厚度，而傘運這場浩蕩壯闊的大型運動很大程度地形塑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由於傘運沒帶來任何實際成果，使年輕人非常沮喪，因此社運朝向激進化，在行動模式（勇武、以武制暴）和意識形態（中港區隔、自決、港獨等）上呈現，而新的本土派代言人（青年新政和本土民主前線等組織）亦相繼冒起，在區隔中港的前題下，擁有「愛國」元素的六四事件因而被本土青年否定。

「如果眼前的年輕人個個都受本土思潮影響，你一定要回應。因此，當本土派開始挑戰六四時，大家都要做調整，令本土對支聯會、對集會的挑戰更大。」除了社會運動的激進化和本土青年代表的橫空而出外，不同政治派別間的對立情緒，也激化了針對六四的衝突。

然而，從客觀數據而言，年輕人真的不再關注六四嗎？根據李立峯的晚會現場調查，傘運後的年輕人參與比例的確比2013年低，但其實低不過04年的水平。他解釋，年輕人的參加比例其實一直不高，最高是在2009至2012年間，2014年後開始下跌，但並沒有跌穿04年水平，及至2018年比例仍屬正常，因此不能斷言年輕人對六四漠不關心。

「最核心的本土派，他們實際的影響力有多大呢？對整個年輕世代而言，不只是說網民，影響力未必是我們想像中這麼大，只是他們的聲音較響。」李立峯透過量化研究，將本土派劃分為三個圓圈：最核心的圈是自詡本土派的組織和人物，如本土派的意見領袖和政治組織；第二個較闊的圈包含了在民意調查中會自認為本土派的人，約有5%-7% [註二]；第三個最闊的圈包括了不承認本土派身份，卻具有本土意識或同樣排斥中國的人。

本土派的核心圈主導了輿論，形塑了人們對本土派的認知，但這個核心能否代表另外兩個圈的人？「我們的印象很受那個核心影響，但在民眾運動中我們會看得更廣，如果我們不只看核心，不只關注那班意見領袖參不參加六四，而是年輕人參不參加，便至少要知道那5%-7%的人的參加意慾。」

根據鍾曉烽和鄧鍵一的調查[註二]，泛民與本土派年輕人參與六四的百分比相若，本土派青年並不一定不支持「主流」社運，「在某些問題上，支持本土或泛民的學生分別不一定那麼大，自認本土派也不一定不去六四。當你把本土派的定義擴闊了，就會很不同。」另一邊廂，即使是最核心的本土派對六四亦有反思，調整對六四的論述路徑。2014年後，作家李怡和練乙錚均提出要尋找本土和傳統泛民的共同基礎，「當有人在推動尋找共識，那大家便可能要修正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這邊不要整天喊「大中華」，那邊不要全盤否定六四。」

李立峯提到，一些本土派的核心人物如梁天琦均意識到六四作為佔據社會主導地立的集體回憶，蘊含了巨大的政治能量，本土派應想方法連結這種政治能量以爭取六四參與者對本土運動的支持。可惜的是，激進社會運動的理性化過程（rationalization）未及實踐，便即被強力打壓，令可能出現的修正過程難產。

在記憶的挑戰和分化過程中，泛民、本土派、廣義非建制派，甚或是親中建制派眾聲喧嘩地談論六四，縱然論調不一，但六四亦沒有消弭。

## 「記憶有個累積的過程」

上述六種記憶過程，離不開一個宏大背景——「以往的社會條件，包括社會整體上還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及不同機構的主事者本身對事件的關注，都令這些途徑能生成以至有效運作。」自六四至今的30年裡，香港雖無民主但仍保有一定空間，擁有言論、集會、出版、結社自由；而經歷六四的個人對六四的深厚情意結，亦使他們孜孜不倦地堅持守護和傳遞記憶，「但這些條件正慢慢弱化，從一個悲觀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確有預計，維持這些過程的條件開始愈來愈弱，包括香港本身的自由度，傳遞記憶的中介人，以及大陸自己內部的轉變。」

在學校裡，親身經歷六四的老師開始減少，沒有切身經歷的老師在講述事件的時候未必有同等的情感投入；香港的傳媒自由排名由2013年的58下跌至2018年的70，主流媒體被親中資本佔據，空間日益收窄；中國內地在近年經濟增長及民族復興的氣氛下，對了解六四比以往冷漠，李立峯提到，十多年前的內地生比較關心六四，即便害怕但仍會參加六四晚會，但現在的內地青年在資訊更封閉的環境成長，不但更難接觸六四，也令他們少了一種對學習西方的嚮往。這些宏觀社會條件的變化，均不利記憶的延續。

即便環境不利，但李立峯也提出，六四本身的意義和公民社會的行動仍可支撐記憶的維持。第一，時間的累積能為六四記憶增加重量，30年的堅持更添累世深意。其次，若記憶的修正能夠完成，便能解決香

港人對六四的內部分歧，對年輕人參不參加六四晚會更能泰然處之，如能解決內部矛盾，亦有利延續記憶。

時代更迭，政局波譎雲詭，專制步步進逼，審查更精緻高端，也是歷史予集體記憶和個人的一場考驗，「究竟一種記憶，多大程度上能夠因為社會或權力轉變而消亡？」李立峯正色問道。

在學界，研究集體回憶的流派當中，有兩派較為突出，亦各具爭議性，一派認為權力階層主導集體回憶的形成和延續，當權者掌有書寫歷史的權力；另一派則強調回憶有其韌性，不易被權力既得者改寫抹殺，因為它始終受事實和過去的記憶路徑所限制，尤其是長時間存在的集體回憶，權力不易搖動。

「集體記憶的道德力量，本身有一定的韌力，隨年月的增加，大家繼續堅持，甚至會更有重量。」李立峯表示，「但的確，現在六四記憶要應付的，是過去的有利條件的消褪。」

六四30年，今年的動員週期早在3月出現，一波波以八九六四題材出發的專題百花齊放，除了固定的見證者、倖存者和家屬的訪談外，也引申到89年對國際政局變革的影響、六四如何連繫五四思潮，甚或當下中國左翼青年的覺醒等，最觸目的是由30位目擊六四始末的記者共同

參與製作的「我是記者－六四30」，把30年前的天安門再次拼湊在今人眼前。

李立峯解釋，個人回憶有兩個作用，第一，個人對歷史事件的講述豐富了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是過去的公共再現（public representation），有時挺沉悶的，個人的故事能令整件事有血有肉。」第二，個人回憶令集體回憶具有真實性。無論是在北京或香港經歷六四，其實都是一種六四見證，見證的力量極為重要，它令事件更加真實，從而令其重要性更受社會認受。

集體記憶，不只依靠環境條件，更有賴無數個人不懈不怠的編織，「大家不停把自己的故事加入，令到個檔案庫更實在更豐富，擁有更多可用的回憶素材，隨每年的紀念增加。記憶有個累積的過程，無論是道德重量，以至實際上相關的材料，這些都有助記憶的傳承。」

**六四記憶，可被刪除嗎？**

李立峯認為，六四在香港一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回歸後，能否繼續在維園燃起燭光，標示了香港還享有多少自由，還剩多少獨特性。若中共的政治壓力進一步波及六四，大眾便能從而評估香港的自由度，所餘多少。「這就關係到一個更大的問題：中國政府在香港，以至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是否能完全不受拘束？政治立場上能為所欲為，毋

須顧忌國際社會的意見？例如最基本的，它能否抹殺六四，說它不存在？或者說鎮壓是對的？我覺得任何一個政權都難以如此肆無忌憚，它必定會受制於某些力量的拉扯。我不覺得我們需要想像一種很極端的狀態。」

「但我們的自由和空間將會愈來愈少。」

「這就關乎於人類如何看待歷史。」李立峯答道。

「記憶的特點是，不要覺得一件大事發生就一定有人記住，也不要覺得一件事消失了一百年就一定不會有人再提起。放眼世界不同的案例，有些事在百多年後會被重新提起，但這往往跟政治權力掛鉤。一個社會，有些回憶可能在一段時間被嚴重打壓，但很難令它完全消失。」

八年前，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展開「微博視野」（Weiboscope）計劃，在2012至2018年間每年的6月初，追蹤逾10萬個微博帳號，共收集了逾千條因與六四相關而被刪除的貼文或圖片。這些被刪的圖文，證明了在高壓審查下，仍有人堅持紀念，就如早前在抖音流傳的短片：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裡，有人手挽兩個膠袋，站在坦克前，「即使是多微弱也好，還是存在的，有人傳遞、有人紀念。長遠而言，我不覺得六四會消亡，它沒辦法被刪除，因為它的記

錄還在，也因此限制了人們的論述。我不覺得歷史的記憶這樣容易被洗去，即使數碼極權多麼厲害，也很難想像一個政權可以完全洗走一個記憶。」李立峯說，一貫泰然。

「既然如此，就像《一代宗師》那句，『憑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繼續記住，等待記憶出土的時機。」

[註一] 港大民意調查有關「平反六四」的問題中，自97年以來接近一半受訪者表示支持。

[註二] 數據基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轄下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分別於2016至2017年間進行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



*過去十年，李立峯與陳韜文合作研究六四 —— 三十年來香港人念念不忘的集體記憶，分析它的生成、延續，以及面對的挑戰。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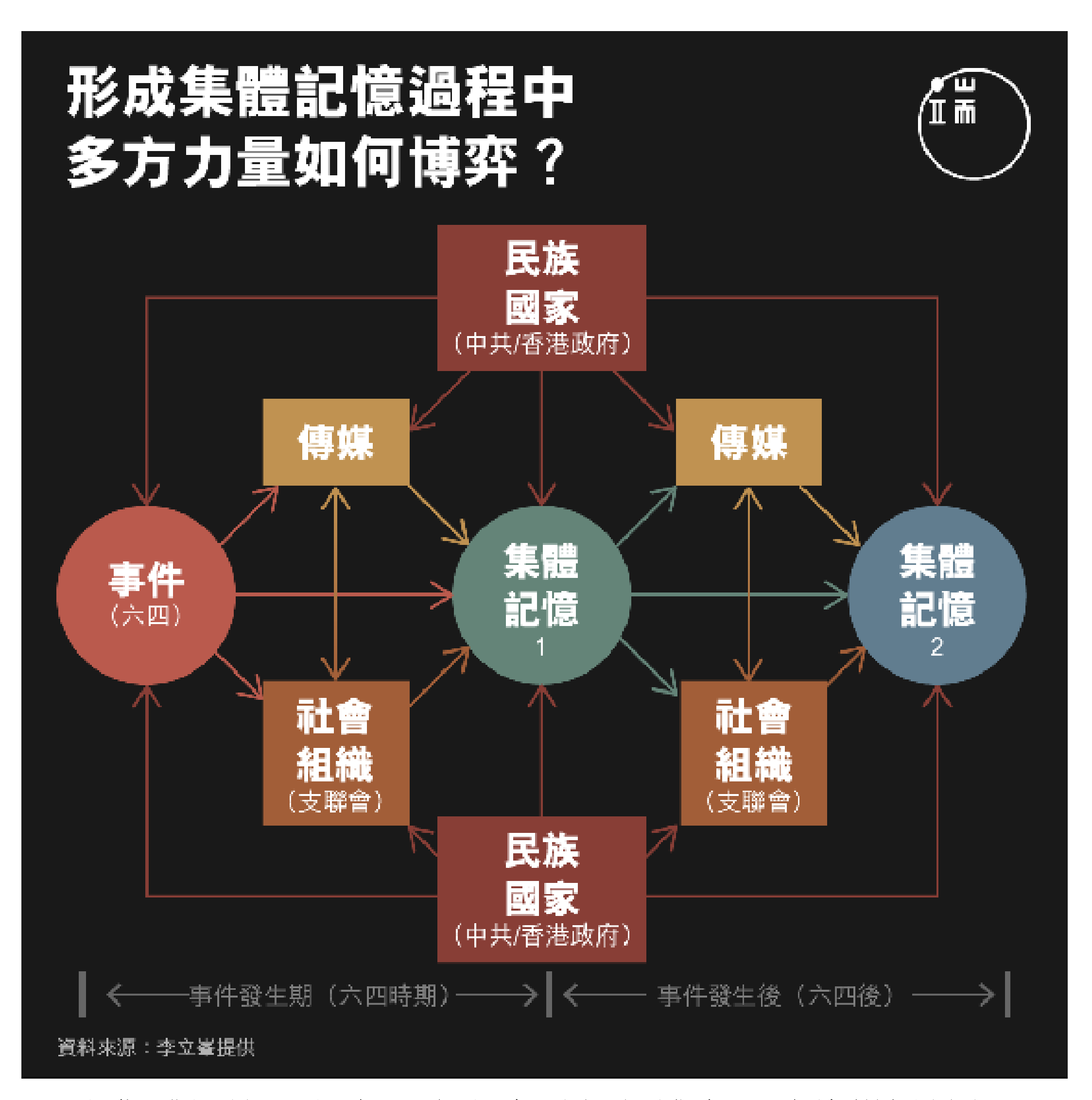
*2009年，六四踏入二十周年，一些評論人開始把香港形容為「中國的良心」，廿周年有個很特獨的論述出現，就是不只紀念六四本身，也紀念香港人對六四的紀念。價值化的過程再次出現，把晚會的意涵從紀念提升到長久的堅持。攝：Antony Dickson/AFP/Getty Images*

**集體記憶如何生成和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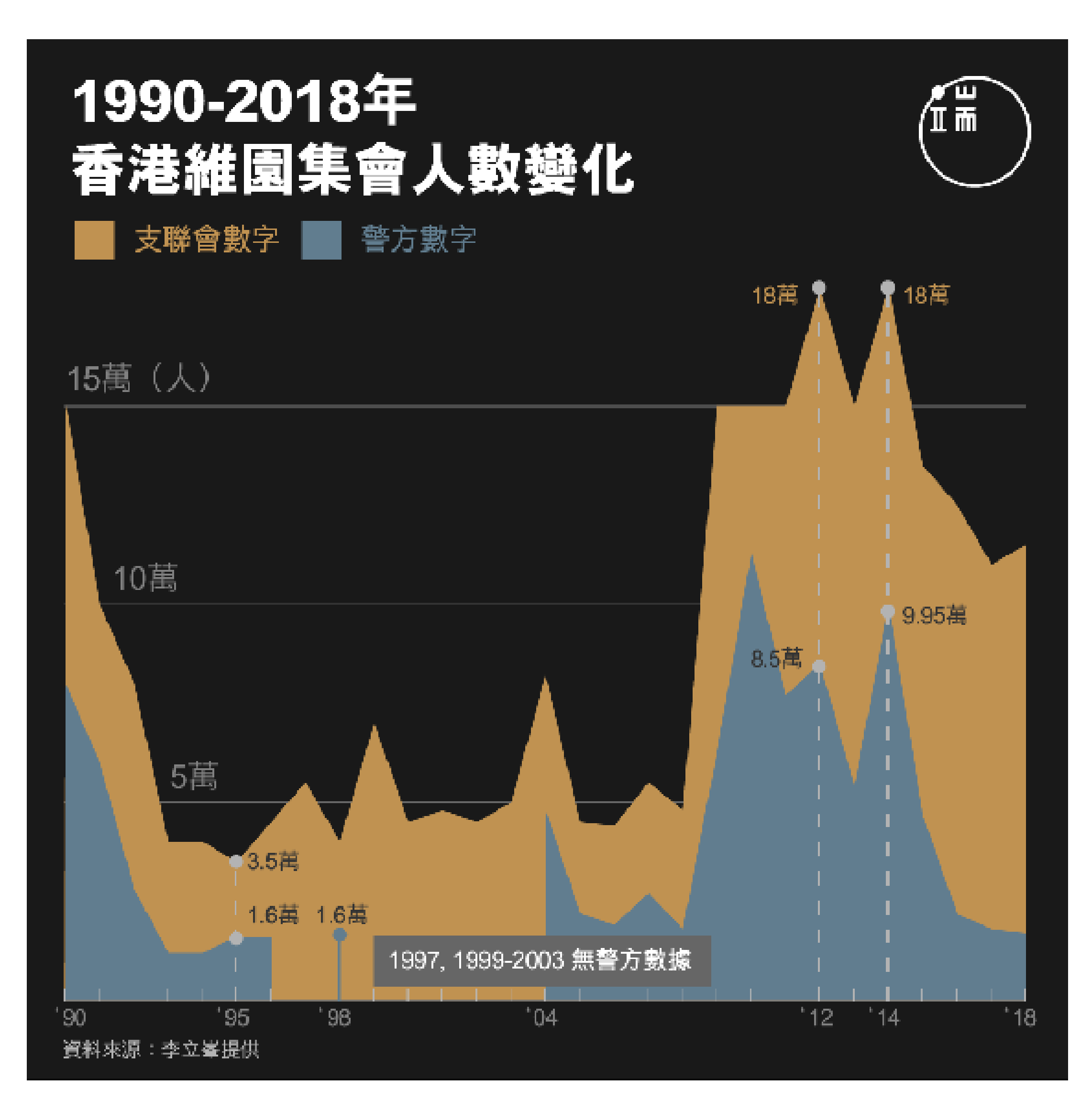
| 記憶過程 | 解釋 |
|---|---|
| **記憶形成和價值化** Formation and Valorization | 社會對過去事件形成一種超越個人的集體記憶，並對此記憶賦予特別價值和重視 |
| **記憶動員** Memory Mobilization | 透過不同方式喚起大眾的集體記憶，例如傳媒在六四前夕報導與其相關的新聞 |
| **代際傳遞**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 由一代人把集體記憶傳遞到下一代 |
| **記憶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 把集體記憶嵌入現有制度中，或者為集體記憶建立恒常化載體(如紀念館或紀念碑)，使集體記憶的持續傳播得到制度化保障 |
| **記憶修復** Memory Repair | 在集體記憶受到挑戰時，對記憶作出修正和調整，使其重新得到大多數人的接納 |
| **記憶巴爾幹化** Memory Balkanization | 隨著網絡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大眾空間分化成為小眾空間，而對同一歷史事件不同的媒體再現可能在各小眾空間之內流傳 |

資料來源：李立峯提供

*集體記憶如何生成和延續？端傳媒設計部*




*形成集體記憶過程中，多方力量如何博奕？端傳媒設計部*




*1990-2018年，香港維園集會人數變化。端傳媒設計部*




*1997香港回歸，傳媒開始把六四以一種道德勇氣的報導框架呈現，例如司徒華和義工如何大無畏地救助逃亡學生的事跡，「那一兩年把六四事件昇華到一件不只是純粹發生在幾年前的事，而是象徵了一種道德勇氣、香港的價值觀，以及香港跟大陸的相異之處。攝：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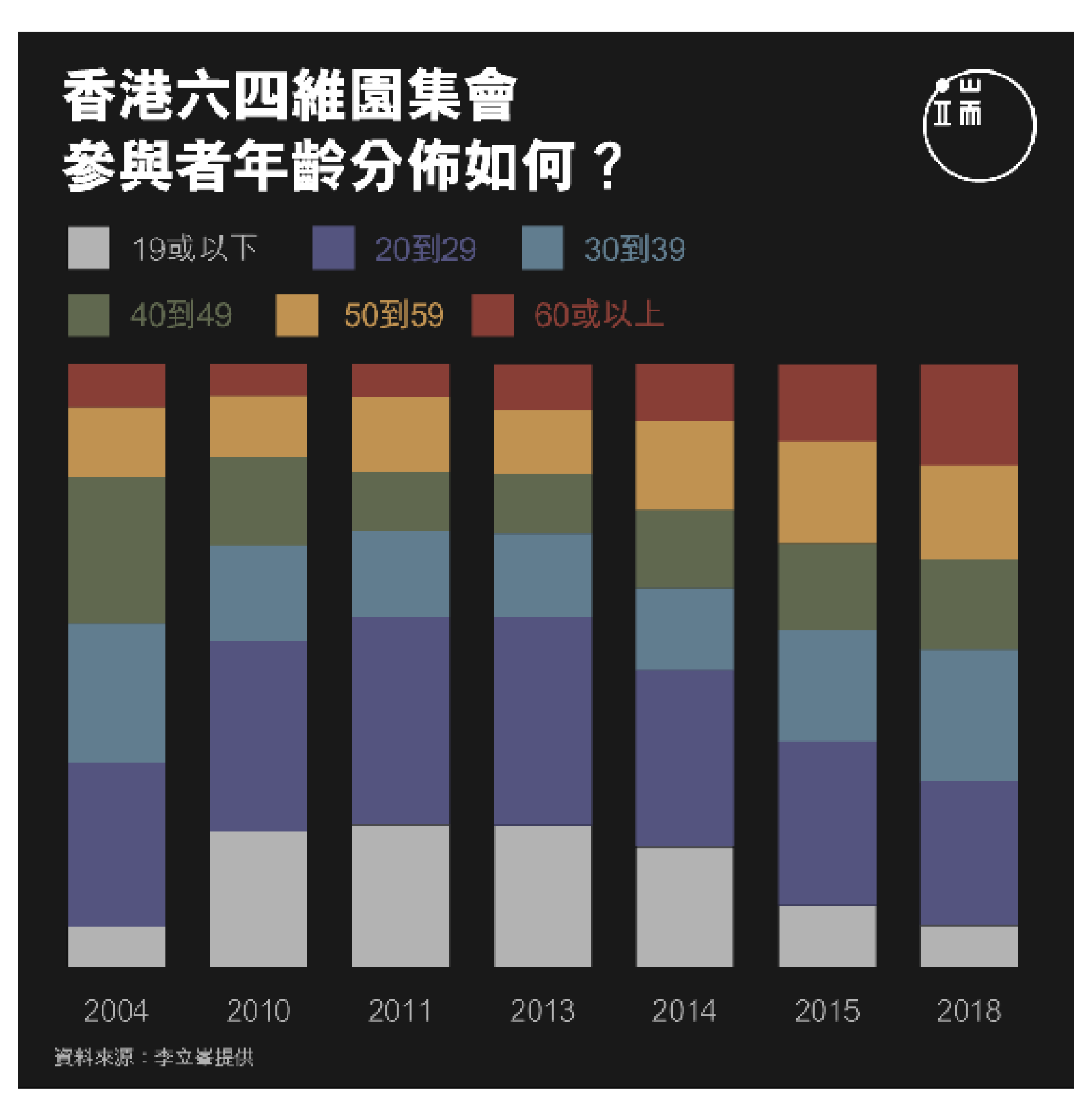


*1990至1995間，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參與人數驟跌，李立峯認為這種忽然冷漠應該根據當時的政治環境去理解。圖為1994年維園燭光晚會。*

*攝：Michel Porro/AFP/Getty Images*



*始自2000年，年輕人大多沒有親身經歷六四事件，為免記憶斷層，支聯會等組織開始提出「薪火相傳」的主題，以把記憶傳遞給下一代。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香港六四維園集會，參與者年齡分佈如何？端傳媒設計部*



*2015年6月4日，普羅政治學苑、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等本土派團體聯辦「遍地開花六四集會」，有參加者批評支聯會於維園的集會流於形式，多年來根本沒有實際行動，因此轉為支持尖沙咀的集會。攝：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自六四至今的三十年裡，香港雖無民主但仍保有一定空間，擁有言論、集會、出版、結社自由；而經歷六四的個人對六四的深厚情意結，亦使他們孜孜不倦地堅持守護和傳遞記憶。攝：林振東/端傳媒*



*李立峯認為，六四在香港一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回歸後，能否繼續在維園燃起燭光，標示了香港還享有多少自由，還剩多少獨特性。攝： 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 專訪吳國光：八九毀滅中國知識分子之後，如何繼續「韌性的戰鬥」？

記者 符雨欣|2019-05-28

1989年7月某天，一隊警察來到北京金台路人民日報大院裏那棟專給青年職工居住的筒子樓裏，給「六四」之後已成驚弓之鳥的住戶們帶來了一陣恐慌。

目標很快就清楚了：他們是來搜查吳國光那間單身宿舍的。吳國光當時已經去了美國，他是這家報紙的政治評論員，曾經參與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政策制訂，也是「六四」因為同情學生運動而下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曾經的講話撰稿人之一。

後來，人們在紀錄片《天安門》裏看到了吳國光，許多人記住了這個一臉大鬍子的受訪者，也對他的理性和深刻很有印象。
「我其實不太喜歡媒體標籤我為趙紫陽智囊。」

說這話時的吳國光，頭髮和鬍子都已如白芒針刺。

比之當年，現在六十多歲的他有另一張令人印象深刻的臉：皺起眉頭時，灰色的眉毛就像兩把匕首，斜刺向鏡片後兩道矍鑠的目光。

1987年吳國光還是《人民日報》的評論版主任編輯，但從1986年秋天起，他就被借調到由趙紫陽任組長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參與中共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分的執筆。到1989年2月他去哈佛做尼曼學者，借調生涯不到兩年半。

六四槍聲響起時，吳國光遠在美國，但後來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流亡者。自嘲為「民運個體戶」的他走上學術道路，經常被介紹為「體制內出身的政治經濟學者」，對媒體喜歡將他與趙紫陽聯繫在一起，他有些不勝其煩。

「我個人不願意提，首先是不喜歡標籤化，我三十年的人生經歷不能被這兩年代替；第二是當時的環境很特別，是中國第一把手讓我去工作，但不像讀學位一樣是我自己努力的；第三是，我為什麼1989年2月出國而沒有留在國內？假如我留在國內可以有很多好處，升官、分房子……我的意思是，我當時並沒有覺得走這條路是什麼很光榮的事。我個人覺得政治改革很好，但我沒有覺得自己為趙紫陽工作就很了不起，我沒有這個想法。」

媒體對他的標籤，部分的來自於六四的禁忌性質——歷史、官方資料不可得，了解內情的人不能或不願開口。曾經在體制內工作、與最高領導人有過交集，在自由世界成為學者，自然而然成為媒體注意力分配的重點。但吳國光坦承，被借調的時候他才不到30歲，實際工作中也與最高領導人有一定距離，從政也不是他的追求。他與趙紫陽的關係，在人們想像中或許有些過於親密了。

令他感到為趙紫陽工作是一件自豪的事，是後來趙在天安門的講話：「趙在天安門說，同情學生想要在民主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寧願下台也不願意開槍，這個時候我覺得趙紫陽了不起」。後來他也曾研究趙紫陽，因為在中國不能講趙，他認為是對趙的不公平：「我在外面有自由，我可以講一講。但我更多不是作為參與者，而是作為學者去反思。」

是歷史把他放到了這個位置。

**和陸定一並列的年輕人**

在吳國光的個人經歷中，他對政治改革的關注是長期的，不僅僅因六四而起，這也是為什麼他不喜歡媒體用短短兩年的經歷概括他前前後後各三十年的人生。

作為毛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說自己從小就被培養要關心公共事務，「用毛的話說就是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但那種關心，是宏大的、純粹的，與現實抽離。高中畢業下鄉下工廠時，他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思想困惑，困惑於過去接受的教育和現實「完全不吻合」。「過去被告知的是共產黨多好、多無私，社會主義建設得多好。我下到村子裏，那時還沒有很腐敗，但可以看到村書記很霸道……要找村書記也很簡單，最好的房子就是他家的。再加上看到農民生活的困苦……這和學校裏接受的教育是完全矛盾的。」

「怎麼會是這樣的呢？」他想去搞明白。作為新三屆學生，他從新聞專業讀起，尤其致力于政治評論方向。8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通過多種途徑影響社會，包括影響國家決策，他也喜歡寫些大膽的文章，大三時在无人引荐的情况下，就把一篇稿子投到了《讀書》雜誌，登出來題為《學術自由自由談》，緊跟在八十年代中共元老裏思想最開放的人之一——陸定一——的首篇文章之後，兩篇文章單列一個專欄。六四之後，這篇文章還被拿出來批判，說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

沒有來頭的他受到鼓舞，接著寫了一篇更尖銳的文章，《反對思想領域的封建家長制》，其中寫道：「如果有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認為只有他才掌握了絕對真理，只有他才掌握了十全十美的馬克思主義，那麼，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就成為真理的敵人，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叛

徒……要反對這種思想專制，必須還人民以自由探討真理的神聖權利。」

結果，這篇文章沒有發出來——編輯已經把它編好了，但政治氣候變了。1980年鄧小平發表「818」講話，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批評權力過分集中，但到了12月底，鄧反過來講「安定團結」，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從此成了中國輿論的四條緊箍咒。」高層風雲變化，吳國光的頭一篇文章誤打誤撞趕上了輿論寬鬆期的尾巴，第二篇就永遠胎死腹中了。

吳國光說，1980年代的一大特點，就是那種黨國主流雖然在體制上、表層上佔據主導，但很多人在思想上都在尋求新的東西，這種尋求不時衝破體制的表層約束和硬殼壓制，一次次形成對黨國的衝擊。衝擊起來了，就有機會表達自己獨立思考的一些想法；壓制跟着來了，那就偃旗息鼓不發文章，繼續埋頭讀書。

## 「還原為人」

讀書寫字寫報告的時光，在八九春夏徹底改變了。即便吳國光多次澄清六四時自己在美國，但六四終究成了他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哈佛的尼曼項目結束之後，他本來是應該回國的，但因為「六四」成了政治流亡分子，以前只能「業餘讀書」的他，決定要去「專業讀書」。

六四發生後，類似下鄉時的思想困惑再一次出現，這次多少帶著點責任和時代的意味。「我自己過去做政治評論、政治改革的，就想要去理解最後怎麼就出來了六四這麼一個結果？」他像回到當年，語氣裏滿是痛心和問號，「有過政治介入的經歷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促使我想進一步深入地探索政治的奧秘。」

但和許多當事人不同，吳國光後來並沒有成為一個「六四專家」，他的專長是中國政治轉型以及理解全球化，六四於他，是一個更大的研究對象——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分水嶺事件。他早年的研究注重去理解中國沒有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機理，最近這些年越來越偏重基於對中國轉型的觀察來理解全球化、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等一些更為理論化的主題。

「六四」對他的學術研究的影響，根本上還是體現在價值層面。這個價值很簡單：國家的公權力不能用來傷害民眾，任何人從原則上來說都不能以殺害別人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形容，過去三十年，是自己從「中國人」越來越還原為「人」的過程，意思是知識是很少民族分野的，真理也是沒有族群界限的，追求知識的人，應該服膺真理而不是服膺強權。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自然地帶著一種學者的執著：定義，首先要定義你在講的到底是什麼；人們討論問題，應該要釐清範圍和界線；他也強調，自己的觀點只是萬千討論中的一種，言論應該要多元。過去「民主」經歷過多次危機，但都通過多元討論、產生新的思想得以克服；他自稱為一個「悲觀主義者」，雖然現在觀點極化，人們都在各說各的，但如果要說什麼東西能克服困難，他覺得還是「思想」。

在加拿大西岸島上的家裏，他給自己的工作間起名叫「桴浮書屋」，取自於孔子說的「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許這就是吳國光離開中國之後在太平洋上的漂浮人生。有趣的是，子路聽孔子如此說，大喜，但被孔子澆了一瓢冷水：「你好勇敢，可我們沒法弄到木材」（無地取才）；而對吳國光來說，無論是時代的命運還是他自己的選擇，他都抱著木頭漂出去了，並在海波上搭起了自己的書屋。

**端=端傳媒**

**吳=吳國光**

**「政權內部的軍事政變」**

端：日前在台北的六四三十年研討會上，您提出六四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這場政變是六四屠殺的前奏，這個觀點引起一些爭議。先簡要介紹一下？

吳：先要說明的是，我不是說六四「是」一場軍事政變，而是整個1989年從4月到6月，「有過」一場軍事政變，這場政變是整個北京天安門事件的一幕。

軍事政變主要講的是，用軍力做後盾，以非法的手段更換最高領導層。在天安門事件中有一個政府和民眾的對立，最終發展成「六四」對民眾的鎮壓，而最高領導層的更換（軍事政變），是為六四天安門的鎮壓掃清了政治上的道路。兩者是一個事情的兩個環節。

我主要考證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更換是不是非程序的。主要關節點是1989年5月17日這天，鄧小平在家裏召開政治局會議（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出席），有什麼特別呢？第一，不是由趙紫陽召開的，按照中共的黨章，應該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才能主持和召開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由鄧召開實際上不合程序；第二，在會上鄧提議軍事戒嚴。趙紫陽不同意戒嚴，但鄧直接讓李鵬、喬石和楊尚昆去負責戒嚴，所以當天晚上李鵬就召集和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這等於實際上廢除了趙紫陽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從那

天開始趙紫陽就失去了權力。當然趙真正被罷免總書記、走這個過場，是在天安門鎮壓之後，6月23-24日舉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

端：確實，這是學界比較認可的趙紫陽失勢的一個關鍵事件。按照您的分析，摘掉趙紫陽前應該有軍事力量的調動？

吳：對。在鄧小平5月17日宣布戒嚴以前，實際上他已經調動了大量的軍隊，我也考證了這點。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以後，中共第一次使用軍隊是在4月20日，將9000士兵調入北京，說是為了維持胡耀邦追悼會期間的秩序。這一次，當時的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三個人都簽了字的。這是《天安門文件》裏透露的。

到了4月27日，第二次調兵。沒有任何信息顯示趙紫陽知道這個事情，當時趙紫陽出訪北韓，鄧小平和楊尚昆調了500士兵進駐人民大會堂待命。與此同時，大約在4月26日，全軍收到緊急指令，取消所有軍人的休假，要按照「426社論」的精神做好思想、組織、行動上的準備。這個指令趙紫陽應該也是不知道的。

調兵、通過實行戒嚴來拿掉趙紫陽、任命新的領導人（江澤民），這是這場軍事政變的三步。

拿掉趙紫陽的過程中，並不是說真的有「軍人衝進來把趙紫陽抓住」這樣一個暴力過程。而是鄧小平在自己家裏召集政治局常委會，宣布他提議戒嚴，與此同時任命李鵬、喬石、楊尚昆負責，實際上拿掉了趙紫陽，也實際上解散了原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樣開會，這個過程，按照中共黨章本身，都是非法的。調兵在前，實行戒嚴在後；鄧小平提議戒嚴在前，在同一個會議上接著就實際上廢除趙紫陽的職務，這就是軍事政變的要害。

國際經驗中，常會發生用強硬軍事力量、軍事政變來阻止民主化進程。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一個特點，是軍事的權力與黨的權力高度密切相關，武力因素內化於黨政體系。我的研究也強調，中國民主化進程在1989年之後中斷了，實際上也是通過軍事政變解決體制內願意民主改革的領導人、軍事鎮壓解決社會上學生大眾對於民主的要求，「戒嚴」這一個手段完成了兩件事情。這才把中國的民主化停止下來。有這場軍事政變並不否認天安門的抗爭，相反這是一體兩面的。

## 中國威权体制為何不墜？

端：過去三十年中國威權體制維持不墜，中國沒有跟着世界的民主浪潮共振，這是為什麼？您在英文作品《反民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勝利之後的政治經濟學》（2017）中提到，中國高效的威權體制，提供了一個比民主制更有利於資本追逐超額利潤所需要的環境？

吳：我這本書講「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涉及中國的內容很少，但確實是試圖理解1990年代以來，世界共產主義垮台之後，「全球化」席捲全球以來產生的權力關係變化。

簡單地講，一個是從制度框架上，分析了「全球化」帶來的新的政治經濟權力框架，再一個就是分析「全球化」在資本主義的三個最重要的方面（資本運作、勞動和消費）的新特點，最後歸結到這三個方面對民主都是不利的，都削弱了民主化進程。

其中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有效統治的權威主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利用「全球化」在剛才講的制度架構上及資本主義上的特點，加強了它的一些能力，形成了一個「反依賴」。

「反依賴」是什麼呢？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當中曾有一個「依賴」學派（Dependency School），用拉丁美洲的經驗來研究說，那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依賴西方領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我想說的是，全球化以來

形成了一個反過來的「依賴關係」，全球資本要依賴有效權威主義國家來贏得超額利潤，而民主國家要依賴全球資本來提高經濟績效。

這個理解起來需要一些基本的理論傳統。比如我說，「全球化」帶來的一個很大的制度變化，就是「資本主義」成為全球性的，而「民主」還在民族國家內部。比如你不可能要求拿美國的民主來要求其他國家的人，但是美國資本已經活動在全球範圍了。所以這裏一個假設的前提是，「民主」和「資本主義」不僅是不同的，而且實際上關係是複雜的。我的努力是進一步觀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二者發生的新變化。

端：您意思是，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受到「資本」的影響很大，但「民主」的影響微弱？

吳：對。我講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變化，首先要定義什麼是「全球化」。資訊、物品、資本、人員的流動，我的觀點是這些都是全球化的表象。作為一個研究制度和權力關係的學者，我認為全球化的制度本質，是各個國家（state）作為權力實體，都接受「市場」作為組織經濟生活的基本機制。例外是像北韓、古巴，但其實北韓也開始接受市場機制，古巴就走得更遠一點。

這個放到冷戰的背景下，就很明白了。冷戰時代有兩種經濟體，一個是市場經濟，與民主聯繫也比較密切，而共產主義陣營則是計劃經濟。共產主義垮台、冷戰結束，市場就開始全球化了。

這帶來的變化是，第一，過去有些國家是反市場的，比如毛主義，而現在的國家權力體系和市場體系是合作的。

第二，市場（資本主義）變成全球體系，貨物、資本、信息在全球範圍內流通，但政治上世界還是分成一個個民族國家的。全球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內的民主體制，二者之間有一個大的裂痕。

第三，全球化中大部分國家都接受了市場，但現在已經很少有純市場的經濟了，大部分是「混合經濟」，這不是說所有制的混合，是指國家干預和市場因素都使用的意思。美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香港本來是經濟放任程度最高的，冷戰結束之後也增加了政府干預的因素。但在全球來說，整個市場是放任的市場，是無效管制的市場。每一個國家內部都是基於政府干預的經濟運作，而全球經濟沒有統一干預因素。

第四，這樣一來，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變得非常激烈。冷戰時很多經濟競爭只是公司間的競爭，現在所有政府都加入全球經濟競爭，政府越來越多地用「經濟績效」來支撐自己的合法性。我把這個

稱為 Economic State（經濟型國家），國家對於衡量自己的合法性的基礎，開始越來越向經濟績效轉移，經濟的功能也越來越大，擴張了很多。

總而言之，民主國家對一般選民的經濟承諾變得非常重要，在非民主國家就有不經選票表達的默契。這就在一定程度解釋了，中國過去經濟搞得好，有一個默契的、未經宣布的，不是經過選票表達的契約，是這麼一套機制在起作用。

中國經濟體非常大，擁抱全球化也比較早，鄧小平南巡就抓住了先機，所以中國在國際競爭中佔有優勢，在現在這個優勢越來越明顯了。所以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權威體制不僅沒有受到嚴重挑戰，而且還輸出到了其他國家，比如一些非洲國家，希望高效率地發展經濟。這就是一個制度上的「秘密」吧——中國在全球共產主義垮台時挺住，擁抱了全球化，在經濟發展上有績效，就走到了今天的樣子。

端：但現在中國經濟有點「內外交困」。中美貿易戰打得火熱，國內的經濟矛盾也凸顯。根據社會學家趙鼎新的「績效合法性」，經濟下滑將直接衝擊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您怎麼看目前這個局面？會否在某個時刻到達一個臨界點？

吳：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的增長，對政權的維持是非常正面積極，但我們也沒法反過來說，當這個因素消失了，它就一定垮台，因為還有很多別的因素影響。比如在毛時代缺乏經濟增長，政權照樣很穩固。

當經濟下行，民眾和中共政權之間過去的那個物質主義默契可能受到挑戰，但由於過去民眾得到了經濟利益，所以可能也可以容忍一定時期的經濟下行。經濟不好了，日子沒有以前那麼好過，但不是過不下去了，這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說要麼很好，要麼就完蛋。
作為一個學者，我只能看已經發生的事情，應該說中國現在經濟上的表現是一個新的開端，剛剛開端，它肯定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增加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但這個開始本身是重要的，過去中美是兩個經濟體不斷相互加深依賴，現在已經向另一個方向扭轉了。扭轉到什麼程度，需要一個過程。但這個變化對中國和全球來講，冷戰之後那樣一個時代可能要終結了。可能要出現一個新的時代。

端：就是「後冷戰」時期嗎？已經跟冷戰時代看待中國的角度不太一樣了。

吳：「後冷戰」是全球化時代，而現在恐怕要進入「後全球化」時代了。

端：在這種「後後冷戰」時代，許多人對民主價值的追求是具有道德誠意的，但現在還把中國放在「民主-專政」這樣的冷戰後的二元框架中去分析，是否還是「合乎時宜」的？繼續用這樣的框架分析，會否忽視了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對資本主義、對現代國家帶來的挑戰，無論好壞？

吳：我想，把中國定義為一個「專制政治」是沒有爭議的，大家感受到政治壓制的時候，總是希望能有自由表達和參與。民主和專制是對立的，但它們的關係很複雜，特別剛才講到隨著全球化的出現，中國既是一個專制政治，也是融入全球化、向全球經濟社會開放的，這麼複雜的事件，不可能用非黑即白的某一對概念去概括。

概念可以探討，但一定要深入，然後會發現有更多的東西相關聯，不要把價值符號化、標籤化。假如只是說這就是專制，那就是民主，那最後也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包括「後冷戰」這個說法，我經常跟學生開玩笑說，彷彿這個孩子出生已經三十年了，仍然沒有名字，老大名叫David，老二就叫「David的弟弟」。我們還在用「冷戰」來定義「後冷戰」。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已經這麼長時間了，三十年了，還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裏，可見人們的理解力多麼落後於現實。

## 八九前後的中國知識份子

端：在六四的其中一種經典論述中，知識份子、學生在八九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1980年代，「體制內知識分子」通過與權力精英之間的各種交際網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共政策，而到了1990年代，國家與知識分子走向分離。這個變化，您應該是親身經歷了的。

吳：總體上講，「八九」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與「八九」之前大不相同。在我看來，「八九」之前，中國基本上尚未出現所謂「體制內」、「體制外」的明顯分化，這主要和當時經濟社會生活的市場化程度很低相關。同時，當時國家政權對知識分子採取了比較開明、開放的態度，知識精英有可能通過制度的和非制度的多種渠道來影響國家決策。

毛時期，人們主要通過「關係」影響政治，隨着毛時代的結束，特別是毛後改革的開始，開始有輿論的、乃至制度的通道，不再只是通過人際關係網絡，使得知識精英也能影響到國家決策。比如恢復高考，這就開闢了一種制度上的通道。對於廣大的平民子弟來說，這個機會極其重要。

以新三屆為代表的這一批學生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那時整個民族剛剛從「文革」的狂熱個人崇拜中有所覺醒，人們都想擺脫「那種一個人的大腦代替幾億人的大腦」的荒誕狀態，所以，獨立思考成為時代潮流，特別受到青年學生的推崇。在毛的思想鉗制下，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後，當時大學教授們和年輕學生們相比，也不具備更多的獨立思考能力。因為年齡上的原因，教授們可能還被洗腦更多一些，年輕學生在思想上的條條框框可能還少一些。學生的知識肯定遠遠比不上老師，但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當時比老師那一輩還要強烈。

我記得剛入大學時上新聞理論課，那時教的還是毛的那一套，什麼新聞的「黨性高於人民性」等等，同學們下了課就和老教授辯論。那時的老教授也很真誠，越是這樣辯論，甚至他越是辯不過學生，他越喜歡這些學生，對這些學生的評價越高。

我覺得有三點對於理解「文革」之後的那一代年輕人最為關鍵：一是對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不是跟隨黨國宣傳的調門來看現實；二是推崇獨立思考；三是精神上有追求。這三點一直延續到八九民運，可以說是導致天安門運動興起的一些很基本的因素。

包括黨國政治精英們在當時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往這三點靠攏的。我強調，毛後的改革，是國家與社會、精英與大眾、共產黨內佔據了主導地位的領導人，與包括不同社會群體在內的老百姓，這之間當時有共

鳴、有共識，這樣形成了改革的發端。直到天安門運動，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從趙紫陽這麼一個層次，到黨國體系中絕大多數的幹部，當時都是和學生有共鳴的。

因此，當時知識分子對國家政策的影響，並不是以知識分子順從國家、服務政府利益為特點，而是以知識分子追求獨立思考為潮流。弄清這一點，對於理解後來知識分子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才能找到一個基本的歷史背景。

端：有人說，九十年代國家與知識分子開始走向分離。隨着知識界自主性的提高和中國日益捲入全球化進程，中國知識界的分野也非常大。中國政治研究學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形容這是一個多樣、但碎片且未必多元的過程。您對此怎麼看？

吳：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不覺得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知識界的自主性有提高。專業性是大大提高了，但自主性卻大大喪失了。

我說的自主性，可能含義有所不同。作為一個政治學家，我認為知識分子的自主性是針對其與國家、資本、大眾等等非知識界的關係而言，而且必定是思想上的——因為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作為思想、精神的勞動者而存在的——當然也包括職業上、財政上等等，這些方面有自主性與否，這也是各個社會群體（不光是知識界）都有的方面。

我從來都不認為八十年代的中國多麼理想。我總認為那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時代。用一些形容詞來說，「乍暖還寒」也好，「欲語還休」也好，總是有暖也有寒，暖空氣和冷空氣相互爭鋒；你不讓我說，我也總還是想說、要說、就得說。而且自上到下，整個社會、民族、國家，這個暖、冷鋒面的對立與纏鬥是無處不在的，從討論大政方針的中南海會議室，到城市街頭你穿什麼衣服、留什麼髮型、聽什麼歌，再到農村地頭、你怎麼種地、能否外出打工，等等，都有兩個鋒面的對立和拉鋸。

時段上也是這樣，那時候說是「逢雙自由化、逢單反自由化」，就是逢雙的年頭，1980年、1982年這樣的，往往改革輿論高漲，大家敢說話，第二年，比如1981年、1983年，直到1989年，逢單數的年頭，壓制力量就佔據上風。這當然是個簡單化了的說法，但看得出來那種起伏。起伏的背後，從知識界來看，就是知識界自主性有所發展、而又不斷受到壓制這麼一個脈絡。

但是，那個時候，所謂「國家」與「社會」還沒有清晰的分化。這是毛時代「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全權主義」的遺產。天安門鎮壓有一大貢獻，就是打破了「全權主義」的迷思。加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中國這才有「國家」與「社會」的分化。

但是，分化之後，是國家強力主導社會，不是社會強烈影響國家。知識界從職業內容上來說是從國家分化出去了，這可能是你說「知識界自主性提高」的原因。但我認為這只是專業化，不是自主性，因為自那之後，知識界對於國家在政治上是高度順從乃至屈服的，而且與政府在物質主義優先這一點上完全合拍，大家「悶聲大發財」，總體上沒有批判精神，沒有獨立思考了。

端：1990年代初，中國大陸還出現過「陳寅恪熱」，推崇「獨立之人格、批判之精神」。

吳：我倒覺得這正是對當時缺少這些東西的一種反省和呼喊。經過「八九」，人們很明顯地經歷了從八十年代那種有精神追求、具備一定獨立思考，到「八九」之後總體上喪失了這些特點，成為單純個人私利的追求者。

剛才說，「國家」與「社會」分化是個進步，但放在中國的長期歷史進程中來看呢，也不能不說有某些退步。怎麼退呢？就是退到傳統的政治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那種知識界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知識界你搞你的專業，你可以通過專業得到各種物質好處、甚至榮譽等等，但你不要批評政府。

我這一代人的這種變化很明顯。甚至可以說，「六四」毀了中國知識分子，「六四」也毀了77級、78級這一代人。

可以說，「六四」毀了中國知識分子，「六四」也毀了77級、78級這一代人。

當知識分子與國家有某種合作關係的時候，不一定就是國家在主導知識分子；當兩者關係緊張的時候，也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反抗國家。

事實上，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更多地是知識分子佔據思想上的主導地位；「八九」之後這三十年，國家採取了以鉗制言論為主、同時高價收買的政策，又打又拉，在根本上是與知識分子處於對立地位的，但大批知識分子卻對此採取了臣服的態度。這種態度，即使有參與到國家決策之中的機會，和傳統權威主義下讀書人通過科舉、仕進求榮華富貴，似乎更類似一些，說不上什麼「思想」。不少人放棄獨立、批判思考而甘為權力的奴才，期待的是由此在私人利益上分享所謂「盛世」。

## 「韌性的戰鬥」

端：如果三十年仍然不是終點，需要四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甲子，年輕一代還可以怎樣紀念六四？

吳：在道義層面，我看不必要有什麼心態調整。有的事情是千古冤案，公義甚至永遠不會降臨，但不義還是不義，並不因為公義未有出現，不義就成為公義。

在感情層面，我覺得應該有一些心態調整。這也是人們的一種自然的心理過程。「六四」當時，群情悲憤，天人同哀。時間長了，很多人的心情难免会变化。但有一種變化是忘記，乃至背叛。我想這不是我們這裏所說的「心態調整」。當年上街示威的人，今天說幸虧有了鎮壓云云。這就是背叛。不必否認，這種人其實很多。

這種追問、這種反省，可能常常需要在沉寂中進行，而不光是通過「呼籲」和「吶喊」。魯迅早年寫了兩部小說集，標題很有意思：一部是《吶喊》，一部是《彷徨》。這代表了希望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們的兩種狀態。但是，是不是只有這麼兩種狀態呢？是不是沒有在吶喊的人就只能是彷徨者呢？其實後來魯迅給過答案，他提出了「韌性的戰鬥」—— 這不等於吶喊，但更不是彷徨。

關於「六四」，我敬佩那些為了讓整個社會保持這個記憶去做努力的人。但這種努力可以有多種方式，甚至必須有多種方式。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要去做最重要的事情。比如我，就選擇做別人看來也許不怎麼重要、但我覺得自己能做的事情。

可以說，我自己在推動中國民主化上是一個失敗者。但我這三十年就是承認失敗、但不放棄初衷，這大概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忘初心」。

還是聽魯迅先生的忠告吧，那就是所謂「韌性」。當今世界太浮躁，中國尤甚；物質主義的今天這個社會充滿喧囂與虛榮，中國似乎也是尤甚。人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迷失，容易漂浮、空虛。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很長，年輕人的人生道路也很長，要有所堅持、有所追求、有所自立、有所收成，尤其需要韌性。我雖老矣，亦願與讀者諸君以此共勉。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歷史系教授、中國研究及亞太關係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兼及政治思想和中國現代史；研究興趣主要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中國政治制度、中國對外關係等。友人A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六四」對吳國光的學術研究的影響，根本上還是體現在價值層面。這個價值很簡單：國家的公權力不能用來傷害民眾，任何人從原則上來說都不能以殺害別人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圖為1989年6月10日，坦克車和軍人在天安門廣場列陣戒備。攝：Chip Hires/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令吳國光感到為趙紫陽工作是一件自豪的事，是後來趙在天安門對學生及大眾的講話。攝：Xinhua/AFP/Getty Images*




*吳國光出席由支聯會舉辦的六四三十年紀念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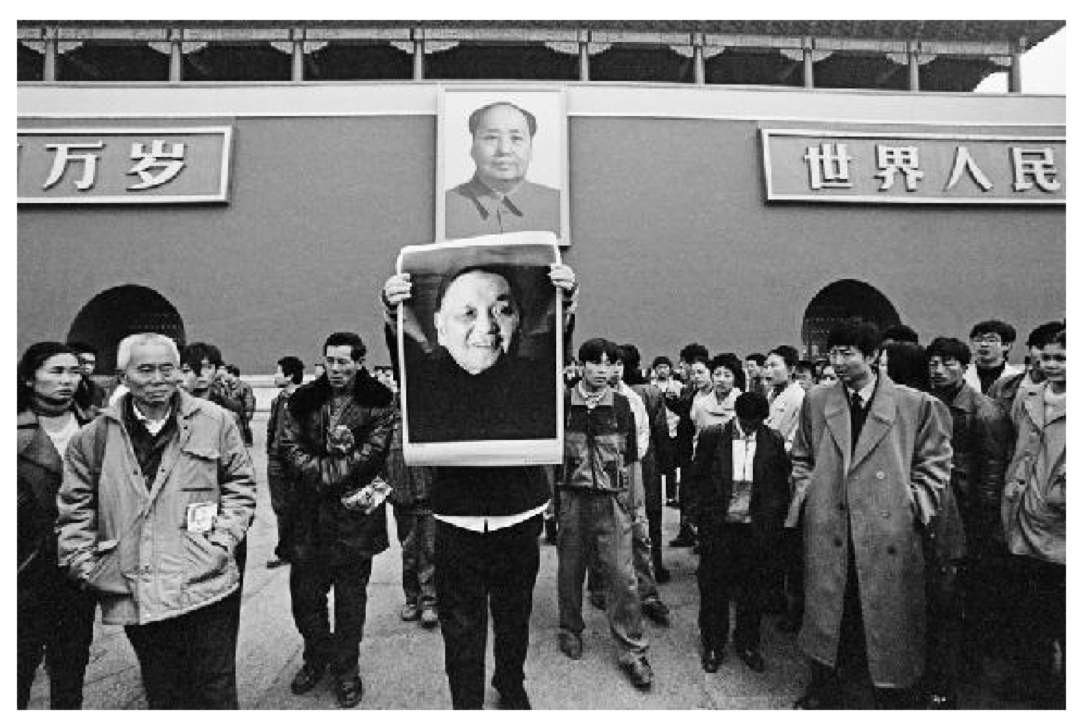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以後，中共第一次使用軍隊是在4月20日，將9000士兵調入北京，說是為了維持胡耀邦追悼會期間的秩序。」攝：Peter Turnley/Corbis/Getty Images*



*「中國過去經濟搞得好，有一個默契的、未經宣布的，不是經過選票表達的契約，是這麼一套機制在起作用。」攝：VCG via Getty Images*




*「我覺得有三點對於理解『文革』之後的那一代年輕人最為關鍵：一是對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不是跟隨黨國宣傳的調門來看現實；二是推崇獨立思考；三是精神上有追求。」攝：Franç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天安門鎮壓有一大貢獻，就是打破了『全權主義』的迷思。加上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中國這才有『國家』與『社會』的分化。」* **攝：**

*VCG via Getty Images*

# 六四三十年紀念研討會首度移師台北，持續重訪八九民主夢

記者 何欣潔|2019-05-21

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將屆，華人民主書院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會議為期兩天半，當年八九民運參與者與研究者齊聚一堂，重新還原當年現場、討論未來中國情勢。過往，六四紀念研討會都在香港舉辦，這是首度大規模移師台灣，不但讓台灣本地民眾、行動者多了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的機會，也讓三十年來持續不間斷的六四紀念場景發生了置換。

「為什麼要辦在台灣，答案很簡單，如果辦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與會者都來不了（如王丹、吾爾開希、封從德、王希哲、楊建利等民運人士，多半都有訪港被拒的前例）」華人民主書院校長陶君行說，「之前雨傘運動前後的時候已經有這個現象了，他們（這些赴港申請簽證遭拒的講者）可能也覺得沒什麼太特別，也沒有特別說出來，但很多講者現在都來不了香港，光在網路上申請就過不去。

在雨傘運動以前，都是有關民運的人士，現在擴大太多，連部分台灣的公民運動的人士都沒辦法來。」

會議中，除了王丹、吾爾開希與封從德等台灣熟知的學運領袖之外，引人矚目的尚有：吳仁華紮實的歷史研究，為當年的歷史重新貢獻諸多重要史料。吳國光提出「六四事件政變」說，認為六四學運過程中，鄧小平調動軍隊、撤換領導人乃至任命新領導人，實是一場軍事政變，引起現場正反意見激辯。當年解放軍官李曉明與受傷學生方政同台，兩人火花，也引起台灣媒體關注。被王丹譽為「我們之中最聰明、學術做得最紮實」的學運領袖王超華，亦首次在台灣發表新書《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知名維權律師滕彪亦與會發表，提出在中國「高科技集權主義」下，公民如何持續行動的疑問。

劉曉波思想遺產、八九後的中國維權運動也是會場上多次反覆提起的話題。雨傘運動的周永康、三一八施懿倫也合寫了一篇論文，雖然仍在雛形，探討六四事件對香港一國兩制方案形成的影響。

會議反應熱烈，大廳一位難求，與會者發言踴躍，當中也可見不少台灣年輕學生身影。這些講者來台並不只在研討會上發表，也在各獨立書店、中研院與大學校園有演講，製造了豐富的外溢效應。

**開幕式定錨：三十年後，世界走入「後後冷戰」時期**

除了六四的參與者、研究者，與中港台三地的行動者之外，研討會廣受各方矚目的講者，無疑是負責進行開幕演說的史丹福大學政治系教授Larry Diamond。Larry Diamond在會後接受《端傳媒》專訪時，他回顧89年的天安門事件時表示，今日的中國政權仍恐懼著自己的影子，「這個影子是什麼？我們都非常清楚，正是今天研討會的主題，八九六四天安門運動。」

Larry Diamond進一步分析，六四運動發生一個在世界對「民主」概念整體都抱有希望的年代。而在89年之後，柏林圍牆倒塌、共產主義垮台，直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期，世界經歷了一段「意想不到」民主進展。但自2006年或2007年開始，世界開始進入一段民主衰退期。Larry Diamond分析，在這段期間，民主衰退的腳步是「漸進式的、零碎而片段的」，但仍是可以指認的。

面對此一現象，Larry Diamond認為，與其繼續以「後冷戰」稱之，不如說世界進入了「後後冷戰」（post-post-cold war）時期。在Larry Diamond的分類中，後冷戰時期是從1991到2006年為止，特色是由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主導世界秩序，而民主是當時世界上主要的政府體制。民主自由的價值擁有極大的動能，吸引更多國家轉向民主體制，而專制政體則轉向守勢，直到2006年為止。

Larry Diamond指出，2006年後的民主衰退，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美國對伊拉克「非必要的、災難性的」軍事介入，讓許多人將民主推廣與軍事侵略畫上了等號，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一場武力強制的政權更換。第二個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機，這導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分崩離析，且造成持久的影響：全球化下不平等現象持續攀升，接著移民危機出現，反移民情緒、負面的民粹主義也不斷攀升。與此同時，俄羅斯、中國等專制政權影響力日增。

Larry Diamond認為，這些因素重疊交織、彼此強化，但在同一時間，美國的民主則不斷疲軟衰落。「我們的世界已經轉變為另一種世界，一個混亂的世界。」Larry Diamond說，「這個世界有兩個超級大國中國和美國，以及一個『半』超級大國、擁有核武的俄羅斯。這是一個美國權力和世界地位縮水的世界，但這也是一個民主仍然存在的世界。大家還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樣的新世界，這是一個在想法、權力、影響力、經濟模式等領域都有激烈爭奪戰的世界，但已經不是後冷戰了，除了後後冷戰，你也可以稱之為新冷戰。」Larry Diamond舉例，中美貿易戰與美俄之間的緊張關係，都是例子。

「我不願意說這是一個民主崩壞的時代，無論是漸進式的還是突然的崩壞，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腳步不斷加快的民主失能時代，一個對民主威脅漸增的年代。」Larry Diamond如是說，「美國、歐洲國內也有許多問題，但人民仍擁有自由可以挑戰政府、要求改革。民主提供開

放、草根、自主且可協調的工具，來進行改善、自我調整、質問與再生。（建構這樣的體制）需要獨立機構、獨立司法機關、獨立監管機關，你也需要獨立和自由的媒體。而上述這些，在一個越來越鞏固加強的獨裁體制中是毫無可能性的。」

他也直指，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由上而下的，當有任何嚴重的異議、質問出現，一定會被事前制止或是事後審查刪改。一個政治體制無法容忍研究、更別說辯論自己的過去，這就是一個有問題的體制、道德破產的體制，因為它無法對自己的歷史（指八九六四運動）有誠實的叩問，無法從自己的過去學習，進而反覆犯了一人獨裁的錯誤和弊病。」

**重回1989：在台灣，叩問三十年前的民主夢**

毫無疑問地，對於所有的與會者而言，既然身在「民主」遭逢新一輪挑戰的時刻，重訪1989並不過時。除了持續要求平反過去、重拾記憶之外，紀念活動本身也也有定標當下的意義。王丹在會議中提出要「六四學」，王超華反駁是「八九學」，王丹再回應，那不如就做「八九六四」學。

在稍晚的王超華新書發表會中，王丹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想法：「你要了解以前的中國，必須了解八九六四，因為是過去的中國一路形成了

八九六四；要了解今日的中國，就不能迴避八九六四，是八九六四形成了今天的中國。這是一個承先啟後的事件，要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解當代史的必須。對八卦性的東西說得太多，理論說得太少。」

王丹認為，「如果當年六四成功了，可能會讓政府在民意壓力下進行改革，類似台灣模式，是一種朝野共同合作的轉型過程。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讓黨內想做一些事情的人，可以在自下而上的壓力下進行改革，不過共產黨把這個機會丟掉了。」

但陶君行悲觀地認為，往後類似重訪六四的活動，或許都要由香港移師到台北舉辦了。

「我覺得可以讓台灣與香港交流，對中國的民主發展也是重要的。就算你要求台灣獨立，你也應該關心中國問題，中國的發展，對台灣香港都有很大影響。過去香港在前線，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台灣這裡可以去看香港模式行不行？」陶君行說，答案非常明顯，「所以很重要，香港人老是說要移民到台灣，但如果台灣也不行了呢？那也不是個辦法嘛。」

面對此一新的局勢，台灣本地的公民團體早也有心理準備，要在未來扛起平台重任。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黃默

說，看情形，香港的情形是很艱難，「我希望台灣可以是一個各方面都能同意的一個平台，不但是六四問題的討論，就算是西藏、新疆、香港、中國問題的討論，台灣都能作為一個平台，這是台灣公民社會有的作用。」黃默說，這個任務艱難，他也不敢說是否能做得到，「但如果我們能做的，就盡量做。」




*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將屆，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八九民運學生方政。攝：陳焯煇/端傳媒*



*史丹福大學教授Larry Diamond。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5月19日，八九民運領袖王丹參加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

*攝：陳焯煇/端傳媒*




*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 專訪前四通總裁萬潤南：三十年來血仍未冷，格局變化將帶來新局面

記者 雷隆|2019-06-04

「我常說，人這一輩子，按平均壽命算大概三萬天，我還剩下3286天。」五月下旬的一天，在巴黎郊外一間餐廳裏，面對一眾舊友，萬潤南語氣平靜地說。席間響起一陣低聲的、善意的鬨笑。

「不對，還有3276天。」萬潤南想了一下，改口說。笑聲再度響起，但是更低沉了。他大概想起，上一次做這種計算，已經是十天之前的事了。

說這話的時候，距離六四30年紀念日只有不到兩週。而這一眾舊友重逢，也不是為了聽這位當年的四通公司總裁掰起手指頭算日子。他們從英國、德國、芬蘭、澳洲等地匯聚而來，是為了一個已經等不到三萬天的朋友——今年四月，旅居法國、常年為民運事業奔走的張健，

在從泰國回法國的航班上突發急病，班機緊急降落在德國慕尼黑搶救，仍無效去世，年僅46歲。
更早之前，資深民運人士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濤，於1月28日在巴黎去世，也不過65歲。萬潤南親題輓聯：「何去匆匆神州正破曉；此行悠悠天國聽驚濤」。但事實上，魏小濤走得比張健更加無聲無息，除了一個極小圈子，幾乎已經被外界遺忘。

30年間，故人紛紛凋零，更顯出時間的無情，以及催生出的急迫感。這在萬潤南身上，或許比當年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體會更深。

2014年，萬潤南從美國舊金山回到法國巴黎。在旅居美國的15年裏，他開過機場出租車、當過「包租公」，也試圖在納斯達克市場上掘一桶金，卻沒有哪項事業，能再和自己在1980年代創辦的四通公司相比。更不必說，在此前後，他作為海外民運的標誌性人物之一，也難以避免地捲入到這場混亂事業的恩恩怨怨之中。

頗有捉狹含義的是，在回憶八九民運的長文《我的1989》中，他評論「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永曦，曾說人生有三大悲劇——「少年得志、中年折翅，臨老入花叢」，而和政治上「少年得志」的翁永曦不同，四通如日中天之際遭遇1989，對萬潤南可謂「中年折翅」，如今卻是不折不扣、字面意義上的「臨老入花叢」——回歸到巴黎遠郊的一棟花園洋房裏，終日以養花怡情。

72歲的萬潤南，身體已經大不如前，十餘年來他一直受心臟病困擾，時好時壞，幾年前又做過一次大手術。過度勞累和情緒起伏，正是心臟病人的大忌，然而故人的離去，又不可能不擾亂心緒。記者原本聯繫好的見面計劃，也因為萬潤南操辦張健的追思會「疲勞到極點」、需要絕對靜養而被婉言推遲。

終於得見，「萬爺」憶起往事，仍然思路清晰、頗為健談。他習慣性地用「資產」和「負債」等商業術語，來評估六四對於中共的意義，但這位當年傳奇般的商界領袖，對於曾經寫在《我的1989》長文中的歷史細節，已經不願再多重複。相反，關於這場運動各方面的反思，關於「在商言商」，關於華為總裁任正非的「悲劇」，他卻有更多話要說。

30年意味着什麼？對於旁觀者而言，不免有種一代人韶華時光逝去的傷感；但對於歷史親歷者萬潤南而言，雖不免有類似感慨，卻更多回味着中國的一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面對海外民運這30年，他不認為是成功，但也絕不認為是一場失敗。用他的話說，海外民運被「修理」這麼多年，卻始終沒有被「屠宰」掉，正顯示其韌性之強。「至少我們血還是熱的，骨頭還是硬的。」

無論在與「民主中國陣線」舊部的座談中，還是在與記者的對談中，萬潤南梳理中美貿易戰以來的形勢發展，認為在後八九時代持續30年之後，「一個新的局面開始了」；並且，他把這種轉機，寄託在美國的最終「醒悟」之上。雖然他始終低調地稱「功成不必在我」，但不經意間仍然流露出來期望——或許這一次成功了呢？

**端=端傳媒**

**萬=萬潤南**

**改革派、學生、知識分子都需要進一步反思**

端：你寫的《我的1989》讓人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你當年作為商界人物，在運動前半期其實一直強調四通公司的利益，認為學運局勢混亂會對公司發展不利。如今生活在法國，黃馬甲運動最受強調的一點，也是對商業利益的衝擊。身處黃馬甲的國度回看1989年運動，有哪些共同的經驗教訓？

萬：任何類比都是跛腳的，因為場景、歷史條件和時空環境都不一樣。但黃馬甲也好，1989年學生運動也好，本質上都是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都有一個相似之處，就是感性、情緒、衝動會壓倒理性思考，主要出發點是為了表達不滿，至於要求什麼，有時並不是很明確。

比如黃馬甲運動，直接起因是增加燃油稅，但根本原因是在經濟地位、就業等問題上長期有不滿情緒。1989年也是一樣，當時改革開放十年，但是民間對收入分配非常不滿，特別是胡耀邦之死也成了一個導火索。這種對改革當中所產生問題的積聚已久的不滿，成了一個火藥桶，一旦爆發出來，就引發了大規模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有沒有一個比較成熟的目標和組織，就顯得很重要。一般來說，自發性的群眾運動都缺乏組織，因為所有的群眾組織，比如「高自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都是在廣場上臨時成立的。而黃馬甲的領導核心也不是很確定的團體。也就是說，這種自發性的群眾運動，誰也指揮不了。

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比較激進的情緒就容易佔據主流。1989年在天門廣場上，學生先靜坐、然後絕食，抗爭越來越激烈。但這種群眾抗爭能不能達到效果，關鍵是有沒有一個有組織的、能夠控制的力量，我曾經打過一個比方，你開一輛汽車，不能光轟油門、不踩剎車。開車要有動有停，抗爭也是一樣要看你的階段性目標是什麼。如果達到了，那麼就可以開始一個良性互動的過程，如果不斷加碼，最後肯定是車毀人亡。

當年波蘭實現民主轉型之後，我去團結工會拜訪，他們很強調的一點是，團結工會當初發動格但斯克（Gdańsk）造船廠工人大罷工，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當時軍政府找他們談判，他們提出的條件得到接受後，整個罷工就基本結束了。這就是說，團結工會有能力讓罷工開始，也有能力讓罷工結束，於是就成為一個「可談判」的力量。

1989年，學生也提了很多要求，比如要同政府對話，結果統戰部的閻明復、教育部的何東昌、北京市委的袁立本通過不同渠道都出來對話了，而實際上參加對話的學生後來也說，這是一種「無效」的對話，什麼意思呢？從對話的目的來看，當局希望學生結束抗爭，當時戈爾巴喬夫要來訪問，起碼外賓來的時候北京能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但實際上學生做不到。即便學生代表答應了也沒用，等回到廣場又都被否決掉了，甚至他們自己的對話資格也被質疑。如果知識分子出面，也會被懷疑是幫當局說話。整個群體沒有一個真正的指揮系統，也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力量，是憑情緒在拼。這樣一個運動，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和（民運理論家）胡平曾經談過「為什麼學生運動總是以失敗結束」，胡平的回答是，因為學生運動「不失敗就不結束」，1989年的悲劇就是這樣。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在趙紫陽主持下，當局實際上已經做了很大讓步。比如說，學生絕食以後要求對話，並且要求直播，這些都滿足

了，而且一段時間裏新聞媒體上相當正面地報導學生運動，學生要求撤銷「動亂」評價、要求承認是愛國民主運動，這些實際上也間接地承認了。

當然，這中間卡在一點，即是否能公開地撤回「四二六社論」（即《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因為社論是鄧小平定的調，而李鵬姚依林等人實際上用「四二六社論」綁架了鄧，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堅決反對撤回，而趙紫陽被夾在保守派和學生之間就很為難。

當時閻明復等人和學生代表對話時已經很誠懇，幾乎是流着眼淚地講，你們要給改革派多一點時間。但最終無濟於事。

端：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是事後總結出來的，還是八九的歷史情境中大家已經清晰認識到的？

萬：當時大家就已經有明確認識。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中將其總結為「雙峰政治」。1980年代的改革，幾乎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攻守，前者以鄧小平為首，手下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後者以陳雲為首，也有李鵬和姚依林兩員大將。

陳雲的基本思路是主張「鳥籠經濟」、就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下，可以有一些自留地等小自由，但大的經濟框架不能動；鄧小平在經濟上

更加開放一點，「不爭論」，基本上就是跟着美國走，但與此同時，鄧又堅持「鳥籠政治」，也就是不能超越「四項基本原則」，其中關鍵問題還是「堅持黨的領導」，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地位不能動搖。

當我們說鄧是改革派旗手時，指的是經濟改革；而在政治上，鄧和陳並沒有區別。可以說，陳是「鳥籠經濟」加「鳥籠政治」，鄧是「自由經濟」加「鳥籠政治」，而胡和趙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更多想法，但他們無法主導整個局面。所以當保守派對胡趙進行攻擊時，鄧小平步步退卻，先後放棄了這兩員大將。

端：如何理解鄧小平既有「鋼鐵公司」般的政治定力，又做出如此之大的放棄？他為什麼不能力排眾議、力保胡趙？

萬：一方面，保守派攻擊的是胡趙的政治問題，而這也是鄧小平非常在意的。另一方面，這其中也涉及到許多政治操作上的問題。比如說，鄧最後下決心放棄胡耀邦，是因為胡在一次私人談話中對黨內同僚表達了對施政遭掣肘的不滿，卻被告密。而鄧對於挑戰他最高權威的行為歷來不能容忍，例如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魏京生等人的態度都是如此。

端：這類似於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表態。按理說，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黨內歷次殘酷政治鬥爭和清洗之後的倖存者，應該懂得進

退分寸，怎麼會犯這種錯誤？

萬：這一點上，可能還真是太高估他們了。政治人物有些是靠謀略，有些就是正派加運氣。比如胡耀邦有句名言，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必有。另外，他的一個長處、同時也是短處，就是從不拉幫結派，所以他身邊沒有一個「派」。

而至於趙紫陽，他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透露鄧仍然是中共最高決策者，被外界認為是事件走向的一個轉折點。從實際操作角度來說，負責安排活動的人應當負一定責任。比如從六四後江澤民重用曾慶紅來看，曾在政治上很成熟。而趙當時的政治秘書鮑彤在思想水平上沒得說，但在黨內鬥爭的細節安排上不夠成熟老道。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的會談，本身並沒有問題，但把會談用直播方式對外公布，這就成了一個問題。

當然，這件事也不完全是趙紫陽的問題，當時甚至「鄧辦」都要求趙講一下這件事（鄧小平的角色），因為之前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見面後，中國官方說這是中蘇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實現會晤，但蘇方說我們還沒有見到中共的總書記，於是鄧辦就希望趙紫陽見面時能夠說明一下這個情況。這些都不是問題，關鍵還是用直播方式播出去了。

事後很多人都問趙紫陽為什麼要這麼講，而趙的回答是沒有想到會出現這種結果。這種回應，說實話不能讓人滿意，因為你是政治人物，怎麼能對一種說法產生的政治後果事先沒有想到？你必須想到啊。而且當時政府和學生已經卡在對「四二六社論」問題上，趙紫陽本身是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妥協、而且說由他來承擔責任的，但這樣一直播，把所有的怒火和矛頭都轉向了鄧小平，鄧當然不高興，也正是從那時起，形勢才開始急轉直下的。

端：針對學生缺乏組織和策略的問題，《我的1989》當中已經提出過批評。30年後的今天，是否還仍然堅持這種批評？

萬：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學生第一年輕，第二還在成長過程當中，他們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不是他們本身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的長期培養教育的問題。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也是自食其果。

有很多有爭議的說法，其實仔細想想，共產黨一直是這麼教育的。比如柴玲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說「期待流血」、要通過鮮血來喚起民眾等等，但這種思維方式不正是共產黨的教育產物嗎？不怕流血、敢於犧牲、不願妥協的政治文化，在這一代人身上體現出來。知識分子去勸說學生，被嘲諷為「你們是來摘桃子的」——好像自己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一樣——這完全是黨文化、毛式語言薰陶的產物。

同樣，閻明復說「要給改革派時間」之後，學生方面的回應居然是「我們不被共產黨的派系鬥爭所利用」，但最後還是不知不覺當中被利用了，而且顯然是被保守派利用了，因為到後來很明顯，李鵬等人就是希望學生留在廣場上，這樣他們才能夠有鎮壓的藉口，也讓趙紫陽無法收場，如果學生真的撤了，他們下面的文章反而不好作了。

當然，今天我們主要應該譴責的，始終是掌握專政鎮壓工具的強者。當年我提醒王丹可能會被暴力鎮壓時，他認為最多不過是被棍棒打一頓，然後兩個人抬一個趕出廣場——他們的經驗是從1976年「四五運動」裏來的，學生對共產黨的殘酷一面缺乏足夠認識。

端：但是當年柴玲表態中有爭議的地方，除了剛才提到的「期待流血」，另一個就是她自己不想犧牲，你怎麼看待以她為代表的學生領袖的這種想法？

萬：說實話，她還真代表不了學生領袖，這很大程度是柴玲個人的特質。很明顯，黨不是這麼教育的，而是捨生取義、流血從我開始等等。我認為這反映了柴玲本人性格上的缺陷。某種意義上講，她（當年）還是很天真的，在這些方面，她反而講的是真話。

端：《我的1989》當中提到你的岳父李昌先生，他當初參加過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所以對1989年的局勢發展非常焦慮，擔心可

能釀成流血衝突。這是不是因為按照中共黨史來說，「一二·九」運動是中共北平市委領導，所以這種歷史經驗會讓後來的中共領導人認為，學生運動背後必然有「黑手」，所以必須強硬對待？

萬：在這一點上，你還真說錯了。「一二·九」運動本身背後就沒有什麼「黑手」，所謂中共地下黨組織、策劃，這都是後來的革命神話。

李昌先生和中共其實都非常清楚，當年這場學生運動是如何自發興起的，並不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和中共地下黨毫無關係，但在後來的革命敘事中把這一段完全改寫了。

後來在紀念「一二·九」運動時，當年的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後來的清華校長蔣南翔曾有個講話，其中把彭真吹捧為「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但彭真心裏清楚，他和這場運動沒有關係，所以他的反應也很有意思，對蔣南翔說，紀念大會可以口頭提一下，但不要寫入書面。（萬潤南夫人、李昌之女李玉插話：彭真1936年春天才來北京，毛澤東在同年秋天長征結束到達延安後才聽說北平學生運動的事。）

正因如此，李昌先生從來沒有懷疑過1989年的學生背後有陰謀策劃，但對於預判這個政權面對學生運動要鎮壓、要流血，這一點他是有明確認識的。

端：那麼在知識分子這邊，你覺得最應該反思的是哪些方面？

萬：他們本身有雙重角色，一方面，相當部分知識分子在勸說學生離開廣場，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效不大；後來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個人絕食，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取得廣場上的話語權，因為如果學生靜坐絕食，知識分子上來勸，是不管用的，但如果我們和你們一起絕食，那就算共患難了，他們當初的確有這方面的想法。而且，六四凌晨最後關頭從廣場撤退時，他們也發揮了作用，避免了更大犧牲。

另一方面，在我看來，知識分子本身的最大失策，是在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談話之後知識界的《五·一七宣言》，指責鄧小平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一下子把鄧逼到死角。從知識分子的正直和理性角度出發，提出這些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但這就是當年的政治現實，在此之前，知識分子基本扮演這踩剎車、救火的角色（雖然無效），而某種意義上說，《宣言》起到了激進作用，激化了矛盾。

**我不是鄧，我不如鄧**

端：30年來，有人先是流亡海外，後來寫了保證書或者悔過書換取回國資格，你在這30年中有沒有這種機會？

萬：此前有很多朋友出於善意，通過各種渠道問我要不要回去，至少可以看看親人，但前提都是要表明態度，就是認錯，當然也有一些婉轉的說法，讓我起碼要表示一點「內疚」，我當時的回應是，第一，到這個歲數，現在違心的話不想再說了；第二，殺人的人不內疚，我這個反對殺人的人反倒要內疚，這是什麼道理？

2010年我的岳父李昌去世的時候，中紀委派人問家人，李老還有什麼遺願需要配合解決，我的岳母很直接地說，李老的願望就是「讓小萬回來」，這個事情當然中紀委自己做不了主，所以給中央辦公廳打報告請示，同時因為擔心我在海外的言論影響這件事的運作，還特意向我打招呼，不讓我「亂講話」。中辦本身只是個辦事機構，最終還要主管領導人拍板，當時主管政法安全系統的是周永康。最後中辦正式給中紀委回函，說「有關部門」不同意。

我當時很清楚，肯定是不同意的；而且即便同意了，也要履行很多手續，都是我沒法接受的。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朋友做過努力，找過賈春旺、俞正聲、曾慶紅、胡錦濤等人，甚至連「保證書」都幫我寫好，最後都是因為我不肯「有所表現」，所以就算了。

端：但不管在政界還是在商界，「能屈能伸」應該都是一項美德，何況你如果回到國內，影響力或許會比留在海外大得多。

萬：十幾年前就有朋友專門去美國勸過我，說鄧小平「三起三落」，還保證過「永不翻案」，最後不也成功翻案？你就低低頭嘛。我說我不是鄧小平。朋友為此還很不滿，因為很多工作都已經鋪墊好了，只等我點頭就好。

但此話怎講？我的意思不是說我比鄧小平更有骨氣、更講人格。我是說我「不如」鄧小平。鄧是何許人也？在井岡山時期就是毛派，在中共領導人體系中曾是第三號人物，1966年文革打倒「劉鄧司令部」的時候，鄧心裏很清楚，他和劉不是一路人，被打倒是給林彪讓路。而鄧是什麼時候給毛寫「永不翻案」的保證的？是林彪在温都爾汗摔死以後，鄧知道自己有機會了。而我在共產黨裏有這種地位、作用和機會嗎？如果中國真的面臨民主轉型了，我寫個悔過書也就寫了，但是沒有這種機會，我學他寫「永不翻案」，這不是自取其辱嗎？

端：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六四之後30年無法平反，但等李鵬和江澤民等一撥人退出舞台，六四有可能得到平反嗎？還是說中共的體制慣性，導致即便人事不再，制度也依然會維持很久？

萬：我個人的一個估計，是這件事有可能的。對於共產黨來說，不應該再把六四看成是一筆負債，而是一筆資產。因為當你要動員民眾

時，重新評價六四其實是一個成本最低的辦法。鄧小平不是喜歡打橋牌嘛，六四就是一張牌，如果打得好，是有利於動員民眾、得到支持的。

至於當局有沒有可能去做？從我得到的一些說法來看，確實有人在考慮這件事。每當六四來臨是，有些人就被警告或者安排強制旅遊，但今年我得到一個信息，國保對有關人說：第一，你們不要亂說亂動給我們添麻煩；第二，現在平反不可能；第三，當局在考慮這個問題，等時機成熟再說——當然你也可能說，這是為了穩定人心的一套說法，真實性可以存疑，但也未必就是空穴來風。

### 「在商言商」：從四通到華為

端：在四通時代落幕之後，中國的民營企業有很明顯的「悶聲發大財」特徵，一些商界領袖的言論，比如「在商言商」，也引起很大爭議，你如何看待民營企業在中國社會發展和轉型中的角色？

萬：說這話的人太「虛偽」了（笑）當時我在四通，一開始還規定大家不能上街，說我們是做企業的，有角色分工云云，當時有一部分四通員工很不滿意，給我寫公開信，說別的公司的老總已經帶着員工上街了，頭上綁着標語，走在公司隊伍的最前頭。而這位老總，就是今

天說「在商言商」、說1989年「老萬腦袋發熱」的人，我說這傢伙當初腦袋比我還熱啊，當時「在商言商」的可是我啊。

話說回來，在中國這種專制體制下，「在商言商」是不可能的。每一代鉅富的崛起都不例外，也就是所謂「紅頂商人」，胡雪巖靠的是左宗棠，盛宣懷靠的是李鴻章。到了1980年代，康華公司靠的是鄧家，就連四通，因為受過趙紫陽的表揚，都被人說成是「姓趙」，更離譜的是還有人說我是萬里的兒子。

端：但在當下環境中，「在商言商」又如何解讀？任正非一直說華為是一家正常的公司，沒有政府背景，只憑技術力量掙錢，這也是「在商言商」的變形說法，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國內，一直都有懷疑聲音。

萬：華為目前遇到的問題，與其說是美國對他的圍堵，不如說是因為在中國這種環境下——我可以很明確地說——他不可能不和安全部門合作。尤其是在2017年6月《國家情報法》通過之後更是如此。華為作為領軍通信企業，中共不可能不對它有所企圖，雖然任正非雖然在公開講話中不斷否認這一點。

如果說這還只是一種推測的話，我還可以透露一個信息：當年四通已經被安全部門找過。我記得很清楚，平時都是我們請（海淀）區政府

的人吃飯，但那一次是區政府的人請我們吃飯，實際上背後是安全部門的人讓區政府出面來找我們，說得也很明確：安全部門要往四通公司派人，你們要配合。理由是：因為四通公司有許多「涉外業務」，所以要幫忙「把好關」，讓你們「少犯錯誤」。至於像今天的華為，在全世界布局，這是情報工作非常好的機會，他們不可能放棄。

另一方面，中國目前的「門閥政治」也決定了，沒有哪個行業能獨立於權力之外來發展。電信、石油、電力等行業、以及後來的海航和安邦，背後都有權力的影子。在這種環境中，有可能「在商言商」嗎？

端：雖然全世界都在懷疑華為，但目前的事實的確是，迄今沒有發現關於「後門」的過硬證據，能證明華為在和安全及情報部門合作。

萬：它不需要在產品裏安裝一個「後門」，所有的通訊數據需要備份，已經有案例顯示華為設備會自動上傳數據，這從技術上也可以解釋，因為出於數據安全考慮，必須異地保存備份，而且重要數據（比如銀行）的備份可能還不止一份，這都是正常業務，但是當數據被保存下來之後怎麼使用，這就是安全部門的事了。美國也在做同樣的事，比如聲稱出於反恐需要，要了解恐怖分子的資金往來，要求公司提供數據，你能不提供嗎？

端：除了技術問題，這次華為面對危機，任正非已經多次出面表態，外界反響普遍不錯，認為有格局、有眼光。你又如何評價？

萬：任正非的悲劇也正在於此。首先，他能夠把華為做到這麼大，這不是偶然的。他對美國的態度、對開放經濟、對自主創新的看法，是很實事求是的，這些話的確是「在商言商」，腦子也很清楚。

但問題在於，他在中國這個環境中，好比你有一對霸道的父母，你自己表現得再謙卑、再理性，是沒有用的，因為人家是把你當作國與國之間競爭的一個犧牲品。所以華為的悲劇在於，你自己再明白，如果這個國家不明白，無濟於事。

再往大裏說，華為所賴以生長的這個體制，是「百代都行秦政法」，以前是「儒表法裏」，現在是「馬（克思主義）表法裏」，再加上現代技術手段，使得控制更加廣泛有效，達到生活的所有細節。我原來認為，技術手段的發展有助於促進民主，但後來發現實際上可能恰好相反。美國現在有點明白了，如果你用這種制度、加上這種技術手段來競爭，那就要從根本上「斷開」，這就是為什麼華為、海康威視這種公司成為打擊目標，雖然現有的技術你還可以用，但下一步繼續發展將會非常困難。

**血仍未冷，骨頭仍硬**

端：你當年有一個著名的表態——「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30年後，如何繼續踐行這幾方面？尤其是當熱血慢慢冷卻之後，如何應對這種挑戰？

萬：正因為大家的血越來越冷，所以熱血更加可貴。我的看法仍然樂觀：中國可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人有一張嘴，要吃飯，要說話，要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要有言論自由，這是普世性的，中國人也不例外。當然，在長久的專制政治、物質匱乏和人口密度下，相比西方的確有不同的環境，但這是程度問題，不是本質問題。

說到六四之後的海外流亡運動，我們當年有一個期望——旗幟不倒、隊伍不散。如今來看，起碼旗幟沒有倒，還豎了很多面；隊伍起碼還有人能從世界各地聚來開會。一個流亡運動，能夠堅持30年，旗幟還在，人還在，血還是熱的、頭腦還是冷的、骨頭還是硬的，我認為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端：但也不能不承認，海外民運的聲音已經非常邊緣化了，在媒體上也很難發出有力度的聲音。

萬：我有個台灣朋友曾經戲稱，媒體行業是製造業、修理業、屠宰業。什麼意思呢？媒體先製造出一個新聞和新聞人物，然後不斷地「修理」他，每修理一次都是一個新聞，先是正面，然後是不斷的負面，最後「屠宰」掉。海外民運這30年來被「修理」得太多了，但還沒有被「屠宰」掉，這不正說明我們的堅強嗎？抗戰不過才八年，我們已經堅持了快四個抗戰了。

中國未來一定會變的，至於我們能不能看到，這不重要。有一句話我說過很多次，在六四30年之際還是願意再重申一次：在這場變化中，我們是壓力、是溫度、是催化劑，最後的生成物裏有沒有我們，不重要了，這就叫「功成不必在我」。

最後我想再強調的一點是，海外民運這30年逐漸走低，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美國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對中共抱有幻想，而現在面臨着一個大格局的變化，應該說，一個新的局面開始了，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此前中國的專制政體一直壓制着大陸、香港和台灣，現在美國醒悟到，必須要對這種強權針鋒相對，某種意義上說，民主的機會更大了。



*海外民運的標誌性人物之一，72歲的萬潤南。攝：凱楓/端傳媒*




*1989年4月19日，北京學生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放上鮮花和花圈，以悼念這位剛去世的國家領導人。攝：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1989年，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北京會面。攝：STR/AFP/Getty Images*



*1989年5月28日，學運中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的柴玲在天安門廣場上發言。攝：Chip HIRES/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6月，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李鵬等在北京接見戒嚴部隊。攝：*

*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學生。攝：Chris Niedenthal/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面對海外民運艱難的三十年，卻始終沒有被「屠宰」掉，正顯示其韌性之強。「至少我們血還是熱的，骨頭還是硬的。」萬潤南說。攝：凱楓/端傳媒*

# 關於端傳媒

自由的道路漫長，我們一起開端

◎端傳媒，立足香港，面向全球華語讀者，以原創深度報導和數據新聞為特色，深入剖析在地及國際事務。在時代潮湧中，提供新的討論視野和表達方式。2015年上線以來，獲得超過45個新聞或攝影大獎。設立付費制兩年多，累積付費會員超過40,000名，成為華文圈最具影響力的網路媒體之一。

▽瞭解更多



http://bit.ly/2KHTETa

▽索取《端傳媒2018-2019主編精選》



http://bit.ly/2xMxr3C

▽領取讀者專屬禮券，

書名：六四三十年： 走進記憶隧道，抵達三十年後的六四現場

作者：端傳媒

出版：端傳媒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663號泓富產業千禧廣場1001室

網址：https://theinitium.com/

出版日期：2020年



Published by Initium Media